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网思想的小鱼



自序

人不知不觉就到了老年，时令也进入了严冬。回首前尘，此生写作、翻译，一共出书近 50 种，不算少了。然则检视一遍，发现并没有收入那些集子的文字，不知还有多少呢。虽然写出之后也陆续发表过，却也从未注意搜集它们。不过后来又回到我手上来的，倒也不少。有一些是自己都忘得干干净净了，由朋友、编辑、图书馆里的书目专家、院校里的研究人员和读者，或将原件，或加以复印，送回给我。这些文字，称之为遗失了的文字，也是可以的。

现在要想把所有遗散了的文字都搜集回来，可难啦！开国以前的，“文革”以前的，许多报刊上都发表过不少作品，大多数没有了，只少数能找寻回来。“文革”中沉默了十年，没有作品。1977 年重新执笔之后的作品，还有可能找到。所以 1985 年岁暮，曾搜罗了一次，将近八年间的散文，尚未编印成书的，择取了 20 余篇，出了一本《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散文集》。然而它收得不齐，失散在外的文字仍然不少。

承蒙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先生热心，要为几位老作家出一套书，且以“书与人”为主题。加上一位年轻的友人徐鲁先生从中襄助，代为搜集和编辑成书，那么，自 80 年代以后的，尤其是晚近几年的不少零散的文字，则都分门别类，排队于此了。因为有“书与人”的主题要求在前，所以这个时期还有不少抒怀、纪游、叙事等方面的文字，只好留在本集之外了。

我曾经说过，我只是一个幻梦家而已。幻梦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迷人。而幻梦者和说梦者自己却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是在幻灭里吗？呵，就是在幻灭里呵！所以我有时倒十分愿意，把我的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称之为我个人理想的“幻梦与幻灭集”。

幻梦，幻灭；再幻梦，再幻灭……人生呵，可不就是这样幻幻灭灭，不可捉摸的么？就是宇宙，也不过是一大幻梦而已呢！

徐 迟

1996 年秋天以后

网思想的小鱼

祭于潮

这是一位卓越的国际述评家，开国以后，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外交界。后来他就成为风度翩然、出口成章、举世瞩目的著名外交家了。

现在他已经去世，寂兮寥兮，奉身长逝。但我仿佛还能看见他，含笑于九泉之下。愿他的灵魂平安，神静心恬。说起来，他可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了，能够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亲自领导下，长期地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作出了贡献。世无完人，孰能无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矣。他是在团圆月、中秋夜离开我们的。一年容易，今又到了月圆时。固然月有盈亏，人寿也有短长。倒是青春最怕以日月相计，反而人寿可以世代传记。浩浩的太平洋波涛，未必能忘记他曾经建有几番功勋。他那永远挂着笑颜的形象，还长久地缅留在老人们的记忆之中。生灵总是有弱点的；人既已去矣，他的弱点也将随时间而消逝。唯独经国大事，文章风采，仍将长存于人们的心中。虽然眼下的一些读者，尚未能对他有所赏识，但我却要斗胆地陈言，任何一个认真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痛的人类历史的学者，恐怕是不能不对他的国际述评表示敬佩之情的。

我有幸结识他于1939年的7月1日，在我国的香港九龙。就在那一天，我们党的一家海外报纸《时事晚报》，即后此的《华商报》的前身，悄悄地在海岛上诞生发行了。报纸的第一篇社论，以俊逸的文笔，写出透彻的见地，闪耀于读者之前，而使我震慑，为之叫绝。之后他天天都有一篇社论，使南天的读者，目明耳聪，茅塞顿开。我个人则是如同从沉睡中被他唤醒一样，觉醒了过来，从此追随真理不舍了。

这一段时间里，抗日战争艰苦卓绝；随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铁骑过处，山河变色；接着苏德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莫斯科城下、涅瓦河畔和逐屋争夺的斯大林格勒废墟中。然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迅即沦陷。这一下，他的火焰般的热情社论，只好收笔打烊，暂告停歇了。

当经西江一路，辗转流亡，我到了桂林山水之中，就打听到他已通过东江游击队救援，出险脱身，安抵韶关了。1942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又在嘉陵江上、山城灯火之中，喜庆重逢。他进了新华日报社，先住在纯阳洞的报馆宿舍中，后住在曾家岩“周公馆”的三楼上。虽然雾都生涯，阴晴显晦，但他又在谈笑风生，再次使翰墨生辉了。

从1943年元月开始，他的国际述评重新开张，出现在《新华日报》的版面上。每两星期一次，纵论着半月来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人间际遇，时代的潮流与历史的轨迹。那时，他有两个笔名：于怀和于潮，交替用于文化论著国际述评。历时三年之久，他那样系统地、完整地，搜罗了、占有了祖国和世界各地的见闻和资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锐利目光，严密的切脉诊断，纪录了、并解剖了当时的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人道与兽道，天堂与地狱的史实，关怀着世界与中国的命运。在周副主席的直接指导之下，他了如指掌地辨识了欧洲、亚洲、非洲与美洲的纷纭危机，生花妙笔，写出了决定着生死存亡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战场。那全球规模的力量对比，无数次往复进退的钳形攻势、迂回包抄的战略与战术，他是广博而深入地写出了战争进程。波涛万顷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斗争，犹如帷幄中的运筹，论胜负于千万里外。如今再读他的《国际述评集》（今年由重庆重版出书），可以重睹30年代40年代的大事。其印迹如此分明，从而更能体会他当年的分析

是何等正确。从芦沟桥的炮声到广岛的蘑菇云，从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到法西斯纳粹的溃败，从旧金山的联合国的成立，到必然要导致新中国的崛起的内战烽火：这一段历史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国际述评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后，有一段时期我曾同他一起工作。但是我们的接触反而不能如以前那样的多了。在他初次去联合国之前的别宴上，听到他咏螃蟹的诗句：“一去成功湖，此物最相思”，为之莞尔。在开城板门店，也曾见了一面，感到他对于敌方真能针锋相对，游刃有余。以后，却隔行如隔山，几乎没有再见面了。但他的风韵，他的文采，还能从新闻电讯中，甚至从外交文件中，隐约窥见。此后之事，如所周知，无需赘述。但时常看到他身负重任，尚能称职，还是欣慰莫名的。只能笑语自慰，他是在跟基辛格、尼克松、田中角荣、瓦尔德海姆、马立克、葛罗米柯这等人物打交道，吾辈可是不容易见到他了。就这样阔别了二三十年，久未和他通上音讯了。

有趣的是人生诚如螺旋。到了他的晚年，我们又能见面叙旧，说些老话了。他仍然警句甚多，妙趣横生。虽然他重病在身，是不治之症，但是风貌不减当年，并未形容枯槁，他还可以息影书斋，闭户读书。惜乎天不假年，满月西沉，千秋功罪，自有公评，只是重读他早年华章深有感触。周年忌辰，聊表寸心。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1984年中秋前夕

和平安详的乔冠华 ——纪念乔冠华逝世十周年

去年曾见到一篇文章，叫《一言难尽乔冠华》。全文充满了热情，赞扬了我们这一位卓越的外交家的一生。就是在说到他的晚景时，却不知怎的，说他还是出了什么问题。该文引用了一个外籍洋人某女士的一大篇话，据她说的是，乔冠华此人后来变坏了。

她的话有什么根据没有呢？她并没有说出什么有根有据的话语，她也只是道听途说，并含糊其辞的，没有给出什么有力量的论据来。而这《一言难尽》的文中，却是引用了她的很长一大段的，相当感情用事，信口雌黄的话。可叹的是，引用在这洋洋数万言的，热情洋溢的，很好的文章的结尾处的话，是很不恰当的，令人遗憾的，未可轻信，不能令人信服，真是“狗尾续貂”！只能叫人茫然。

本来这些事也是犯不着多说它的。

然而这个疑问，却很多人都是有过的，或者说，免不了都有过这么一点点的。他这个人，是这样一位仪表堂堂的人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全球性的外交领域中，他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机智，他的口才，他的学问，他的风度，是五洲四海都曾倾倒过的。当然也不是说，他是永远不会错的。人孰无过？但是要看他究竟错在哪里了。现在却有人向他泼去了一盆污泥水。怎知又有人在一篇极好的文章里引用了盆里的少许污水。本来在有一些人的心中是怀了一点儿疑问的。这样一来就更想要有个明白端倪了。到底这盆污水泼得对不对？

我本人也多多少少有过这样的一点点疑惑的。在“四人帮”当权的时候，他还在当外交部长。谁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当时，毛泽东是主席，周恩来是总理，当然是他们让他当外长的，他又不是不称职的。然而在两位老人家都过世以后，就不大好说了。

因此，在他终于辞职以后，有一天我去到他家里，曾当面问讯过他自己，问的就是在粉碎“四人帮”那一年，他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后，回到国内来，随即就被撤了职，此后也就不再起用他了。这究竟为什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出了问题，那出在哪里呢？我这样直率地问讯了他。我们是半个世纪的老友，不过在他任外长时往来较少，直到他赋闲后，又恢复了旧情。

这个乐观而又豪爽的外交家，听了我的发问后，大笑起来，说事情已过去了好几年了，何必旧事重提它们呢？我说，不然，连我都心中有点疑惑，你还不给我澄清澄清？好歹总得让我放下我心头的负担。我们只是谈谈心，你给我指点迷津，就是画龙点睛式的，点到了也行，给我说说明白啦！

他想了一想，又大笑地说道：

“有一个小故事，是很有趣的，我就给你说这个故事：就是在我最后一次出席那个联合国的大会上，我是要作一个重要发言的。重要是因为国内已经发生了人事变动，人们都在关心中国局势的变化。当在我准备讲稿之时，北京来了电报，告诉我这次讲稿中应该保持“按既定方针办事，”这样的字样。好了，既然有指示，照办就是了。不料，在联大会议之前，我又接到一个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告诉我一个新的决策，就是又要把“按既定方针办事”，这样的字样删掉。好了，又有了指示了，照办就是。因此，在联大的大会上，我没有说这七个字，就是说，删掉了这七个字。哪知开完了大会，回到大使

馆，我得知，国内已经因为我在这次联大的发言中“说”了这七个字，在批判我了。批判我的罪状自然是很多的，其中却有一条是我“说”了其实我没有说的七个字。

“这一来，我一下子心中有数了。我查阅北京发电报的时间后，就豁然开朗，我了解了一个有趣的键。

“有趣在于第二个电报是发出于联大会议开会前很短的时间里。发电报的人以为我是不可能收到这一个指示的。所以电报虽然是故意的，有意地发出得很晚，算准了我将收不到这个电报。他们以为我没收到这电报，就会说出这七个字，如果我说出了，他们就能让我犯下这个错误了。

“他们不知道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是有一个所谓‘时差’的东西的。

“但因为有‘时差’，结果我是收到这个电报了。他们是土老儿，不知道东半球西半球，这两个半球之间，是有‘时差’这么个东西的，这回‘时差’帮了我的忙！我没有吃亏，没有落入这个陷阱。不过，回想起来，不免有点儿不寒而栗。”

他说完，又笑了起来。不是苦笑，是真正的好笑。

他的话使我明白了，原来如此，谁想得到还有过这样的事。在纷纭的国家大事中，真使人想起鲁迅说过的，“好像看《三国演义》似的，好看得很。”至于他讲的“时差”的小故事，却是连《三国》里都是没有的。

关于“时差”，也许应该再说一说，作一点解释。

很多年前读过的书，大都记不大清楚了，但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也不少。我记得读过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曾写有一篇关于“时差”的名著，里面说的是：某一航海家，从某港出发，将在一年内，在完成绕地球一周的航线后，还同日回到原来的出发港。行前有盛大的庆祝会为他送行，说好回来时也会有同样盛大的欢迎会，迎接他的归来。然后，他按计划走上了他的航线。一年内经历了很多的变化，是不必多说的了。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他的全部旅程。只是最后的一小段不太顺利，可能会使他晚到一天。为了加速他的轮机速度，把舱房内的木板都拆下来，烧掉了好多。但还没有成功，他肯定已没法如期地回来，进入他的出发港了。但是，当他进入港口之后，却发现码头上已人山人海的，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在等待着他。原来他不知道，他绕地球一周，是会产生刚好是一整天的“时差”的。他以为他失败了，哪知他正好及时赶到！要不然他们就要提前一天，反而“过犹不及”，美中不足了。于是，皆大欢喜，这部小说是以大团圆结局的。

十八、十九世纪还不知道“时差”，20世纪里，有了超音速飞机之后，这一个“时差”问题，才比较广泛地为人所知。坐过喷气机作远距离飞行的人大都知道它，并且它还有点儿使人受不了。却谁也想不到，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中。在一出“三国”似的好戏里，“时差”还能助一臂之力，救起一个人。从前述的故事中，可见也并没有什么“一言难尽”的事儿。只有一段趣话，举一隅而三反焉，即可澄清得了的。

现在已经无所谓“一言难尽的”乔冠华了，且也无所谓“满城风雨的”乔冠华了，现在只有一个“和平安详”的乔冠华，躺卧在浩瀚的太湖之滨，洞庭东山上的墓地。在杨湾山腰，在那果树林下，他长眠着，安息着。不觉他已经去世十年了，闻着花果的馨香，听着湖水的波音，他留下了一片丹心，面对着永恒的苍穹……

是诗人，是画家 ——悼念芦芒

深更半夜，一个长途电话把我叫醒。

心知有异，这样的时刻来电话，不会有什么好事。

开灯起来，接过电话，只听到一片哭声。一个泪音告诉我不幸的消息！你突然病逝了！

此后便是一片呜咽声……这怎么可能呢？……三天之前，你从我们这儿出门回去，还是那么精神，那么热情洋溢、神采飞扬。你在这儿写了诗，画了一幅又一幅的画，写了那么多张的字。这儿的一些同志要留住你，也留不住。你那样欢笑着，一挥手就走了。

我们还希望你两三天后还来，你也答应，如果不去南方，就再来这儿。你要给一本画册写序文，并且要写诗，作画。你诗情葱茏，画意浓郁。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那么愉快的一星期。没有任何疾病的症状，没有一点儿预兆半点儿阴影，一切都是光亮的，欢快的，甚至是香雪海似的一片灿烂的，怎么你就突然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呢？热情的人呵，怎的舍弃了我们呢？

我们在一起住，你在楼下，我在楼上；你在绘画，我也在改东西。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一起在园林里散步。我们把臂同游香雪海，之前不久也是一起飞越长空，到北京去开诗歌座谈会；也是在一起，今年元旦到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去。

我是较晚才发现你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以为这是你的二重性。在先，我却只知道你是诗人，而且是一个政治倾向性比较强烈的诗人。我微微感到你在诗艺上有着某一种特点，而没有研究出来，我不知道你原先是一位画家。我最近想研究你的诗，你把你的诗集都端到我的面前来。我只拿了你最近将要出版的一本诗集的清样，现在它们还在我这里。但是它们的作者却永离我而逝去了。

直到前两年，我才看到了你在战争年代里所作的许多幅的素描原稿。最近我又重新把它们看了一遍。那带着硝烟味的粗犷线条画出来的人物、山水和场景，绘形绘影地歌颂了新四军的英雄，战斗的生活，敌后的群众和东海之滨的海防大队的革命的浪涛。两次看画，都使我震动。

这些素描，我深深感到，是一种革命的历史的速记记录，是从火热的斗争的生活中涌出来的，是最直接的反映，因此最有生命力。我想不到你画得这么好！

我感到，从这样的素描基础上，理所当然要产生出大幅的版画以至巨幅的油画，许多精采杰作的。但是进城以后，你基本上放下了画笔，而写起诗来了，也许这样做，是因为你可以展开一幅幅更加宽阔雄浑的画面。然后你悄悄的又挥动了画笔，然而却画起国画来了。也许这样做是因为在国画的笔触里，你可以更加细致入微地浓缩诗情和精练你的画意。

我从你的即将出版的诗集《奔腾的马蹄》里，看到这本集子的主题歌，题目叫做《奔腾的马蹄卷起革命的旋风和闪电》！多么好的一个诗的题目呵！我还没有读到过一首诗是用了这样强烈的诗的语言与画的形象作为诗的题目。在这首诗里，你把上海市比作一匹“红鬃的烈马”：

马蹄迸溅出

数不清的火光。

“好！你这大上海的诗人呵，你把上海市，这伟大的疾驰前进的城市，

歌颂得多么雄浑、壮丽呵！

你是大上海的诗人，你是大上海的歌手。你的嘹亮的歌喉高唱出大上海的气派声势，你的彩笔绘画出我们心爱的城市，祖国的也是世界的伟大城市，上海市的风光风物。你的一首《登高》里写着：

晨曦中我登上大厦顶层，
呼吸着吴淞港外吹来的海风。
俯瞰着英雄城市的全景，
那浩荡的气势如同江海滚滚。

你既是在写诗，又是在画画，你画出了“白练似的江面上帆樯林立，艨艟驰骋”，你画出了“翡翠河般的外滩碧波荡漾，鲜花缤纷”，你画出了“近代化的建筑像摩云峭壁，倚天峻峰”，你画出了“急旋的车轮沿着钢铁大桥如江潮奔腾”。就这样，整个大上海罗列在我们眼底。但见“党的阳光照引百万面红旗如万马跃奔”，你的诗中出现了这样瑰丽的图画，诗中的画正是可以补画中之诗的不足的；反之亦然。

最近我看到你的国画《春耕图》。你是画牛的能手，善于画出耕牛的诗来。耕牛足踏在稻田的春水之中，春意盎然，忽然一回头，（当然是牛头）相望，神情憨厚。我也是当过牛倌的，对牛也比较熟悉，能解牛语，因之从你这幅《春耕图》上，我听到这劳动者的牛的哞哞的语音，诉说着它对人的脉脉诗情。这次你在楼下画了很多幅耕牛，于是我忽然发现，你所画的耕牛，都有你自己的形象在内。于是在你走前一个早晨我把这话告诉你。你说，是的。原来已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说了，很多同志都这么说过。你有着耕牛那样的劲，有着耕牛那样的力，你在用你的诗和画，犁开我们的春耕的大地，用热情的黑眼睛注视着我们。

我喜欢你的诗，也喜欢你的画。因为它们真像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你那首《油菜丰收进行曲》里：

呀！这么多的白蝴蝶，
愈来愈多啦！
呀！这么多的白蝴蝶，
舍不得离开啦，
尽飞向人们的脸庞，
呀！油菜丰收，
遍地芬芳……

那样动人的小诗的烂漫的画面，那样跳跃着的抖动着的飞翔着的诗情！真正是随类敷彩，尤其气韵生动！

还有一首《野葱花》，写红军长征，穿过川西北大草原时，切开皮带煮锅汤的时候，野葱花忽然“从草丛中遍地焕发青春”，你歌颂了这种可以食用的野花，歌颂了通过这草地的风雨苍茫的七昼夜的红军，“在红军的嘴里现在还留着你的清香”，你写着，也是画着：

野葱花，野葱花，
你星星点点长在草原上，
朴素的形象，鲜艳的光泽，
就像红军的脚印在闪光。

我们的诗人又是画家，像《母亲的名字》，是你最好的一首诗，像你送我的那幅《桔颂》，画着鲜红的洞庭红桔，也是你的最好的画……你还将写

出更多好诗，画出更多的好画！

可是，你已忍心地离开了我们。一挥手走了，再不回来了。从楼上走下来，经过你住过的房间，我想起我们还有许多关于革命生活和艺术创造的话要交谈，可是你已经不在了。我又走过那些园林，要告诉你，玉兰已经待发，茶花已经放红，可是你不在了。我在吃饭时好像你还坐在我的对面，欢笑着，神采奕奕呵！我才知道那几天你虽然精力弥漫，可是疾病已经隐伏在你的身体里了！有人约我去看盛开的红梅，可是你已不能同去了。我怎能忍心告诉你，你的孩子们哭得那样悲痛，你的那位最亲密的战友如何坚强地忍受着她的绝望的痛苦。我仿佛看到上海市民的哀悼，失去了我们的诗人。我简直无法写下去了，亲爱的诗人，你还没有老，可是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文艺界何其不幸，又有一颗星星突然陨落……

马思聪

马思聪先生曾经并不是用音符,而是用文字,写下了一首《童年追想曲》。他写他母亲。记得他三岁在外祖母家里听留声机,便能跟上唱片一起唱。七岁时他堂嫂在风琴上弹中国曲调,他听后就学会了弹出来。只是他手细,不能弹八度音,他用三度音代替,还比八度音更合乎和声呢。十岁弹月琴,音乐记忆力特别好,他能背出许多首很长很长的粤曲。十二岁他大哥从法国带回一把小提琴,演了几个简单的曲子,他觉得太美妙了。大哥说:你若高兴学,带你到法国去学。他认真地说,他一定去。他是一个固执的小孩,以“一定”始就以“一定”终,他这句话很重要。大哥果然带他去了法国巴黎,住在枫丹白露附近。一个女教师在一把旧提琴上,举弓拉了一下A弦,说“这样拉!”马思聪也照样来了一下,说“就这样拉!”一个小提琴名手这样开始了他的漫长生涯。

这位女教师教了他两个月。因搬家到巴黎的东区,换了第二位女教师。她严一些,他每天拉上三小时;半年后又迁居,又换一位老师。后来还换上了第四位女老师,她是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的。一天他冒着滂沱大雨,骑单车去上课。在他走过她家的地板上,好像有一条河流在流淌,吓得女教师像大祸临了头,问他为什么不穿雨衣。他说这可以锻炼他的身体和意志。这话也反映了他的性格。就在那时他有了创作欲,写过一首《楚霸王乌江自刎》的小提琴独奏曲,还写过一首根据一篇童话写的《月之悲哀》曲,足见他少年时候已能刚柔并济了。

1926年他16岁,即考入了郎西音乐院的高级班,学小提琴、钢琴、视唱和乐理。他参加过一次比赛,弹奏了帕格尼尼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得第二名。惟时他已感到,郎西音乐院也许不可信任。他跑回巴黎,结识了巴黎国家歌剧院的小提琴独奏家欧柏陶先生。思聪奏一个协奏曲给他听,奏的是拉罗的《西班牙交响乐》。欧柏陶先生听完后说:“你的演奏,表情很好。但是弓法指法,都有误差。”他不得不改从欧柏陶先生学琴,以纠正他那些多么令人恼火的差误,然后琴弹得更好了。

1928年他考入巴黎的国家音乐院。学小提琴之外,他还跟宾南蓬老师学作曲。次年又专门学了一整年的作曲法,1929年他写出了《宋词七首谱曲》(作品第一号)。从开头就是浓郁民族气息而使他属于民族乐派的,他那作曲家生涯便如是发端。

根据他晚年写成的《简历》得知,他从二十岁起便开展了一系列创业性的音乐活动。1930年他创立了第一个完全由我国器乐家组成的交响乐管弦乐团,他自任指挥。1931年他创办了广州音乐院,任院长。1932年他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直至5年后抗战爆发。1937年他转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以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战时的流亡生涯,他挟着小提琴,流浪在中国大地上,开了不知多少音乐会。1939年他经香港、河内到云南的澄江,时中山大学迁校于是。1940年来到陪都重庆,他创办一个国家级的中华交响乐团,任指挥,兼任协奏曲的小提琴独奏家,他在重庆指挥独奏过几十个场次,蜚声于大后方的中外爱乐者之间。(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和他相认并成为莫逆之交的。)1941年他飞到香港,用他的琴声和他自己创作的浓郁民族风格的乐曲,征服了香港热情的中外听众。这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经历了香港的炮火,1942年又开始流亡。经他家乡海丰,辗转到了桂林,又回到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

1944年又是湘桂逃难，奔波于桂林、柳州、贵阳、昆明。1945年到重庆、成都，又到贵阳任贵州省艺术馆馆长。1946年飞到上海，建立了上海音乐家协会，又转台北，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然后又回广州，到中山大学执教，兼广东省立艺专音乐系主任。1949年他到了北京。在第一届全国文代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随后作为文艺界的新政协代表，他参加了那历史性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时他任教于燕京大学音乐系。1951年他被委任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多年以来，到这时，他已经谱写出很多重要的作品，开创了丰富多采的一代民族乐风。

继他的第一号作品《宋词七首》之后，他写了三重奏和《第一小提琴钢琴奏鸣曲》。然后，是那么多的浓郁民族风味的美丽而健康的小提琴曲。如《摇篮曲》（第四号作品），是他自己演出过最多场次的，非常受欢迎的一首，作于1935年。第六号作品作于1937年，名叫《第一小提琴回旋曲》，也是他经常演奏的保留节目，显出了他拥有最美丽的民歌资源，随手便可展出最好的旋律。也是这一年他完成了他最重要作品之一的《绥远组曲》现改名为《蒙古组曲》（作品第七号），内分三章：一、史诗；二、思乡曲；三、塞外舞曲。这是使他享盛誉的杰出作品。《史诗》奏出了抗战的激情主题。在离乱生活中的《思乡曲》唤起了广大听众的联想。《塞外舞曲》气魄雄健，所受赞赏仅次于《思乡曲》而已。这个组曲有小提琴谱及乐队总谱，流传最广。

他一生有三个创作时期，分别有三个创作高潮。1941年，在躲避日机轰炸的香港防空洞里，我亲眼看见他开始动手写他的《第一降E大调交响乐》，这部交响乐于1942年夏天在桂林脱稿，并完成了乐队总谱，是他的第十四号作品。紧接着他又完成了第十五号作品的《西藏音诗：一、述异；二、喇嘛寺院；三、剑舞》。《述异》正如其标题的涵义是瑰丽而又苍茫的；慢乐章的《喇嘛寺院》哀婉凄绝；《剑舞》气势磅礴。到1943年，他在粤北坪石的大自然环境中，创作了《第一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鸟惊喧，第二乐章的昭君怨和第三乐章的贺新岁。这是他的一个极受欢迎的第十六号作品。同时又有两个小提琴曲子：《牧歌》和《跳神》，分别为第十七号和第十八号作品，写于1945年。至此他的创作高潮还未衰退。

接着他给中国人民献上了三部大合唱：第二十号作品的《民主大合唱》于1945年；第二十一号作品的《祖国大合唱》于1946年；第二十二号作品的《春天大合唱》于1947年。这些作品号召团结战斗、歌颂祖国，抒发对新中国的希望与理想，同时代的潮流紧密合拍，正是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群众歌声。

开国前的这个创作阶段，他一共写了二十二个作品。

去年我有机会到桂林旅游，在市图书馆找到了桂林版的《大公报》。1942年8月29日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有我们之间的《两封关于音乐的公开信》。副标题是“论纯粹音乐、标题音乐、舞剧、歌剧、世界性和民族性。”两封信中的一封是我写给他的“提问”。我的问题提法较怪，不值得再说了，第二封信是他写给我的“陈义”，他的陈述思路明确，结构严密，如经典性的定义一般，值得在今天再摘录若干章句的。

例如：他说，“音乐直接唤起某种情感，它并不告诉唤起某种情感的原因。”“音乐只唤起效果，其来由是不管的。”“各人凭着自己的经验、自

己的生活去回忆，去发生联想作用。所以一首乐曲的解释是因人而异，而且无可能是同样的。”以上是他对纯粹音乐的陈述。

他又说，“既然音乐唤起联想的作用，于是好些作曲家就想出，不如把联想确定了。于是标题音乐产生了。”“可是把标题省略了，所余的仍是纯粹音乐，仍然唤醒个人不同的联想。”“我觉得纯粹音乐胜于标题音乐，其原因在于纯粹音乐能永远发生新的联想。”

关于舞剧和歌剧，他这样写着，“音乐加形象：舞蹈。音乐加形象加文字：歌剧。”“在我，纯粹音乐是最高的表现。但舞蹈、芭蕾舞剧也是被人视为极完美的艺术形式。”“在音乐史上，歌剧是尽了最大的诱惑，去把群众领入音乐的圈子的一种形式。”“我希望将来能够尝试一下。”他晚年果然实践了他的愿望。然后，他在信中又说：

“让再给世界性、国民性、个性等关系的范围，单纯的说一说。有个性不一定有国民性和世界性，但最高超的个性可能三者都有。有国民性的不一定有个性有世界性，但最高超的可能三者都具有。有世界性不一定有国民性，但可能有国民性又有世界性的必有个性。”这段话对我们今天的音乐界可能特别恰当。

这是距今四十六年前写的。可以说它经受住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的考验。这也可提供我们对他自己的创作进行验证。它和他的音乐理论完全一致的。

在40年代里，他曾经为新中国的理想而追求而奋斗，到50年代，似乎都已经开始实现了。身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他推进了全国的音乐教育。在教学之外，他举行小提琴独奏会，使他的琴声在全国飞扬。他的弦乐、管乐、声学作品，一创作出来即由中央乐团和其他音乐单位演出，首场还常由他自己指挥。有些过去未能演出的作品如《第一交响乐》和几部大合唱都演出了。他一家子，夫人王慕理，女儿碧雪、瑞雪，儿子如龙，全家住在一所精巧的四合院里。孩子们都学音乐。当父母在家合奏时，孩子们就在大钢琴底下的地毯上倾听或嬉戏。这是我在他家里时常看见的愉快景象。他还在全国各地旅行，除西藏之外，足迹遍于东西南北，各大小市镇城乡。他还时常出国，和世界音乐界人士往来。

那时工作愉快，生活安定，举国形势，蒸蒸日上。他的创作也反映了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息。1950年他写了《欢乐组曲》（作品第二十三号）。《汉舞曲三首》（作品第二十四号）其中包括腰鼓舞、杯舞和头巾舞的钢琴曲。

《第二小提琴回旋曲》（作品第二十五号）。1957年他以充沛的感情和娴熟的技巧写成三首小提琴钢琴曲：《山歌》（作品第二十六号）、《春天舞曲》（作品第二十七号）和《新疆狂想曲》（作品第二十八号）。到1953年，他登上三个创作高潮中的第二个。这一年之内写出了一部《淮河大合唱》（作品第三十号）、一部为郭沫若的诗剧《屈原》谱写的戏剧音乐《屈原剧乐》（作品第三十一号）、一部钢琴《粤曲：一、羽衣舞，二、奔马，三、狮子滚绣球》（作品第三十二号）。还有简直像喷泉一样迸发的四首小提琴曲：《跳龙灯》、《慢诉》、《跳元宵》、《情歌》（作品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号）。这个高潮到1954年还保持着，他又创作出一部交响乐诗《山林之歌》，为作品第三十九号，分五个乐章。一、召唤，像屈原的《九歌》中的山鬼在召唤她的恋人。二、过山，恋人穿过猿声啼不住的山林，过山而来。三、恋歌，情人们从日落中对歌到深夜。四、舞曲，山地人的舞蹈，粗犷而神秘。五、夜，月华升上山来，树叶瑟瑟作声，然后一切安息了，一

切复归于寂静。

这以后的两年，他没有出作品，到1959年他拿出了一部《第二交响乐》（作品第四十三号）来。这部献给国庆十周年的交响乐描写了中国人民经过无数次的起义斗争到最后取得胜利。一共四个乐章，一、快板，二、慢板，三、快板，四、终曲；但不间断，一气演完。这部交响乐当年由他自己指挥在中央乐团演出，还灌了唱片，我现在还保存着这张唱片。

然后到了1960年，他完成一部《A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第四十四号）却就此沉默了。

这第二阶段里，他共创作了二十二号作品。

他沉默了十年之久。为什么我们的音乐家沉默了这么长的时间？沉默了，就无法知道为什么。如果能够回答，他就不会沉默。但是后来我们不也是一样，沉默了十年之久吗？基本上是一样的原因，不过他比我们大家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有沉默的必要。他比我们早了五年，可也不能搭救他。不过五年之后，渔阳鼙鼓动地来，那吵闹喧嚣的“文革”就在1966年发生。这场大悲剧替他，也替我们作了回答，作了说明。难言之隐，无言之痛，所不同的只是，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服服帖帖，听任摆布，而是像一只似乎柔弱的不驯的夜莺远走高飞了。

我和他在40年代中是往来密迩的知交，50年代各忙各的了，遂隔行如隔山。60年代前半期我离京迁往武汉，我们中间就隔了一道黄河。60年代后半期，他去国出走，更隔了一个浩瀚的太平洋。直到80年代才又通上音讯，到1984年才有机会，我到费城又和他会了面。于是我知道了他是如何自我放逐的，如何在70年代初就又在琴弦上、在乐谱上，响遏云霄地歌唱起来。1970年又恢复了音乐生涯；1972年进入他第三个创作高潮，那年他和马如龙一起拉他的《小提琴二重奏五十首》（作品第四十六号）。用女诗人马瑞雪的诗，谱写女高音独唱曲，一首《家乡》（作品第四十七号）和一首《热碧亚之歌》（作品第四十八号），在台湾演唱了，尤以后者博得热烈的欢迎，简直轰动。1973年，两个作品，《阿美组曲：一、春天；二、寂寞；三、少女；四、月亮；五、山地舞》（作品第四十九号）和《高山组曲：一、祭神；二、芦笛酒歌；三、战舞；四、咒语；五、收获》（作品第五十号）都以台湾民歌为主要旋律，都在台湾演出了。然后他专心写作一部“音乐加形象”的芭蕾舞剧，开始于1971年，花了七八年功夫来写和修改。取材于《聊斋》的同名小说，三幕四十二个曲子的《晚霞》（作品第五十五号）完成于1978年。在台湾演出时，曾改名为《龙宫奇缘》。我看过它的电视录相片。演出的盛况是空前的。

1980年他完成了《第三小提琴回旋曲》和《第四小提琴回旋曲》。（作品第五十六、五十七号），接着完成了《A大调钢琴协奏曲》。它以云南民歌为主旋律，五易其稿，是为第六十号作品。稍后他投身于“希望将来能尝试一下”的大歌剧《热碧亚》的创作。剧本和歌词是马瑞雪创作的。他是反复的修改，父女二人合作得很好。就这样，马思聪完成了一部以新疆民歌为主要旋律的歌剧，作品号码第六十一。这是他的最后一号作品的天鹅之歌。正是这部作品使他积劳过度。甫告完工，就进了医院。最后手术无效，不幸病逝。因而他久已准备就绪，本来即可开工谱写的另一部大型歌舞剧《九歌》便成了未竟的遗志。他再不能完成这个和其他的许多计划了。

这样在他第三个创作阶段里，他写了十七号作品。

他一生一共写了六十一号作品。我本来以为他的作品目录是可以达到一百以上的数目，但我们国家十分地动荡不安，政治生活更多变易，致使文化事业遭受屡次的干扰。开国以后，极左路线对文艺事业无穷无尽地横加干涉。鸟惊喧早变成鸟惊弓。因此，和西方的那些音乐大师的作品目录相比较，他写得可是少得多了，他当然是会写得更多的，如果没有这些那些干扰和干涉。但是他还是写得比任何其他的中国作曲家多得多。不说早夭的聂耳，或寿命也不长的冼星海、黄自，都只写了歌曲大合唱和几部交响音乐，而长寿的赵元任也只有几十首歌，他另有专业。

我们的音乐界、音乐评论家，对我们自己的作曲家可以说一般地都不怎么热情。文艺界里懂音乐的人也并不很多。1941年在香港我组织过一次音乐沙龙，请马思聪为二十来个文艺界名流学者演奏他自己的作品。其中有大作家茅盾。演完以后茅公谦逊地说自己并不懂音乐。而茅公开国以后就当了十多年的文化部长，并且是非常称职的。我和马思聪在通讯中谈论过一些问题，也向他索取了创作的目录。他给了我一份英文打字的全部目录，他说他们是空身出来的。大部分作品来美国后在国会图书馆里找回，有小部分可能已遗失。“生逢乱世，我们国家音乐出版又不发达，能保存这一些，也许算幸运了。”他还再次回答我的提问说，“追求我们这伟大民族最美的声音这个高目标，一定努力以赴。至于驰誉世界，就难说了。这当中有极其复杂的条件和机缘。拿巴赫来说，他是死后一二百年才驰誉的呢”。

但我需要指出，马思聪的全部作品是真诚的，是他的感情的结晶，心血的凝聚，爱国的证件，历史的纪录，珍贵的遗物，价值连城的国宝，壮丽的精神财富，汉民族文明的一座高峰。这些作品中必有一些将传至千秋万代，这些不朽的作品也就是他永生的灵魂了。

我总有一种感觉，他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拥有他的唱片、录音匣子和一些乐谱，就像他还在，永远在，在远方。

祭马思聪文

历史上，放逐、出奔这类事不少。屈原、但丁是有名的例子。在“文革”中，我中华民族的著名作曲家马思聪先生，受尽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迫于1967年出走国外，以抗议暴徒罪恶，维护了人的尊严，他根本没有错，却还是蒙受了十九年（1967—1985年）的不白之冤。

1984年11月，当我在美国费城和他会晤之时，他给我最初印象最令我惊奇。虽然他还和过去一样的故人情重，且神态泰然，并相当乐观，还在勤奋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却有所不同。我没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点上跟以前不同。我只是从他的声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时流露着一点点不易觉察的细微凄怆，却未能体会他心灵深处，埋藏着巨大的痛苦。

后来在他女儿马瑞雪回忆她父亲最后日子的文章里说到一个晚上，马思聪听着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乐》。他忽然失声痛哭。他求他夫人王慕理让他哭一个够。后来，他含泪说，“这个世界很美。”他为什么哭？他哭他内心的哀伤。他哭他离开了祖国大地，这么久了没能回去。但这个世界很美，很美。

有一次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前副院长和我谈到他们在“文革”中的往事。这位前副院长在黯然伤神中，突然面容扭曲，喘息地说道：“有人用有钉子的鞋子猛打马院长……怎么打得下去！……”他说不下去了！

那年年底我回到国内，不久便听说我国已公开为思聪平反。不白之冤终于昭雪了。从此我就等他回国。1985年8月16日，他从美国寄我一封长信，其中讲到他“读了叶浅予文章，谢谢他的真情。那时代的人好像比较真情，‘文革’把人弄坏了。

看来我真不如浅予。在《为马思聪饶舌》一文中叶浅予写道：“受过欺凌而被迫出亡的人，最懂得祖国的可爱，爱国之心也是最切。只有那些口口声声教训别人如何如何爱国，而自己却横着心侮辱普天下善良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马思聪不欠祖国什么，那些窃国篡权的人却欠他太多了。”叶浅予说得又慷慨，又体贴。我们许多人却都没有说什么，以帮助他解除那凝固在他内心的深沉痛苦呵！

那封长信是他从欧洲旅游回来写给我的，他写到了南斯拉夫的钟乳石岩洞，威尼斯舟子的金色歌喉，罗马的铁伏黎喷泉的音乐和华格纳常去喝咖啡的一家希腊咖啡店。他还写到翡冷翠的大教堂，比萨的斜塔。还有，如入仙境的瑞士雪山，以及大雪纷飞之下雪山餐厅里的丰盛午餐。还有他的那一别已半个世纪的巴黎。他写到巴黎他的母校国家音乐院的陈旧的铁门。最后他到了伦敦，这次旅游快要结束了，他忽又悲从中来，说“盛衰转换，月圆月缺，周而复始，自是天地之轨道。”什么引起他的感慨万端？他为何要自苦了呢？想来是因为他能作欧游，还不能回国。他只在信尾说了，“待我从西双版纳出来，立刻跑新疆。”这却不是说他想去一次云南和新疆。不，他说的是他正在修改那五易其稿的、以云南民歌为主要旋律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六十号），等到他修改完工，从这曲中，从云南旋律中跑出来，便要立刻跑到新疆民歌为主要旋律的一部写新疆生活的大歌剧《热碧亚》（作品第六十一号）的创作中去。他人在北美心在祖国。他只是没有法给我说他暂时还不能回国来，虽然他正驰神于云南的热带雨林和新疆的天山南北牧场上。

因为他不知道回来的话会怎么对待他。他也许是心中在想，他既然出走了，他还能回去吗？他童年时是一个固执的小孩，到了晚年他还是一个固执的老人。在“文革”中他有勇气出走，现在他无勇气回来。出走是不得已的事，在国外十九年是不得已的事，暂时不回来也是不得已的事，如今永远不会回来，更是不得已的事。这中间，恐怕只有叶浅予等少数人，只有少数亲友，给过他巨大痛苦的心灵一点儿慰藉。

他保持了他独特的性格。除了他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外，他还有最纯洁的最天真的最美的音乐的个性。他还有一点疑虑。还没有回来，等待着一个能够回来的时机，等待他的疑虑的被消除。不幸他没有能等到那一天，他的灵魂已经飞升到了万里云天之外。但是他的灵魂，正像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的结尾，是“得到了拯救”的。

1988年5月20日，马思聪逝世一周年。他在无可奈何中生，在无可奈何中死，生离死别，徒呼负负。呜呼哀哉，作文奠祭，其辞曰：逝者如斯，从兹离分。恨别经年，梦睹英灵。你是珍珠，晶莹蒙尘。你是国宝，横遭蹂躏。黄钟坠地，瓦斧雷鸣。美人离宫，骚客出境。忧思沸腾，莫此为甚。魂逐飞蓬，爱国有心。孀闺泪尽，永安幽冥。欢怨非贞，中和可经。幽幽琴声，一往情深。民族之音，冬夏常青。百世芳芬，千秋永恒。

鸥外鸥

鸥外鸥，在我国新诗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一位：我们的新诗诗人中间还没有几个能这样坚贞地忠于新诗事业的。迄今他还保持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标新立异的表现方法。他仍在天天写诗，只为了抒发胸臆，并不一定非要发表它们。他不愧为新诗的诗人，他的诗总是新的。三四十年代的旧作拿到了今天来看，从形式到内容都还是最新的；更别说他的向未来投射的近年之作了。

五十多年之前，我在江南小镇一所小学里教书。放了寒假，因爱情不顺利，我出门旅游去南方。时为二十岁人，喜爱新诗。乃因施蛰存介绍，得见鸥外于广州的码头。他来接我下船，带我到他河南洪德里的住家。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半月之久。我们畅谈新诗，交换着看各自的新作。我的不顺心也就消除了。

那时我的诗晦涩，他的诗奇特。我们都写了不少恋爱诗。我的诗羞怯，他的诗大胆。他写了明快地赞美和尖锐地暴露、讽刺两性生活中的美与丑的诗，既有一些有着细腻、婉约的情趣，更有一些有着强烈的幽默感和辛辣讽刺的力度。可惜的是这些诗现在已不容易找到了。如有热心者愿为他做一点发掘工作，还可能挖得到很多精品，必会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只是30年代的一些刊物，凡是用白报纸印行的，现在都已发黄，不能翻动，一翻动就变成了碎片，纷纷坠地，无法复原。因此也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现在的书刊印刷品大约也只有五十年的命运，远远不如宋明版本的纸张可以保存到四五百年以上的。这是相当滑稽的事情：廉价的物质怪不得难于产生不廉价的文明了。

那时，我以为他是一位写爱情诗的圣手。早期的印象反而是不容易改变的。他的形式的新颖奇特又掩盖了他的实质性内容。我不仅不理解他，甚至还误解了他。只在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在我给一次突然的灵感的袭击所启发之后，我才终于作出了一个总结性的论断，认为他具备了足够的条件，可以被誉为本世纪中国的一位讽刺诗人，有如罗马的朱文那尔和琉克莱蒂斯的讽刺诗人那样。

1935年初，我从广州买棹还乡，又和鸥外通了许多信，交换许多诗创作。在郭建英主编的《妇人画报》上我们曾进行过对话。那些信，那些诗，那些对话，一概都没有再找到，似乎没有留存的了。1936年我跟戴望舒学习编辑《新诗》月刊，却不记得为什么没拉他的稿子。到抗战开始，音讯渐疏。1938年我又去到香港，然和他已较少往来。接着我的思想和诗风发生了一次“奥伏赫变”。这构成了我们后来长期疏远的原因，其责任主要是在我这一方的。

但青春年代里曾有过这样一次热情的交游往来，给彼此都留下了非常美好、深刻难忘的记忆。以后虽然劳燕分飞，各自东西，而在心灵深处却都藏着长相记忆的友谊。相隔26年之后，在北京重逢，是在1960年夏天第三次文代大会上。我们又共同消磨了一个黄昏。他的境况似乎不太好，但言谈尚欢。那时我在中国作协工作，任《诗刊》副主编。每天坐班，负责具体的编务，掌握着选稿发稿的大权，颇受主编的信任。当时是在大跃进之后，有新民歌运动；然后三面红旗飞扬，作协书记邵荃麟起了一个“开一代诗风”的雄心。我们也就提倡着一种狭隘的现实主义文学。闻浪漫主义而不悦，见“广阔的现实主义”也生疑。《诗刊》初创时，我有意地发了一些现代精神的作品。但到第四第五期之后，开展了风暴斗争。那时我争取到了南星、吕亮耕

等现代诗人的作品，但对鸥外之诗却还有难处。到 1960 年时，我也没有向鸥外索稿，而他也不想给我看他的新诗。文代会结束了，又互不相往来，其责任还在我这一方。

又过去了 24 年。1982 年 2 月，为参加一个中英文学交流周，我出访了香港。归经广州，我有 50 年未曾再访广州了。往事萦绕在心，便再次寻觅鸥外，始得重逢。大家都已历尽艰辛，饱尝了世味酸辣，只是别来无恙，都已到了老耄之年。他七十有二，自称“老夫”。我那年六十有九，却也在七十的边缘上了。（再过去三年，七十有二就轮到了我；又过了三年我便是他此年的七十五了。）维时携手偕行，同登五层楼，共游六祖寺；鹿湖对饮，兰圃啜茗；所谈所论，还是离不开新诗的。他送了我一本 40 年代出版的《鸥外诗集》复印本。我还读到他抄赠给我的他近年诗作中的部分作品。我惊讶地发现他老年诗作仍充溢着旧时那种青春气息，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风格与个性的表现，飞扬着浓郁的诗情以及尖锐的讽刺。惊讶之后，更感欢喜，想起我往昔对他的冷淡，不禁深有愧色。

我们这 70 年来的新诗运动，历程也真迂回曲折，堪称业绩辉煌。这滔滔的风流，要说成洋洋乎大观，未始不可也。我们的新诗有宏伟历史的背景写照，也有对巨大的社会变革作出过真实的、不尽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反映，人才既已辈出，流派亦复众多。经受了十多番风霜，还熬过至少是两三场浩劫。但鸥外始终是寂寞的，不大痛快的。虽然在 40 年代之初，在抗战烽火之中，他曾激起了一番浪花，后来又是默默无闻了。直到如今，他几乎还没有被我们热闹的诗歌界所承认。是的，也还有人记得他。凡是记得他的人，对他都还有点儿排斥。但他之被冷落在一旁，他自己是毫不在意的。他继续在抒情，发自胸臆，始终如一地在讽刺人生，鞭挞、锥刺。因生于这个歌功颂德的时代，也不可能不歌颂光明，便这些也没见多少是发表了。人之写诗，本来不应该为了发表。写诗只是为抒情，并不是一定要发表的。诗可以发表，也可以不发表。有些诗大可不必发表。往往不发表的诗多于发表了，往往不发表的诗还更精采些。不热闹又何妨，热闹只叫人头痛。冷冷清清则未必不幸福。照例讽刺诗人不会走运。没事儿还是胜于出事儿吧，较少各种各样的外来干扰更好，他可以长久地吟哦，反复地推敲，怡然自得，悠然见南山。

1943 年在桂林，大地公司出版了诗集《鸥外的诗》，收入诗作 50 篇。卷首有篇《感想》，卷末有篇《备忘录》。当时胡明树和他共编一种《诗》杂志，上面发表了他形式特别新奇的诗。诗坛禁不住大惊小怪起来。少有人称许他，更多人持异议。报刊上出现了抨击他的文章，一时议论纷纷。他的一首《被开垦的处女地》本是相当精采的一篇讽刺力作。只中间写进了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山山山”，被一些人引以为笑谈，攻其形式的一点，而不及其内容和实质。消息传到延安去了。艾青从延安给胡明树写来一封信，谈到欧外的诗，艾青曾肯定过鸥外的诗里的创造性。原信就全文刊载在《诗》的副刊《诗新闻》上。我那一年正在重庆，追随曾家岩的一些同志提倡所谓“生活态度”论。我正担任《中原》季刊的执行编辑，就在上面倡导它，（已经是够“左”的了，后来却又被视为有点儿“右”的。）因此并没有注意桂林这场论争，也没有介入，作了壁上观。

在《闻一多全集》（1948 年版）第四卷的“现代诗钞”中，收入了鸥外的一首诗《和平的础石》。还有三首：《都会的悒郁》、《男人身上的虱子》、《父的感想》，因抄录者抄漏了作者的姓名，是用“佚名”两字付排的。实

际这三首也是鸥外的作品，然则他一共被闻一多选中四首。

该全集第一卷第 22 页有朱自清的《序言》，其中引用了闻一多对新诗看法一段重要的话：“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和渥兹华斯、惠特曼，而转瞬便是最真实的诗了。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只有固执和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

经朱自清记录下来的，闻一多的这些话，谈得多么深刻呵！如果说这些话有针对性，所针对的中间的肯定部分至少应该有鸥外的诗在内，而其中的否定的部分，就应当包括我后来作为编辑时的那种固执和狭隘了。

鸥外鸥完全不是一帆风顺地航行经过了这半个世纪的。他行驶在一条逆风船的艰苦航线上。一直到他的晚年还是如此。他的诗作多半没有发表出来。大量的诗已经丢失掉了。近几年的新作他还是藏着，拿出去发表的数量则极少，有的也不一定要发表。而发表出来的他的作品不是被冷漠地对待，便是毁誉参半，且一直是毁多于誉的。他是不是很倔强呢？是的，他自己是我行我素，亦无所谓倔或不倔。但是他总是有一些誉者、欣赏者的。难得朱自清这样的老前辈在《新诗杂论》集中，有篇《论朗诵诗》文章，其中称道了鸥外鸥之诗在修辞上的创造性。

这里可要引用一大段朱自清的文字了，因为老先生说得很有意思。朱自清在《朗读与诗》段落中如是说：“现在的白话诗有许多是读不出来的，不能让人全听懂的。新的词汇、句式和隐喻，以及不熟练的朗诵的技术，都可能是原因；但除了这些，还有些复杂精细的表现，原不是一听就能懂的。这种诗文也有它们存在的理由。这种特别的诗，也还需要朗读，但只是读给自己听，读给几个看着原诗的朋友听。这种朗读是为了研究节奏与表现，自然也为了欣赏、受用。谁都可以去朗读并欣赏这种诗，只是这种诗不宜于大庭广众。卞之琳先生的一些诗，冯至先生的一些十四行，就有这种情形。近来读到鸥外鸥先生的一首诗，似乎也可以作例。这首诗题为《和平的础石》，写在香港，歌咏的是香港老总督的铜像，现在节录如下：

金属了的总督。
是否怀疑巍巍高耸在亚洲风云下的
休战纪念坊呢？
奠和平的础石于此地吗？
那样想着而不瞑目的总督，
日夕踞坐在花岗石上永久地支着腮
腮与指之间
生了铜绿之苔藓了——
……………
手指永远支住了的总督，
何时可把手放下来呢？
那只金属了的手。

诗行也许太参差些。但‘金属了的他’‘金属了的手’，这个名词用作动词，便创出了诗的词汇，可以注意。这二语跟第六七行原都是描写事实。但是全诗将那僵冷的铜像灌上活泼的情思，前二语便见得如何动不了，动不了手。第三语也便见得如何‘永久的支着腮’在‘怀疑’。这就都带上了隐喻的意味。这些都比较生硬和复杂，只可朗诵给自己听；要是教一般人听，恐怕不容易听懂。不过为自己的朗诵和为人的朗诵却该同时并进，诗才能有

独立的圆满的进展。”

上面的引文虽长，然确有深意在焉。这样的艺术分析那个时候也并不多，如今则很少了，几乎还没有。尽管我们一再要求艺术分析，但我们只看到一篇篇的政治评论。偶尔看到一点艺术分析，多半是皮毛，达不到这样的精细而又全面。朱自清的棍子指石成金，起死回生。那些打手的黑心的棍棒不知打死打闷过多少优秀的心灵。

被朱自清等注意到的创造性这一点，在鸥外是并非偶然的。鸥外很少接受中外古今的诗歌传统；同时代人的诗作也不能感染他。他具有一种免疫性。他要求的只是着眼于、投身于现实之中，在自己的生活“阅历”中捕捉爱与恨的思想感情，而后以自己的表达方式及反映手法，把它们写出来。他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他也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爱杜甫和白居易。白居易的诗论中，有“文章合为时而写，诗歌合为事而作。”鸥外正是这样，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有为时事题材而写的很多诗，如《都会的悒郁》、《与自然无关》、《用刷铜膏刷你们的名字》等等。连恋爱题材的讽刺诗，他也是在真实的素材上加以想像，而并不是虚构架空的。那些诗应用了夸张手法，实际上是更加逼真地描绘出现实社会里的真实色相，也因此使人受不了，从而一味地排斥他。

怎么能说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呢？他比那些号称自己是现实主义者却闪闪躲躲地不敢正视现实生活本身的残酷面貌的，比只看现实的这一面而不看现实的那一面的作家，要现实主义得多。现实主义确实是文学的基础。从鸥外的作品看，他是形式很不一般，手法尤其奇特，揭露现实毫不留情，讽刺时事冷酷无情的反映现代生活的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早期的恋爱诗尤其是他的一手绝招。对于“食色，性也”作了尖锐的讽刺，充分的暴露，入微的刻划，甚至拍摄出来了原形毕露的丑态。他的笔墨往往使读者惊惶失色。若然阁下在这方面并不很纯洁的话，一时是接受不了的。所可惜的是他青春鼎盛时期的佳作现今只留下了很少的几首。桂林版的诗集中，30年代的只留下1936年的两首，40年代的留下的十几首。而最妙的却正是30年代之初的。花城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鸥外鸥之诗》留下了1933年的三首，已经把许多所谓“黄绢幼妇”的绝妙好词删去了。那么，是失落了还是删去了？我想是删去了，而不尽是失落了。不过这些诗是不能从我的记忆里删去的，只要肯耗费一点力气还能找回一些来。留下的1933年的《映树》，1936年的《甜的空气》是十分美丽的抒情，正是从这样的美好的感受中，渐渐产生了那种向讽刺诗的方向转化的运动。但是1936年的《戴了眼掩的马车之马》，在1985年版本中已被删去了。连这样一首自我嘲讽（当然也嘲讽了绝大多数男人）的诗也都删去了，何况其他呢。1942年的《无礼之风》（写不良少年、猖狂的无赖汉的），1943年的《无理之窗》和《有理之风》都小巧玲珑，含蓄而辛辣，是鞭挞，鞭挞得很有力。然而也没有收进他的1985年版本中，也许至今还怕卫道之士要对它们疾言厉色吧。而《卡特林娜走出来》这1942年的诗却是严正的呼声，它们正是对付那些卫道之士的。也未收入1985年版，太可惜了。

1933年的《爱情乘了BUS》，说到老奶奶的“爱情”是用花轿抬来抬去的。少奶奶的“爱情”是坐了小汽车回家的。而姑娘的爱情，“却乘了BUS（公共汽车）/自己爱挑哪一辆便上哪一辆/合则留坐到终点站/不合则半途而废/自己下车/又挑过另一辆BUS扬长而去/对搭错车一笑置之”。这小诗也很

了不起，要过了 50 年之后到今日才看得到这种姑娘，才看得到“对搭错车一笑置之”的乘了公共汽车的这种爱情。而过了这么 50 年，仍有坐花轿、坐小汽车的“爱情”存在着的中国之今日，这 80 年代里也还可能有卫道之士会对这首诗表示大为不满的。遑论乎 1933 年的中国，出现了这种诗哪还了得？所以鸥外鸥之诗，比之洪水猛兽不差多少。然则他也是真正的诗人——预言家了。

应该指出，这些有关风化的诗比较难写，稍有不慎或稍有过头，是会落入猥亵或教唆之罪的。而鸥外鸥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正好入木三分。人间就是有这些那些现象，是常见的，甚至还多不胜数呢。不是说文艺就要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使人惊醒，使人感奋吗？要表现这些现象却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在我们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期已经有百余年，而封建历史时期达两三千年的黄土大地上，对这一类文学更是特别地敏感的，所以他这部分诗的命运很是不妙，一直也是受到歧视的。如今连他自己也只好忍痛割爱了许多，只留着少少的几首。

其次是他的政治讽刺诗也很有特点，写得也不少。在当年，它们起到了一定的战斗作用；日后，直到今天都还是很可以鉴戒的。它们和书坊间流行的那种政治诗不同，味道不同，它们更脆更辣，辣得出眼泪鼻涕来。现在保存下来的还稍多些。像写香港的一首《军港新加坡的墙》，作于 1936 年，预言了日本的南侵。在发表当时，大多数人是不会相信的。后来也就不幸而言中，都成了事实。一首《第三帝国国防的黄油》是反对纳粹德国法西斯的，又如《欧罗巴的狼鼠祸》都是写于同时的绝妙好诗。现今读来，仍很新颖，真比朦胧诗还新，应当热烈赞扬。但那首全部用了报纸语言的“请以卖号外的声音朗读”的《第二回世界讣闻》，当时也曾经受到一些指摘。不知现在是否还会有人指摘？因为它相当地喧嚣了，其中：WAR！ WAR！ WAR！（读作哇！哇！哇！）意为战争！战争！战争！发而为声，好像用得太多了，印在纸上，似乎也浪费纸张，但在三四十年代里这却是生活中常时听到的叫卖号外的报童的声音，是时代的声音和现实的声音。当时有很明显的效果，都还听到了非议，而现在的读者却没有这种现实的感觉了，不知作何感想。我们现在的报纸不讲时间，早晚决无关系，谁也不抢谁的新闻。而我们曾经是过来人，听见过号外，有过等着看最后新闻的紧迫感，亲自经验过，再读这首诗就很自然，而不会奇怪的。

1985 年花城出版社编选出版了《鸥外鸥之诗》121 首。前有自序，后有后记。作者肖像是黄永玉画的，照片是陈复礼拍的。共 221 页，定价 1 元 7 角，印数却只有三千册。可见，经过了半个世纪多些，我们的心胸还是宽广起来了，我们的文学园地也比以前宽广了，可以容纳鸥外鸥，容纳更多的文艺作品和流派了。只印三千册是被一种不大合理的制度约束了的结果。可见固执和狭隘是要不得的。对于新事物、新诗的事业，这两者是最不利的了。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兴趣，我的赏味，在 30 年代也极为广阔，无拘无束的。从 40 年代起开始表现得狭隘了。到 50 年代里刚创刊《诗刊》的前四期还可以，后来就表现得很固执，刊物和自己的创作便都从此一蹶不振了。

我们有许多年学会了和习惯于将文学艺术创作简单地分别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并经常是俨然（其实很可笑）摆出一副唯我正确的面孔来批评和判决另一种或某一种作品为“不正确”。奈何我之自以为正确，很可能并不就是，或根本就不是。而他之“不正确”者，却也不见得就是，甚至并不

是完全不是的。在林彪、“四人帮”逞凶的时代，情况岂不就是这样完全颠倒了和混淆了吗！某些人物，某些事体，粉墨登场，锣鼓喧天：他们表现得太过分了。而文艺也就被摧残得实在够呛。大戏演完了之后，又还来点折子戏。俱往矣！可以不说它们了。

意识形态的事，精神文明的事，文学艺术的事，万万不能简单对待。文艺作品主要看你喜不喜欢。有时也有正确与不正确的区别，但归根结底，还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題。可以谈喜欢或不喜欢，可别扯到正确和不正确上去。楚襄王说三闾大夫屈原写了大毒草，将他放逐到张家界森林公园里去了。他自个回来跳入了汨罗江。人民划龙船直到今天，已成为世界性的运动，还要划下去划下去了。评论界有许多名家对《红楼梦》后40回跳脚，破口大骂高鹗不正确，但人们还是喜欢读到四大家族的最后垮台。四大家族硬是不肯垮台哪。评论家中的某些人物亦然。

对于鸥外鸥的诗，我很喜欢。你可以不喜欢。或者他的作品中有你喜欢的，有的不喜欢，或者今天喜欢他的这首，明天就不喜欢了。这一切很正常。但你说他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说什么形式主义的道路是不正确的；什么现代主义乃是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文艺，因此是不正确的，等等。这种话其实是很无知的。其实只说明他不喜欢很不喜欢。你不喜欢就不去看它们好了。抽刀断水水更流，棍子是无法阻挡奔流的。几十年来的文艺斗争历历在目。打棍子的人都下台了。而人们喜欢的文艺仍然拥有亿万读者。人们不喜欢的文艺就无人问津。当然这里也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喜欢的，能喜欢多久？这属于客观标准。但谁也不能说，唯我是标准。哲学史上最丢脸的是唯我主义，所谓 Solipsism 就是除了自己正确，谁个也不正确的。

1983年2月

以上是三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写时本想给他的诗集做序的。后来因几家出版社都不愿出这本诗集，我也就收了起来。不想三年之后，这《鸥外鸥之歌》已经出版。但我也是在第四年的1986年2月才见到这本花城版的诗集。这个集子印刷装帧都很像样。觉得所收的一百二十一首诗都很精采。它不应当受到沉默的扼杀，应当为它饶舌，为它呐喊，就略为修正本文，寄给《浪潮》，以求发表。我很可惜，这样好的诗集只印三千册，因之我要告诉读者：欲购从速，以免向隅。

1986年3月

又因《浪潮》忽然夭折，此文未能发表。1987年，我对鸥外鸥的评价又上升了一些，就向花城总编辑李士非索回原稿，再作了一次修改。这回赠给他鸥外鸥一顶用玫瑰花和带刺的玫瑰花枝编成的讽刺诗人玫瑰冠。

本文缺点是没有评介他七八十年代新创作的72首和他寄给我看到的更多的新诗。做这件事要写另一篇文章。现在已经写得太长了，只好以后再说。只提一件事，他在1984年写了《创世纪》和它的兄弟篇《真正的“上帝”》、它的姊妹篇《望月》、又一兄弟篇《自作之孽》、以及又一姊妹篇《太阳的声明》。这是他读了美国物理学家魏斯科普夫的《知识与神奇（人所知道的自然界）》一书以后，写到了宇宙的创生的最新物理理论。《人民文学》在

1988年初也发表我的一篇《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讯息》一文，写到了天体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的宇宙创生论。我和鸥外鸥同时学诗。等到过了55年，又在总出发点的宇宙创生学说之前会面了。实在是使人非常高兴的事，特别记上一笔。

1988年5月

纪弦和他的诗

居于台湾三老之首的老诗人纪弦（早期曾用笔名路易士），从 1933 年到 1988 年的 55 年间发表过约 2000 首新诗。这位诗人，在 1935 年的一首诗中曾轻松地写着：“爱云的奇人……古时候曾有过一个，但如今应该数到我了。”于是他幻想自己是“一朵雪白的、高高的、奥妙的云”。而这云，“悠然唱着一支歌”。这首诗就是《爱云的奇人》。二十年后，在他写作《四十岁的狂徒》时，奥妙的云没有了。出来的是一位受尽了生活折磨的勇士。他已知道，“捕狮子的陷阱，就设在我的坐椅下”，并知道“我的灵魂善良，而你的丑恶；我的声音响亮，而你的哑；我的生命树是如此之高大，而你们的低矮；我是创造了诗千首的抹不掉的存在，而你们是过一辈子就完了的”。他唱出这样的对比来，唱出了个人的尊严，一个四十岁人的写照。又十年后，1964 年他写出了《恒星》。自称是一孤独之恒星，无伴星，无行星，无卫星；不属于任何星团，不位于任何星座；它有自己的光。这光“是如此之奇异的，奇异的，跟谁都不同”。

确实如此！纪弦诗无敌，矫然诗不群。他的诗跟谁的都不同。这些诗狂歌奔放，同时也是真诚之歌，天真之歌。他是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到他的独特风格，别人是学不来，也无法冒充的。这风格他是用生命换来的，自我的生命，自己的风格。

纪弦的诗，自己分了三个时期：大陆时期、台湾时期、美国西部时期。前几天，我看到吕剑，说起我要为纪弦诗选写序。吕剑说他记得路易士早年有本诗集名叫《火灾的城》。我说吕剑你的记性真好。吕剑说主要不是我记性好，而是他的诗好，所以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还忘不了那首诗和那本集子《火灾的城》。这首诗编在纪弦诗选《饮者》部分中。读了它便可知道，他的早期作品已有这样深刻的思想了。他是从人的灵魂的窗子里，望见了里面，最深最黑的地方有着一座火灾的城；这城里还没有消防队救火会。这首诗写于 1936 年。后来到了 1968 年，他曾回到这主题。他写的《火焰之歌》甚至欢呼：“然则升腾并燃烧起来吧，楔形的火焰，菱形的火焰啊，自我的生活之华美的内部，自我的生命之神奇的底层！”说得真好！谁个的灵魂深处没有一座火灾的城呢？地球的核心里不也是一团熊熊的大火？谁个又能不读了他这诗而看不到自己的内心里也有着这座火灾的城，从而永远忘记不了这城中即这心中的火灾了？奇异的诗人啊，独一无二的诗人啊，他帮我们发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火灾之城。

我还很记得 30 年代在上海的诗人路易士，也忘不了这 80 年代在美国旧金山的诗人纪弦。一模一样的那个人，修长修长的个子，穿着三件头一套的黑西服。他手提一根黑手杖，嘴衔一枝黑烟斗，有时还牵着一只绕着他跳舞的小黑狗。我在 1937 年 7 月的《新诗》上，发表过一首诗，《赠诗人路易士》：

“你匆匆地来往，在火车上写宇宙诗，又听我说我的故事，拍拍我的肩膀。”

“出现在咖啡座中，我为你述酒的颂：酒是五光的溪流，酒是十色的梦寐。”

“而你却鲸吞咖啡，摸索黑西服的 14 个口袋，每一口袋似乎都藏有一首诗，并你又搜索我身上的诗。”

“我却使你失望了，因为我爱缄默。只在你来了，握了我的手掌，我才

想到我也能歌唱。”

遗憾到了 40 年代之末，我们各奔各的前程去了。天南地北，我们分离了 30 多年。而且我竟可以不注意台湾的新诗，直至 80 年代初，我才初次读到纪弦的作品。那时尚不知他是何许人也，但读到了即有似曾相识之感。读着读着即拍案而起了。我发现并断定，这位纪弦定是路易士无疑了。不久果然证实是他。然则我还能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一点没有弄错儿。

终于，1984 年秋，我们重逢于旧金山邮街一旅店中。他依然如故，只是他的诗更成熟、炉火更纯青。他还有太白遗风，嗜酒如昔，而且酒德日高。承蒙他赏饭于唐人街，饭后他还选购了一瓶威士忌，到旅馆中又一番畅饮。我以为他已可称心如意，似梦如幻了，那知他后来还来信告诉我，说那晚上并没有喝够，下次再当痛饮一次，要能大醉一场才好呢。

他赠给我一本《纪弦自选集》和一本《晚景》使我得于反复吟咏，再三再四地，欣赏他的诗作。我发现，他的台湾时期所作，够得上“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评语。而美西时期，大有“老来渐于诗律细”的浓味。这部分的作品，都值得推崇，应当评介，它们决不亚于第一时期他的少年之作。

他到台湾写的第一首诗，1949 年的《一女侍》写得真俊美。他让我们无法抗拒地看到了她的美丽。“音乐一般的口，舞蹈一般的姿”，以至诗人呼唤起来，“啊啊！纯粹而且为完美的”什么呢？“艺术品的年纪！”她的青春之美被浓缩在这六个汉字里了，被制作成了一件永恒的“艺术品”。然后诗人细腻地摹写了她的形态，简洁的几笔，色彩鲜明：

素衣。

青裙。

及肩的秀发上，簪着薄红的

小小的花，那侍女

啊她！“从托着的盘里”（她是多么魅人的舞蹈之姿！）“轻轻地置下啤酒杯”（诗人看到她将瓶和杯放置下来）“在这沉醉的少年的一边”（也就是诗人自己这一边）然后她那音乐一般的口

笑了笑，像亚热带的风

像突然吹拂过来的一阵是多么温馨的热风。顿时使他升温，使他的心剧烈的跳荡了。这是一幅用文字描绘出来的油画肖像画。像蒙娜丽莎在她的背景前那样，女侍被放在“啊啊，睡眠的馥郁的岛上”的背景之前，以及在“槟榔、椰子，无数地繁殖着”的热烈气氛中了。这首 16 行小诗的最后两行又回到开头的两行，但加了两个虚字，“为那音乐一般的口，为那舞蹈一般的姿”，而全诗就这样结束了。多美的岛！多美的女侍！多么清新俊逸的诗！令人神往。

以这样的风格，纪弦写作了一幅幅的素描和油画，一曲曲的即兴和奏鸣，一出出的舞剧和歌剧，一篇篇可爱的传奇和故事。1952 年的一首《晨步》简直是惬意极了，“雾的街如水彩画”，真的，这早晨的散步，整个儿都进入了这水彩画里。诗人带着喜悦的心清走进街头的行人中，“行人是三两个笔触”。他也是只用了两三个笔触便画出了他自己来，当他“策杖作几分钟的散步”。然后就是全诗的最后三行：“十字路口，苍绿的老榕下，邮筒静静地立着。”它立在水彩画中，大榕树下。多么漂亮，多么安静，真是惬意之极。这小诗一首，只有七行，不过五十五个字。用色淡淡的，落笔轻轻的，然而雾气和绿树之对比，竟使两者都很深沉。铸成了一艘摇进绿色雾中去的

诗画舫。多少年来仿佛我们都没有享受过如此舒适的一次晨步了。突然的一刹那，晨步的诗人有一小驻足，逆着苍绿之色。诗人和那邮筒互相地看了彼此一眼。似乎互道晨安，然后诗人又举步作悠悠的步行。如此怡然自得，也就是唱着一支歌的爱云的奇人的悠然神情了。

使我尤为心动的是台湾时期的《银桂》和《早樱》这两首。似乎它们各自包含着许多故事和细节似的。还不很清楚，或不便说出，也许是不说出更好些。《银桂》更像一篇抒情小说或一篇散文的试笔。那是一枝瘦小的银桂树。这一年它开放了还不到十朵的很小很小又很香的花。细心地看着这树这朵朵的花，诗人联想到了二十年前的叶子姑娘。她穿着一件淡色的银桂色的旗袍。那个时候他正弹拨着一架古旧的七弦琴的琴弦呢。然而叶子姑娘现已成了好几个孩子的妈咪。而这竟使他痛心，竟觉得满目萧然，而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多么的荒凉。此中心情，无法描述，似乎柔肠已经断成一寸一寸的了。他含恨、追忆……往日不再来……

《早樱》也有一段类似的柔情。不知这早樱何所指？她又是谁？何等的高贵？就像那比一般的樱花要高贵得多的早樱。似乎不是悲，但也很悲，也很美，不知是怎的一回事？

有趣的《一封信》却有一种喜剧的效应。“像失手打错了一张牌似的”，寄出了一封信，而这全局就都输掉了。但是信已寄出，是无法挽回的事。“要是把地名写漏掉几个字那多好……总之，不该贴上邮票，投入邮筒。”不知到底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好像却也知道一点点的内容。也别问了，反正是输完了的，甚至于是“输了这一辈子，这两撇很帅的小胡子，连这些诗，也一古脑儿输掉。”不能不令人莞尔而笑。那么，可惜，太可惜了。怎么搞的，打错了这张牌，走错了这步棋？竟失去了一座本当挥师直下的名城，唉！太笨拙了，太傻了……奥妙的信啊！糟了，糟了！啼笑皆非。

还有《一片槐树叶》是充满了感情的……还有许多。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他在台湾写的那许多，都是我喜欢的美丽的诗。即使奥妙的云没有了，但类似奥妙的信之奥妙的诗还在还多着呢。

他的第三时期，美西时期的绝妙诗篇，就更多了。以《鸟之变奏》，只有十行，五十二个汉字，“我不过才做了个/起飞的姿势，这世界/便为之哗然了！/无数的猎人，无数的猎枪，瞄准，射击：/每一个青空的弹着点，都亮出来一颗星星。”多么老练的诗笔啊！真是现代派之现代派，不容易懂吧。也可以懂，是人生的一个概括，多少回的经历的记录。

而《相对论》则进到了一个更高的领域，“向地球及其卫星说再见/向太阳系说再见/向银河系说再见。”“我们乃是些所谓的性情中人，一向生活于一有情世界/所以瞧着你们那些奇特古怪冷冰冰的数字，我摇摇头，说不懂，这一点/应该说是可以原谅的。”“你点头，说有道理，于是你就一个箭步回到了唐朝；/而我却欣然买了张头等舱票/上了仙女座火星云直达的宇宙船。”

这首诗也许比现代派之现代派还要现代派。30年代里我就说过他“在火车上写宇宙诗”了。80年代他提出，相对论虽然难懂，不懂也不要紧，人类却可以享受相对论的成果，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购票，搭上航天飞机，到银河系外的仙女星云（啊，又回到爱云的奇人云里去了！）旅游去了，或者竟是办公去了，或出差去了，访友去了，幽会去了……

《禅》却是相对论、天体物理学加上中国和印度哲学的产品：

“世人多半喜爱对称：我，宁取均衡。”“让阿母斯壮的脚步永远留在月球上吧。然后是火星，木星和土星……/然后是银河外星云，宇宙外宇宙……/无尽，无穷。”“在这儿，半岛如画，四季如春/我朝暮吟哦着‘酒德日以高’/而左边的一联或剩下的三行/就再也不高兴去有所完成了。”“也许，此之谓‘禅’。”

这又比之《相对论》，更上了一层楼。自从量子物理中发展出来了相对论，从相对论中又发展出来了天体物理学、宇宙学和大爆炸学说，更往前发展将又是什么呢？宏伟的相对论的建筑物上已经出现了三条或更多的裂痕，以后将是什么？以后将是并协论以及类似“禅”这样的理论，科学哲学两结合的解答。纪弦和我似乎是走在一条道，或两条平行的轨道上：因此除了这些共同的现代科学的冠冕之外，他还有一种我并没有的《茫茫之歌》。

《茫茫之歌》可以是第三时期的他的代表作，是歌咏那茫茫的太平洋的。他曾遥望着小时候后花园中那些高高大大的梧桐树而不可见，它们是在茫茫之中。他也曾遥望扬州，遥望着瘦西湖的法海寺、五亭桥而不可见，它们是在茫茫之中。“你总是茫茫的，茫茫的”，说的是

我的故国也茫茫，

我的家乡也茫茫。

纪弦是一个深爱故国家园的诗人。“啊啊！茫茫……”是全诗二十六行的茫茫然的结局。

他祖籍陕西，出生于河北的清苑县，小时候住过北平、武汉；九岁在上海过生日；曾到了广州、香港；也曾定居扬州；又曾考上武昌美专；而后毕业于苏州美专；直至成名于上海……不断的迁移，使他有了一个流浪人的感觉。他的《脱袜吟》乃是他的成名之作。可是那时候他还想不到他要过后半辈子的大流浪人的生涯。他的前半辈子是不算流浪的流浪人，他的后半辈子才真真实实的成了流浪人，到了太平洋的彼岸。他真是到了他乡异国。他既要思念美丽的岛，他还要思念那美丽的故国。因思念之深，他的悱恻动人。然而也因他思念之深，那茫茫的太平洋已不是不可渡的了，有朝一日，他会回来悠悠然观看一下，像一朵飘然的奇异的云……

1988年11月

怀念周乐群

人之一生中，得一知己是很不容易的；失去一个知己，也是一个人的揪心的悲怆，无可挽回的莫大损失。

1978年春天，真好像是一个万象更新的春天。在迎春花、杜鹃花怒放的云南，我忽然接到从武汉发来的一个电报，要我为一个即将创刊的《外国文学研究》写一短文，并要我担任该刊的主编。前者我可照办，为该刊写了点赞同和希望的话，交了卷；后者我不答应，我拒绝了主编这种头衔。不料该刊不断地来“纠缠”我，一连几个月要我答应去当主编。后来我回到武汉才知道，缠我的人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周乐群先生。不知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可以出任主编的外国文学专家中，他独独看中了我一个，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多次找了我，我都没有答应。后来他下了“毒手”，就在七月出版的该刊的创刊号上，在主编的头衔下，依然塞进了我的名字，表示即使我不答应，他还是要我担任主编。我这人心肠软，只好让步了，允许了诚心诚意的周先生。

后来我才明白，我国的外国文学专家虽然很多，他们之间，可不免有着许多成见，而不能很好地合作。周乐群是知道我和这些专家之间，有着很好的关系。由我（本来是一个局外人）来主编他们的刊物，却是摆得平的，谁也不会有不同的意见。我才想到，周先生是一个知人也知心的人，识大体，办事得当，周旋起来很是周全，且极稳妥，并且也是一个热爱知识的人，做学问很认真。

因此，在接着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上，我和他一起参加了一个外国文学专家会议，将他介绍给所有的专家们，说他是当时唯一的《外国文学研究》刊物的副主编。并说我们两人一起办的刊物，要请大家帮忙。眼看专家们都愿意支持它，我放手让他主持这个刊物的工作。我发现他编刊物是游刃有余，从容不迫的，为之欣然，我自己仍可以创作为主也。刊物办了两年后，声誉不错，国内欢迎，国外亦小有影响。国内销售额超两万，国外亦达千册以上。四年后我到美国去，在麻省一所大学里见到过国外的订户，很有些学者对它说了些好话。

一个成功的事业，开始得到好评了，却立刻会遭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打击。在我们国家里，这样的事是出现过很多很多次的。你办了一件好事，就有人会不快活，恼怒得脸色发青。你创始一番事业，刚有一个样子，就有人出来攘夺，想方设法要把你推开，好由他来当家。

所以在我们这里，做人应十分小心谨慎，千万不可麻痹大意。而我们的这位风度翩翩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副主编，却在刊物比较顺利、渐入佳境的时候，失去了警惕，出了一点毛病，犯了一点过失。其结果是该大学的领导撤掉了他的副主编职务。当我知道这事之后，已经无法挽回，乃愤而辞去了主编之职。但这大学的领导人又出面调停，来打圆场，我没有表示接受，而明白宣称不干了。然而刊物上照样刊出我是主编者。又两年，我才被允许辞去职务。

周乐群忍受了这个不公平的打击。后来，他离开了武汉，来到深圳，在教育学院任教。深圳是开放改革的圣地。深圳的许多开拓性的新事业使他兴高采烈，奋发图强。从一个能干的、得力的事业家，吃一堑，长一智，他已成长为一个很成熟的学者了。他工作得愉快，写了许多学术论文；他编书、

出书、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培育新人，并且还再想办一个刊物。场景的转换，对他有好处。他像雨过天晴之后，充满了活力。待到1988年，在我来到深圳麒麟山下的创作之家避寒过冬时，我看他生龙活虎地投身于特区的文化工作中。我们的几次长谈，都欢快无比，此后，友谊也更增长了起来。

不幸那次失误，毕竟在他身上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在深圳市医院的一次体格检查中，他被列入了癌症嫌疑的病患者，要他立刻来院再检查。当时他正准备到外地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而医院却通过一定的手续，命令他进院再检。再检的结果是，他必须接受一次大手术了。

一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往往由于气愤填膺，导致癌症。这不治之症总是在你气闷之时，前来侵袭你的。癌症和心情的郁悒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反过来说，意气风发，倒也是能抑制这种可怕的病疾的妙法。正因为他来到深圳前后，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过程，他进入一种思想上特别开朗的境界。他竟能超越了自我，置生死于度外。他已征服了癌症的威胁，成为特区的战胜癌症病患的代表人物。他全身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活力，开始做起一种没完没了的重大工作来。虽然他是致力于学术研究工作的，但还结交、辅导和帮助了素来陌生的许多癌症病患者朋友。他告诉他们，他以何等坚定的信心，来和癌症作斗争的一些经验。许多外地的病者来信向他请教，他都细心地写了回信，给他们很大的鼓舞。

他曾三次击退了癌症的进攻。著名的外科大夫郭文兴给他开过三次刀，切除了胃、脾、胆及部分胰脏等器官。每一次手术的前后，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健康的思想，乐观的气质，以及必胜的信心。这实在是罕见的精神状态。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他坦然处之。他思想畅通了。他的灵魂，现在已没有任何的负担了。他成了一个透明的人。生活得越发有劲头了，抓起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来，不放弃一分一秒钟。他还能做得格外有成效。他成了深圳市的市民中的一个奇迹，成了经济特区中的一个异人。

1991年元旦，周乐群邀请我到他家中去作客，我在他家住了两个晚上。我看他的身体简直不像一个病人。他的精神昂扬使我惊奇。他虽是一个本当受到世人照料的病患者，可是相反的却是他在慷慨地照料着人世间呢。请看：一个抗日时期的地下工作者，已捐躯多年了，前不久却发现了他的诗稿，周乐群即为这遗作比了不少精力，进行了编辑、校订、注释、序跋，还为它找到出版社，正式出了书，公开发行。那时，他还在老龄大学兼职并教课，曾带我去参观老人们上课的情景。他搞了我一次突然袭击，要我给这一堂课讲一点关于文学语言的话。不知他怎么想出来的，我只好讲了。当时从上海来的电视台摄制组听说了他的事迹，要求给他拍摄一部电视片。他是这样的乐于为群众服务，为了要给癌症病患者以精神上的鼓舞，即以自己的意志作为榜样，接受了这任务，相当劳累地配合了这个片子的拍摄。他的活动可真是多，他一概都是认真的，欢快地做着这些事。

如此等等的活动，可见他没有脱离生活，甚至他是生活在沸腾的生活中的。但他是否作得太多了呢？他使我意识到，他付出他自己的，真是太多了。他是过得有点过头了！我告诉他：“过犹不及，不可过！亦不可不及，宁可不及，而不可过头也！”他表示，他接受我的劝告了。不过我也知道他还是歇不下来的，他决不会停下来的。其实这时他已经来不及了。当过了这个新春佳节后，医院要他去复查，癌症已在他全身扩散。

只因为他的意志如此之坚强，一时连癌症也扳不倒他。他一直坚持着：

敬业和乐群。即使在病床上，他还写他的学术论文，并为其他的病人服务，直到4个月之后。4月19日，在昏迷了大半天后，他又神智清爽地、正常地吃了饭，和家人、朋友们交谈，欢快地过了一个晚上，其实那已经是回光返照了。他料理好了自己的一些后事，之后便无任何负担了。夜间，在一阵突然的风雨雷电中，在病房忽然间灯灭的黑暗中，他安然酣睡去，便不再醒来。他走得好轻松呵，好坦率呵，好安静呵！

失去了这个知己，我感到非凡的痛心。他的一生中，有三个阶段是我亲眼看到的：先是风华正茂，热爱知识，惜入世未深，乃一足踏空，掉进一个荆棘丛中；接着，他跌倒了再爬起来，吸取了教训，终于得识天命，使他转变成经济特区新事业的一个忘我劳动的文化工作者；而后在他可以作出大成绩时，癌症这种不治之症突然来袭，迫使他排除掉了他的所有一切剩余的杂念，一如四大皆空，真可以一心一意致力于任何一种重大的事了。他无所畏惧地，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无私的人，一个完全战胜了自我的人。可惜这时已到了他的生命的最后，终于出现了这个生命的最高潮，使他做尽了一个人所能做的本份，然后愉快地，无愧于自己地，离开了人世。

他离开我们已两年了，他的声音笑貌没有淡去，宛然犹在。会有很多人步他的后尘的，这是天地之间的一种浩气长存，一种天然的精神感召的力量，引导着人们活下去，不受干扰地，不会退却地，走向人和自然的无止境的进步。哀哉，伏维尚享！

纪念赛珍珠

1991年元月，镇江市文联将为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举行她的创作研究会，开始对我国的一位可敬又可亲的朋友，来纪念纪念了。获悉了这一讯息后，我感到兴奋和欢喜。虽然近斯我还不能对她进行专题研究，但是我的感想太多了。写篇短小论文，表示一点悼念，关怀和感喟与感激，是我长久以来的一桩心事。现在好了嘛，总算有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和场合，可以来有所陈述和评介她了。

我认为，长久以来，我们对这位可敬又可亲的朋友是不够朋友的。我们这儿有钦佩她的人。却也曾有某些人物对她毫不热情，而且非凡冷漠，甚至至于口出恶言，予以中伤，使她不明不白，感到过伤心和痛苦，而后逝去了。

1933年之秋，我从美国的《亚细亚》（Asia）杂志上，读到赛珍珠署名的小说《二妇人》，觉得很动人。她描写东西方的两个妇人，完全是两种形态。西方的开放型，东方的封闭型，使我沉思起来。“东方和西方”，确实大不相同。英国作家鲁耶尔·吉卜龄（Rudyard Kipling）说过，东西方难免是“永远碰不到一块儿”的话，赛珍珠也有此感觉。虽然如此，可是两位作家偏偏又都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企图架起桥梁来。

那一年，我将这篇小说《二妇人》译成了中文，寄给了天津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文艺栏。其时，那一栏目是由沈从文先生主编的。承他采用了。译文发表了出来，并给我取了一个名字，不知为什么取名“龙八”。文章分两期登完，约在是年12月里。我给赛珍珠女士寄去了那两期刊物，还写了一封信给她。1934年初，我在苏州收到了她给我的一封很客气的回信。可惜这封回信老早就不知去向了，但它一直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

只不过五年之后，到了1938年冬天，赛珍珠就得到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这时，日军大举侵华，上海已经沦陷，南京遭受到了残暴的日军的大屠杀和肆意的蹂躏。我想，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之所以在那年奖给了她，主要是因为全世界都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都想方设法要给中国的精神上的激励和道义上的支援，当然也因为她确实给我们写了十来本关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书，包括她得奖的有名的三部曲。她写得不比我们的最好的作品差，但比我们最好的作家写得多得多。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很高兴。但有某些人却不以为荣，反以为耻。羞恼成怒的心胸之狭窄未免太可怕了，好像一个外国人写中国而得到大奖，他们就受到侮辱了似的。不然何以十分冷漠，甚至于还对她反唇相讥起来！这些人大约有大旗在手。也有人不赞成这种作法。但多少年来没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是不敢说的，因为不知道对她的得奖小说究竟该如何看呢？赛珍珠的《大地》、《儿子们》和《分家》这个三部曲，将近两百万字的篇幅，写了一个家族的三代人。《大地》原名“美好的大地”，写了由农奴发迹成为大地主的王龙；《儿子们》写了独霸一方的军阀王虎；《分家》写了经过社会的剧变，终于写出了大城市和出洋留学归来，想以现代农业科学振兴中国农业的第三代，新兴的一代，则还是资产阶级的一代。我是最近从一个盗印本上重读到了这个三部曲的。30年代的创作，到90年代再来读，我觉得更有把握来判断了，我的感觉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个文苑英华的30年代确实不简单。赛珍珠当时是一个家庭妇女，和美国文艺界并无关系，和中国文艺界也毫无接触，而能完成这三部巨大著作，诚然难能可贵。如果说她并不是写得尽善尽美的，那又有什么奇怪呢？可是她确实写出了那

么多那么多丰富，那么形象那么生动，而且是对茫茫神州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又怎能不给予较高的评价呢？她的局限可以批评，当然应当是善意的批评。不应当作出恶意的中伤，或者说至少应当避免给她以中伤的。全面的来看这三部书，它们是成功的写出了中华民国的那个时期的生活风貌来的。

顺便在这里说一说，对吉卜龄也一样，我们的某些人曾经把他当作一个帝国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来看待，并辱骂过的。我年轻时候就是这样听到了的，因此对吉卜龄很有戒心。看见他的书就转过脸去不看它们，因为中国人当然是恨那些殖民主的。最近，我也是从盗印本（客气点，可以说是翻版书）读到了他的代表作《吉姆》。一读之下，非常震动，十分吃惊。这部小说是精采地描写了西藏、尼泊尔、印度地区，亚洲次大陆上的社会和宗教生活的作品，他是写了帝国主义军队生活的作家，这样做可不一定就是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就是殖民主义作家，正如写了喇嘛教生活的作家不一定就是喇嘛教徒，不一定就是僧人的。英国作家吉卜龄已那样的熟悉东方的生活，次大陆的风貌，各种神秘的信仰，传奇的生活，独特的风俗和人群中的古里古怪的一些习惯。山川地貌，人物心灵都在他的笔下出现。那永远碰不到一块的东西方，在他自己身上却碰头了，也在他的笔尖上，他的作品中碰到一起了。这也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和赛珍珠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在排斥他的作品，对其为人是蔑视他，对其作品是冷漠它们。

我一直就想给赛珍珠和吉卜龄这美、英两位作家翻案，给他们的作品平反。我们应当承认，他们同样都是用不可多得的功力，写出了卓越的作品来，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大奖的。我们应当研究他们，翻译他们。我家里有一点赛珍珠的书，一本《东风、西风》，一本《第一个妻子》，现在我也没有片子收集她的其他著作了，我也没有吉卜龄的书，一本也没有。建议镇江市文联在开过纪念她的会议之后，收集她的著作，译文，将已译出的重版或重译出书将没有译出的请人翻译出来，将他们发表和出版。毕竟她生于镇江，成长于镇江，这些镇江市都能办得到的。应当把出版她的作品作为纪念她的头等大事，恢复她的故居作为纪念他的二等大事（出了她的书，故居才有意义）。这样做了，我们就很够朋友了。

纪念吉卜龄，可能是印度的那一个州邦的事了。但我们也应当有一些人，成立一个吉卜龄创作研究会，切切实实的做一些东西方交流工作，让东西碰到一起，互相理解、互相影响，消除误解，增进友情。想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不叫 Water mang ' n（水的边沿）而叫 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她的美好的愿望，应当早日实现！

1991年

我悼念的人

“我像一只舵机失灵了的小船，漂泊在一个虚无缥缈的时空连续区里，将会飘飘荡荡的，也许就是这样地不知所终的了。”

这是我 1985 年初说过的话，用于悼念我的妻子的。现在已经是 1995 年了。十年过去，七十岁人成了八十岁人。我们生活在里面的时空连续区（爱因斯坦发明的名词，）也有很大的变化了。不少的星座在死去，如同 SN1987A 号新星，发出强烈的灿烂光芒而后消逝，已经是经过了不知多少个风驰电掣似的光年才扑上我们的肉眼的视网膜上来的，我们已赏给它一个美名，叫做新星，编了个号。全世界的天文望远镜都曾对准了它，然后看它慢慢的暗淡了下来，到再也看不见它为止，也可能它变成了一个黑洞。

宇宙都在变，星星都在死，何况人？

我有很多要悼念的人，他们都去世了；也有很多想念的人，他们都还在世，可惜他们将来也要消失不见的。现在，还是说我所悼念的人吧。

要悼念的人很多。现在，我可要悼念很多的人了，因为我自己也到了这个年龄了。在这些个年头里，很多的人去世了，他们一个一个的走了，离开了我们，不回来了。我们不能不悼念他们的，他们是多么好的人呵，可都已经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我们！

我觉得，他们都是自己的这一个世代的。这一百年里的，最好的人，留有他们的径迹的，都要一直留传下去的，他们留下很多的文字，和很多束的记忆。好不奇怪，他们竟一走了之，他们没有带走一丝声音，一片影子，一些句子和文章，还都留下来了，留在后人记忆中了。在活着的时候，他们说过、不说过、做过、不做过、爱过、恨过、笑过、哭过。他们展示过这么动人的形象，极精警的语句、宏钟似的音响，还激起过潮水一般的涛声、回声、诱发了宏亮的赞美与衷心的羡慕，或者也引起过风暴似的争吵，以及同时激荡在一起的器闹音，夹进了一些冷言冷语的嘲讽，奚落和不谐和音、反驳声，乃至强硬的抗辩之声，以及混战一场的杂乱声音。但最后这一切都看不见了。现在各种声音都已经没有了。一切是静悄悄的，很平静，在报纸上见到的多少消息报道，或三言两语，或一大堆官衔堆积，都没有了。最后是尽量避免再想起往事来了。即使他们曾像往常那样的极大地震动过人们的心灵，他们现在却这样寂寞，再没有声音在耳边响起，也再没有形象在我们面前移动了。

我不知道我说了的是什么。反正我心里悲哀，觉得不是滋味。

我最近翻看了 80 年代初的一部书，叫《中国现代散文》，上、下两册。选有鲁迅七篇，郭沫若五篇，瞿秋白三篇，朱自清六篇，等等一共六十二人的一百七十篇作品。极大部分人不在在了，其中就有前不久刚才离开的一位老人，九十五岁的夏衍。都是我们的非常亲切的人，非常敬爱的人，不知怎的竟一下子现在会距离我们这样远，很远，很远很远，可望不可即了。

悼夏衍

当时上海已经在炮火声中了，我和叶灵凤一起到大陆商场的茶座去，和夏衍乘坐同一部电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的《赛金花》上演时，我是非常钦佩他和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部戏的。但在电梯里他满脸心事，怎么没注意到我。他正忙着他的大事，忙得不堪。一句话没有给我说，但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上海沦陷了，戴望舒一家带了我一家到香港去，我第二次见他是在香港。有一次一大群人聚在快活谷喝茶，其中还有廖公，这是正式的见面相识。以后，我们有了共同语言，并日益熟悉起来了。时常在皇后大道的中华百货公司的阁仔，喝着下午茶，会面和聊天。但那时最吸引我的人不是他而是热情洋溢的乔冠华，而冷静、理智且更幽默的夏衍，虽然谈锋犀利，娓娓而不倦，却比较克制，更从容不迫。他老是开我玩笑，说我长得像那个英国首相张伯伦，常常一见我说：“你看你看，张伯伦来了！你们看他像不像？”因为张伯伦不得人心，我只好苦笑着说，“像，像。像！就是少拿了一把雨伞罢了。”

我最接近他的一段时间，是在桂林。他代表郭沫若主编《救亡日报》时，我到桂林去，想采访在南宁前线的昆仑关的一场大会战。我住在七星岩旅社，天天往他的报社里跑。围着火盆，听他纵论天下大势，夏公发表了最精采的国内外形势分析。我真是想不到他能知道那么多的信息，作出那么准确的判断，叫我五体投地了，忻悦之至。这一段经历，在我自己的回忆录里，详细写了的。不多说了。

再以后，是重庆《新华日报》时期了，那时我很瘦，他又给我换了个诨名，说我一身骨瘦如柴，很像一只螳螂。说了几次以后，我就用了一个“唐郎”来作为笔名了。这些事本来没有什么必要去提它，但这可以说明那个时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轻松愉快。后来到了重庆，接触也更多，依然谐趣无穷，笑口常开。若要细说，是可以写成很漂亮的书的，不过时间较远了，要这样做就得有一大堆研究和准备工作了。

开国以后，在北京，见面的机会也很多，较多的机会交谈，而谈话反而稀少了一些，就是许多的话反而不大好说了。在一些会场上经常碰到，紧张感与岁月俱增，松弛感却已不知去向了。往昔的那种无所不谈的，畅所欲言的心情，竟不知何时杳然消失了。可叹可叹，多么令人感觉到淡淡的悲哀了呵！

在我的回忆录里，我写到他的篇页也还是不少的。因为写了不少，所以曾经提出想听听夏公的意见，有什么地方写得不对，还来得及再改正改正。这样，我到 he 家里去了一次，在九二年的春天。当问到这个时，他说：都对，都对的，你不用改了，可以啦。既然得到了这句话，我自也不能多说什么了。那年他是九十二的高龄了，能有这么一次见面，也是心里很庆幸和快活的了。

对夏公我有什么话儿想说的呢？我想来想去倒有一句话：我太羡慕他的一生了。他能活到九十五岁，真不简单。谁会这样想的呢？他自己也说过，他本来是学科学的。虽然后来改了行，过的生活比较科学化。他的身后安排，据我所知，是有紊不乱，条理分明，井然有序。那么，这点羡慕，就不能构成什么悼念了。然而，这还是悼念，还是很深、很深的悼念呵。

悼冯至

1936年的一个夏天，在上海，戴望舒为《新诗》月刊结集一个五人编委会，为卞之琳、孙大雨、冯至、梁宗岱和望舒自己。他那时有两个小喽罗：路易士和我。

在上海的一家名叫“蜀腴”的川餐馆，新诗社宴请了一次客，届时，编委到四人，只卞之琳因在北京没有来。赴宴者有路易士（即现在客居于美国

加州的大诗人纪弦)和周煦良,邵洵美,和一位女诗人严文庄,和我,共有九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冯至先生。他身材不高,微微有点胖,是学者型诗人。温柔敦厚,他说话并不多。他是经鲁迅先生称赞过的诗人。梁宗岱也很“帅”,不多话,只有邵洵美一人,是一付风流潇洒的样子,话说得最多。望舒本想大家好好谈一谈诗的,心中便有点不高兴,认为这诗会给他搅乱了话题。时在1936年冬,一去已五十九年了。

冯至先生写过他自己的一个最动人的故事

1937年的8月12日上午,冯先生在上海出海口吴淞口的镇上的一座小桥上,看见一个卖西瓜的农民,如何突然间发现,当时空气里已战云密布,急忙地招呼即将进入前方阵地的士兵,来吃西瓜,“弟兄们,把这一担西瓜分着吃了吧,反正我也不愿意再挑回去了”。话说完,他的周围聚集起一群士兵。一看见这幅景象,他心里感到轻松和爽朗。当他在镇上办完了一点事,乘轮回上海,船从日本军舰中通过。一到家,便听到了闸北一带的炮声响起来。他听了炮声,就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好像放下了一个长年的负担。这在当时是几亿人同心向往的一端。然后,一直要等到八年之后,他终于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才再一次喘了一口气。先是四万万人同时喘出的一口气,再是这全世界都共同喘出的一口气。冯先生的这篇散文,喘出这样两口气,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力作,为之心折之至。请看他,他喘过一口四亿人之气,他又喘过一口全球人之气。今年正好是纪念二次大战的五十周年了。

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在《人民中国》当记者,去他家采访这位刚出国访问了民主德国回来的冯先生。我是去请他为我们刊物写文章的。我才知道他是中国德文学会的会长。他带了我去参观了他主办的一座“德国文学图书馆”在一个很幽雅的庭院中。现在当然已归了公家,失去了他的独创性了。那时我读了他的许多诗歌译文:哥德和海涅,席勒和里尔克。尤其是他译的里尔克,叫我喜欢得没有法子了。至今那记忆,还一点儿没有消失。

在1956年夏天,西安机场来通知,要我去住一晚上,次晨飞兰州。到了那里,只孤零零一人,寂寞中突然看见冯先生也在。他也是在等候次日的班机,要飞回北京的。这不期而遇,真使我们高兴到了极顶。在机场月下,我们谈到了深夜,次晨他还一路散步送我,一直送到飞机的舷梯旁。那时坐飞机的人少些,还是可以这样做的。后来他写了一首诗,叫《西安机场赠徐迟》,因为那样的机遇实在太难得了。

冯先生最使我佩服的一件事,是1957年《诗刊》创刊前一个月。我们在想望着创刊号上能发表毛泽东主席的诗作。大家说,这恐怕不可能。我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家来动脑筋,想出一句话来,告诉毛主席。这句话必须是他一听到就立刻答允给我们以他的诗词的。只要想出这一句话来,只许一句话!大家不信,也都不怎么想它。但是冯先生在想。在过年的时候,我到北大的燕南园冯先生家,聊了一上午,在他家吃了午饭,冯先生后来说了一句话。我一听就跳了起来,大叫:“就是这一句话!”是的,正是冯先生,想出了这一句巧妙的话。智慧之神通过他说出了这一句话来了。

我回到编辑部就用这句话来写了一封信,大家签了名,发出去了。过了不几天,中南海来了一个电话,要主编臧克家到编辑部等着,有重要的信。一忽儿,信来了,毛主席寄来了他的一十八首旧体诗词。

这句话,我过去讲过,那样聪明的话呵!过去我说了,但并没有多少反

映。我很奇怪。我们对于智慧怎么能无动于衷！我不再说它了。反正是确有这回事。一句话，换回来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毛主席的一封信》。

我最近一次见冯先生是在中国作协组织的一个诗集评奖会上。我也是被邀请的评委之一，我参加了评委的工作。冯先生也在。我们同住在一座大楼上，我看到他在一连三天的时间里，非常认真地坐在桌前，弓着腰阅读要评奖的诗集，十分认真。使得我心中感动。

冯至先生也是九十五岁，去世了，我想写一悼念文章，写了前面那几段，就好像他并没有去世似的。他，我是不会忘记他的，他的《十四行诗》是不会被人忘记的，他的译文也将和德国诗歌一样的，会永远和他一起存在着的。他不会需要人悼念的。但是我仍悼念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学者，我深深地、深深地悼念着他。

悼蹇先艾

一位老友，云南作协的李乔先生，去年 11 月 12 日给我来了一封信：

“贵州老作家蹇先艾与我有四十多年交情，是一位忠厚长者，今年 10 月我写了一首拙诗祝贺他八十八岁大寿。他复了我一信。不料 10 月 26 日跌了一交，因脑出血即逝世，令人哀伤！他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者，文化革命前续弦的那位夫人在他遭受批斗时，曾保护过他，不让斗，不让打，他感激不尽。不想那位夫人在十年浩劫中受刺激太深，患精神分裂症，对他加以虐待，乱骂乱打，他不堪折磨，与她离婚。可是，又想到她舍死忘生保护他的那些行为，又让她同居一起。那位夫人变成虐待狂，他也甘之如饴，逆来顺受，直到逝世。他先后请过两三位阿姨做饭，并伺候她。阿姨没有事时难以消遣，他租些小人书来给她看，那位夫人疑心他有异，更加折磨，并屡次将阿姨赶跑。蹇老念及她保护之情，始终不忍与她分开。看他，可不是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者吗？蹇老后半生可说是一个悲剧。”

和蹇老，我一向是深有感情的。后来因为读到他的一些旧作，更觉得他的作品里面的深度，不同凡响，就有了比深深的感情还加添了一层的深深的敬意。毕竟蹇老是 30 年代靠拢在鲁迅先生身边的老作家了，便又有了点“咸阳古道音尘绝”的感伤之感。他身体向来是很好的，他不该那样早地走掉的。

我去过贵州一共三次。第一次没见蹇老，第二次见了，陪我游览，谈得很是快活。在 1979 年，我们同在作协的访问团里，一起到大庆和鞍钢。有一天晚间，辽宁省委任仲夷书记宴请。我和李德生将军一时兴起，两人竟喝掉了一瓶茅台酒。醉醺醺的兴奋，使我缠着蹇老，发起酒疯来了。这才发现蹇老的英文很“棒”，和他胡扯了半天的洋泾浜，以后开会见面，必找他长谈。但第三次在贵阳见面，他推说忙不过来，只见一面就不再见了，我已知道他家里有了难处。他家里的事当时听说到了，但没有这次的详尽。接李乔信后，我才更加明白他了，便觉得格外难过。（这里面一定还有很悱恻动人的细节，现在还一点也不知道，而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而又正是这一次的贵州之行，使我更加理解贵州省，有无比丰富的矿产资源，有格外美丽的山水，还有那时人们还不知道的这样感人（！）的人道主义。但我和李乔先生一样，对于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很赞同的，当然对于托尔斯泰和蹇先艾先生的人格我是钦佩的。不过我自己并不想要这样的人格。但知利人，不知利己；以至己之不存，何能利人呢？

悼沙鸥

人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于和好地相处？而且，人口又这么多，十二个亿，恐怕还不止这个数目了呢。这多的人，相处在一起，肯定是不好办的。

从这多的人口中，这么一个人他走啦，祝他的灵魂平安。想起了沙鸥来，本来是我的很好的朋友，不知怎的，一朝分手，却像成了仇人似的，半个世纪，不通音讯，没有往来，形同陌路。实在是不应该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就知道了。做人真难呵！

抗战期间，在重庆，沙鸥创作了一组组的方言诗，用四川话写大后方的悲惨的，痛苦的，底层人民的，血和泪的生活。受到了好评，就此成了有名的诗人。1950年，他和王亚平一起，主持《人民诗歌》的创刊，办了一年，就停了。他继续写诗。把方言诗是放弃了，也写许多诗论，都是可以帮助推进诗歌运动的。后来成立了《诗刊》，任编委。至1958年，新民歌运动崛起，那一年的《诗刊》主要是他主持的，次年就到了1959年。不知怎么一回事。中间有一个很复杂的情节，能写出来也许就是一部长篇小说。这年的五一节之夜，天空中正飞溅着灿烂的礼花，他却忽然不见了，我们满城找他，从城里找到城外。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揪心的痛苦。

他后来离开了北京，沉默多年。后来，又写诗了。近年是在重庆，就一直继续在写诗，这一点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据《华夏诗报》上的文章，说到他已去世，报上并详细描写了他的临终和近年来他写的诗，我才知道这一噩耗。

关于他，流传着好多的传说。是不怎么有利于他的，也无法转述。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雾蒙蒙的尘世中，有很多是完全不必要的，而居然很认真地做着。其实却只是一些我们既不能理解，又不肯容忍的人和事。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呢？说真的，如果现在要真实地描绘出中国的那怕只是小小的一幅图画来，还真不容易呢。文学呵，诗歌呵，这本来就是做这一件事的，全国也出版了好多好多小说和诗歌，但是好多事没有说出来，都不能说和说不清楚的。什么事会说不清楚的呢？什么事是不可容忍的呢？无非是自己心地狭窄！

我想，不一定管得那么多了。我认识你，沙鸥。我与你，曾经有一段很快乐的友情，虽然半个世纪没有往来了，而记忆犹在。我们的不相往来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凭什么我们中间要有这样荒谬的误会呢？我为什么只能够悼念那前面半个世纪的沙鸥。前不久我就很想给你写封信，表述一下恢复友情的要求，并想过认真的把它恢复起来，可惜已经迟了一步。那么悼念我们终身的友情至少还来得及吧。我痛苦地悼念的沙鸥是一个一生完整的沙鸥，他被我们不公平地冷淡过，不，简直是遗弃过。我感到难过，我感到后悔，我感到痛苦，我要补过。将来我们在天上见面时，我要向你道歉，我要向你赔罪。

记得开国之初，你曾住在北京的城东北的角角上，我却住在城西偏南的角角上。有一天我找你，就乘车转了半个城，转一个身儿又回到了家，那么快速，不过现在可不行了，就是用航天飞机冲出了太阳系，银河系，巡天遥看一千河，也无法再找到你了。不能让这永世的沉思，默默地保持下去的，

不然从今以后的人间怎能有深厚的友情，永久地存在呢？

悼金近

金近夫人：

接到噩耗，心凉悲痛。我们是四四年相识的，已经是四十五年的老友了。没想到他先我而去。这几年我身体不好，未能经常给他写信，只在开会时常常谈谈。我本想给你发一唁电的，但电文里说不了几句话，故改作写信。金近为人，真诚之至，不失童心，勤勤恳恳，从事著作，一生是正直的，成果也很明显。失去他，当然是令人悲痛的，但务必请你自己珍重，节哀为是。他将长留我们记忆之中，异日当再为他写悼文，以志哀悼的。保重！保重！

徐迟

1989年7月11日

这封悼念的信我寄出后，又在他的一本纪念文集里看到了它。本想就这样录下来了，不必再写什么。但感到我不能在这里写得这样子短，何况还有话要说的，又想加上几句了。是的，自从失去了金近，我发现，我也就失去了我的小朋友，也就是失去了我的童心。因为，我确实是他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小朋友。在这好些年里，当我们互相过从时，或通信时，我都是因他那颗纯洁的心灵的诱导，而童心大发，总是听见他的声音便雀跃而起，且振翅飞翔的。我们像小学生一样的搭着肩膀走路，尽说一些天真无邪的话儿。当我和他在一起时，好不快活，写信时也是那样，字儿好像也写得歪歪斜斜的。而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从此这些欢乐的时刻呵，是再也不会有的了。

悼（李宗大）鸥外鸥

六十二年（1933年）之前，我从家乡到广州去看你，你到码头上来接了我，替我提起了我那一口旧皮箱。原来我们并不相识，是施蛰存先生介绍。原先我们只是神交而已。你从船上找到了我，我们在码头上才初次见面。便这样，我们并肩来到了你自家的家门前，你放下了我的旧皮箱，说了，我是从东海岸来到广州市的，“你是高贵的客人，请你先进”。于是主人谦逊地让我，作为客人的我乃先你而进入了你的家门。你提起了皮箱跟在我后面。

多好的主人呵，我们语言不通（至今我不懂广东话），却和你建立了深深的友情。永远难忘的初相识，这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但这中间也有疏远了一段。虽然我们曾有这中间一段时间不相往来，但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我们就恢复了友情。到“文革”后，我出访香港回来，在广州又见面后，就完全恢复了友情。我知道你并不很愉快，你的遭遇与你的气质不可能融洽，我知道你还写诗。你这辛辣讽刺的大诗人，一直在、暂时还在，受到国内的歧视与冷落，但你是拥有很多的读者的。

然而在天堂的门前，在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都是客，好像你这件事就不愿意和我谦让了，你是先就远远的去海外，这次又独自的先进了门去，把我甩在门外的远方。你夫人和女儿发电报来，我才知道你已过了忘川，先我而到达了彼岸。没有什么，我会在办完了我这边的这一些琐碎的拉杂的小事情后，随后就到的。然后，让我们再在一起谈诗。你不要笑话我，说我又迟到了。不过我会说，我借你的光，本来没有想用这个名字，它是你首先给我

提出来的。好啦，我们又可以一起飘荡在云霄间，脚踏着空虚的宇宙，作为两个虚拟的灵魂，来谈我们的空灵的诗，并且谐和地、久久地相互唱和了。你别埋怨喜欢你的诗的人不多，实说，那是因为你的诗讽刺得太厉害了，人们受不了你的挖苦。难道还有哪一个诗人，比你更前卫、更赤忱、更勇敢的？你比所有的诗人都大胆！更有益！而且在恋爱的观点上，你尤其凶猛，你大张挞伐，你挖苦那些无耻之徒的鄙劣行为尖锐得叫人们受不了，吃不消，就是这缘故。所以，很不喜欢你的诗的人是有的，而喜欢你的诗人就更多，我就是其中之一，也是特别忠诚的一个。你的诗材才是不朽的！这句话我敢于当着众人的面前，大声的这样说。因此，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失去你，她不一定认为是太大的损失，现在小脚女人没有了，气量狭窄的人还很多的，失去你，实在是一个“也是一个损失”的套话的同时的，一句真实的话：真正不可弥补的损失。

悼秦文玉

秦文玉并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同一代的人了，我不仅仅悼念他而已，他的丧失使我惊愕，惋惜得去失了声音，他是那么迷人的散文家，我为他的《绿雪》而写的序中说过：“西藏是迷人的，关于它的这部书是迷人的，作者的风散文风格是迷人的，主要是因为它写的是最迷人的西藏高原。”

而尤其迷人的是他的如此罕见地卓越的小说，我说的就是他的《女活佛》一书。这本精彩的书出版至今已有十年，还没有公平地得到它应有的评价。真是一本好书呵，甚至比《绿雪》写得还要好，因为《绿雪》虽迷人，但还有些不够成熟的地方，而这本书却不一样了。它从喜马拉雅山的中国西藏的丹宁寺女活佛，写到她接受神示，不失身份地流浪印度，直写到进入不丹王国的边境，还转到印度去了，最后，仍不能回到丹宁寺去。这整个艰险的历程，许多的事，不能说出来的，说出了一些来。这些事孕育着深远的内容，我们是从来也不怎么知道的。神秘的土地，神秘的宗教，作者写得多么的惊心动魄。如在三十三节中描写岗穹赛和蓝眉尖的一切野蛮搏斗中最野蛮的一场，后者已把前者举到了顶，正要在女活佛的眼前把他抛掷到万丈深渊的山涧中去，她冷冷地和他作了一段庄严的对话。一霎间侍卫乌坚仿佛自天而降，把一根短棍打到了蓝眉尖的眼睛上。逢凶化吉，破邪呈祥，落入山涧的是黑耳鸢……我说你，秦文玉呵，你本该有多少的好文章好作品可写的呵，而我们却没有帮助你写出来，反而把许多杂碎的工作压到了你的肩上。而你又是这样的不幸，在盛年遭殃，你被从我们的手中夺去了。你还这么年轻就离开了我们。我是因久久为地，外出漂泊，你出事了我只是听闻，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不敢去问。总之是实在太可惜、太叫人悲痛了。这个老天爷，真是太暴戾，太无情了！

但是既然事已如此，那也可以接受。我本想哭你的，也不想哭你了，你写的那位活佛也在尘埃中如此生活着，你写得真好，你闯入了禁区，又闯出了一个新的时间与一个新的空间来了。我佩服你没有落入俗套，给予我们一个初看起来莫明其妙的答案。你的没有给答案，这就给了女活佛的一个好答案了。你写出了一个新的境界来了。它不会很快的得到理解的，最终你会看到它被少数人所理解。而为此我哭悼你。

哭谢景兰

在北京的姐姐突然来了一个信，报告一个消息，说，刚接到中央电台陈莲的一个电话，说陈莲女士报告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巴黎的谢景兰被汽车撞了，立即身亡。

呵！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你就这样一霎间被夺去了生命。我刚才哭过了秦文玉，现在又要在电脑上大哭了。你们都是在车祸中丧生的。我曾把已写为《哭秦文玉》的“哭”字改掉了，改成“悼”字。现在我把已写为《悼谢景兰》的“悼”字改去，改为“哭”字了。我们从1942年相识以来四十三年来的友情细想了一遍，从北碚和温堂峡，从嘉陵新村和杭州的里西湖，从你到北京的久别重逢到我们在一起在巴黎的共游罗浮宫，以及从一起在贵州作乌江、赤水河之行到最后一次你离开北京，都细想过了一遍，我们的友情几乎可以说是爱情，纯洁的爱情。我们是心心相印的，而绝不染一丝一毫的红尘杂念。我们是这样的相互地理解呵，像音乐上的复对位的和声，像美术上的 Nuance（色彩上的微细差别），像律诗中的不是反对而是正对的对句，内在的统一精神，高能物理中的不是共存而是并协，是最完美的完美，最纯洁的纯洁。但是有一次你却对我说了，“如果我们一直是在一起生活，我想一定会非常融洽的。”也不一定的呵，但我没有说。如果本来是两小无猜的，一旦“猜”了，就是烦恼和痛苦的开始。你不该说这话的呢，它多少损伤了一点儿我们的感情。有人认为天下决不可能有纯洁的爱情。有的，天下定有，决不止你我，有这样的爱情的。我喜欢你赠我的画，它就在我的书斋的墙上瞅着我，我早把这画看成了《天上人间》的图画，也即是我们这个宇宙的图画了。我曾误把灵芝称为幽兰，灵芝就是灵芝，而幽兰正是你。你为什么不生长在空谷中，那里是你本来应当生长的地方，你却进入了偏偏是红尘中最是繁华之地的巴黎，在那里你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呢？但你这回去世也太突然又太剧烈了。又有什么要紧呢？剧烈，或不剧烈的痛苦，都也只是是一霎耳。生死本只一霎，连宇宙也只是一霎，你的画上已经解剖清楚了。这地球也只是红尘一粒而已。我这两年也曾生活在尘垢里，我从中得到了冷然的一滴，我得了最高的智慧。世俗是这样的可笑，庸人才真正的可鄙。如今幽兰回到了她的空谷中，我却要为了超渡众生而留在人间，不过我用的方法是我自己的。而你已经获得了超渡。你已经进入了你自己的图画，从那里，你肯定是不屑再向人间作一瞥回顾的了。

你们，所有的，我悼念的人们，我知道你们都已经醒悟了，而成了自由粒子了，你们不断地，穿过不空虚的真空，飞来飞去，穿过实体，或冲撞而湮没，或飞溅又诞生。呵！不幸的人生也就是这样，然而，能有这样的人生，也有幸了。

《芦芒诗选》序

到哪里再去找《东海之歌》那样的动人心弦的革命史诗呢？

到哪里再去找《东海之歌》那样的气韵生动、须眉毕现的，形象化的，又是戏剧性的，真、善、美的语言呢？

到哪里再去找《东海之歌》那样的风暴声、海浪声、锚链声、拉纤号子声、枪声、人声、爆炸声、沉船声、呐喊声、歼灭侵略者的战斗声和凯旋归来那样地掷地如有金石声的歌声弦管之声的共鸣与交响呢？

《东海之歌》的作者，已经永远离开了人间。

《东海之歌》写于1940年，到1950年又加了一段尾声；《东海船夫曲》写于1941年；《“东海老人”》写于1942年；还有《转移》、《东海边的一夜》两首，没有记上年代；又有东海之滨的《苇荡营》一首，也没有写作年代，但都是同一期间，同一海域的作品。1955年芦芒的第一个诗集出版，书名就叫《东海之歌》。

一个诗人能够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歌颂人民歌颂党，一个诗人能够在身后，给后世留下这样的好诗，献给人民献给党，把中华民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侵略的人民战争记录下来，描绘下来，提炼、升华、结晶，他可以无愧于心，他真是不虚此生，何况他那时还是刚刚写诗，后来还写了很不少的好诗，它们的作者不是正含笑于九霄之上吗？

他的感觉就那样锐敏，他捕捉的形象就那样鲜明，他录下的音响就那样逼真，他处理的素材就那样贴身。当诗人开始学习写诗的时候，他在生活的源泉里是泡得周身渗透了生命之琼浆似的、洒向稿笺都是诗，他是活生生的生活本身，就像生活本身在创作一样。

《东海之歌》里，有抗日的现实主义，也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诗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整个儿是抗日的主题、气氛与题材。诗里的倾向性完全是通过形象本身来显示的，但也并不排斥，在恰当的地方发出浪漫主义的、充满了革命理想的声音。“风儿凶，浪儿狠！要将身——挡住风浪啦嗨！”（《东海船夫曲》）和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一样的，是和抗日的现实主义结合着的革命的浪漫主义！

在《东海之歌》描绘了海和将军的面容之后，将军说了一段话，又在描绘了海滩高地上的老渔民和八岁的小姑娘之后，老人也说了一段话；然后，将军和战士共同抒发了他们的理想，而这理想，只不过经过了十年就实现了。在美妙的尾声中，将军乘海军巨舰经过这海滩，十八岁的姑娘已是女村长，而八十岁的老爹是盐场的看门人。多么紧凑、鲜明、简练地描绘了我们这由暗鸣叱咤到光辉灿烂的伟大转变时代。诗人这第一首诗写得多么动人，当时他只有二十岁！尾声是三十岁加的，成熟了。

诗人芦芒在奔赴皖南新四军参加革命时，是1939年，十九岁。随后到了东海前线，在战地服务团，主要从事美术工作，后来是画报工作。写诗，那时属于他的业余创作活动。然而，那些诗是他深入生活以后，禁制不住的发自内心的歌唱。所唱的不是他个人的情感，而是客观世界里的革命斗争的所感所触、所见所闻，他将它们摄制电影似的拍摄下来了。

又《“东海老人”》一首，写老人和残暴的敌人斗争，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歌颂了我中华民族的英魂忠魄。《东海边的一夜》谴责、控诉了日本派遣军龟一郎军曹在中国大地上欠下的血债。罪恶太深，他无处逃生，在电

线杆上自尽了，其中也描绘了日本人民的哀惋痛苦。《苇荡营》写大坏蛋魏八，向敌人告了密，而最后受到惩罚的却是魏八自己和他的儿子魏小宝，大快人心。

所有这些诗，都有莎士比亚式的戏剧性的生动情节以及完美而丰富的荷马史诗的风味，并具有勃洛克以及马雅可夫斯基那种革命诗歌的某些影响与特点。我最近重读了这几首诗，被它们震动了。在我国新诗创作中，这样的好诗并不多见。芦芒的诗中，这一组六首诗一千行，可以推为他的代表作。

到了1945年，芦芒写了一首《洪泽湖》。诗很动人，但风格上已起了一些变化。“洪泽湖呀，你深沉的急急的滚动着浊水”，“你”字出现在诗中。有了你便有了我，诗人自己虽然没有出现在诗中，却已经站在洪泽湖边了。从这首诗开始，芦芒从史诗的领域跨进了抒情诗的领域。

这首诗仍然有丰富的色彩和完美的形象，然而诗里没有单一的人物形象，有的是一般的彩色风貌，没有特殊的事件，有的是全面闪耀的图景。此后，他的诗中就没有了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在“骑兵行”中，是一队骑兵，甚至可以是一个骑兵团在驰突。《人民参军》中的老公公也不是“这一个”而是那个共同体。偶尔，在《女担架队员》中，我们又看到金凤这个具有个性的妇女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遇见了根宝的爹，则如电光倏然，一闪就没有了。《禁门》那样的诗是吹响了席勒式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号角。

决不能说号角、传声筒就要不得。传声筒是诗歌艺术的一大发展。这件事发生在十八、十九世纪民主革命运动中。自席勒以降，有一系列的战斗的诗人写了光辉的政治抒情诗。战斗需要号角，革命需要号角。时代精神需要传声筒——诗。

1962年，芦芒的诗集《奔腾的马蹄》出版，这本书在1979年，诗人逝世半年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再版出书了。这是开国以后，他复员回到上海，在上海十年的创作的选集。萧三同志在一封代序的信的里面，对诗人说，“你鼓动青年努力生产，你欢呼空军去警卫祖国的万里长空，你歌唱二十四个大老粗的熔铁炉小组，号召市民绿化上海，为‘双钱牌’轮胎写广告，为油菜写进行曲，‘让奔腾的马蹄卷起革命的旋风和闪电’……这都是沸腾的（奔腾的）现实和战斗的号召”，这里说的是芦芒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朗诵诗、鼓动诗、政治抒情诗；这都是芦芒对于大上海的礼赞。芦芒有一首诗就叫《吹响喇叭》——它吹响了时代精神的号角。

当时整个诗歌界的风气也是这样的，诗都写得硬梆梆的，脉脉柔情要受批评。工农的胳膊都越画越粗，豪言壮语都是慷慨激昂的。那时《诗刊》提出个口号，要“开一代诗风”，还嫌当时这样的诗风不够强烈，不够“带劲儿”，要求风暴来得更紧些，海燕飞得更高些！

1964年他又出版了诗集《大江行》，其中有《战长江》、《垦区行》等民歌体十五首。从姜彬同志转念芦芒同志的文章中得知他为上海的新民歌运动付出了许多心血和劳动。他在这集子里也写了比较优美的《太湖抒情诗》，但写得动人的还是他那著名的《外滩，玫瑰色的早晨》和《这时候，在东海边的一个角上……》。他最有名的一首诗是《母亲的名字》，又具有史诗风格了。

以后是十年的剧烈动荡。全国的诗人都沉默了。诗歌只存在于无声处，最后在天安门广场上喷发。芦芒也重新歌唱起来，发表了许多好诗。他的足迹出现在白洋淀，出现在大庆油田的创业庄，出现在柳江边，但就在他准备

要到海南岛去的前夕，他突然离开了人间。正当他要进入六十之年，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高潮之际，我们完全能希望他写出比《东海之歌》更好的史诗。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他突然离开了我们。

借芦芒的诗集，我想说一点创作方法的问题。从芦芒的诗来说，《东海之歌》那一组诗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且是抗日的现实主义的，因而也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在夜雾里走向太空的白发老人，“东海老人”闪烁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光芒。

芦芒的政治抒情诗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敌高举批判的大旗，同时歌颂骑兵，歌颂突击队，歌颂上海外滩，玫瑰色的早晨，歌颂“双钱牌”轮胎。创业庄的酒歌，白洋淀的船歌，也属于浪漫主义的抒情诗。

我个人有种感觉，芦芒的诗艺中，较成功的还是他的史诗式的《东海之歌》。在他的青年时期，他是新四军的战士，紧密地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均匀地溶化在水分子的中间那样，澄清而透明地，化得根本看不见他的自我了。这就是一般通用的“如鱼得水”的意思。

要做到这一点，是必须深入生活的。芦芒一度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如果要向芦芒学诗的话，我想首先还是要学习他深入到革命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又能用艺术的手段，来写诗并绘画。他的绘画集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我看过他的绘画原作，也和《东海之歌》一样的富于生活气息和革命精神。因之我感到深深的痛悼，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了。

时代的怒涛

——《黄山松》序

1962年秋，安徽省文联召开诗歌座谈会，中国作协命我前往。我自京飞合肥，经芜湖，到黄山，正值台风过境。一路风雨，惟风势已渐，雨丝稍煞。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这自然的气候也相当相似。我一路上看到、听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中，因“极左”路线干扰（当时并没有这个认识），安徽遭受到的酷烈摧残。事先，诗人闻捷曾劝告我不要到安徽去。我没有想到会见到这样严重的灾难。我后悔没有听从他。去时，人们垂泪而道，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阴暗场景惨不忍言，也不忍闻。百思不得其解：建国一十三年了，前景美好的社会主义何以发生了这样的逆转？种种实际的情况，一直至今还是讳隐不谈的，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然当时，台风确已过境，情况是扭转过来了。八字方针起到了良好作用，事过境迁，似乎还是不谈它为好，免得挫伤我们的志气，徒使英雄气短。但我得承认，那时我气沮了。黯然伤神，世事诚非我们所能逆料。怅惘到了无所适从时，便浮升起一种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的遐想。在胜境黄山，我且玩一个痛快。于是，遗伤痕于下界，漂浮乎云海之上，悦松姿之挺拔，赏飞瀑之响雷，迎日出于清凉台，蹑彩虹于光明顶，贪图美学的享受，其情调是低沉的。

诗歌座谈会紧接着在黄山宾馆开起来了。立即一场争论，在会上爆发。当时安徽一位有名的诗人，住在芜湖的宾馆，写他的长诗。我想，我远道之人都来了，他是近在咫尺的，却不来赴会。人们自然对他有了议论。在五九年、六年那样困难的时刻，人民正在遭受极大的痛苦，肥沃的大地嗷嗷待哺，鱼米之乡却在填沟壑。作为诗人，应该敏锐地，并恰当地，发愤以抒情的，这位诗家反而高唱着：“江南春，浓似酒”一类的曲子，集成了一卷。当对就在座谈会上引出了一场大喇叭与小提琴之争。音色刚健的大喇叭不喜欢柔和缠绵的小提琴；优美清亮的小提琴弦也不爱那粗犷的铜管。但铜管也可以悱恻而多情，弦音也可以慷慨而悲歌。政治诗少不得澎湃的热情，田园诗中也有金刚怒目的猛志。会上有人认为山水诗不可能也不应当写成政治诗；也有人认为，尽管时代要求有高亢的号角，但喇叭若没有吹好，徒然使人感到噪聒，也还是听者寥寥。我们时代的诗歌，到底应当如何写呢？

这场论争的活跃思想，振奋了我当时低沉的情绪。我遽然而悟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结识了许多诗友，情谊至今不衰。我就是在这个诗会上最初结识了张万舒同志的。正是在这一场论战之中，他有感而发，新创作了一首《黄山松》，写成就给我看。我被它所激动，《黄山松》具有一种雄壮的气势。它奏出了这特定时代的霜天晓角。我不再纳闷了，我从

谁有你的根底艰难贫苦啊，
你从那紫色的岩上挺起了腰；
即使是裸露着的根须，
也把山岩紧紧地拥抱！

这一节诗里，感到作者写出了三年灾难时期的中国人民的形象，写出了这一个多世纪来我们民族的声音，也写出了—一个要做人民的诗人所必定要有的品性和精神。这首诗深深触动了我。诗人在黄山松涛的画幅之中发出了时代的怒涛声。它是政治诗而写成了风景诗，山水诗写成为言志之诗。会后我把这首诗带回北京，很快在《诗刊》上发表。它激起了一阵回声。它是 60

年代初鼓舞斗志的有一定影响的一首好诗。

当时是全国最大一家模型厂车工的张万舒同志，现在是新华社安徽分社采编部主任。一直是业余作者，本职工作很忙，他写诗不多。从五七年他还只十九岁时发表第一首诗迄今，二十多年只写了一百多首诗，他写的诗少，是因为他尽力求精的缘故。每一首诗发表出来是都要接受人民和历史的检验的。他告诉过我，他认为诗的生命在于真。忠于时代，忠于人民的真声才能产生冲击波，挥发出感染的力量，振撼读者的心灵。虚伪的感情，失真的语言瞒不过读者。矫揉造作的诗是软弱无力的，然而真情要找到真切的表现也不容易。故他宁愿写得少些，尽自己的力量写得好些，他是有一股磨劲的。这一次他自选集子，一百多首诗砍去了一半多。我看到留下来的都是比较好的。他的严谨态度我是很赞成的。鉴于《黄山松》已为张万舒的创作定了音，他的其余诗创作也就不赘述了。

从黄山相识以后，我们并没有再见面。通过不少信，其中却中断过十年。去年元月，《诗刊》召开座谈会于北京，又相遇了。知道他从黄山唱到了法国、英国、拉美和日本等地。音响远美，真是高兴。听说他要编诗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写篇序。他笑而不答。却把诗集编了出来，迳自送到出版社去了，也不给我说一声。偏偏让我从编辑部那儿探听到了，我硬要给它写篇序文。承蒙他和出版社的笑纳，作些短序，无非是让读者略知作者其人及其诗而已，非有他也。然亦有他也；历史总是打圈子，我就不说穿了。

1980年2月

《左琴科幽默讽刺小说选》译本序

本书译者送来左琴科中短篇小说若干篇，要求我为它写个序文。平素向来不喜欢作序，一般这一类要求都是推辞了的。但这个序还是试写一篇，因为有几句话要说。

1935年4月2日夜，鲁迅在致黄源一封信中，说起“左勤克的小篇，金人想译他一本，都是滑稽故事，检查是不会有问题的，销路大约也未必坏，就约他译来，收在丛书内，何如？”

我在阅读《鲁迅书信集》时，读到这里，脑中忽然划过一个思想：噢，鲁迅先生是这样评论左琴科的！为什么会划过这个思想呢？就是因为苏联的日丹诺夫有个讲话狠狠地批评了左琴科，棍子很粗，打得很重。我对日丹诺夫的那些文字也有看法，觉得味道不对。当年虽然也是紧跟的，但总想看一看这个左琴科的作品，然而看不到。看鲁迅的笔下就很有肯定之意，所谓滑稽作品，实际上是好的评价，又说检查是不会有问题的，自然是说的他没有政治性质的问题。既没有政治性质的问题，想必是讽刺世态与人情之作，倒是值得阅读的作品了。又说，这样的作品销路未必坏，就是说他颇有通俗性与大众化的意思了。鲁迅愿意出版这样的书，这个左勤克（即今译的左琴科）大体上该是一个有一定社会效果的作家了，是可以有利于人心与世道的。

不过这些年来，总也没有读到他的作品。前年在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上，我研究了日丹诺夫的一些言论，也因为鲁迅那一段话在我心中形成了对左琴科的一个印象，对日丹诺夫的大张挞伐就很有意见了。但遗憾的很，就是一直没读到左琴科的作品。

滑稽作品，在我国很不发达，就是侯宝林很有名，很受欢迎。相声这一艺术形式是笑的艺术的形式，但至今好像还不登大雅之堂，赶不上希腊古典喜剧诗人阿历斯托芬尼斯的地位之崇高。在我国作家之中，掌握笑的艺术的作家，自鲁迅死后，只有老舍一人，而自老舍死后，就再没有一人。过去还有《笑林广记》，然而现在没有了，好像根本不该有的。30年代也出过什么幽默大师。但当时就有一种说法，叫做“硬滑稽”的，说的是其实并不滑稽而硬作滑稽的姿态。现在是硬滑稽也很少了，很使我怀念，因为硬滑稽本身就滑稽。我们现在还剩下的，就只是相声和漫画这两种笑的艺术形式了。笑的文学不发达。硬滑稽也不多。现在文艺新秀倒是雨后春笋，但从事笑的艺术的作家还一个没有出现。这是有社会原因的，尽管我们在生活中，可笑的事还不少，我们还是时常大笑特笑，中笑小笑，嗤然一笑以及莞尔而笑的，然而都不愿意将这些笑形诸于文字。我们在文学中引人发笑这件事，看来确实还值得避免，不过也因此恐怕是值得提倡的了。

终于，因为我研究过一次日丹诺夫引起了译者的注意了，这个译本就来到我的书桌上。我抽暇读了一些篇，满足了我的想读一读左琴科的作品愿望。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也更证明了鲁迅的评论的准确。

这些作品都值得一读，读了免不了笑它一笑，而其中却有深意存焉。也许读者会觉得它们也并不深刻，因为我们的文学要求非常深刻的思想性。然而，这本书暂时还是有存在价值的，因为截至我写作这篇序文之时，我还没有看过比这本书更深刻一些的滑稽故事呢。我想说的就是这么几句话。

急转的陀螺

——郁风散文集序

这位画家，兼善散文，写得还真不少。相对而言，画却不多。毋宁说，她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术工作者；也可以说，她是一个以美术为专业的革命工作者。但说到底，她还是画家，也应当如此。

1934年，她十八岁，在北平艺专毕业后又去南京学画，和另一个同学女画家方菁，二人同开画展。次年十九岁回到上海，她投入了救亡运动，从此不光是绘画，而是什么都干了。在地下党领导指示下，去浦东工人夜校教课，响应一二·九运动，当过妇女、青年、工人游行示威的领队；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先跟郭老和夏衍同志去广州办救亡日报，后来又去香港当记者、编辑；后随剧团巡回演出，搞舞台美术和服装设计；再后来又在新民报编副刊等等。

开国以后，她又担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展览部主任。50年代至今，一直在做美术工作。筹备、组织、评选，举办了不知多少展览，展出过不知多少中外绘画雕塑和一应的美术品，接待着不知多少人次的摩踵挨肩的参观群众。如此周旋了这多年，她自然很少时间绘画了。

她说过这样的话：“与其摈弃这一切责任而去搞并不比别人更有成就的作品，还不如在我比较轻而易举地使有成就的作品不致于被埋没冷落来得更有意义。”

说得很好。本来，客观条件把她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也并非牢不可变的。但她有这样的才能，有适应的天性，又有广泛的兴趣。一当主观的努力博得了客观的公认，她就越来越身不由己了。

然美术之意义，仍取决于展览；她这种工作，没有一股劲是干不下来的。抛开为人民的美术事业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不说，她干的都卓有成效，而且不管如何忙碌，她都从容不迫，风度潇洒。美术界对她的展览工作是一致首肯的。

这些年里绘画不多，散文却写了不少。见景生情，一挥而就，像画素描似的，写来如水涌流。不计工拙，反而精采，以明丽见胜，带有很大的激情。集子里最早一篇写于1943年，其实再早她就已经有好作品了。这本集子是四十年间的选集，收入的文章不少，舍弃了的更多，如她的美术评论一类散文，花去不少心血，字数比这本集子还多得多呢。

她写的散文纯真，有自己独特风格。有些作家写了很多短篇长篇，多幕剧甚至长诗，还展示不出散文风格来。这散文风格，非同小可，尤其在文风不振之时，陈辞滥调还在充斥。好的散文风格，似是信手写来的，却新鲜活泼，才智横溢，天然成趣，足见个性，颇能引起共鸣，短短的篇幅中，振辐急剧增大，绕梁三日，余音袅袅。

只在最近，她终于全部脱出身来，不再搞展览的具体工作了。但一生中的大半辈子已经过去。掇拾英华，她有了这么一本美文集。

选入本书的若干幅画，都是近年所作。从这些画看，非拿过半个世纪的画笔，是画不出这样苍劲的线条来的。明净的色彩，亦画家心灵之光洁闪照。只当野花闲花丛中，你看到了缩影似的小小风帆，方见富春江上一片风光，布局巧思令人怡悦。在满眼显赫的葵花照耀下，粉墙黑瓦方窗在不显眼处惹起了多少乡情离愁。青峰墨竹红桃，淡淡地掩映着两三家春雨中的江南人家——呵，江南人家！就在这些对比中间，唤起了一瞬间的感情。《过冬的草》

是冬日抒情的杰作，把主题隐藏在非主题的深处，生气勃勃。1982年被选送法国沙龙美展，得金牌的《春风吹又生》，是一幅早春的抒情，生机盎然。细细看去，原来是国画，不是油画，而有油画的效果，国画出了格了。较之不出格的国画之寻求新意者，这些出了格的国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创新。不过，包括写黄山的画幅在内的这些绘画，未免画得工整了一些，说明用心过于严谨，她的画笔还并没有奔放的气势。

对于这些画，她自己是并不满意的，说过：“我多想画出新的画！这一天不会太远了。虽然这批画里也曾注入我热烈的感情和搜索枯肠的心思，但我巴不得它们过去。这次印成集子放上这几幅，也就是标志过去的结束。”

说的好啊，标志过去结束的这本选集《我的故乡》。有异域的描写，从《巴黎珠贝》之中也可以窥见未来起点的标志了。作为风景诗古代产地的富春江，不也早已开始了它拦河坝前后的新生命了？她明媚的生地，父母、亲族、师友的回忆，童年的钓台，正如一只急转的陀螺，它就是这个地球，是这么多的他乡的遭遇，异域的见闻，人物的命运之所由来。从这本书里也可以读到历史的涤荡更新，社会急剧转变的去向了。

我们都是些平凡的人微不足道，却生活在最不平凡的年代里，而且生活在经济大发展的中国，在多事的地球上，在太阳系的里面，在银河之上。生产力的大革命任务已担上我们肩头。科学技术还将赋予人类以主宰宇宙的方便。文学艺术又怎能沾沾自喜地满足于狭隘的目光和闭塞的思路里呢？

《我的故乡》的卷末，作者已经是一个面向寰球的世界公民。她访问过并描写过的有南太平洋岛屿、大洋洲的风光，以及法国巴黎的文化。吸收域外的生活与文化的精华，可以促进我们的新创作。我们应该登上更多的航程，奋翅作更高的飞翔。无限在我们前面，我们自己未必就是有限。今后的历程将更艰苦，也将不知如何形容才能形容出那种光辉灿烂。我们也决不会忘记当年我们如何投身于革命以及我们如何走了过来的，但我们头顶就有满天星斗，等着我们去勘察与开发呢。

记得在40年代刚开始时，宋庆龄曾送给她一支自来水笔。她用它写下了这许多散文。然而说到最后，她还是一位画家，今后她应当用彩笔绘画出新的创作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83年1月11日

《瘠地上的樱桃》序

熊召政写过一首诗，名叫《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这首诗发表后，激起一场风波。有人反对，有人赞成。风吹浪打，折腾了一年之久，弄得举国皆知，群起而支援之。时过境迁，其中是非曲直已不值得提了。一首诗有这样大的影响，就足以说明这首诗不错。

它本来只是暴露了一个所谓“大寨县”的问题，后来却是通过它显示了两种对待，也就是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不同态度。一个态度是其势汹汹，责难这首诗；另一种却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指出这首诗的美中不足。后来，问题解决，而使诗人心悦诚服，并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激发出更清新之作的，自然是后一种态度。

我并不赞成他以后再写这样的诗。因我们常说的诗是战斗的武器，并不是真把诗当作一件砍杀的家伙。诗人可以投笔从戎，上火线去；但诗只能对战斗、对战士起鼓舞作用，枪杆诗只能贴在枪杆上。用普希金的名义来开炮射击，确有其事；也没有用《奥涅金》当炮弹打击希特勒。战斗的诗歌，只是发出战斗的号召，助战的声音，鼓动的声音，以激励战斗的精神。诗，跟具体的武器，跟枪杆子有别，而跟擂鼓之声，庶几近之。《森林》要求这首诗摆到省委书记的桌上去，颇有点干预生活的味道。其实，在这首诗发表之前，事情已经摆在省委书记的桌上了。正是这位贤明的书记，早已作过了调查研究，经过了深思熟虑，妥善处理了这事和这一类的事。后来也是他，妥善处理了这一场风波，使争议双方都受到了教育，现在他已到中央书记处去工作了。

说起来，还在风起萍末的时候，熊召政就写出了《在深山》这一组组的小诗了。我们在1980年初相知，读了他这些诗的手稿，觉得颇有诗味，赞成他这样写下去。虽然有个别的人说他这些诗纤细柔弱，远不如《森林》有力，故不屑一顾。我持相反的看法。原子核的核力量，看起来微乎其微，但释放出来时，一分为二为裂变，惊天动地，合二为一为聚变，比裂变还强大。

休曼称肖邦的音乐为“掩蔽在鲜花里的大炮”时，他是这样说的：“如果北方的大国的专制暴君知道，在肖邦的创作里，在他的马祖卡舞曲的质朴的旋律里，隐藏多么危险的敌人，他一定会禁止音乐。”考察文学艺术作品，可不能简单化。我们有些不读书的领导，总以为他有权，可以禁这禁那，这和那岂是禁得了的？熊召政有一首漂亮的小诗《谷雨》说得很好，“你越掐，它越长得丰盈。”他说的是茶叶，毫无弦外之音，不必敏感，可别误会了。

那些小诗颇有诗味。我并不说它们都好，有的只有一点儿诗味。要求每一首诗写得十分完美，全都像金刚钻那样的，呈八面体球面晶形的光整美丽、光彩夺目，真是不容易的。可以追求，他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呢。若干篇诗，如《盗墓者》仿佛有点靠近。

他年纪虽轻，经历怪曲折的。他读过那么多线装书，还是童年读的呢，大约自学为主，缺少严师指点，现在在行文中，在诗行中，好像还有点纰漏可捉。法国诗人亚姆，通过程抱一先生的翻译，会对他有影响，却是我初料不到的。我也喜欢这位法国诗人，尤爱这个程译本，故抄出几首来，加上按语，送给《长江》丛刊发表。丛刊出于谨慎，抽掉了其中的两首爱情译诗。然而熊召政就这样爱上了亚姆这么个法国诗人。

我看熊召政的山村诗可用《诗品》的办法把它叫做“其源也于”程译的

亚姆。这些山村诗，是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年轻诗人心中的。如没有程译的亚姆将它们唤醒，它们就会在他心中长期沉睡，甚至永久沉睡不醒。一经点化，它们就醒来了，并找到出口，化为流泉，喷沫而出，潺湲不绝，现在还在奔流呢。这就不能说亚姆对他没有影响，程抱一对他没有影响，但这也不全是他们的影响，他们只是给他开了窍。可见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一样的。

因为诗素早已孕育，一旦成熟，条件具备，山村诗就像樱桃一样，一组又一组的挂在枝头了。瘠地上的樱桃？不，不是瘠地上的樱桃。我不懂他为什么要搞一个这样谦逊的书名。年轻人往往如此，其实他的诗已经证明：证明地并不瘠者，正是这些红红的樱桃。

我不用多说了。请尝这一颗颗的红樱桃吧。

程抱一译诗集序

1979年春，随巴金同志、孔荪荪同志，我访问了法国，得识程抱一先生于巴黎。首先一个印象是程先生的儒雅和爱祖国之心；次一个印象是他对法国生活的理解，他的法语的精通。接着又得一个印象，原来龚丝旦·维涅尔女士的《艾青译诗选》是经程先生校订过的，而她还是程先生的弟子。我们接触时间并不很多，交谈得并不够，很快却又要向他告辞了。程先生临别赠书三种：一本是他译中国古典名诗的法文书；一本是《和亚丁谈法国诗》，一本是《和亚丁谈里尔克》，亚丁其实就是他自己，后两本是中文书。我收下了，并谢谢他，那时也只是一般的礼节性的感谢而已。于是回国到北京，便中翻了翻他的书，竟然大吃一惊！那本中国古典名诗的翻译，他用了两种译法：一是逐字译，完全保存原诗的原样，只把中文字换了法文，而读来又很好，这样做需要很深的法语的功力；另是作意译，一般人都是用这个译法的，但因先有原诗用中文字在同一页上印刷着，中间又逐字译出，读过它们，然后再读这意译诗时，一下子可就看到了全诗的意译出来的崇高和优美来了。我先读的是这本书，已为之拍案叫绝，击节叹服了。然后读《和亚丁谈法国诗》，则不仅吃惊，而且为之狂喜，只见那译文的正确与精美，用字的魅惑与妥贴，那介绍作者生平之文字的文采之美，那评论文字的精湛，一针见血的妙处，决不是钝刀子割肉，叫读者发出哀求的惨声的，真所谓“抓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此郑板桥之名句也，不用说我是如何的高兴了。然后我读了《和亚丁谈里尔克》。程先生对里尔克的理解也这样精通，说明他的德语的功夫也不亚于他的法语。我在40年代之初，写过一篇《里尔克礼赞》，故对这位奥地利诗人尚非不熟悉，而现在我才认识到我自己的无知与狂妄了。我饥渴地拜读此书，吸饮了它的芬芳甘冽，快活得无法形容。那样的深邃的诗，也只有里尔克达到，而程抱一先生却能将它们体贴入微地翻译出来。这三本书于是成了我的枕中秘笈，轻易不肯示人，因为书有这种命运，一示人就有人借，一借出去就回不来。

稍后，我抄录了雅姆的几首译诗，在《长江丛刊》上予以发表。但该刊编辑未免谨小慎微，发表时抽下了两篇，恰巧又是最好的两篇。乃转而发表了他的和亚丁谈波德莱尔的通信和译诗于当时我个人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上。当函告程先生时，他又重新将此文抄录了一遍，并略有修订，寄了回来。以后对雨果，对阿波里奈尔，对兰波也修改了寄来。这些文章都发表了，反应极好。当积累较多时，我就想要给他编一合集了。

1983年5月，在京出席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与湖南代表彭燕郊同志同住于北京市第三招待所。我们每天见面。我们还谈诗。他送了我几本《诗苑译林》丛书，并要我给他约点稿子。我立刻便想到程先生的译诗了。大会以后，我将他那两本书和已发表的七篇文章寄给了燕郊，因他是为《诗苑译林》丛书约稿的，并建议编一本译诗集问世，对每一个法国诗人冠以短小介绍及评论，即可从那两本书中选出。随即收到燕郊来信，同意我的建议，并说已得出版社同意，决定将此书收入《诗苑译林》丛书中。他又命我作序。我想到，程抱一先生曾在台湾居住，他赠给我的两本书也是在台湾初版印刷的，但对大陆他有深厚的感情。虽身在巴黎，而心向北京，他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曾使我心温柔而爱上了他，总想为他作点服务工作。他现在还不知他的译诗将在祖国出版。我想，一旦知道了，一定会使他心花怒放，

乃至泪花盈眶的了。而本书的读者也会非常感激他的，他给我们送来这一束束法兰西的馥郁而鲜艳的花球——它们真美呵！

1983年9月18日

《又是一年春草绿》序

一位挚友嘱托我给这本书写个序，不敢推诿，欣然应命。

这本书是中国园圃协会的一个直接地受协会领导的著名园圃里的一位园圃工人所著写的园圃学栽培科的，多少年经验的一小册回忆录。预告着将来还可能会有大部头的回忆录问世。

我就是有幸得在这个全国首屈一指的名园花圃里，受到了雨露与阳光栽培的一朵，属于报春花（*Primula malacoides*）品种的现已开败了的小蓓蕾。虽然我已到了萎谢之年了，但想起他和他的同事们怎样为这个园圃操劳，为我的怒放的花期花尽了心血汗水，不能不有点感情激动。

无论中国玫瑰，洛阳牡丹，云南茶花，川藏杜鹃，最红最大最美的花朵也都得要经过花师傅、园圃工人的专家手艺的一番番调养料理，修枝剪叶，才能出落得格外的鲜艳芬芳，显示出仪态万方。

这本书虽然正面让我们看到一些尊敬的，可爱可喜的花朵在不同的场景里的言与行，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园圃工人自己的园圃的形象与活跃的为园圃服务的姿态。必须是爱花的园圃工人才能把花养好，但不是所有的园圃工人都爱花的。唯有真正爱花的人，各种有效措施才能跟上去。他的书里让我们看到了爱花者。写到这里，忽又想到那位挚友在嘱托我写序时就嘱咐了我，他说，你可要写得实事求是一些，可不能太赞美。是的，我前面写的，也许太赞美了吧。我想了想，我还是实事求是的，我用的比喻也还不是并不恰当的。谁让他自己也题的《又是一年春草绿》呢！

1983年11月

注：

中国园圃协会，在这里是指的中国作家协会。在这里写到的名园花圃指的是作协的刊物《人民文学》。这里写到的园圃工人指的是现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周明同志。他写的这本书写了一些作家的作品产生的情况。这本书是由陕西文艺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的。

法国当代五诗人诗选的引子

法兰西的诗歌，有似一条柔和而又强悍的溪，一道温馨而又深幽的涧，一段光亮得叫人睁不开眼睛，时而又黝黑、朦胧，似乎浓得化不开的雾川，一泓多色彩而又单纯、统一、深远的美丽的大河，即使有其丑陋之处也还是很美很美的河川，一百五十年来法兰西诗歌，或许可以被推举为这段时间里全世界各个疆域里奔流过往的同类型河川中最丰富最激动人心的水系了。

自从雨果、波德莱尔、兰波、玛拉美、梵乐希、魏尔伦这些大诗人以降，从进入本世纪起，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这十多年间突然在法国涌出了无数的诗人，分别成为许许多多小流派，曾出版过两百多种小诗刊。这比我国 1986 年的百花齐放的诗坛，包括所谓“诗大展”在内，或不相上下，或甚至于还更蓬勃些呢。虽然他们现在都已听不见了，但划时代的诗歌的“现代精神”都正是从这些中间培育出来的。这些人中间还有一些诗被人记得。不过我们异国的人知道得极少。

本世纪初的巴黎，新世纪的巴黎，强烈地放射出耀目的光华来了。法国诗人之首都的巴黎几乎成了世界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群集的首都，保尔福尔、果尔蒙、克洛代尔、阿波里奈尔、何维第、雅姆、米修，多么辉煌的光彩呵，随着日月的运行，他们的声誉与日俱增了。而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大诗人大文豪大艺术家都来到了巴黎，共同创造着现代精神的文艺。艾略脱、庞德、洛尔迦、里尔克、奈鲁达等在诗歌方面；海明威、乔伊斯、爱仑堡、卡夫卡之在小说方面；毕伽索、玛蒂斯、达利、克里、米洛、莱杰尔等等在美术方面；以及若望·高克多、狄阿吉利夫、斯特拉文斯基等在舞蹈与舞剧方面；拉威尔、德法耶、格拉那达、巴尔托克、许洪堡等在音乐作曲方面，真正是组成了一个“美的世纪”（La BelleEpoque）。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大放异彩，愈来愈盛，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堪与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发生与发展并驾前驱，真是盛极一时。就在里尔克、艾略特、庞德等斐声诗苑之际，法国诗歌从达达主义走向超现实主义，出了勃勒东、查拉、阿拉贡、艾吕雅等，他们喷薄而出，冲向进步的天空，还有苏佩维埃尔因有了一个好的译本，在我国国内较为有名了，而波里维尔特、庞德、夏尔等因没有译本，在我国较不知名，似乎默默无闻，但在法国都是知名的。总之以当时的盛况来说，可谓空前，或许竟是近于绝后了。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继那些盛誉不衰的大诗人之后，又增添了许多抒情的高手：彭那福亚、波斯开、列那、萨巴蒂埃、奥斯特尔、阿林、杰勃斯，还有别些，都成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崛起的诗人。但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了。译过来的很少，介绍他们的工作几乎完全没有人做。怪谁个呢？我们有过一个不短的时期，“嘭”的一声，关上了大门，干脆拒绝一切引进，历时达好多个年头呢！这个工作现在要补做，也还来得及。

正是在这个美的河川的这样的背景上，本书译者江伙生副教授，从当前的本世纪 80 年代的法兰西诗人中，选择了包括 1985 年法国的得奖诗人朗贝尔和勒·当岱克在内的，还有弗耶当卡夫特、柯尼格、塞尔日·佩五位诗人，他们是译者自己喜爱，且在他留学法国期间和他们有了接触往来的五诗人，他选择了他们的诗。

这五诗人是一百五十年来法兰西诗歌的美丽河川的现阶段的，当代的河段。有了这五位诗人的作品，大体上我们可以纵览整个河川的发展过程，

大河上下，一览无余了。

现在就诗论诗，让我们对这五位诗人逐个地端详一番。在我国出版界，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在翻译的作品前面，由原作者对中国读者说一些话，谈作者本国的创作情况，及其本人的创作感受的。这是少见的创举，至少在诗歌集子方面，本书可能是仅有的一本。

五位法国诗人中的第一位，让——克朗兹斯·朗贝尔写有他的《我的诗歌观》一篇约六千字，是专为中国读者写的，然后是他的诗：《漪蒂尔》、《流浪公园》、《异域恨》等五首，都不算短。虽不为多，却也够我们来细致捉摸和揣摩的了。这个比较亲切的初步接触，可以让我们认识他对诗歌艺术的认真追求，下过多少功夫，用上多大功力，他很喜欢中国，也来到过中国的国境线前，可惜事先没有安排好，没有能够入境来。他的田园诗《漪蒂尔》、《流浪公园》是很美的，又很深沉。摘取随便哪几行诗都够你这么终日的吟哦，况有无数的画面可供你凝视、沉思。《异域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不知道的。但它那么可爱，那么有趣，还相当的辛酸，充满了脉脉柔情，《识字课本》、《公案》都很奇妙，充满了想象和都有迹象可寻的联想。“你是用拇指和食指取了那些樱桃”。那些诗句和警句和那些纤细的感觉和可喜可爱、可悯可怜的一切，随着朗贝尔，你也成了诗人，也在捻须、构思和创作了。

德尼丝·勒·当岱克，女诗人，给我们中国读者谈法国诗，《今日法国之诗坛》。五彩缤纷，比我在这个小序之前部分写的丰富得多了，德·尼丝的两首诗《小屋》和《乱麻的纺织女工》（心乱如麻的纺织女工）大有史诗的气派，叙述了极复杂的事，抒发了最温柔的情，凡是喜欢对号入座者，多半可以对号入座。当岱克的诗比较好读，把阁下自己摆进去就是了。

泰奥多尔·柯尼格写了一篇致中国读者，特别是武汉读者的信，《诗歌简论》。弗耶当卡夫特写了《法国当代诗歌管见》致中国读者。他们对法国诗歌作了说明、介绍和评论，面对着面地促膝谈心，娓娓道来，尤见亲切。为什么法国诗人对中国的感情这么深厚？柯尼格说得好，中法之间没有距离，甚至“比某些平坦大道相连的邻国更为接近”。他的诗并不晦涩，不过只读一两遍不足于体会妙处。弗耶当卡夫特对中国诗人提出了恰当的忠告和明确的建议。他的诗《在万里长城的脚下》，自认他是中国长城的西方后代，他的诗一读就可以明白，二次读又三次读它原来还有许多内涵，非再三吟诵是不能会心的。

塞尔日·佩的《无题——致中国读者》颇如望舒的《零札》和艾青的《诗论》，实为源流相通：中国诗给过法国诗，法国诗给过中国诗。佩的诗，短小精悍，也并不好“懂”，但这里用不到这个字，感觉就已够用。读诗之求一个懂，好比是问道于盲。不要去寻求一首诗的理念和意义了，但一定要去感受和把握一首诗的形象和情绪，对于这位诗人，对于这五位诗人，对于古往今来所有的诗人，此话一概适用。

《袁水拍的诗歌集》序

人已经去世了，愿他的灵魂平安。十年动乱后期他曾当过文化部的副部长，未增光彩，这是袁水拍的悲剧。但也有喜剧，他的诗歌活下来了，还会长久地活下去，并且写入文学史的。

受一些老同志的委托，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袁水拍的诗歌集。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勉力承担了。他工作过的单位送来了一大包他的书籍，其中有他的诗集十本，山歌集两本，还有译诗集六本，诗论集两本，共二十本之多。可也没有收集到他的全部著作，还遗漏两本，我找来了旧藏两本给以补上。另有剪报和手稿一叠，还有他已编好而并未出版的一本诗集，名叫《云水集》：合起来的数量也就很惊人了。

关于这个编辑工作，原先想把他的自由诗、山歌和译诗合起来编选一大本的。但数量过多，只得把译诗分出去，也许将来可以另编一本译诗集。他解放前出的诗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腾的岁月》和颇有影响的《马凡陀的山歌》、《解放山歌》等共出了七本。其中还另有的的一本《诗四十首》，则是他解放前那些诗歌的自选集，正好成了我这个选本的一个蓝本。那本自选集选得太苛了些，许多好诗并未选入，因此我将它扩大了。共选进了一百三十首，说起来也还是相当苛刻的。开国以后，他的诗歌集有六本之多。它们是《春莺集》、《华沙·北京·维也纳》、《歌颂和诅咒》和《马凡陀的山歌》的自选本（它也是我选山歌时的一本蓝本），还有《政治讽刺诗》、《煤烟和鸟》，加上未出版的《云水集》，也共七本。从质量来讲，他的诗歌不如以前，我就选得更严一些。《政治讽刺诗》、《煤烟和鸟》就没有选上一首。而《春莺颂》也成了我选他的开国后的诗歌的一个蓝本。这七本我共选了五十首。然后征求意见，又加添二十二首，并分为五辑。这样，解放前和开国后，共选二百二首。

袁水拍一生在五个城市中度过：苏州、香港、重庆、上海和北京。

苏州。他本是苏州人，名叫袁光楣，1919年生。度过了童年少年期后，他进了设在名园沧浪亭内的苏州艺术专科学校学美术。星期天他总要到观前街的新书店和护龙街的旧书店走走，还要到北局那边的吴苑茶馆店去，喝茶，温温功课，听听评弹。这个文化古城有园林百余座。即使是方寸之地，半亩之园，都有崖岸溪壑，种植了名贵花木，养上了珍禽异兽，藏书之富，甲于江南，高度的文化生活就熏陶了他。事后追思，评弹艺术对他后来的山歌创作是具有相当重要性的。

香港。后来他考进了中国银行，当上一名练习生。抗战开始，他被调到香港分行的信托部里，升作一名低级职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信托部是在汇丰银行大楼的五层楼上办公的。已经不绘画了，天天要上班，只是有时他心里还会有两三张画的题材，其中一张只能是木刻之类的思想。他写起小文章来了，在《力报》的由茅盾主编的副刊《言林》上以及其他报纸的报屁股上发表了許多，那时署名望诸。他知识面很广，文字清新俊逸，颇为幽默有趣，读者看了欢喜。我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他的。他身高一米八二，长方形的脸型，中间略凹，夹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起话来，犹带吴音。年轻时神态潇洒，热情洋溢。未说话自己先笑，说出口来，听者也大笑。他很有风趣，且不庸俗，有雅谑与机智之妙才的，但在美学上，他显示出崇高的素质。初时尚未成婚，不久回苏州成亲，却又单身返港，害得后来夫人朱云珍万里寻夫而来。

1939年春，戴望舒和当时在湖南的艾青合编诗刊《顶点》。望舒要我向这个苏州人约稿。大约他早先就写过诗的，欣然应命，三天后就交稿了。当时那首诗题为《我是一个田夸老》，现在改名《不能归他们》，若不是他的第一首诗，至少也是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署名袁水拍。诗很好，发表后受到好评，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他找到了适合于他的那新诗的形式，不断发表新作，很快成为有影响的诗人。我曾问他为何起这个笔名。他答道：有一句描绘江南水乡的诗，“ 水拍天”（前四个字记不起来了），他的笔名就由此而来。后来毛泽东《长征》诗中也把“浪拍”改为“水拍”了，可见这名字还是饶有诗味的。

在殖民地的香港，抗日战争的不利以及社会现实生活的黑暗使他很快有了明确的倾向性。他曾居住过的那种“后街”的人民的沉沦，迫使他唱出了慷慨的悲歌。他参加了进步的文化活动，参加了学习《新哲学大纲》、《法兰西内战》和《资本论》的学习小组。虽然每周六天在银行里工作，每天的傍晚都要去咖啡座和文艺界、新闻界人士聚集交谈，喝杯柠檬茶再回家。那些年香港成了从上海、广州和南洋来的文化人的集中点。他们开始在银行联谊会里开展进步活动，并举办青年读书班。1940年1月11日上午我和他谈了一些话后，他回家去，一顿饭的工夫就拿来了一首诗送我，就是《悲歌赠徐迟》。那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人民》，由郁风作的封面。十月，中国银行调他到重庆的总行去工作，次年五月又调回香港。国民党统治下的雾重庆和大后方的痛苦的现实生活更加加深了他的认识。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写了当时的名篇《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只这么两年时间，一个革命诗人迅速地成长并进入了成熟期。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他通过东江纵队的帮助，过了一个短期的游击区的生活，唱着 he 根据一首流行歌曲填词的《阳台山之春》，安全到达桂林，转道回重庆。

重庆。仍在中国银行的总管理处信托部供职，职位又稍有点上升，头两年他还写抒情诗，也翻译了一些外国诗：霍斯曼、彭斯和拜伦等等，重庆当时号称陪都，敌机时常要来轰炸。升上了一个警报灯笼就要往防空洞跑，挂上两个灯笼得赶紧进防空洞，通货逐渐膨胀，物价越涨越高。特务多如牛毛，人民怨声载道。忽然讽刺诗大为流行，从1944年起，他用马凡陀的笔名，写出了许多讽刺的山歌。初时山歌调子还不太流畅，次年就比较流利，渐多佳作。到1946年，他越写越妙，简直达到了最好的民歌手的出神入化之境。这些山歌无情地解剖、暴露和猛击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凶恶暴行和无耻谰言。1946年春，他又由银行调回上海。

上海。他在外滩的中国银行大厦里办公了，同时担任了《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编辑。那时天天去上班，那种生活是气得死人的。但白天办公憋足了气，到晚上他就有气可出，有山歌可唱了。偶尔他又写点抒情诗。大多数唱的是火辣辣的马凡陀山歌。当对山歌的声誉已有好评，山歌的形式他运用自如。上海滩上的素材可多了，随手取来，俯拾皆是，加上对时局的分析，好像每天的气象预报一样，山歌起到了政治气候的预报作用。这样，他在银行里渐渐受人注意，不大安全了，乃于1948年转移到香港，进《华商报》工作。其时国内局势已经大定，人民解放战争的胜负已十分分明，1949年上海解放，他随军进入上海。他写的名作《在一个黎明》，描绘了上海的解放景象的这首诗，结束了他的前半生创作生涯。七月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九月来京定居。

北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日子里，他乘坐着人民空军的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前的检阅台，接受人民领袖的检阅，并写了诗。他的工作，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任文艺部主任。于是社会活动多起来了。那时他神采飞扬，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过莫斯科，华沙，维也纳，并出访印度等地。所写国际题材的诗歌和政治讽刺诗非常动人，非常强烈。但在反右时期，他写的反右的诗，大跃进时期，写的大跃进山歌却并不突出，看来它们只在当时有配合的作用，过后却只好报废了。不仅他的诗才渐渐地消蚀了，枯竭了，人也渐渐变得沉默，拘谨，口才也不灵活了。偶然他依然能爆发出机智的光彩，然而我们熟悉他前半生生涯的人都感到他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与朋辈往来也少了，见面时也不能很好地交流了。到60年代他离开了人民日报社，当上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他更加严肃、谨慎起来。他不能如鱼得水，反而远离了沸腾的生活，并疏离了故人。这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不再是一个唱谐谑调的山歌歌手，更谈不上作一个热情奔放的抒情诗人。他只能写一点淡而无味的政治讽刺诗，说教式的论说文，曾编过一部《文艺札记》。等到他当上副部长之后，写诗只是为了执行任务。他失却了灵气，诗味少了，诗风不灵光了。往下就没法说了。1982年，当庆祝《诗刊》创刊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再次出现时，我看到他已是一个疾病缠身、异常衰颓的老人。此后也发表了一些作品，却不能选入本集，因为他早期的诗歌是那样生气勃勃的。1979年夏天，夫人先逝。八二年春天，他病逝于北京。

袁水拍的诗歌，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抒情诗，山歌和政治讽刺诗这样的三大类型。他没有写过叙事长诗。从我个人的爱好来说，他写得最好的还是抒情诗。那应当是他最擅长的诗歌形式，自有他特具的优势、卓越的禀赋。《向日葵》这个集子里，有首《铃鼓》，《沸腾的岁月》里有首《哀悼》，这两首抒情诗曾由育才学校的一位表演艺术家朗诵过。那一次是我一生所听到的最美的诗的最感人的朗诵了。然而，《岁月》里的第一首《火车》，更是回肠荡气，最令人感动的抒情名篇。我们能感受那种在火车上摇晃前进以及冷静的月台上的那种期待的情怀。诗人给我们揭示了大家都熟悉而又往往忽略了的有关火车的多种细节。一个坐在火车里，有约会要奔赴的，被等候着的人；一个在小火车站月台上，围在围巾里，脸冻得通红的，已经约好了的等候的人，决不是只很少的人有过这种等人和被等的经验的。甚至每一个读者都有过共感，似乎都能理会这种同样的经验的！能说出这种共感的抒情诗诚然是最好的抒情诗，诗不正是要做到这共感的一点的吗？如果袁水拍能将他的才能集中于写这种抒情诗，他将会得到何等的丰盛收获。我相信他完全可以写得和彭斯一样好，和拜伦一样好，甚至是可以、完全可以写得和所有那些大诗人的抒情诗一样好的。但他没有集中全力于写作抒情诗。社会现实和理论的号召使他把主要精力平分到山歌和政治讽刺诗里去了。我早年曾写过一篇短文叫《抒情的放逐》，预言了放逐抒情诗人的灾难。这年头可不是抒情的年头，这世纪也再不是抒情的世纪了。袁水拍本能写出很多很好的抒情诗，然而终究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抒情诗，是无可奈何的。

后来他是这样热情地投身于《山歌》的创作了。1944到1949年，这么六个年头里，他是冷讽热嘲，嬉笑怒骂，他身不由己地勇猛地以山歌作武器而战斗了过来。他取得了在战场上不可能取得的另一种形式的精神世界里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他极精采地展出了用革命辩证法则来展出的旧中国、旧社会里的人间悲喜剧。《发票贴在印花上》、《四不像》、《海外奇

谈》、《关金票》、《人咬狗》等等，都是绝妙好歌，我前面说过的所谓出神入化之作。但也要指出，幽默不等于油滑，而讽刺文字一出现油腔滑调，便是败笔。《马凡陀的山歌》也还有一些“随口溜”的东西，有些地方也还是败坏了马凡陀的好名声的。那例子我就不举了，那样的山歌我也就不选了。在他写山歌之初，我是不赞成他这样写的，但后来却佩服他了，作为一个笑的艺术家的艺术家，他是卓越的。山歌成为他的成功之作了，他的声誉主要来之于山歌。有一次我和他一同去看望陈毅元帅，元帅送了他一柄折扇，上面元帅写下了赞美《马凡陀的山歌》的墨迹。不知现在这柄珍贵的折扇还在否？

还有他的政治讽刺诗，有的用了山歌体，有的用了自由诗，篇页也不在少数。早在《人民》这第一个诗集中，就有《一个“政治家”的祈祷》这样的讽刺诗了。《冬天、冬天》中又有了《未爆发的夜》和《凡尔赛的枪弹》等国际题材的作品。他是受了当时一位著名的国际述评家（后来是我国著名的外交特使）的影响和教导的。在《沸腾的岁月》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写有好几首诗，还有写解放法兰西、解放柏林和会师柏林的诗，以及庆祝苏联红军节和1945年十月革命节等等的诗。在这些诗中，诗人走向国际题材，以诗作为国际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武器。他在和平运动中，出国访问时，也写了很多好诗，他是一个能在国际外交讲台及反战的和平运动中纵横冲杀和舌战群魔那样的一个不可多得的诗人。可惜的是他后来的《煤烟与鸟》、《政治讽刺诗》没有写好。观乎这样一位诗人的一生作品，我们将发现，一旦失去了诗人的鲜明个性之后，写起那种十分正确、十分保险、人云亦云、重复了又重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诗歌，实在是苍白无力。应知文学艺术须臾也不能离开“自我”，只是“自我”应与“世界”即主观应与客观实际，自我应与社会现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这本选集就要摆在读者面前。说得再多再好也是赘言。西谚云“天下王子成千上万，贝多芬只有一个”。是的，诗人也是不多的，乌纱帽却不少。诗人要桂冠，不要乌纱帽！

1984年4月6日

袁水拍译《聂鲁达诗文选》再版序

巴勃罗·奈鲁达(Pablo Neruda)，三十年来，在我国一直被译成巴勃罗·聂鲁达，是一大错误。现在要下个决心，把这错误慢慢地纠正过来。否则既对不起这位大诗人，也对不起西班牙语。

奈鲁达生于1904年，于智利的帕拉尔城；两岁时迁居特墨哥。年仅十四岁，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十九岁他出版第一本诗集。在二十岁那年又出版第二本诗集，叫《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凡曾读过它的人，都会感觉到一个新的诗人诞生了。

从二十三岁起，他当上外交官，历任驻仰光、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智利领事馆的领事职。当他二十四岁在科伦坡任上时，曾游历亚洲，来访中国，到过上海。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当时这位智利驻马德里领事目击佛朗哥的军人法西斯统治的残暴行为，西班牙著名的诗人玛却陀和洛尔加都惨遭枪杀，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本来是一个超现实派诗人，现在却写下了《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和愤怒控诉反动派暴行的《亚尔美里亚》等著名诗篇，集合为《西班牙在我心中》一卷。有一次，他朗诵它们给搬运工人们听，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赞扬。这些诗也受到了进步人类的欢迎和感谢。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不对的。天变，道亦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变为进步诗人，写诗热情歌颂斯大林格勒和苏联卫国战争。他后来在巴黎和墨西哥京城当领事，在拉美各国旅行和歌唱，出版诗集《愤怒与痛苦》、《献给博利瓦尔一支歌》、《致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并写了长诗《马楚比楚峰》以及著名的《广场上的死者》等等。

1945年他四十一岁，奈鲁达加入了智利共产党。因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参加政治活动，发表《致广大群众的一封谈心信》，并在议会发表《我控诉》的演讲反对当时的总统独裁统治，于是智利反动政府最高法院判他有罪，下了逮捕令。他被迫转入地下，他的动人的名篇《逃亡者》写下了他在人民群众保护下不停地转移，辗转流亡的过程，直到他逃出智利。

1948年他在北美写出了本世纪最著名的诗篇之一，《让伐木者醒来吧》，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卫国战争作了热情的歌颂，并寄极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这首诗两年后得到了国际和平奖金。

1949年以后，他成为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声音响彻巴黎、华沙、维也纳等一系列的和平大会。1950年，他的《诗歌总集》出版。

1951年他以国际和平奖金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来到中国。我曾在中南海怀仁堂上，听到他朗诵《致宋庆龄》一诗，并看到他授予我国宋庆龄副主席以国际和平大奖。我们现在重印的这本《奈鲁达诗选》就是1951年由袁水拍同志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的。当时出有三种版本：一种仿宋宣纸线装本，一种精装大开本和一种平装二十四开本。为欢迎他的来访，我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过《让伐木者醒来吧》这首长诗，并把当年由电台录制的唱片赠送给他。他那次来中国，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新中国之歌》。

1954年，他五十寿辰时，世界各国都曾派出有代表性的诗人集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给他祝贺。其时代表新中国前去的是诗人艾青，参加了盛大的祝寿活动，并给他送去了一份厚礼。

他第二次来到中国是1957年，仍由诗人艾青前去昆明迎接他，并陪他游

览四川，穿过了长江三峡，转道来到北京。但是那时所谓反“右”斗争已经起来，艾青就没有再行露面。由我主持一次北京诗会的会场上，我见到了他。诗会在进行中，他忽离座出去，独自徘徊在大厅两侧的游廊上。我跑出去向他问讯：“你在寻找什么吗？”他机智地回答：“我在寻找——你。”他寻找的并不是我，我知道他在寻找谁。我们一起回到会场上。以后他就没有再来中国。只听到说，他常在智利的海岬上，面对大海，呼唤一个中国诗人的名字，再后来，我们也很少再听到他的消息了。

五十、六十年代中，他不倦地歌唱，写了大量诗歌，发出嘹亮的声音，出版有《葡萄园和风》、《元素之歌》、《新元素之歌》、《颂歌第三集》、《怪异集》、《航行与归来》、《情诗百首》、《英雄颂》、《智力的岩石》、《典礼歌》、《鸟的艺术》、《沙滩上的屋》、《船歌》、《白天的手》、《世界的终头》、《还有》、《烧红的剑》、《天上的石头》、《海啸》、《无用的地理学》、《孤独的玫瑰》等等，一心一意地，为人类进步而歌唱，他的诗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赞赏。

1970年，奈鲁达由智利共产党推荐，参加了智利总统竞选。后来他自行退出，转而支持了阿连德。阿连德当上总统后，即任命他为智利驻法大使。1971年他得到了诺贝尔奖金。1972年回国，他受到盛大的欢迎。1973年9月13日，他病逝于智利，终年只六十九岁。身后又出版了包括《二〇〇〇年》等八本诗集。

这次湖南人民出版社《诗苑译林》收入并重印的这本书，原来只有九首诗，现补入发表于五十年《诗刊》创刊号上袁译的一首《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共得十首。这十首诗是奈鲁达的代表作，是诗中之诗，是不朽的名篇。译者虽是从英文转译它们的，但是，众所周知，诗只能由诗人翻译，所以袁译的这些诗确是能保存原诗诗味的珍品。可惜和奈鲁达的浩如烟海的诗作相比较，它们只是一瓢之饮了。

我在《文艺和现代化》一文中说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艺定能创作出理智的、健康的、乐观的、丰满的、尽可能完美的文艺形式和作品。”（见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与现代》一书第8页）我看奈鲁达的诗就是我说这样的作品。虽然他也写过不少超现实派的诗作，但他终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诗人，反对人剥削人的旧世界，歌唱无剥削制度的新社会。他是我们的诗人，他是进步人类中的卓越的一员：世界公民，社会主义的歌手。

沉舟已经升出水面 ——《吕亮耕诗选》序

这也是一次打捞沉船的工程。诗人吕亮耕逝世，已有十一年余。祝他的灵魂平安！

然则，在时间的逝波里，应该说，还在近岸的浅海里。诗人遗下子女二人。尤以长子宗林，悉心打捞、收集他们父亲已经失落了沉没了的诗作。在诗人很多知交老友帮助之下，沉舟终于又浮出水面：龙骨还比较完整，形体的色泽和光彩又重新展现了。

我再次诵读了这本《吕亮耕诗选》，被他的那样精美、情深、形象、光亮的诗篇激动得甚至震慑了。不光是为了纪念这位诗人，他那些诗本身就有留芳百世的不朽价值。湖南人民出版社能出版他的诗作，不但很有情义，而且很有眼力呢。

然时间的逝波也还冲刷掉了他的一些诗作。它们有的也经受不住冲刷，不知被冲刷到哪里去了。很可惜，还应当追寻回来。毕竟有不少是追寻不回来的了，令人遗憾。

我和亮耕是同时代人。我们是同年岁的。我比他大一点点，只大了三十五天。不知他是否在 1935 年发表过诗，在《现代》上？1937 年，他在卞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戴望舒为编委的诗刊《新诗》上，发表过《Ottava Rima 四帖》、《独唱》（外三章）等八首诗。《新诗》的主编是戴望舒；在编辑部里跑腿的，有路易士和我两个小编辑。亮耕是 1934 年来到上海的。当时不是不可能和亮耕见面，一起喝过茶的。迄今年月已这么长久，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只有一些溶溶的波影在动荡，没有十分具体的印象了，但他在赠给我的诗中说了：“我们不曾见过一次面。”大约他是对的，不过我们神交已久。我们都还有许多神交素未会面，“却像是最熟不过的朋友，”非常熟稔，情感很深，永在一淘，再也难忘。“如果要寻找友情的线索，那就是生活，那就是诗。”他说得多好呵！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亮耕的诗是有独特风格、他自己的个性的，很光亮、很开朗，形象特别地鲜明。主要的恐怕是他的诗风表现着一种浓郁的艺术追求，其过于执著，而使有的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亮耕早期的诗歌，象征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忧郁、凝重，大多是个人感伤情怀的咏叹；后来抗日战争改变了他的认识。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但抗战前夕我们对艺术的追求，不能完全否定掉。一个诗人以追求艺术性作为他的起始点不是什么坏事。倒是不以对艺术的追求作为起始点的诗人到头来可能是可悲的。不过，艺术追求而为现实生活服务的道路是一条健康的道路。抗日战争那样的大的局势也必然能导引诗人们走上为现实服务的健康道路。亮耕在 30 年代末写的诗都是抗战文艺了。他写得比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丝毫不差，有些甚至还要强些。他满溢的激情喷涌而出。他决不作干嚷。他写的是诗，今天读起来还令人激动，其中深深地感染读者的，如《望金陵》、《不死的记忆》、《望江南》、《一面敌旗》等等。在纪念抗战四十周年的今天，他这些战斗的诗篇依然多多的激发了当年的同仇敌忾，也召回来许多记忆。它们是不朽的诗篇。因为写过这些诗，他是永生的诗人。

他在 40 年代，先当了好几家地方报纸的副刊编辑，后又当了三几家地方报纸的总编辑和主笔的职务。可惜的是他在 40 年代后半的诗，现付阙如，当

时他一定是写了很好的诗篇的。到了 50 年代之初，他离开了报纸工作，当了中学语文教员。1957 年，中国作家协会的《诗刊》创刊，那时主编臧克家同志和我都比较注意团结二十、三十年代以来的诗人，竭力要动员并组织他们回到诗坛来。我们找到亮耕，向他约稿，接到了他的《历史画两幅》。喜的是他写得那样美而雄健有力，我们包括吕剑和吴朗都是非常欣赏非常之高兴的。那年三月号《诗刊》发了这两首诗。当时真应该鼓励他写一巨幅这样的历史大画的呵！六月号又发表了他的《徕山行》。我们满怀着他的希望，相信他必定能为新中国写出瑰丽的诗篇来。但是风起云涌，电闪雷鸣，九月号发表了他的《韶山的农民在战斗》。这首诗，今天看是不妥的，只能“存目”的了。随即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被错划为所谓“右派分子”了，蒙受了一切横暴侮辱和不幸遭遇。整个 60 年代贫病交加，而迫害越来越厉害，到 70 年代，他完全无法生活下去。不知他是怎样地支撑着的？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高风亮节的人：“愿从劲节求知己，岂向柔枝托至情。”（《梅菊吟——赠诗友》），这样的性格竟不容于这样的社会。到了 1974 年的国庆前夕，他支撑不下去了，就此离开了人世。他也来不及听到他得到平反的音讯了。我们要控诉那可诅咒的极左路线，迫害了我们如此优秀的诗人。

他曾经这样地引吭高歌呵！我要告诉远远近近的朋友：/我快乐。生命如春花开放在春天，/阳光在泛滥，哗哗的波浪在呼喊。/原因很简单：我生活在新中国！

这首诗题目叫《快乐》。怎不令人读了掩卷凄然？

但是让我们快乐起来吧。沉舟已经升出水面。

1985 年 10 月 24 日

《天马吟》序

1978年的夏天，我曾和曹禹结伴，同作新疆之行，到过伊犁。一次游览伊宁的春花果园，又一次伫足于伊犁河大桥远眺，而后过桥去了察布查尔锡伯族的瓜田，这两次活动都有马建勋作陪。那时他对文学已有憧憬。因为那夕阳染红的伊犁河、那蓊郁的松林、桦林，那梦幻般的雪山、那撒满了“珍珠”的绿色草原，不能不激起他的敏感心灵对于文学创作的向往。

他生于50年代之初。十年内乱开始时，他只有十几岁。那曾经担任过乡村教师的无辜父亲是被迫害致死的。之后不久，他母亲也因病离开人世。他成了一个几乎被生活所遗弃的孩子。从陕西漂落到了新疆，新疆！啊啊，新疆以她慈母般的宽广胸怀，养育了他，给了他的他没有想到过的温暖。那时他刚刚19岁。他像一棵小小的白杨苗在伊犁河畔，承受了阳光、雨露的恩赐，开始萌芽、扎根。他终于立稳了足跟，在奋斗中求得了生存。他结识了这块土地上的许许多多工人、农民、战士、干部，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伙伴，他们都是他的亲人。他们给了他无私的帮助，使他更加热爱新疆和生活在新疆的人们。他已在这里渡过十四五五个春秋。

他在这段时间里，担任过文学杂志的编辑，伊犁州党委的秘书，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写过一些散文，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和长篇历史小说，成了作家。我看到了他的一些散文，他的散文写得很亲切。若干片断又使我感到惊异。他那些散文写出了何等的风光，展示出来了我国大西北，我国最大的一个自治区的无限宽广的空间感！

例如，他的《边陲四景》，是一篇很小的散文，其中冰山，沙漠，草原，森林，四景各写一小段，字数不多，而空间感大极了。冰山“是一个辽阔而奇特的世界，有彻骨的寒流，有弥天的风暴，有深不可测的冰裂，有惊天动地的雪崩。她可以毁灭一切软弱无用的东西，她也同时造就勇悍无比的强者”；沙漠“漫无边际，沙子的海洋，它变幻莫测，有时像一片金黄的童话世界……有时像辽阔蔚蓝的天空……毕竟是冷酷无情的……它拒绝了绿色的生命……可是，明驼，却是征服大漠的最顽强的勇士……昂首阔步，在沙漠中自由来去”，草原，“不光是牧人的天堂，也是一个严酷冷漠的地狱……不失为一个真正陶冶人杰的摇篮”，森林，“……勇敢的朋友，请你到天山深处的大森林里来吧！”这四个小段，篇页如此之小，容量如此之大。考验如此之严峻，里面往来着英雄人物。它们不光是英雄交响乐的四个乐章。它们是四部强劲有力的英雄交响大乐。

在这里，我要打个岔，讲讲别的讲题了。近几年里，20世纪80年代的中叶，中国文学界的生态失去了平衡，环境污染是相当严重的。流行于北洋军阀时代的那种武林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忽然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高举着通俗文学的幌子，招摇过市，大嚷大叫，古今传奇，无奇不有，张牙舞爪，为非作歹。它们全是污泥浊水，铜臭熏天。上当者不少，中毒者尤多。而衮衮诸公，懵懵懂懂，向不读书，不明事理，不该管的管过，该管的倒不管了。

受商业化的影响，所谓“纯文艺”也有点不纯起来。新诗，小说，文艺理论，报告文学等等，不免都受到了一些影响。有的是轻微影响，有的影响也不轻微。靡靡之音不算少。一知半解的洋货上市。精神状态相当低下，思想境界莫名其妙。真的当成假的，假的当成真的，真假难分，评奖的好处是

鼓舞人心，评奖不平，其实不评奖的好处更大。在各种文学形式中，散文倒是冷冷清清的。因为它是散文，不值几个钱。唯其如此，所受影响较少。大体上它还是干净利落，玉洁冰清的，我最喜欢的杂志如《散文》与《随笔》，还是清新可读，哲理隽永。这个马建勋就没有受到影响。虽然现代化的建设热不足，但还比较亲切，其中富有刚强之作，英雄史诗，顶天立地的人格，崇高的心灵。打忿就打到这里为止。

再说马建勋的散文，我喜欢他的《林公树》。当年在伊犁河大桥上远眺，远远的水平线尽头处，就是惠远城那里的云气。桥上讲起远戍边疆的林则徐的一些业迹，当时就曾被打动过。读了这篇小散文，不禁伤神，然而这决不是颓思，而时感时忧国的激情。我还喜欢他的《天鹅湖之恋》，写的有点汉赋的味道。我是可以对人公开承认的，我伏虔崇拜汉赋。那才是至盛之文章，洵文章之盛世。请看马建勋的这一段文字：“天鹅遨游九霄，吸江南明媚之气，收塞北雄奇之风，蓄宇宙万物之美，集天地纯洁于一身。贝加尔湖有她的倩影，地中海有她的清音。它有着非凡的毅力和高超的飞翔本领。在夜间，借助星斗的位置，它能够飞渡浩瀚的汪洋，逾越高处不胜寒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准确地到达天鹅湖，从不迷失方向。”这是其中一小段，写得已非常好！其他还有写得比这还好的。我喜欢那《伊犁马之歌》，天马之歌。我还喜欢《阿尔泰山探宝》，不多说了，“阿尔泰哟，你无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看到了许多好东西，请你自己去看去。我不抄给你看，我就在心里藏着它一点儿，让我藏着点。你去看看，但你得有一点儿真心诚意，我可不是叫你去寻花问柳的，那里也没有这些庸俗的东西。我从《天马吟》这本散文集感受到英雄气概。如果你看看那篇《塞外奇闻录》，那猎人怎样和熊搏斗，怎样“猎人狠捅熊的五脏，熊亦龇牙咧嘴，用两只前爪‘噤’地揭下猎人后半个体皮”，我不往下抄了，你自己看去。何等的气概？何等气概的散文呵！从这样的散文中，我可以欢呼我们的年轻一代的文学的未来！

1986年5月16日

我向往神秘的布达拉宫 ——为散文集《绿雪》而序

“我和我的同学都是和新中国一起长大的青年，由于祖国的需要，大学毕业后奔赴世界屋脊建设祖国边疆……”

“我们爱上了那一片银白与葱绿相间的、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我们把高原看作第二故乡，藏族人民也把我们当成亲生儿女……”

“生活远远不只是诗情画意。那里有风暴、雪崩、泥石流；伴随着我们歌声笑语的，还有忧思、苦恼和眼泪，乃至殷红的鲜血……”

“高原大自然的特异的美；藏民族古老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边疆各族人民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同我毗连的友好邻邦与我们的亲戚情谊……”

就这样，作者寄来这么一封信，还寄来了他的一本散文集子，并要求我给他写一篇序。这件事可使我为难了。

对于西藏，我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虽然我曾踏过祖国的许多土地，甚至也曾以迷恋的眼神向往过世界屋脊，但我并没有去过。年轻时未能舍近而求远，到晚年再也去不了啦。纵有雄心，要考察长江源的冰川，还遐想至少应能进入国家登山队的大本营，但组织者在考虑我时都认为我的体力不合格了。连作为一个旅游者前去也不可能，充其量我只能当一个西藏文集的读者。

一个读者可怎能写序？可是在读完了《绿雪》这本散文集子之后，我却不能不写个不是序的序言了。我要说明秦文玉同志的散文如何使我读后喜欢得禁不住战栗起来。

之所以用战栗这两个字，并不因为他描写了什么太恐怖的情节。没有恐怖的情节，只有鸣禽的啾啾，彩羽的闪闪，说明作者对多种禽鸟是非常熟悉的，对于大自然更有着无限的默契。一个小女孩子在她的第一次飞行中产生的理想：绿化冰山雪岭！这座机上的旅客们，播种者们，带着进藏的菜籽树种，月月红，万年青，说明他们自己也就是种籽，要洒向西藏的大地。我是一刹那间欢喜得战栗了。

他的《布达拉宫之晨》像有个导游者带领着他和我们读者，拂开云海，登上红山。一边让我们倾听导游人叙述它的宏丽建筑的历史，一边走进山门，深入迷宫中去，我是第一次领会到，这座大宫殿简直是世界最大的，也是世界最崇高的，并且是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我看到作者如何仔细地观察东大殿，它是如何的美不胜收！然后进入灵塔殿，那八座灵塔，被描绘得叫人膛目结舌！最后又登上日光殿，观赏日出，以及巡回考察那么富丽堂皇的室内装饰！欲知其详，请读该文。这《布达拉宫之晨》也使我欢喜得战栗，但是我因而更加饥渴似的，似乎还不满足，显然这里所写的还只是这座巨大建筑物的极小极小一部分。不知为什么，我至今还没能读到我们的哪一位散文家挥笔疾书，淋漓尽致地写尽这白宫和红宫组成的世界屋脊的上层建筑的全部珍藏和它的骇人听闻的历史呢！

这部散文集共 19 篇，每篇都使我欢喜得战栗。如第三篇里的两只鸭子的失踪以及归来，简直叫我喜不自胜。大约是我还没有到高原上去，只读了这本书，我就已经喜悦而且战栗，神驰于云霄之中，气喘而且昏昏迷迷，一句话，爱之弥甚。光是阅读这些高原上的事迹，就已经使我有了高山反应。西藏是迷人的，关于它的这部书是迷人的。作者的散文风格是迷人的，主要是因为他写的是最迷人的西藏高原，读了它令人无限喜悦，心向往之。

家庭主题和家庭文学 ——《浪漫的女人》代序

爱情主题曾被认为是文学的相对永恒的主题。那么，家庭主题呢？说者不多，却实在也是一样的。希腊史诗《伊利亚德》和《奥德赛》都有这个家庭主题。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悲剧更是家庭主题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文学中，家庭主题甚至可以说超越了爱情主题的。在资本社会中，两个主题并重，而爱情主题颇有超过家庭主题之势。爱情主题有了许多盛名之作。然而《罗密欧和朱丽叶》还不也是爱情与家庭矛盾造成的悲剧？《茶花女》也一样。在生活中，家庭主题占上风；在理想中，爱情主题才取得崇高地位。

挪威女作家温茜特（Sigria Undset）写了已具强烈个性的《克丽丝汀的一生》，她写的是“布柔可夫之子劳仑斯”的一大家。这部动人心肺的小说赢得了192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翌年，这个文学奖又颁给了德国大作家汤玛斯·曼，主要因为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中，记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变迁历史，它是我们当代经典性的家庭主题以及家庭文学名著。

在我国，不用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家庭文学的巨著了。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勾划了我国封建家庭的衰落史。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其得奖评语是“由于她对中国人民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她的三部曲，第一部《大地》描绘了一个中国农民如何发家成为大地主；而后第二部《儿子们》描绘了这个大家庭如何分崩离析，因而衰亡的史实；在第三部《分家》中，却极有意义地为我们描绘了这个家庭一个分枝的变化，即如何建立起来了新类型的一个资本色彩的家庭，且与世界发生了一些联系。这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不知何故在中国没有激起回音来。不仅没有被赞赏，反而受到了排斥。不友好、不礼貌、不公平也算到了登峰造极、骇人听闻的地步了。

新中国的文学，描绘在大坍方的封建家庭废墟上，有的在重建半封建家庭，有的在兴建起新型的初级社会主义的正与资本趋势拼搏的家庭的变革进程。前者不少；后者不多，我还说不出多少作品来。我国当前的家庭文学不很发达，家庭主题很少受到作家和评论家的重视。甚至于不久之前，爱情主题还被桎梏紧紧地禁闭着。不过近年来情况大有变化。人们正在创建独立的（不依附老家的）、自由的、幸福的革命家庭。而这样的家庭在经历着何等艰难痛苦的历程。可怜我们多数人还未能从家庭的旧观念中挣脱出来。我们的新型家庭观念也还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形态，或者说，典型、定型。

在我们的农村与城市中，还在进行只讲价钱不讲爱情的买卖婚姻，家庭生活中也还有不少古老习俗、封建观念等待我们的作家去揭露，并狠狠抨击。这些揭露与抨击是已经有了一点成绩的。但是对于新型的独立、幸福、自由的家庭形态，还要作家们去考察、发现、分析，综合后给以描绘、反映的，这样做的人较少，尚在起跑线上。我相信，这样的新型家庭已经存在，典型正待文学家创作。

我是提倡家庭主题和家庭文学的。多研究一下家庭主题，大有好处。我也支持家庭文学。《家庭》杂志及其他同类刊物，它们正在为此进行着严肃的工作。我祝他们成功！

《微型报告文学选》序

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体，它既有所报告，且用上了有相当文学味道的生花妙笔。在我国，报告文学已成为群众喜闻乐见，争于先睹为快的一种文学形式，发展得很快，大有前途。

近几年里报告文学颇有一种向巨型发展的趋势，写写就是二万多字，再多多到了十来万字，一篇就成一本书。这也是好事。当年中国有个范长江，美国有个斯诺先生，都是名家，巨大的作品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很有些报告文学作家在写这类巨型作品，有的已经得了奖。将来自然会出现更多的鸿篇巨著，也是读者所需要的。

与此同时，又兴起了一种微型报告文学，例如本书就集有五六十篇之多，每篇不过千字左右。这些小小报告文学，读起来非常亲切，朴素而且玲珑，没有拉开架势，毫无宏伟建筑的规模，只是娓娓道来，听起来也很动人，文字优美。现在许多报刊在提倡它们，响应者不少，不能不说是一桩好事。

我很喜欢看这样短小、精练的微型报告，它似乎更符合于新闻报道的要求，好像发新闻电讯那样抓住要害，很快就说得清清楚楚。斟酌字句，而又反应迅速；不失时机，而又写得幽雅，有味，优美，动人。这是应当提倡，应当推广的。

我们这本书就可以起这个作用。

因此此微型报告文学集，写此微型的序。

1988年4月25日

献给报告文学的一首颂歌

报告文学是新时期的文学，报告文学是新社会的文学。

《法兰西内战》是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公社文学，《震撼世界的十日》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红星照耀在天空》是第一个人民共和国的文学。报告文学是永远走在文学的前列的文学。

报告文学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文学，报告文学是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文学。

报告文学是报晓的文学，报告文学是曙光的文学。

报告文学是每天早晨的晨报的文学，报导最新新闻的文学；也是晚报的文学，报告每天傍晚的最后的讯息的文学。

报告文学是新的文学，是美的文学，它是坚定信心的文学，它是纯洁信仰的文学，它是崇高信誉的文学。

这是报告文学的时代，在这报告文学的会议上，敬献上对于报告文学的一首颂歌。

（这是作者在 1990—1991 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上的发言，作为获奖作品集的“代序”）

尼罗河与长江

——程犁、唐小禾散文集序

两条大河，尼罗河与长江，是在两位画家的心灵上汇流的，而后再分流到各自的两座城市，灿烂辉煌地奔流不息，发出闪耀光芒于各自的国家的城市建筑物的墙上。

一座建筑物在埃及的尼罗河上，开罗的国际会议中心；另一座在中国长江上，江陵的博物馆。

在国际会议中心的大会议厅的壁画名叫《七千年埃及文明史》。五个历史时期：它们是法老时期、希腊罗马时期、伊斯兰教时期、工业时期和今天。它的画风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的，构思非常简约而又非常完整，山水、人物、思想也都非常之清晰，栩栩如生。长二十八米，高三米，面积为八十四平方米，气势庄严、肃穆、平静、美观。

而在荆州博物馆的门厅三面墙上的那幅壁画，名叫《火中的凤凰》：一侧有一对凤凰在自在的飞翔；正中有三只凤凰，在自为地，积香木以自焚；另一侧是一对自由的凤凰从火焰中飞舞而来。它的风格属于象征主义的浪漫主义，构思比较深沉而又非常生动，色彩、抽象、精神却是更加的轩昂奋发，富于感召。长三十米，高三米，面积为九十平方米。进入这博物馆的门厅时，观者便卷进到这画和古老的神话的旋涡之中去了。

这两幅画是差不多同时画起来的。前者之形似，形胜于神；后者神似，神胜于形。

埃及的那幅画已立刻博得埃及和世界人士的好评，荆州的画面也获得了当地的，包括农民的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旅游游客们的热烈赞扬。然而两者的艺术境界全然不同。《七千年埃及文明史》是这样出色的作品，但《火中的凤凰》却比前者更胜一筹。

这与两位画家对人生的认识，对生活的体会，对自己把握不同题材的深度，以及对人类灵魂所追求的未来憧憬是有密切关联的。两条大河，两个古老的民族，各有自己的渊源和发展，并不是容易把握住的。

在埃及，他们参观了如许的古迹，所付出的全身心劳力和思维，赢得了好些精美的古国的映象，诚然可喜可贺。然而在江陵奔流过的滔滔长江同时是在他们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呵！

《火中的凤凰》就不是映象的问题了，竟是我们民族的再生，从烈焰中再生和腾飞到至为高尚的境界去的一种渴望了。因此所取得效果就不一样。

然而我必须给画家们指出的，他们献给尼罗河的赤忱的心是可贵极了，但是要求有同样的，甚至加倍的，乃至三倍的炽热的赤忱献予长江，如果他们想作出更大的贡献来，譬如说，比郭景纯的《江赋》所绘画的长江图画，还更要美，更精神。

诗歌分类的学问大有前途 ——古远清《诗歌分类学》序

继《文艺新学科手册》之后，古远清又完成了一本《诗歌分类学》的专著。看来作者是有计划地在经营一些带有基本建设性的基础理论。这样的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这是对于诗歌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所极需要的。进行了分类，然后又逐个地对各个的类分别地探讨了之后，方能综合起来，对总体有个比较全面的概念。这两本书都这样写，是合乎科学的方法，也较容易阅读，具有通俗性。

诗歌之分类，一般地只是大别有三，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诗，事实上却非三者所能概括其全部的。看了这本书，我才感到细分起来还有这么多的种类。其实这些门类之外，也还可以更细地分下去，像物质结构的探索似的。

我国以抒情诗起家。西方则以史诗为先河。其实中国古代也一定是有史诗的，不过流传于民间，没有被记录下来罢了。现在少数民族就保留着许多史诗，据说数量是惊人的。剧诗在我国也有一个非常富丽的宝藏，元明戏曲都出了大作品，不过在我们的新诗运动中却把这个门类冷淡了。哲理诗又是一个大项目，并不应属于抒情诗的行列，当然也可以属于抒情诗的行列。这方面的作品极多，有佛家和禅宗的影响，也有很多的好诗。如果钻进去研究，也会发现很多宝藏。这个诗歌分类的学问大有前途。这本书可能只是一个起始点。

诗歌中最难解决的是一个灵感的问题。没有灵感，徒具诗歌的形式，还是不能成为诗歌的。诗之所以称为诗，好诗之所以成为好诗，主要在于诗歌有没有灵感，有没有意味、无穷灵感，而这是很难谈的。然则从诗歌分类入手，细细分析研究，有很大的可能找到它们的共同的东西，即是灵感。

作者勤奋努力，做了许多诗歌方面的工作，写了许多论说诗歌的文章，出版过《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现又写了这本书。希望他以后能写一本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集中的诗论集子，对于诗歌爱好者，对于诗人们都是非常需要的。书不必写得很大很厚，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只是一个很薄的薄本子，钟嵘的《诗品》还更小些，然而却是不朽的作品。诗是最精练的艺术，甚望作者将来写出总结性的精练的诗论集来。

1989年雨水后惊蛰前

孤桐、乔木与幽兰

要为一本书写一个序，却还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看完书稿，想了一个似乎还不错的，有树魂、花魂的，是可以作书名的：《孤桐、乔木与幽兰》。但是，自己也认为它是不很合适，不会被录用的。其实，这名字可真好呢。又想，也许还再改动一下，称之为《一株孤桐，一株乔木》好。不必提到那幽兰了，因为她就是作者本人，做题目不宜。则更简洁一些吧，称为《孤桐和乔木》，让他们挺立在天地之间，也还是一个不错的书名。但书名我管不着，也不用我管的。可这序文得尊重我的了，所以可以用这个假定的名字，来写这本书的序文了。

这本书确是有点儿与众不同。它是很不一般的。所说的那一株孤桐，指的是一位大学问家，章士钊，字行严，号孤桐；那一株乔木，指的是一位大外交家，乔冠华。他在当年写国际述评时，用的笔名就是“乔木”两字。这本书就是写这样有声望的两位人物的。但是，这一本书并不是中、长篇小说，（这本书已可证明，作者有足够能力写小说的。）它只是若干篇纪实文章的合集而已。然其可读性却是相当强的。此外，除了两位名人，书中还牵涉到很多中国、外国高层次的政治家、外交家；国家元首、主席和总理、总统和国务卿、首相等领袖人物。也许可以说，它是写到了本世纪著名人物的一本重要的传记体书籍。其作者是前述的那一位了，她是孤桐的女儿，亦即乔木之妻，她也是悲剧中的主要人物，自1983至1993年的近十年中，信誓旦旦，生活了下来，也是不容易，堪称空谷幽兰了。这本书就是她用自传的体裁写出来的。

这本书里，主要写的事迹是乔木和幽兰这一对情人的相识与相爱，定情和结婚，同行且共事，从事国际外交事务的经过。有过多少的人呵，写过多少歌唱爱情的诗歌和散文呵！以致爱情竟被称为永恒的主题了呵！然而爱情不一定总是平静的，幸福的，欢乐的，令人艳羡的，无波无澜的。它，反而往往是不如人意的，凄凄凉凉的，人言可畏的，满城风雨的，多的是牵肠挂肚的，别恨离愁的哀史。而乔木与幽兰的爱情却更加复杂，更加困难。他们正好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风暴的中心，他们受到无法避免、不可逾越的命定的厄运，演出了无限凄苦的一出爱情悲剧。书里写到的也正是，这20世纪的新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若干个不愉快的篇页，和正好相反的、幽雅的、抒情的、浪漫色彩的、非常愉快的片断，还有更多各种各样的混乱的、黯淡的、噩梦式的、丑恶的场景，同时还有完全相反的，是特别崇高的、壮丽的、辉煌的、光辉灿烂的场景。那不可理解的风暴早已经过去了，直到今天还没有很完整地理解它。不理解它可是不行的哪。

这里的一切全是真实的。既然是自传体文字，并且是被写得情文并茂的，很生动的，因此，这本书甚至可以当小说来读。这里是一个女性在写她自己的时候，写到她父亲，自然较容易写好。而写得更多，又更加细致入微的是一个妻子写自己的丈夫，免不了有着浓厚的感情流露。一些肺腑之言似瀑布一样地倾泻而下，有的地方是潮水一样的涌起，并迅即疾卷而过。但因为所写的文字中间，有中外的高层次人士穿插在内，行文便受着理智的强制有力的控制。作者的语言非常之精练、高雅和准确，做到了恰到好处，极有分寸，真正是不容易的，难能而可贵，不用说的了，她很多东西没写。

回溯可以比速写更真实。回溯本世纪初的章士钊，有许多事件，大家根

本知道了。而大家知道的反而是错误百出的传闻。我们都曾经琢磨过：为什么毛泽东那么看重这个被鲁迅当作落水狗而痛打过的人？那事可从这书里得到解答，解答得非常有趣，因为解答者也是不明真相的，且对父亲一直还心怀不满呢，她的思想变化因此很值得一读。如是被搅浑过的水，这才又澄清了一样，这样便可还我们近代史底层深处的真面目。其实，历史学家早为章老写了书，作出了辩解。惜大家都还不知道。还是要写点传记文学，借助于它们，可以更广泛地传播真相，所以，写传记文学是很有意义的，读传记文学是十分有益的。章士钊本人对古人的历史评价，就写有许多反复考证的渊博的翻案文章。柳宗元一篇文章《平淮夷雅》，后来被误解了。为柳宗元，他批评了韩愈，保护了苏轼，又一丝不苟地给烈士石孝忠的“推碑”案翻了案。章老本人一样，多年被误解了。好在他精神开朗，身心两健，甚为超脱，毫不以为意。人生竟是这样地复杂，盖棺并不能论定。有许多案子就是要翻过来翻过去的。人死以后，本人已根本不管它的了。但活着的人，还是要把是非曲直，断出个分明来的。何况，即使连亲人都可以不闻不问时，即使千百年后，即使是非亲非友的人，也还要盘根问到底的。

这本书里，《我与父亲章士钊》吐露了作者自己的心情，展示了本世纪上半叶和后来三十多年的父女生活的全部脉络。在《忆故乡》的一篇里，又写有乔冠华的童年生活，自家乡人的回溯起，迄于今日他长眠在太湖之滨，大体上可以说已是这位当事人一生遭遇的简练追忆了。有了这些作基础，然后可以进入本书的主要部分。不过这主要部分，我也只看到文章，还没有看到题目。恕我暂时再来补充它一个，就用它的一个小标题作篇名，叫它一回《魂断梦随录》吧。

《十年风雨情》这篇文章共分五章：（一）天上人间——诀别；（二）相识、相知；（三）相爱何难；（四）十年风雨；（五）魂断梦随。从这五章的小标题中，全文的梗概略可看出来。现在倏然又过了十年，再回首思量，似乎可以把它们比作好像是由四个乐章组成的一部《昇C短调（悲怆）交响大乐》。其第一乐章，一上来有一个引子：呜呼！呜呼！斯人逝矣。哀哉！哀哉！在诀别的那最后的中秋之夜，月色如水，金风瑟瑟，哀悼的旋律和亲友啜泣声，此起彼伏……当音响沉寂了下去，曲子转换到了第二乐章，快板，欢乐调，奏出的主题，是胸怀坦荡的真知灼见，心灵纯洁又风度翩翩的，令人听起来感到轻松、怡悦的主旋律。是曾有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尽管已是大动荡的时代了，却还在整个气氛中感到有明朗豪放的一面。毛主席尚健在，以超凡绝世的智慧，扭转乾坤。他左右大局，谈笑风生，多么地幽默和富于机智呵！维时周公，昼夜辛劳，往返折冲游刃有余，排解围攻，昼夜处理的工作极其繁重。他关怀下的外交部。乔冠华的笑声响彻环球，充溢在主旋律中。当幽兰与他相识，又在有些别别扭扭的中间相知；很快发现他们的“相爱何难”蒙上了一层阴云，起初还是薄薄的，往后便浓郁起来……不觉已奏完了第二乐章的慢板。这时聒噪声中，出现了反主旋律的第三旋律，既干扰主旋律，且与哀伤旋律急剧地对立起来。终于爆发了第一个大冲突，“林彪夜潜逃”。这是第三乐章的谐谑调，变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场不谐和音的剧烈的碰撞，尽是冲突，胡闹的闹剧。举国噤若寒蝉，阴邪狂风大作。最后是周总理的逝去，引起再次的大冲突。恋人们处境就更困难……尔后是最混乱的第四乐章，不停歇的快板，直奔高潮，狗急跳墙，策划疯狂，当时我国代表团正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大会期间，虽排除了奸诈的阴谋，归

国途中，他在巴黎听到了粉碎“四人帮”的大好消息。方庆河山，重见光明，却真想不到在国内等着他的是一套套的阴谋，要“请君入瓮”。他哪里逃得脱呢？骤然地坠落了下来，是为尾声，引子里的哀歌又在尾声中奏起。整个交响大乐的内涵大致如此。

这些丰富的内容，在小小一篇序文内，不可能列述了。好在当读者在读这篇序文时，这本书已握在读者们的手上，我已把读者引到它的面前来了。它的内容是很罕见的，作者的笔墨有其独到之处。但我还要添加几句话，我还是很不满足于这本书呢。它所写的似还略嫌简单呢。我尊敬的一位老师说过我们的好些作品，就算是写得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较好的提纲而已。我们的生活实在丰富。而时下的笔墨，包括拙笔在内，都未能做到尽善尽美，希望本书作者，对她亲身的经历，以后能够细腻地，精彩地，“缘情而绮靡，体物而浏亮”地做到。

（本文为上海文艺版章含之著《风雨情》序）

《当代商人手记》序

大约在70年代之末，或80年代之初，王勇刚曾写一封信给我。他说，他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正在写着研究我的报告文学的毕业论文，希望我能给他说一点点意见。

我回信说，你要研究我的报告文学，就请直接研究作品好了（潜台词：你也没怎么说你怎么研究我，因此）。其他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好像是人海之间，两个人的眼睛偶尔相遇，而且互相对视了一下。然后就分开了。也许从此不再相遇了。

但后来我们却又相遇了，在一列从北京往广州的火车上。

王勇刚其时也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出来，被分配在交通部工作，任交通部副部长潘琪的秘书。后来我听说他在《深圳特区报》当记者。然后我听说，他改行了。他经商了。他当企业家了。但虽从商，而不弃文，他仍在写作，写了许多散文诗。

12年过去，我们又在经济特区的深圳相遇。这回他劝告我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要多注意商人的言行，并且给我看了好几卷的他的《当代商人手记》，又名《请你等着我》的散文诗集。

这本集子的体裁却使我想起数学家兼散文家帕斯卡尔的《思潮》这本世界文学名著。我自己也曾试用这体裁来写一本《网思想的小鱼》，而没有成功。我看完他的《当代商人手记》，就有点手痒，就摊开了稿纸来，要给他写一个小序。

我也把这件事的全过程交待清楚了。这也是人海之中，少数几个人的不多几次的眼睛相遇，偶然对视而已，但说起来怪曲折的，而且相当的热闹。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既曲折，又很热闹。

世界很小，中国也不大，其实容易相遇，互相对视。

这本“商人”的手记中，有一篇小文章题名《检察长的眼睛》，写得真是不错。他写出了深圳市检察长的眼睛，面对着一座商业大厦里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赞叹不已了，“很难找到像我们这样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不知他写的究竟是检察长的眼睛，还是检察长眼中的商品？当然两者都有的，还要加上检察长的思考。而检察长思考的是：“检察工作，一定要促进经济繁荣啊！”这篇文章在“商人”的手记中是较长的一篇。它写出了检察长的各种眼神，有时惋惜，有时沉痛，但主要是欣喜，对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满意之情及他的没有忧虑、安度晚年的愉快心地。是的，检察长是要检定善恶、好坏、是非的，所以检察长的眼睛是明辨一切的。

这篇文章使我对商品经济也禁不住地快慰莫名了，写得真好！

王勇刚的散文诗都写得极顶清静，高度凝炼。像我前面说过的，也是偶然相视中刹那的光芒，却能在读者心上留下了一点痕迹。他写得很细腻，很空灵，很像珠江口的浪涛，共着蓝天，一闪一闪地发出闪光。从每一闪光来看，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唯见从多，一浪一浪的，几乎无穷无尽展开的，就有了铺天盖地的浩瀚的感觉，看似单调，却似乎里面还游泳着许许多多珍异的水族。当它们汇合一本集子的时候，它们互相拥抱在一起，形成大千世界中一个复合体，又浑厚，又玲珑，熙熙攘攘的，令人目不暇接。值得一看。可以细读。

《当代商人手记》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叫作《金佛山之梦》，

属于个人的回忆。外婆家的小茅屋，小茅屋后面的小杉树；和金佛寺，寺前也有一群杉树林。所谓《金佛山之梦》，就是建立一个金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当代商人的最美丽的梦中梦。另一部分是当代商人有关商业的手记。还有可能是最主要的部分是，当代商人有关自己的心灵深处的绮语或无声的呐喊。当代商人也还是人，有七情六欲的人。

有关商业的手记是作者的重要的经验谈。商业是充满诡谲和风险的舞台。商人在商业的舞台上表演着，或在商业的海洋里浮游着，时升时降，时出时没，忽儿升上云霄，忽儿如坠深渊。可喜的是我们终于建立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他也有了这散文诗的新题材。我读着他的这些短小精悍的散文诗时，感到惊心动魄。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如今它们是最新最美的事物。将近一百首的小诗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但读完了又有尚嫌不足之感。我相信商业越做越大，散文小诗越写越好，甚至写上一两千首和更多首诗来的。

我想，也不必对当代商人心灵深处的绮语或无声的呐喊再多写什么话了。手记已在我们的面前摊开，任凭我们翻动、阅读，这里是他内心隐私的充分宣泄，是美的机智，是俏皮而又严肃的思索。如果和愿意再多写一些，也许可以写很多的多余的话，但是我又想，是可以不用多说什么话了。他说了很多可看、可听、可思的话。把小序在这里结束，《手记》就在你的面前展开了。

1993年3月

《毛泽东语言艺术大辞典》序

应编者的请求，给这本大辞典写一篇序，甚感光荣。

前几年曾经很偶然的在深圳市老年大学讲过一次话，说我国有三位近代中国的语言大师。第一位是曹雪芹，第二位是鲁迅，第三位是毛泽东。这个序次是按年龄排列的。似乎没有别人这样讲过。

这个思想第一次提出来是在我自己的《红楼梦艺术论》中。我曾说过：“《红楼梦》的出现，就是我国的一次近代的语言革命。它简直是惊蛰的春雷。它为现代中国语言破了土，并奠了基，建筑了一座精美绝伦的大观园，作为典型环境和人物的榜样示范。”接着我还说：“《红楼梦》的语言，到鲁迅才得到进一步的加工与发展，然后到毛泽东同志才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我们现在所用的语言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还在进展中。”

我认为这几句话说得也没有错。好像也没有别人这样说过。对《红楼梦》的语言，我也只仅在我那本书的《形式与语言》这一章里专门议论过，是很不够份量的。对鲁迅的语言，我也曾研究过，但给一个论争卡住了之后，没有写完成书。这里不能多说什么了。别人是否研究过，议论过鲁迅的语言，我不太知道。专著似未见到，但顺便谈到了的，自然是不会少的。应当有专著，研究鲁迅的语言艺术，多多益善。我以为鲁迅这方面的功绩是，除了将中国现代的语言提高到了严谨的理论高度之外，还作出过许多努力，要将东、西方的外国语言形式和风格、词汇等，溶化、融合到中国现代语言中去的努力，但个别地方他没有达到完善无缺的成功。有许许多多有心人也参加了这个工作。而这一点，最后是由毛泽东同志完成的，而且是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因为他的语言确实做到了他自己提出来的，“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要求，就是在他的古体诗词创作中，这亦不例外。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应当有人研究，并写出不光是谈诗词，这样的书已有了，而且是专门集中地谈艺术语言（也包括谈诗的语言在内）的专著来，似乎还没有，也许这是因为谈毛泽东著作的人，主要谈他的文章内容，似未见有人专谈他的语言艺术、语言形式或文字形式的。而他自己倒是写有专著的，如《反对党八股》等等，是谈到了语言问题的。可惜的是党八股非常顽固，是个不倒翁。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语言艺术还必需研究，更加深入探讨，才能好好地“反对”掉这个“党八股”的顽固大敌。

可见，不谈他的语言形式如何能谈他的思想内容？不谈他的语言生动怎么能展现他的内容光辉呢？我们的评论家，一般地说比较少注意到生动活泼的形式的。有些人的唯物论有点偏，他们就是缺少一点辩证法。谈物质多，谈精神少，谈斗争多，谈统一少。毛泽东光华四射的思想正是用他的生花妙笔和精采语言表达出来，吐露出来的。他是用他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来发挥他的深刻的思想内容的。

“东风压倒西风”是林黛玉的语言，仅涉及闺房中的尖锐斗争。只有在毛泽东一引用之时，问题就扩展到了普天下的大趋势去了。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也是毛泽东说出来的。这是他的语言艺术一例。当他说到文化生力军的“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勇猛，简直是所向无敌的”，这也就描绘出来了鲁迅的阵营之语言艺术的力量之强大。它尤其鲜明地显示出来了毛泽东自己的语言艺术力量的强

大有力。三位艺术大师各具有特点，而其中最具强大的力量的不能不是毛泽东同志的语言艺术了。

因此，编纂一部《毛泽东语言艺术大辞典》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编成这么一部书是很不容易的。书已经摆在读者的面前了，关于词条等等，就不必多说了。

有着一座语言艺术最富蕴的矿藏，这里的这部分是已被开发出来的。大部分还未被开发出来，就要继续进行开发。对于这些已开发和未开发的矿藏的研究和分析，考证和注释等，应当一步一步地做下去。不可畏缩不前。不可因噎废食，大胆谨慎，严肃认真的做去，是必定会做出成绩来，而有利于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工作我们并未做得很多，而是做得太少了。世界的变化很快很大，我们要加紧赶上前去。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什么宁缺毋滥，“滥”当然不对，“缺”就更不对了。君不见已有多少美好的，珍贵的东西，正在被遗忘，似在失传了吗？

《湖州市文化艺术志》序

“白水满春塘，旅雁每回翔。
唼流牵弱藻，敛翮带余霜，
群浮动轻浪，单汛逐孤光。
悬飞竟不下，乱起未成行，
刷羽同摇漾，一举还故乡。”

（译文：白茫茫的水涨满了春天的湖塘，南飞的雁每年都要飞来又飞往。来吻这水流并含上一枝小水草；清理羽翼上还留有的异乡余霜。成群的水禽激起了轻柔的微浪，也有独个儿的追逐着一大片的水光。只管悬挂在天上飞旋不肯下来，下面成群的起飞了，零乱不成行，那些拂刷着羽毛作好了起飞准备的，一下子飞走了，好像要回它们自家的故乡。）

第一句“白水满春塘”说的，差不多就是我们湖州市了。这是这本书里要介绍的大诗人，沈约的诗。第二句“旅雁每回翔”说的就好像是我和像我这样的一有机会就要回乡看看的，久居外地的旅人。这首诗感人至深。题目叫《咏湖水雁》正是写了湖州的景物似的，波光、水影。那样的闪闪在水上摇漾的旅雁，在拂刷着翅膀的天鹅，是准备起飞的。其中连我这一只野鸭子，也就是在想“一举还故乡”的呵！沈约这首诗反映了我们多少湖州人的游子的心呵！

这本文艺志书找我写序，可惜我生得太晚了。出生在1914年，马上就要八十岁了，却要我来写这些从古到今的，往昔如此灿烂的文化艺术的一本志书的序，我怎么胆敢下笔呢？这是应该请前辈作家茅公来写的，我是不够格的。看来只有请茅盾（沈雁冰先生）写最合适。他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战士，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中国作协第一任主席，真正是湖州人。十年前还在，可惜现在已去世了。现在近代第一号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近代第一号音韵大师陆志韦先生，也都去世了。

现在要我来写序，我是只能够写一点抒情散文的人。才疏学浅，于钱山漾这样的遗址，我几乎一无所知。这七千年以来，迄于今日这20世纪末的，《湖州文艺志书》序，对我来说，是太艰难了。六千多年前的湖州人就能养蚕、制丝、纺织了。就是这些蚕丝，以及其他地区的材料和条件，因人民的智慧和劳动，织出、创造历朝历代的锦绣河山，并留下来了这么多的锦绣文章和艺术品。这全部的文化遗产就成为我国最宝贵的精神文明，其中也有这本志书中要记录的湖州的部分。

这本志书所转录的时限，起自上古，下迄1989年。其实它实际上已下迄到了20世纪末。而本世纪末本身，正好已经属于世界和中国的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的了。世界和中国都正在发生巨变，要从三维的时空，进入到四维的时空。那样的巨变，是部分地通过信息时代，而进入到空间时代的，那样的巨变。现在大家还不太知道，因为它方才开始。但是，它已经开始了。

本志实际上只是传统志书的规范中的一部文艺志书。但是它也承担向读者们揭开这场巨变的序幕的重任。宣传我们往昔时日的光辉业迹，就是在为这场巨变作准备，为这场巨变来鼓劲，以便我们迅速地跟上，并进入未来的无比荣耀的新世纪。

湖州的文艺有这样光辉的积累！是我原来所没有想到的。我在《江南小镇》中曾说过：“这地区是文物精华的集中点，出过大诗人、大文豪、大艺

术家、大书法家、大收藏家和音韵学大师、大科学家，”我列举了曹不兴、沈约、赵子昂、陆心源等，其中好在也提到了的，钱三强这样的一位原子物理学家。

但是，我突然感到忘掉了一个人。我竟然没有提到现已拥有中国的航天之父称号的屠守锷，他也是湖州人。因为在编写这本志书那时，我们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这已是空间时代了。空间时代就是开发太空，开发宇宙的。我想我说的话是否说得太早了？宁可说早一点，否则就要来不及了，而来不及就太可怕了。我说的正是时候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世界在变化。你知道日本人在干什么？欧洲人在干什么？美国人在干什么？俄国人在干什么？新加坡在干什么？南韩在干什么？我台湾省的同胞在干什么？香港，快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了，也在干什么吗？我湖州一定要奋起呵，要全力赶上去呵！这就是为什么要编辑出版这本湖州精神文明的志书的理由了，看我们曾经是怎样地走过来的！

正是，七千年的文明永远是我们的这一切的基础。只要回顾一下新石器时期的邱城遗址和钱山漾遗址的出土的文物，以及重读秦汉以下许多精采文章时，它们确实证明，往昔的湖州，早已经是、并一直至今，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人才济济。我们决不能落在生活的后头，必须赶快赶上去。高科技正以神奇的出人意外的速度发展，这是一口气也松不得的。

本志书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很全面的，它是市领导非常重视之一项工作，全心全意地组织了很大的队伍，从民间文学到各种艺术领域：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电视、建筑、图书，联系到有关的工作单位、学会、机构等等，人物都有传记；重大事迹都作了记录。从事这志书工作的人，为数真不少，以辛勤的，热情的态度全面地收集、调查、研究了每一个细部，然后，认真地编写出了这部书。我感到它的文笔很不错，很用了一番心血。我虽没有全部阅读它，也先读为快地读了不少章节。也说一点缺点，觉得它稍有虎头蛇尾之感，是因为前边太辉煌了，后边就跟不上去。这又说明是有点厚古薄今，对当代的人与事注意得不够，关照得不够。现在的情况已与前不同了，而且今后更会不同。这缺点是会得到改正的。

本志书的出版将会增加我们的知识，鼓舞我们的意志，在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作出巨大的成就来。我衷心祝愿湖州市的经济繁荣，在这个基础上，湖州能再次发出精神文明的新的光辉，尤其在高科技的领域内，希望能涌出更多的钱三强、屠守锷那样的杰出人物来，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使湖州市在今后，更好地，更出色地为时代服务！

1994年

《无边的栅栏》序

受人委托，拿到一本书，已是出版社的清样了，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看来是只等序文写出，就可以付印的。只好停下一切来赶一赶了。说来并不知道作者伊谁，但知是收在“新世纪文集”中的一本诗集，翻开一看，有作者的一张照片，却不仅是窈窕淑女，而且是一个爱武装的花木兰，且是空军中校，又是著述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电视作品，均甚多者。这本诗的集子中有新诗60首。连夜赶快，给她看了它一看。

诗写得十分优美，但写得并不容易让人懂得。很有点抽象，好在富于形象。这诗集分为三辑，第一辑，“走出空地”；第二辑，“无边的栅栏”；第三辑，“自裸的灵魂”。这些显得是一种较为空灵的境界。既然是“空地”，就永远也不用走进来，又怎么走，也不走出去的；其次，“栅栏”怎么能是“无边”的呢，无边就是根本没有栅栏，要不然它是天罗地网，或者是一个无边的圆。而最后的一辑“自裸的灵魂”，也难于理解，因为可以裸的只是物质，灵魂藏于物质之中，怎么自裸？再一想，原来灵魂是只能“自裸”，即只能由物质自己来裸露出灵魂来的。

第一辑的诗，稍稍有点初试韵律的青春稚气的感觉，一枝倒下的凤凰树给予一个少女十分深刻的印象。想不到这里已有了“自塑的像”（即自我的物质）了，而且还有“垂下栅栏”，解答了前述的一个难解的谜，原来眼毛睫毛，就是那无边的“栅栏”了，这真是一个十分巧妙的巧思了。第一辑里的爱情诗都是可读的，只是份量略为轻了一点点。

第二辑里有了变化。我们的女诗人初始从“围城”，这“界限的篱栅”里“一度逃脱”了。可怜的是“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知道/再也出不去啦/自筑了爱情的坟茔/我已被关进/婚姻的牢房如今/围城的铁条已扭开/我却/要逃避你/入黑夜的阴影/一再渴望阳光”我猜想，走出空地，是否进入牢房了，进入阴影了？那就难说。我知道，马上要到“无边的栅栏”了吧。

哪知道，下面紧接着一首诗是《无缘》。我相当喜欢这首《无缘》，每一节两行，一共是十四个，即十四种“无缘”。二十四行，不在这里引用它了，请读者自己读去吧，说它是这个集子中最好的一首也不过份的，这是一首动人的诗。从起句，到结句，它导入了这本集子的作为题名的《无边的栅栏》的主题。

我也不引用这首主题歌了，也不必解释这妇女们的“无边的栅栏”是怎么一回事了。

第三辑的十二个题目的二十一首诗中，作者已逐渐地成熟起来，她的诗也有了一定的沉重，有点份量了。我就到此结束！我感到这本集子里的谜语差不多已经揭破了，多说就没有味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本集子里的她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一天/我心血来潮竟然/把爱情的残酷/编成两个环/锁住一对恋人/拥抱的姿势”

难道这就是“自裸的灵魂”？

请读者翻到八十八页，再读下去，自己去阅读，自己去欣赏和琢磨吧。

第四个十年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报告文学集》序

重读了芦焚先生的，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1928—1936年）报告文学集》所写的，像火焰一般燃烧着的序，是《大系》里的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与时代的忧虑的，一篇激情的序。

然后，又重读了刘白羽先生的，为《大系第三辑（1937—1948年）报告文学集》所写的，从十年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浴血战斗中，奋勇地冲杀出来，并继续战斗，直到踏着胜利步伐，“向前向前向前”解放全中国的，又一篇激情的序。

现在要写的就是大系的《第四辑（1949—1976年）报告文学集》的第三篇序了。这是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升起五星红旗写起，一直写到开国后，先抗击外来干涉，然后涤荡污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济基础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建树，后来还发生了突然地出现的可怕的逆转，其中却隐约显示出来了未来的光芒。它扩大了篇幅，有上、下两册，可以承前启后，回溯过去，瞻望未来，历数今朝的风流人物，歌唱他们的生动事迹与卓越的功勋的，也得写出一篇激情的序才是。

我想这就是我在这一有如接力赛跑所要做的事，并要将这一接力赛赛棒交给此刻还不知是谁的第四棒的选手来接将过去，在第五辑（1977—1999年）的选集里，跑到本世纪的终点，亦即是80年中国新文学的全过程终点，可以想见届时群情雀跃，欢呼之声大起，七彩的礼花飞满天空。想来那第五辑（1977—1999年）的序，必然也是波澜壮阔，进入新世纪去的，升高到了科技文明的高峰上，巡天遥看一干河，显示出我国新世纪的文学的明媚春光来，一篇激情的序。

我国的报告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开创性的文学体裁。随着革命文学的发展，声势越来越浩大了。报告文学射出了一串串的闪电一般的光芒，随之是一阵阵的雷声隆隆。

这部《中国新文学大系》，再过四、五年，将以第五辑，连前共一百册的巨著全部出版了，全面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各种样形式和风貌，为我国新文学奠定个扎实的基础，是我国人民的近代史里的一座历史性的丰碑。不过现在谁也还不能预测到它在新世纪里，将是何等样的风光景色！

当初蔡元培先生、鲁迅先生他们开创这《大系》的第一辑之时，新文学的自身还没有被普遍地承认为今日之文学。报告文学也没有被公认为一种文学体裁。它当时只是“散文”的聊备一格，后来又一直被称为“特写”、“通讯”，那时仍归属于散文的类别之中。有时候，“散文特写”连书在一起，有点分不开来了。到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邀请我编过《1956年散文特写选》，那时还难得有人提出“报告文学”这个名称，但它已等候着背影里。到70年代之末，它才名正言顺的，盛称“报告文学”，而显示了它们的作用，则是以后第五辑里的事，从此就再用“特写”的名称了。

那个时候，人们认为“特写”是属于新闻文学的，或集纳主义（Journalism）的文学，是有时间性的。它应当不失时机地写出来，迅速地通过报刊而广泛地传布。它们居多的是朝生暮死，像新闻一样，只有一天，或两周、一月的短命，但它们中间也有的是能够长远地流传下去的文字。但它是“报告文学”，它是文学，而有史料的价值，或者就是俱有永久性的历

史价值，是文学的精品，是光辉的篇章。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当写作的时候，还只是作为“散文、特写”写出的，发表的时候也是作为“散文、特写”发表的报告文学，可是出来之后，它却变成了历史的篇章，成了有如《左传》、《史记》的，史学格局的文学了。《史记》是从五帝开始，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主体；“八书”和“年表”以为辅：纪录了既往，即它当代的，现实的事迹和理想的焕景，用的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等等手法，以及历史的，有如《春秋》的，褒贬的笔墨。在本书中，也有眼前的一个例子，如1949年10月2日，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的文章，作者林韦。这一条新闻就是忠实地记载了我们当代的最重要的日子，是一段最珍贵的，俱有长久价值与光辉的历史。同样是不幸早逝的女作家杨刚所写的书简体的同一主题，显然也是极为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

我们现在从事的编辑工作是从当时的许多“散文特写”中，进行选择，汰芜取精，去伪存真，选出一百多篇特写来，编入“报告文学卷，献给读者，可给史学家们提供资料。这些文章都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却又是褒有贬，有爱有憎的，有歌颂光明，赞扬美德的，也有暴露黑暗，怒斥腥秽的。固然其他文学样式，也在这样做着，而报告文学的特点却在它的新闻性（历史性）和它的真实性（尤其在真实性）之上。它有别于诗、小说、散文、戏剧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就在这两点上。同时，它们也就是在这两点上，又有点难于区别它们与其他的文学样式和体裁了。

在科学中，有所谓“边缘科学”的。我看在文学中，也可有类似的“边缘文学”。有些报告文学写得很像小说：短的像短篇小说；中，长的像中篇小说；也有很长的像长篇小说。已有一种“纪实文学”的名称可能更适用于它们。传记文学也是如此。好的作品风行一时，又长久地流传下去。这不仅在我国如此，现在在国外也流行着所谓“非小说”（Non-fiction），似小说，而实非小说，并非虚构，因为它是并非虚构的非小说，这种作品的形式或体裁。似乎“纯文学”并不怎么欢迎它们，但是读者们却是乐于接受它们的。在全世界图书的市场上，“非小说”已经占有了将近一半的位置了。怎样来区别它们，则是并不困难。真实和虚构，对于有眼力的人，一眼就能看穿。

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些边缘文学，我们确是感到了有点难分难舍。例如巍巍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本来是一篇散文，但“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号，发生了共鸣的效应。它化成一篇已取得全民公认了的报告文学。这篇文章激发了全国读者的欢欣和热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因之我们已和编辑这一辑《大系》的“散文卷”的主编袁鹰先生进行了磋商。得到了他的同意，还是把该文从散文卷里请了过来，列入了“报告文学卷”。

同样，丁玲的《记游桃花坪》本来也可以选入散文卷的，但是作者当时将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作者用了这样的句子作结尾：“这里不只是有了湖南秀丽的山水，不只是有了明媚的春光，不只是因为看见了明朗热情的人，而是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呵！……我们就在这样的生活之中，就在这样的新的人物之中，获得了多少的愉快，和增加了多少的力量呵！我怎么能不把这一次的游玩，记下来呢，哪怕它只能记下我的感情的很少一部分。桃花坪，桃花坪呵，我是带着无比的怀恋和感谢的激情来写到你，并且写你来安慰我现在的不能平静的心情。”这样一段热情话全是说的报告文学家的语言。这

可以说明，它不仅仅是一篇散文，而已是可属于报告文学的品位的散文了。

事实确是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全“新”的气息，这就是本辑本卷，最明显的特征。多少年来，我们的被幽禁的身心，现在可以自由行动，被窒息的声音现在可以放开喉咙歌唱，放大声音发言了。但也不能不指出，那陈旧腐朽的事物依然还存在着，它也是不能很容易地，听任人家来扫除，就此自形消失掉的。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之后，就开始了我们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旧世界就和新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进行了公开的较量。关于这次较量，我们写出了很多的战地通讯，或者说报告文学来。我们选入了不少篇在本卷之内。除巍巍之作、巴金、杨朔、刘白羽、碧野、路翎、菡子等等，很多著名的作家都到了朝鲜，进入坑道，写出了新世界的这个强大有力的自卫力量和许多战斗英雄们的风貌。

我们选入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菡子的《我上甘岭来》，秦基伟的《守卫上甘岭》等，还提供了刊登其他同类文章一定数量的篇幅。从现在再来看，也都属于回忆录的范畴了，但它们在当时是新的，及时的，最迅速地发表出来的战地通讯。我们选入的这一卷内，较多的还有时间属于前两辑的，两大卷的年代里的回忆的作品，如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巴金）和《在日寇细菌试验厂里》（弓人），所展示的德国纳粹分子和日本鬼子的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对照着至今还有他们的残余力量，时光虽已过去了50年，却让世人感觉到，国社党余孽和“东洋鬼子”，一直不但不知道悔改，还有卷土重来的妄想，还想赖账，未可轻视。这些文章是历史见证人的记录，应该引以为戒，把它们慎重地保留下来的。

更早的还有红军长征的回忆录，十年内战的回忆录。抗日战争的回忆录，以及解放战争的回忆录，虽然在时间上都并不属于本集，然以形式而论，却正是属于报告文学之列，当然可以，也应该包括在本集中。同样的，属于本集的时限之内的一些亲身回忆，也已经有很多的文字，是在后一个时限内写出和发表的，它们将要在以后的第五辑里，其计划中的篇幅将增加到三大卷，可在那里面发表的。

因为我们的第四辑的这一卷的两大册里，有两个分明的特点：一是自1949年至1965年，这十六年里的整个文学创作，是突出地、空前地繁荣的，那时的特写创作把这两大册都占了；二是自1966年至1976年里却没有创作，出现了世所罕见的一片空白，是非常醒目和刺眼的一片空白，是长达十一年之久的一片空白。这里要说明，是先有了这一段繁荣时间内的文章，那时特写还叫作特写，大家都还没有想到用上了报告文学的名称呢。到了后边的空白时期内，就没有什么报告文学的文章可选用了，我们只用了三篇：《十里长安街》宣告了一个时期结束；《大海之歌》《踏上地球之巅》预告了新时期到来。其他的大量文章是也没有法子选用的，那些东西的猖狂、无耻、根本不是东西。而等到这段空白文学时间一过，报告文学这一名称立即出现了，它是应运而生，显出极大光芒，从此它名正言顺，它包含的范围，也比以前更要开阔。

这一片空白所说的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对它的政治结论，早经作出。在文学上，当年的作家们是一致的清醒地搁下了笔，有人是人被囚，没有纸笔；有人有纸有笔，根本不写；有人写了的，放着、藏起来。只见无数的小报纸满天飞，大报只有极左的“两报一刊”，这大一个国家，只有八个“样板戏”了。这段没有文章的空白里，是充满了口号声，残

酷的斗争会，惨绝尘寰的迫害狂，一切颠三倒四。这在“文革”中表演了的滑稽戏、鬼戏、闹剧，演出了悲剧、悲喜剧，在“文革”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在诗与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中都有了反映。由于《大系》的时限规定，多数都是通过回忆方式事后反映出来的，只好收入“大系”的第五辑中去了，在本卷的空白时期里，就是空白。

正如一张纸，都有正反两面，任何事物都分阴阳。文学作品一般地都要分清了积极的和消极的，这样的两极。报告文学更不例外。歌功颂德和暴露黑暗从来就有。基本上，文学是英雄、美人一方；各种无赖、坏人另一方。乱世里很难产生出什么“歌德派”去歌颂无赖坏人；阿谀奉承不成其为文学。而盛世里一定要兴建凌烟阁，赞美功臣；好人好事，就要作为典型，加以表扬。《春秋》这部书，史笔用字，最为严谨，正直不阿，一字不苟。报告文学有明确的目的性，它区别于散文，就在目录的搜索路径（取自计算机语言的：path）不同，而散文似乎是以似无目的见佳的，其实还有目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上已成定论的：“光”俱有波粒二重性，大家同意了，他们是一事物的两个表现。这是不同于二元论的。两者难分难舍，相反相成，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中，不也应该如此？好事之好，好在坏事作对比，所谓“二者必居其一”，却与物理学新成就，未能一致，说了一面之词。物理学证明了已近一百年，政治学还不能接受。本卷选载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及续编，也是说了两面，但是他还站在一面上说话的。他是要“干预生活”。而生活却冲击了他。十余年后，东山再起，有成果，然还是我道不行，现已浮桴出海去了。

我的观点一直是：社会主义即使有九十九个不好，它作为新生的事物，至少总还有这一个好，这一个好可以克服那九十九个不好，何况它绝非仅一个好，有很多个好。坏处有，没那么多。万里长征，赢得了一个新中国。现在是一个新的长征。

我也不太赞成那首“就是好”，太过分了。这歌不看看自己有没有缺陷和不足之处。“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它们至今还在猖狂吠，到处乱闯乱咬。“文革”已证明是不好的了，也为我扫清了最不容易发现，更不容易扫清的，真正的障碍，扫完了，扫出了新的道路。日后，一切好坏都会统统显示出来的。所以，凡事不要太绝对化了，凡事要相对地看待。有人说，现在文章真难写。我说，决没有难写的文章的，只看你怎么写。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看清楚了路径，就好下笔了。

这一卷里刊登了许多英雄人物，《大渡河边英雄多》、《狼牙山跳崖记》、以及《在烈火中永生记》、以及吴强的《英雄的业绩（淮海前线纪事）》等等，有的是选自本时限内出版的几集《红旗飘飘》等。报章上的特写中，工人阶级的孟泰、王崇伦、向秀丽、赵梦桃，农村中的潘永福、王永淮、王国藩、邢燕子，以及《大寨英雄谱》。战士的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当代的历史人物的“列传”，他们至少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

我们还是稍提一下这次选入了许多的名篇。西谛的《移山填海话厦门》、路翎的《从7月27日下午10时起》、方纪的《挥手之间》、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华山的《童话的时代》、冯牧的《摩梭人的家乡》、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袁鹰的《十里长安街》、鲁光的《踏上地球之巅》，很多这样的画幅都是一出来就激动人心的篇页。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丰富，

多采。但我不能对它们一一的评述了，因为若要这样做起来，这可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我想，这篇序里不作一些评述是不行的，那么还是给自己开一刀吧！那么有一些问题，多少是可以说清楚的。

我国的报告文学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这个真实性的问题，这可是讨论得最多的了。很惭愧的是，这正好牵连到本卷一篇叫作《祁连山下》的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下卷，第十七章第八节，有两句话说到它：“徐迟有些作品注意了文学加工而忽略了事件的真实性；个别文章语言不够通顺、规范，这是他的作品的缺陷。”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我能接受，并以后注意着改进。但我也想过，一个作家的缺陷，往往也是他的风格上的长处。虽然对于注意文学加工，似乎忽略了真实性，事实上是有的时候这样做了，恰好又是加强了事件的真实性的。

这篇《祁连山下》，初稿是在《人民文学》上作为特写发表的。但写时，却是并未把它作为特写来写的。发表时，出乎意料之外，编者将它作特写发表了，见到刊物才知道。而评论家与读者却又都同意了编者，一直至今把它作为特写来接受了。

事已如此，作者就不好说明，在写作当时，是作小说写；主人公的名字是用的假名。却因编辑部改称为特写，广大的读者又都把它当作特写读了。作者索性修改了它，将特写一改改为报告文学，把尚达的假名取消，换上常书鸿的真名。作者要这样说明：“实在那时我还不认识常书鸿先生，一连三次访问敦煌，常先生也都不在那儿。我只是听了敦煌研究所一位艺术家谈话。我在日记上记着：‘听到谈常书鸿的故事，很可以写成小说。他和一个女雕塑家在巴黎恋爱结婚。回国后，艺术家倾轧得利害，他被挤到沙漠上去了。他爱上了千佛洞，女雕塑家可受不了这生活。于是出奔，他前去追赶了一阵子没有赶到，她就跑了。他后来只有一个女儿。不久后，李承仙来了’（录自作者的《1956年日记》，9月9日所记）。”

就这样，当时只听了这么几句话，三四月后，作者回北京，住在云松巢中写作，写成了这篇文章。是作为小说写的，放了几年，那时候这种写知识分子的文章不能发表。过了四年，到1962年初，时机来了，正好在广州会议前夕，给知识分子表彰之时，发表了它，很受欢迎。到1978年，想把它收在报告文学集里，又改了一下。为此我专门找到常先生，问他出书同不同意改用真名。他说，“可以。”我又问，“可是它开头的部分论绘画，并不是你说给我听的，而是我捉摸了你的艺术观点，由我编造出来的，你想想，你能同意吗？”他说：“我完全同意，我正是这样的观点，一点不错。你可以换上我的真名。”因为有了他这一句话，1978年出版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时，就把它也编入了，初稿的尚达的名字就改成了常书鸿。跟着也把沈健南的旧名改回到真名字的孙健初。

然而这次“大系”第四辑的这一卷内，这篇文章被选了进去。好在，按照这一部“大系”的规定，是只能刊登初次发表的原稿，不登出后来经过修改的稿子的。现在已恢复了原样。这篇特写的情节，它的“事件的真实性”，读者看来是能接受的。再则，也不能说，此文的文学的加工过了头，恐怕只能说它在地质学家的文学加工上面还有不足之处呢。序文里不多谈它了，已经谈得太多了。

现在就看文学界一般地是怎样理解这个真实性的问题了。没有人会说，报告文学只要人物情节的，包括细节的真实性，而不要文学的加工的。报告

文学自然是要“报告”，也要“文学”的。但要了文学，少不了加工。既然是叫了“报告文学”的，以后报告文学应当成为“文学”，就得注意进行文学的加工，要剪裁、要缝制、要试样，才能交卷。玉不琢，不成器。我确实说过：“报告文学是可以容许合理的加工的。”也许我这话是不对的了。我又多次说过“报告文学，总得是‘文学’，不光是‘报告’的。”这样的说法可能是越发叫人为难了。若再说什么“这文学加工的事儿，似乎是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也许就更成难题了。不过这不是这篇序文里的事。

在文学内部，要划清报告文学的界线，毕竟不会比划国界线更加困难，却也会差不多同样困难的。从时限上说，本卷所选的，还是它的特写时期的作品，而其中已有报告文学的露头了。空白时期，为后续的时期留下了无限丰富的“报告文学”的富矿，露头已到处出现，佳作已多不胜数，美不胜收。到第五辑中，上、中、下共三册，将是何等地琳琅满目，叫人读起来，禁不住的气冲斗牛了。让我们拭目等待吧！

序《中国书艺六论》

偶过苏州市，得目睹一卷手抄本，为已故的毛启俊老先生著：《中国书艺六论》。拜读之后，不胜钦佩之至。

毛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我国开国以前，全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都是用他的著作，来作授课时的课本之用的。可笑的是，当时的国民党政政府内，有个出任教育部长的，名叫朱家骅的人，愚昧无知，粗暴地反对这世界各国都公认了的社会学。仅因其含有“社会”两字，即惶惑不安，神经过敏，竟明令全国各大学一概取消掉了社会学系。但不久后朱就下台了，各大学立即又将这社会学系恢复了。而在我国开国之后不久，由苏联专家来指导教育改革，在院系调整声中，又因社会学所教授的，并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亦将这社会学系一笔勾销了。直到了“文革”以后，始将它重行恢复。毛老先生就在这样的教改之中，遭遇到了两次无辜打击。幸好社会学中，尚有统计学一项。于是他的教学工作，后来就改为教授高等数学。而高等数学却还得采用苏联版的课本，好在老先生精通多种外语，即从俄语教材中，边学边教，直到他完成任务，也到了年龄，退休了为止。

而毛老先生的精深渊博之学，无缘继续发挥了。暇来无事，他还孜孜不倦，仍钻研社会学不已。他沉思默虑，潜心著述，写出巨帙专著。遇有为难之处，还煞费他的一番心思。又因当时不能发表、不能出版，时日一久，不免有所逸失。如其专论中国文字改革的部分，显然亦未写定，全书尚有待于搜集、校勘、核定。更因他夙爱诗词，不时吟咏，已选印的诗集，并非全豹。另有《中国历史年表》一册，考证严谨，极形完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属于类书之列，将来也应当能够给他出版的。而此书，《中国书艺六论》，则原稿虽已散失，幸而手抄本犹存，已由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接受，乃可先行付印问世了。

出版社要我为此书写序，我也愿意为它写几句。但我于书道，知识很差，亦无时间可以临渴而掘井。虽从事写作已六十多年，写过的字数也可以千万计，惜没有练过毛笔字，却深知，书道必须放进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下去。仅洗拭砚台，即可染墨成溪。我家乡就有一条，被称为二王之墨溪的。我不可能做到，然亦颇能欣赏墨宝，每观赏佳作，则崇敬之心，油然而起。唯于篆、隶、草，均未曾细究，只能看看楷书和行书而艳羨再三。然则作为一个爱好者来发言，终还有一些资格的。对于本书，总该可以说点嘉言，以示悦目之心情的了。以上均是一点老实话。下面再说点儿感受。

读此书，如航大海，见波澜壮阔；如入深山，观重峦叠嶂。翰海墨林，乃千古之圣地也。清真瑰丽，精妙入神；千姿百态，罗列在前；奇光异彩，眩耀眼底。它们却不是没有经过整理的，天然有序，摆设得好好的。亦可作无限制、无穷尽的探索，并随意取舍。读者自可漫游自如，徜徉来去，自得其乐，各异其趣。乃至将碑帖收集，揣摩之，临摹之，放到老花镜、放大镜下细察之，或深思之。毛老先生所作的工作，因若不经意而为之，有寻常松弛的感觉，尤见其底子之厚实。所以他的这份业迹，与一般的作品大不一样，材料丰富，经纬明确。文体用了文言，而一点不难读。至于本书印版之考究精美，远远非一般出版的书法之书的粗俗印刷品可以相比，故特为作序以推荐之。

我们现在来到了很特殊的境遇前面，为从来的历史所未见过的。我们

所生活的时代，先是铅笔、自来水笔、钢笔，部分地取代徽墨、端砚和湖笔，然后，圆珠笔又取代了铅笔、自来水笔和钢笔。近年，电子计算机不仅取代了圆珠笔，而且根本放弃了笔。我们现在上键盘打字，用彩色的光写作，用彩色的光来显示出一个一个的汉字，而且今后的计算机还将做许许多多向来用笔墨做的事。除了在合同上签字，写字的机会以后不见得很多了。甚至写信，绝大部分已被直拨电话所代替了。连设计师打图样也不用笔，而用了计算机。不必往下说了，今后奇怪的事儿还多着呢。（人类正在航天奔月，无人飞船已降落在火星表层，“探险家”飞出了太阳系去，哈勃太空望远镜考察了宇宙边缘的类星体。）中国的文字也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中国的书法、书艺、书学、书道这个传统，会永久保留下去的，是不会变掉了的。那就是中国的一种万古长青的“精神文明”。它会源源不断的留传下去，并在港、台，在日本（书法早就流传了。而且他们出版的书法书籍，本书亦不敢望其项背），还将在南洋，在华人世界上，广泛地流传开去的。我们希望，并且也相信，它就是会留传下去和流传开来的。那时它将要受到的是更大的尊敬和更广泛的喜爱的。毛老先生的作品，起到了在这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全面总结前人经验的珍贵作用。它不仅仅是一本供读者欣赏和研究的有益的书。

什么是精神文明？这是谁也回答不了的老大难题。没有一本百科全书能够，就连那《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内，都很难回答出来的。埃及、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墨西哥、印度、希腊、罗马，恐怕都还回答不了的。

这是我中国的一大新发明，从文明这统一名称中，硬生生地分裂出来这两种东西。用它来区别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不是不可以，早有这个“西方物质文明”的习惯用语了。其实物质文明自身，即已经包含着精神文明的无法分割的许多因素在内。但这名词还是有用的。这书法艺术，就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难题了。用我国的书法艺术来代表我国的精神文明时，可以说明它虽然也不能不附丽于物质之上，然而它，还可以说是相对地独立于物质生活之外的，一种精神所创作的文明产品。从结绳、鸟迹、彩陶的花纹，到甲骨、钟鼎、竹简、木简，到纸、笺、匾额、摩崖、石碑、印章等等，它已成为我国卓然不群，早已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应用之上的一门独立的、光彩夺目的艺术门类。它具有精神文明的，罕有的，备受尊重的，崇高的境界和独特的地位。它达到了一种其他的艺术形式难于达到的，不可企及的无法言喻的完美的文明程度。

赵子昂在《识王羲之七月帖》中，评论到人品问题，倒是很值得来提一笔的：“右将军王羲之，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议论人物，中其病常十之八九。与当道讽谏，无所畏避。发粟赈饥，上疏争论，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事重宜，为晋室第一流人品，何其名为能书所淹耶！书，心画也。百世之上，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遒劲，即同其人品。可惜溺意东土，放情山水，功名事业，止是而已。抑以晋室之气数有在也？晋之政事无足言者，而右军之书，千古不磨。米元章颜其斋曰：‘宝晋’，正与羲之书故耳。”接着他说到了《七月帖》：“大德二年孟夏，适过翼之斋中，出示此帖，二十有九字，圆转如珠，瘦不露筋，肥不没骨，可云尽善尽美者矣！”真是书如其人。这很可怕，这是一点都不会错的。

我读古代书论，常觉得它们多偏重于书法，而较纤弱于论书艺，谈到人品就稀罕些了。只有苏东坡的《书舟中作字》，真是个好样儿的。我就要在

这里，将它录下来大家欣赏一下：“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萃然，四顾皆涛濑，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这里面，寥寥五十七个字，写出一幅有声有色的图画。舟子的紧张，滩水的惊险，“士无人色”，就与书法家的宁静，及其无比的智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谓人品，可不就是这样子生动的展示出来了么？

鉴于《中国书艺六论》中，对此也有多处的论述。我在此序言中，就不必赘言了。我写序一向不谈书里的细节，不评不论。当《六论》已握在读者手中时，是够读者读的了。我只需介绍些情况，发我的几句狂言，也够了，少说为好。

我国的书法艺术是有过迂回曲折的发展进程的。开国以后，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一时是照顾不到所有的文教工作、艺术形式，也难免有砍了社会学系、书法几乎失踪等等失误。不能不提到，要过了六年多以后，到1957年的元月，才见到《诗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毛主席的诗词十八首，而且制版影印了老人家的一封信的手迹。这乃是首次推开了古典诗词和书法艺术之还被紧闭着的大门的一大创举。此事我是亲身经历了的。

现今我国的书法艺术已昌盛一时，挥毫运笔和墨迹展出，到处皆见。这里还说一下，书法艺术是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最为幽深的一种，而且几乎可以说，书法是已经被写尽写绝了，却又永远也写不尽写不绝的。而所有的艺术都有绝处逢生的大庆幸的。超过古人，是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这样去做，但新的创造还会不断发生的，就看有无那种坚持力以及攻坚不止的大毅力而已。

1995年清明

科学家需要更多的知音

——报告文学集《成功启示录》序

科学是比较接近于获得了真理，即相对真理的，因为它现在是讲“相对论”的了，而且它向来是欢喜进行认真的研究、试验、论证，后来又特别讲究定量，从来一丝不苟。那么，它和梦幻大约有很大的距离了吧。不然，它们的距离竟是意想不到的。科学是那样地靠拢梦幻，和梦幻相贴近的呢。哪里是个远近的问题呵！可能你没有想到吧，科学和梦幻竟是、或差不多是一回事儿的呢。

科学家说：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呵，这说的是没有幻想呵，而你说的却是梦幻。然则梦幻与幻想，岂不是一回事？甚至于与狂想曲也是一样的呢。科学时常有像萧邦的《即兴狂想曲》似的激动人心的优美的音乐风格，当然它也有它极严肃的一面。那一面是非常严谨的。

一部《封神榜》里面，包含着多少幻想的故事，有着非常之梦想的风格的呵！它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它敢于想人之所不敢想，言人之所不敢言。这书不算是写得那么好的，然而它里面的神话，今天差不多都实现了。还有什么“精卫填海”，也是当作神话来讲的，可是对于高科技来说，现在若要填海，真是算不了什么。现在到处都在填海。就是“女娲补天”，也是神话，现在科学家们却也正在研究，怎样把臭氧层的空洞，补起来呢。什么“千里眼”，那是望远镜，岂止远望千里，哈勃望远镜已能望到数以亿万光年计的遥远之处了。所谓“顺风耳”，不过是打电话而已。现在已可以既打电话，又看得见对方的形象，声音笑貌俱在了。近来更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就更了不起。坐在家里，不但不出门，就能知天下事，还能用它来参加国际会议，如置身在大会场的现场上一样。人在家中坐，便可看医生，作检查，接受治疗。医生可以根据任何地方传来的高清晰度X光片或扫描图像，进行会诊，手术时还可以与远距离之外的、经验丰富的专家保持声音和视觉的联系。长期患者可以在家中接受定期检查，得到及时治疗。过去所谓有的“乱说《西游记》”，孙行者可以“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现在火箭升空，比孙行者还要厉害。“探险号”卫星已经飞到了太阳系之外的银河系去了。或早或晚，人类是要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去的。

人所幻想的什么，科学是都可以给人去做到的。人类的梦幻，就是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或更美好的世界吧，这肯定可以通过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精心设计，组织施工，群策群力，创造出来的。信息高速公路是最近国际上的热点，美国一发起，德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印度……都在策划、设计、投资、着手进行了。深圳也在按照国际技术标准进行信息塔的设计，以建成一座可使光缆网与微波网组成天上地下、立体交叉的全封闭的信息高速公路，很不错了。

不要怕幻想。能做美丽的幻想，是好事，并不是坏事。能把高科学和高技术，未来和梦幻、幻想结合起来，是大家的希望、人民的希望。我们最怕的是落后。我们最不喜欢的是没有幻想、没有梦幻的人，这种人可能是没有出息的庸人。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这话真不错，这是真理，相对真理。

以上一段文字，是写进了拙作《幻灭与幻梦集》里的。写完之后，意犹未尽。科学，科学史，科学家，科学家之于人类……这样一些问题，仍然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不，可以说，我的大脑，几乎是整个儿被它们占据着

的！那么，现在，我再来说说科学家，说说科学家之于我们吧。

80年代中期，一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W·F·拜纳姆、E·J·布朗和R·波特三位英国人编辑的一部书，名为《科学史辞典》。翻看着这样一部书，我发现，人类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本世纪里的发展和发现，真个是迅捷和惊人，真个是人所能幻想到的东西，科学仿佛都可以给他去做到一样。了不起的科学家！比孙行者还厉害！仅以20世纪的物理学来说，它就有两个主要的探索，一个是探索宏观宇宙，业已通过HST探索到了宇宙的边缘的“夸萨儿”（Quasar，译作“类星体”）；一个是探索微观宇宙。微观到了什么程度呢？说起来真让人不敢相信。六十年前，物理学家所知道的原子内部，只有质子和中子，以为这是最终极的、最小的物质了。但是后来从外空射来了宇宙线，以及用更强大的加速器、用高能碰撞粒子碰撞出来的碎片，做了许许多多的试验之后，才展示出来了在更深的层次里，还有多种多样的，好多不同的粒子和其它的物质呢。最后发现，原来质子和中子还是用了更小一个层次的小粒子，叫做“夸克”（Quarks）的建造起来的。正是这“夸克”，和电子、中微子等，才是今日之物理学所理解到的，名字叫做“基本粒子”（又叫亚原子）的最小物质的建筑材料呢！“夸克”和电子等，小到了10的负18方/米还不止呢！这里无论用什么譬喻，也无法来描写它是如何如何的小了。这样一个“微观世界”的发现，当然得归功于我们的科学家！

举这样一个例子，只在于说明我们的科学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然则，一方面，科学家们都在不停地、飞速地探索着和追寻着那些未知的事物，而另一方面，有多少类似这样重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却又和我们的日常经验的距离如此遥远、隔膜，我们多数人包括笔者在内，压根儿就没想到去知道一下它们呢！以往的岁月可以不说了，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科学家，视最新的科学发现为异端，以致于干下了多少愚蠢的事儿来！但是现在，到了20世纪90年代了，眼看就要跨进一个新的世纪、新的纪元了，虽然我们天天也在喊着提倡科学、尊重科学，但是，我们的大多数人，对于科学上的最新的和重大的发现，又真正知道多少呢？我们对于科学家的尊重与理解，又深入了多少呢？即拿我们的文学界而言，能够展现一点科学上的最新发现的内容的文学作品，真如凤毛麟角，而能够写一写原子和粒子的文学作品，迄今也没有出现。我们的大部分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科学家们的成就的内容与价值，实在是知之甚少的，更不用说一般读者了。英国有位C·P·斯诺先生，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作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两种文化》，其中说到，人类的“两种文化”，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呢！其原因就是互相之间缺乏了解。长此以往，两种文化各执一端，日益疏离分化，结果只能给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带来损失。所以这位斯诺先生在书中警告和疾呼：两者应该合作，两种文化应该融合。我是极其赞同这位斯诺先生的意见的。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直到今天，我是一直在期待着有更多的文学家和写作者来读一点科学、科技方面的著作，来写一写科学家，写一写科学的。文学和科学应该有所结合。而事实上，我这番话语，愿意听的人是很少的。我很奇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拥抱信息时代和高科技时代，本是件火烧眉毛的事儿，可为什么似乎都不那么着急呢？即使偶尔有人报道了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却又总如空谷之音，响应者寥寥呢？我有时不免觉得万分孤独。自己所做的努力，所写的科技方面的

文章也吃力不讨好。我的这方面的许多话，已经写在去年上海书店出版的那本《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的“后记”和一篇《王婆要卖瓜——为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自夸》一文中了。这里不说了罢。

现在要说的是，一部由作家们来写科学家的书——《成功启示录》，就要摆在大家的面前了。我的欣喜是自不待言的。使我感到欣喜的是，这部书在下面几个方面尤为难得：

一是书中所写的十多位科学家，都是目前活跃在我国科学领域里的，最年轻的一代科学俊彦。他们的年龄，正当但丁所谓“人生之中途”。这是真正的跨世纪的一代！他们意气风发而壮志凌云，他们目光开阔而意识新锐，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也都独领风骚，成果卓著，享誉世界，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这里有专注于原子显微科学研究，堪称为这一领域里的“华夏先驱”的白春礼博士，中科院最年轻的副院长；有醉心于生命科学研究，并且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陈章良博士，北大最年轻的副校长；有从事资源与环境科学研究的“黄土地的儿子”史培军博士；有钻研智能科学和模拟技术的，由一位普通士兵而成为博士生导师的刘增良博士；吴启迪博士，我国第一位经民主推荐而成为同济大学校长的女科学家；冯长根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年轻的力学专家，从事的是一种叫做“混沌与非线性科学”的研究，他现在已是中国科协副主席；这里还有“大器早成”的精密仪器专家尤正博士，清华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同样是搞精密仪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年轻的副校长王珉博士，研究的却是航空精密仪器，他现在同时还成了江苏省的省长的助理；林宗坚博士，从事的是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的研究；航测遥感研究，他现在是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副校长；从事海洋生物研究的祝茜博士，被人们誉为“鲸鱼博士”，是他在地球的北极，率先谱写了一曲中国海洋生物科学探索的浩歌；彭实戈博士，山东大学数学历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他在应用数学上的研究成果，已经写进了世界数学史册之中……尤其使人感到振奋的是，这么一些科学精英人才，这么一些国家之栋梁，这么一些年轻的“博士中的博士”，他们大都是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他们生长于斯，成才于斯；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没有国界，但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根，却紧紧地和自己的祖国连在一起。他们的才华与贡献，既是属于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又是首先属于自己的祖国母亲的。他们是世纪之交的祖国科技界的真正的栋梁。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救国”的理想，延续到了这一代年轻的科学家身上，则变成了用高科技来振兴中华，以高科技来报效人类！

其次，这部书值得称道的是，采访和撰写这些中青年科学家的经历与事迹的作家们，在详尽地写出了科学家们的成长之路、成才之道，藉以给读者们——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们以人生的借鉴和成功的启示，同时，他们也在大胆地用文学的笔，去写一点科学方面的内容了。而这些科学内容，通常情况下不仅不为一般人所知晓，就是想象力再丰富的诗人或作家看来，也会觉得枯燥和抽象得难以下笔的。但他们却敢于尝试着去下一下笔的了。这已经很不容易，很值得欢呼的了。即便是作者们在写到某些专门的科学内容时，写得并不一定那么流畅和自如，读者读来也不一定觉得称心如意，甚至仍然会觉得不得要领，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只要写到了，也就是好的。写到了，比没有写得好。科学和科学家需要文学和文学家来做他们的知音。曲高和寡，有时是很使人扫兴的。科学家们需要掌声。科学家也实在应该获得比任何人更多的掌声。

承蒙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家们记得我，曾经是为科学和科学家们写过几篇文章的人。他们几经辗转，才找到了闭门谢客多年的我，并委以重任，让我来参与编辑这么一部写科学家的书。我觉得很荣幸，既结识了这么多意气风发的科学俊彦，又得以和许多在创作领域各有建树的作家同行，有了一次愉快的合作的机会。惭愧的是，岁月不饶人。我虽还愿意，尚且能够日日读一点儿科学著作慰我心灵，聊以补缀心头的那个未曾做完的科学梦，然则，要实实在在地再去一个个人物地采访，一个个领域地去探骊得珠，却是力不从心，徒呼奈何了！所幸的是，这一件事儿，出版社一提出来，便得到了中国博士联谊会的大力支持，他们以卓识的目光，把当代最优秀的一批中青年科学家，博士之中的佼佼者，推选了出来，介绍给我们的作家们。而出版社的编辑们又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在科学家和作家之间，架起了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平等对话的桥梁。当此物欲之声，洋洋盈耳，拜金主义，变本加厉之时，有人还能想到请作家们来写一写科学家，请科学家来谈一谈他们奋斗的甘苦、成长的得失和成功的感受，想到为广大青少年们出版这么一部书，这，显然已超越一般的敬业意义了。

诗人歌德 1813 年在与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谈话时说道：“科学和艺术，属于整个世界，在它们面前，民族的障碍都将消失。”现在，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虔诚地面向科学、新生科学，当我们怀着崇敬之心，面对我们的科学家，去理解我们的科学家，那么，所有僵化、懵懂和短浅的目光，也将随之得以改变呢？

是为序。

1996 年 11 月 10 日

《托尔斯泰传》全译本序

人到晚年，似乎什么事都可以来一段回忆的了。这部书，《托尔斯泰传》的全译本，也经历过一个四十年的漫长历程，则叙述它一下也并非没有意义的。

1943年初在山城重庆，有一家国讯书店，特请茅盾同志主编一套《国讯丛书》；并约我供稿。我还未考虑好给什么，戈宝权同志向我推荐，将他收藏的“牛津古典丛书”版本、英国人艾尔默·莫德著《托尔斯泰一生》（上下两册；这是他在国外时买回来的）借给了我，建议我将它译出，给国讯书店出版，由他写序，还答应了帮助我解决有关俄国情况及俄语方面的问题。接着，国讯的尚丁同志来到张家花园，到我住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房间来，找我商量，他说全书约有八十万言，卷帙太大了。我们商定先选译其中一部分，按青年、中年和晚年三个时期，分为三卷来出版。于是请示了茅盾同志，他同意了，我就着手翻译。一年里，三个分卷都译出，出了书；次年，1944年2月又合成一厚册出版。书的印数也还较多，读者是需要这样的书的，虽然它还不是全译本。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7年，我将此书交给近亲的宋蜀碧同志，嘱她先将上部未译部分补齐，准备陆续出全译本。不料上部译稿交到国讯书店后，书未出，而书店竟遭国民党查封。直到1950年尚丁同志清理书店事务时，才将这部译稿找回，归还译者。

全国解放后，我在《人民中国》英文版当编辑，1951年，忽有一天，胡乔木同志寄来一封短信，问我是否愿意将旧译《托尔斯泰传》全部译出，并修订旧译再版出书。这封信使我很感动，他当时是新闻总署署长，看来我译的这部书还是值得翻译的。但我当时回信说，工作实在太忙，近期无法办到，只能以后再说。哪知紧接着又有一天，遇到了何其芳同志，说他在一篇文章里曾引用了我译文中的一段文字，希望我将全书译出。这一来，我就真的写了信，问一个出版社是否有意将此书重版。不料回信却说，此书似不宜再出。信上虽没有讲出理由来，但并不是难以猜测的，无非是现在还不宜于出西方资产阶级作家写的传记嘛，也还可能是认为不值得出托尔斯泰的传记呢。又过了几年，到1957年，我在《诗刊》时，有一天忽然刘白羽同志也提出来了，要我全译并早日重印是书。我告以出版社认为不宜再出之说，他自告奋勇，说不要紧，他可以负责替我去联系。后来果然征得了那家出版社的同意。这时我编《诗刊》也很忙，乃商之于宋蜀碧同志，那时她已经出版过几种译书了，请她补译那未译的部分。她欣然允诺，为此花了两年时间。她补译了未译的半部书之外，还校订了我旧译的部分，一并寄给了出版社。可惜我们等了三年之久，在一个早春二月里，译稿退了回来，依然是此书不宜出版之类的话，不禁令人为之黯然神伤。

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了。我的大量文稿和集子全部给捆载抄走，以供“革命大批判”之用。但我爱人还是巧妙地在一只碗柜里藏起了这部近八十万字的全译本约两千张的稿纸。因为这是宋蜀碧同志的劳动，寄存我家，我们是要替她保存好的。后来就将它转移到我的一个男孩那里去了。这部稿子比她本人安全得多地度过了十年动乱。等到蜀碧离开她那悲恸之地，终于又调回北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时，形势已经转变，万象更新了，又见到了文艺复兴之日。这回北京出版社要出这部大书，她在重新检点

原稿之时，竟发现少了十三章。虽然她本职工作也很忙，还是抽出时间来又将它补全。这回用的不是戈宝权同志的珍藏本了，而是我的弟弟徐舜寿在 50 年代特地托人从英国为蜀碧买来的一部书，物在人亡了。现在，这个全译本已发排，即将出版，蜀碧来信，催我作序，焉能不从命呢？译事固小，不无裨益，也可以告慰她的爱人于地下。亡灵有知，也会很愉悦的吧。

这是个简单的叙述，也写了上千字，径直地说，叙述它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

问题就在于：像戈宝权同志、茅盾同志和胡乔木同志、何其芳同志、刘白羽同志这等有威望人士都比较肯定的、都希望能翻译出版的这本书，为什么解放之后，要经过三十余年之久才能实现其全译本出版的愿望呢？用什么“不宜出版”为口实而拖延了这么久长的时日，是一种什么样的习惯势力，如此之严厉呢？这是一本坏书吗？显然不是坏书。这本书于我们没有益处吗？也还是有些益处的。这个英国人，艾尔默·莫德，及其夫人是用英文译出了几乎全部托尔斯泰著作的大翻译家，他是研究托尔斯泰的艺术和思想的著名学者。毫无疑问，他也会有他的一定的局限性。难道就不能有他的一家之言？为什么他就“不宜”给我们的读书界见一见？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也确已深思久矣。现在这个全译本已经摆在读者面前了，就请读者自己作出鉴定吧。

在 50 年代之初，西方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逼得我们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在政治上独立自主，在文化上闭关自守了。一度也曾经“一边倒”，但很快就走自己的道路了。那时我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及它的文艺几乎是全面否定的。除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一些文化名人时，我们也开个纪念会，出一两本书，发少量的纪念文章，对于西方文化的优秀遗产我们并不是批判继承，而是干脆拒绝接受，有点儿唯我独尊，唯我独“左”的派头。所谓“不宜出书”是很客气的话，并非不可以出，不应该出，而是非其时也，不得已也。这种“左”的思潮最后竟然被林彪、“四人帮”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专制主义，到了绝灭文化精华的程度，是怎么也想不到的，简直不可以理解的。这个教训之深刻，实在值得深思。

但我也并不是说，莫德的这本书就那样的好，虽然它未必比比留科夫、古谢夫或别尔斯等别的传记差。苏联和世界各国研究托尔斯泰其人及其作品的文墨之多，是不在话下的。由于较长时间来我们简直读不到多少国外的新书和报刊，关于这方面是一无所知。能先把这一部传记译过来也就不简单了。但应当有更多的他的传记译过来。现在托尔斯泰研究会以及别些个研究会都成立起来了，今后的研究工作、翻译工作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看这一本《托尔斯泰传》的特点，主要是作者掌握了这么大量的材料。这在我们国内是没有看到过的。这些材料的整理也可以供我们参考。传记中选用了这多材料，读者自己就能够得出一些观念来。莫德有一种开明的风度，他摆材料很多，很丰富，而讲道理较少，缘其不强加于人，因此可供参考的价值也就多一些。

1982 年 3 月

《瓦尔登湖》译后记

亨利·戴维·梭罗的生平十分简单，也可以说十分不简单。他生于1817年7月12日，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风光美丽的康科德城。这使他颇为自豪，该城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地点。他说过：永远使他惊喜的是他“生于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之一，而且“时间也刚好合适”，刚好是美国知识界极为活跃的年代。当时的康科德城燃烧着美国精神生活的辉耀火炬。当梭罗的青年时期，著名的作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已经在康科德发表演说，撰文，出书，鼓吹卓越的人，给予梭罗的影响很深。

他的家庭境况比较困难，但他还是进入了哈佛大学。1837年毕业，跟他的约翰哥哥一起在家乡的一家私立学校里教了两年书。对他，学生们都表示爱戴，他经常带着他们在户外授课，野餐，让学生们受到以大自然为讲堂，万物为课本的生活教育。他被一位朋友称作“诗人与博物学者”，并非过誉。他的生活和知识是丰富而渊博的。

1839年，他们兄弟俩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航行了一个星期，后来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河上一星期航行的记录。他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他一路上的探索沉思以及他的学识和文笔使他写出一篇有名的旅行记，精雕细刻，他写了十年才拿出来。

那时，他像爱默生那样，在康科德学术讲座上，作过多次演说，但并不受欢迎。1842年，约翰不幸病逝，从此亨利离开了学校，没有固定的职业。1843年他住到了爱默生家里，一边照顾这位晚年的大作家，一边在他的身旁研究他的思想。那时他也给爱默生主编的《日晷》季刊写过稿子。稍后，他到了纽约，到爱默生兄弟的家里居住，希望在那里建立起他的文学生涯来。但他那种独特的风格并不能被人喜爱，靠写作维持生活也不容易，不久又回到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在家里帮助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又放弃了这项营利的事业。

1845年里，他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三月底他借来一把斧头，跑到城外，在瓦尔登湖边的森林中，开始伐木。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他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湖边的木屋。在木屋中，他观察着，倾听着，沉思着，梦想着，独立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记录了他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他在自然界里得来的阅历和经验。可是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作是隐士生涯。他的目的是探索人生，批判人生。他并不是逃避人生而是走向人生，并且也曾以他自己的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在认为已达到了他的目的时，他就走出森林，回到了城里。

就是在瓦尔登湖滨独居时，有一个晚上他到一个鞋匠家去补鞋，忽然遭到逮捕，并被拘禁在康科德的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支付人头税。他已经拒付了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为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了。释放出来后，他还是到鞋匠家里，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和一群朋友跑到两英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的看不到什么州政府的越橘丛中——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狱事件。在1849年出版的《美学》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他的一篇有名论文《消极反抗》。在其中，他认为好政府自然有利于人民，更不会去干扰人民，但所有的政府还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保存了奴隶制度的美国政府了，因此他拒绝支持它。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以此表示抗议，表示他不愿意服从这样一个政府。他认

为如政府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应当有消极反抗的抵制它的权利。《消极反抗》这篇论文对后来以绝食方式对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主义”有很大作用；对托尔斯泰“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启发；对罗曼·罗兰也曾有一定的影响。

梭罗一生都是反对美国的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帮助黑奴逃亡。继 1845 年的抗议之后，在 1851 年和爱默生一起积极支持了约翰·布朗的反对蓄奴运动，一直到 1859 年 10 月 30 日布朗被判绞刑，梭罗在康科德市会堂发表演说《为约翰·布朗请愿》。布朗死后，当地拒绝给布朗开追悼会，梭罗亲自跑到市会堂去敲响大钟，召集群众举行会议。梭罗关于约翰·布朗的一系列文章都是强烈的政治论文。这期间，梭罗得了肺结核病，健康明显地变坏。虽然去明尼苏达州作了一次医疗性质的旅行，但病情并无好转。他自己知道已不久人世了。最后的两年里，他平静地整理他的三十九卷的日志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平静安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死于 1862 年 5 月 6 日，其时还未满四十五岁。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1849 年自费印刷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印了一千册，只售去二百十五册。送掉七十册，存书都堆在家里，因此负债，好不容易才还清。1854 年出版了《瓦尔登湖》，也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相反的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伯特·路易·斯蒂文生的讥刺和批评。但随着时光的流驶，这部书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它已成为美国文学中一本独特的书，一部世界名著。他一生写了三十九卷手稿，都是他的日志，或者说就是日记，其中记录着他的观察和思想，理想和信念。它们是他的生命的精髓，给他的文章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在世时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死后收集成书的有《旅行散记》（出版于 1863 年），《缅因森林》（出版于 1864 年）和《科德角》（出版于 1865 年）等。

以上只是梭罗生平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再说他的这本书。对于他的《瓦尔登湖》，看来已不需要多说什么，书已经在读者面前了。只是还要说几句。这是一本寂寞的书，恬静的书，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之处，但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过“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了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的寓言。有位爱德华先生特地跑到克拉克岛上去问他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但这本书内也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山林的茂密翠绿；也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能启发人。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似乎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其实，至今还能留下来的过去的名著，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总是在向前运动的。他们的作者是人类的接力跑中的一个选手。这就是它们和他们的价值所在。本书十分精深，不是一般的读物。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爱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去，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韵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

人们常说，作家应该找一个僻静幽雅的去处去进行创作；信然，然而未必尽然。我反而认为，读书确乎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够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读《瓦

尔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读者跑到一个山明水秀的、不受污染的地方去的兴趣，就在那样的地方读它更是相宜了。

梭罗的书近年在西方世界更获得重视。严重的污染使得人们重新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的澄静的清新空气。梭罗的书自有一些可取之处。他能从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这些生活之必需出发，以经济作为本书的开篇，崇尚实践，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本书曾编入《美国文学丛书》。出版时全国已解放。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又重新将它校译出版。要感谢香港吴明实先生出版此书前作过润饰，还特别要对帮助译者，对译文全文作了一次校订而使之益增光辉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深致感谢。

注：

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先验主义作家的代表。

7月4日，美国国庆。

约翰·布朗 (John Brown, 1800—1859)：美国废奴运动的杰出组织者之一，因协助奴隶逃跑而被判处绞刑。

詹姆斯·洛厄尔 (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1891)：美国诗人，散文作家，外交家。

罗伯特·路易·斯蒂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英国小说家。

《瓦尔登湖》译本序

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明其妙，莫知所云。

这个中译本的第一版是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那时正好举国上下，热气腾腾。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因此注意这本书的人很少。

但到了50年代，在香港却有过一本稍稍修订了它的译文的，署名吴明实（无名氏）的盗印本，还一再再版，再版达六版之多。

这个中译本的在国内再版，则是在初版之后三十二年的1982年，还是在上海，经译者细加修订之后，由译文出版社出第二版的。这次印数一万三千册。几年前，《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决定，将它收入这套丛书，要我写一篇新序。那时我正好要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有了可能去访问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和瓦尔登湖了。在美国时，我和好几个大学的中外教授进行了关于这本书的交谈，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于今回想起来，是十分感谢他们的。

对这第二版的译文我又作了些改进，并订正了一两处误译，只是这一篇新序却总是写不起来。1985年写了一稿，因不满意，收回重写。然一连几年，人事倥偬，新序一直都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呢？最近找出了原因来，还是我的心没有安静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了，这回可找到了原因，就好办了。心真正地安静了下来，这总是可以做到的。就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了。为何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本《瓦尔登湖》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热热闹闹的书。它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它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在你思考一些什么问题时，你才有可能和这位亨利·戴维·梭罗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

这位梭罗先生是与孤独结伴的。他常常只是一个人。他认为没有比孤独这个伴儿更好的伴儿了。他的生平十分简单，十分安静。1817年7月12日梭罗生于康科德城；就学并毕业于哈佛大学（1833—1837年）；回到家乡，执教两年（1838—1840年）。然后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家里（1841—1843年），当门徒，又当助手，并开始尝试写作。到1845年，他就单身只影，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独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1848年他又住在爱默生家里；1849年，他完成了一本叫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的书。差不多同时，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消极反抗》（On Civil Disobedience）的极为著名的、很有影响的论文。按字面意义，这也可以译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它。然后，到了1854年，我们的这本文学名著《瓦尔登湖》出版了。本书有了一些反响，但开始的时候并不大。随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越来越大。1859年，他支持了反对美国蓄奴制度的运动；当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绞刑处死时，他发表了为布朗辩护和呼吁的演讲，并到教堂敲响钟声，举行了悼念活动。此后他患了肺病，医治无效，于1862年病逝于康城，终年仅四十四岁。他留下了《日记》三十九卷，自有人给他整理，陆续出版，已出版有多种版本和多种选本问世。

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也可以说，他的一生十分不简单，也毫不孤独。他的读者将会发现，他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而且是精美绝伦，世上罕见。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

他对自己的出生地，即马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的首义之城。他说过，永远使他惊喜的是他“出生于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点”之一，而且“时间也正好合适”，适逢美国知识界应运而生的、最活跃的年代。在美洲大陆上，最早的欧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兰”六州，正是美国文化的发祥之地。而正是在马省的康城，点燃起来了美国精神生活的辉煌火炬。小小的康城，风光如画。一下子，那里出现了四位大作家：爱默生，霍桑，阿尔考特，和他，梭罗。1834年，爱默生定居于康城，曾到哈佛大学作了以《美国学者》为题的演讲。爱默生演讲，撰文，出书，宣扬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觉的卓越的人，出过一本《卓越的人》，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驱者身份所发出的号召，给了梭罗以深刻的影响。

梭罗大学毕业后回到康城，正好是他二十岁之时。1837年10月22日，那天他记下了他的第一篇日记：

“‘你现在在干什么？’他问。‘你记日记吗？’好吧，我今天开始，记下了这第一条。

“如果要孤独，我必须要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我怎么能孤独得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是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

那个条文里面的“他”，那个发问的人就是爱默生。这真是一槌定了音的。此后，梭罗一直用日记或日志的形式来记录思想。日记持续了二十五年不断。正像卢梭写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思想》一样，他写的也是一个孤独者的日记。而他之要孤独，是因为他要思想。他爱思想。

稍后，在1838年2月7日，他又记下了这样一条：

“这个斯多噶主义者（禁欲主义者）的芝诺（希腊哲人）跟他的世界的关系，和我今天的情况差不多。说起来，他出身于一个商人之家——有好多这样的人家呵！——会做生意，会讲价钱，也许还会吵吵嚷嚷，然而他也遇到过风浪，翻了船，船破了，他漂流到了皮拉乌斯海岸，就像什么约翰，什么汤麦斯之类的平常人中间的一个人似的。

“他走进了一家店铺子，而被色诺芬（希腊军人兼作家）的一本书（《长征记》）迷住了。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哲学家。一个新生的日子在他的面前升了起来……尽管芝诺的血肉之躯还是要去航海呵，去翻船呵，去受风吹浪打的苦呵，然而芝诺这个真正的人，却从此以后，永远航行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了。”

这里梭罗是以芝诺来比拟他自己的，并也把爱默生比方为色诺芬了。梭罗虽不是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家，他却是出身于一个商人的时代，至少他也得适应于当时美国的商业化精神，梭罗的血肉之躯也是要去航海的，他的船也是要翻的，他的一生中也要遇到风吹和浪打的经历的，然而真正的梭罗却已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他向往于那些更高的原则和卓越的人，他是向往于哲学家和哲学了。

就在这篇日记之后的第四天，爱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记上也记着：“我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朋友了。仿佛他已具有一种自由的和正直的心智，是我从来还未遇到过的。”过了几天，爱默生又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我的亨利·梭

罗可好呢，以他的单纯和明晰的智力使又一个孤独的下午温煦而充满了阳光。”四月中，爱默生还记着：“昨天下午我和亨利·梭罗去爬山，雾蒙蒙的气候温暖而且愉快，仿佛这大山如一座半圆形的大剧场，欢饮下了美酒一样。”

在爱默生的推动之下，梭罗开始给《日晷》杂志寄诗写稿了。但一位要求严格的编辑还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罗也在康城学院里作了一次题为《社会》的演讲，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注意。到1841年，爱默生就邀请了梭罗住到他家里去。当时爱默生大事宣扬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办了个先验主义俱乐部似的。但梭罗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在一段日记中他写着：“人们常在我耳边叮咛，用他们的美妙理论和解决宇宙问题的各种花言巧语，可是对我并没有帮助。我还是回到那无边无际，亦无岛无屿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测着、寻找着可以下锚，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一处底层的好。”

本来梭罗的家境比较困难，但还是给他上了大学，并念完了大学。然后他家里的人认为他应该出去闯天下了。可是他却宁可回家乡，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学教教书。之后不久，只大他一岁的哥哥约翰也跑来了。两人一起教书。哥哥教英语和数学，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学和自然史。学生们很爱戴他们俩。亨利还带学生到河上旅行，在户外上课、野餐，让学生受到以大自然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的生活教育。一位朋友曾称梭罗为“诗人和博物学家”，并非过誉。他的生活知识是丰富，而且是渊博的。当他孤独时，整个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侣。据爱默生的弟弟的回忆，梭罗的学生告诉过他：当梭罗讲课时，学生们静静地听着，静得连教室里掉下一支针也能听得清楚。

1839年7月，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艾伦·西华尔来到康城，并且访问了梭罗这一家子。她到来的当天，亨利就写了一首诗。五天后的日记中还有了这么一句：“爱情是没有法子治疗的，惟有爱之弥甚之一法耳。”这大约就是为了艾伦的缘故写的。不料约翰也一样爱上了她，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三人经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划船。登山观看风景，进入森林探险，他们还在树上刻下了他们的姓氏的首字。谈话是几乎没完没了的，但是这个幸福的时间并不长久。

这年春天，哥儿俩曾造起了一条船。八月底，他们乘船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作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上，一切都很好，只是两人之间已有着一些微妙的裂纹，彼此都未言明，实际上他们已成了情敌。后来约翰曾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绝了。再后来，亨利也给过她一封热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后，艾伦就嫁给了一个牧师。这段插曲在亨利心头留下了创伤。但接着发生了一件绝对意想不到的事。1842年的元旦，约翰在一条皮子上磨利他的剃刀片刀刃时，不小心划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他用布条包扎了，没有想到两三天后化脓了，全身胀痛不堪。赶紧就医，已来不及，他得了牙关紧闭症，败血病中之一。他很快进入了弥留状态。十天之后，约翰竟此溘然长逝了。突然的事变给了亨利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虽然竭力保持平静，回到家中却不言不语。一星期后，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关紧闭症。幸而他得的并不是这种病，是得了由于心理痛苦引起的心身病状态。整整三个月，他都在这个病中，到四月中他又出现在园子里了，才渐渐地恢复过来。

那年亨利写了好些悼念约翰的诗。在《哥哥，你在哪里》这诗中，他问

道：“我应当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身影？/沿着邻近的那条小河，/我还能否听到你的声音？”答复是他的兄长兼友人，约翰，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们结了绸缪，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颜为他自己的容颜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达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约翰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从这里开始，亨利才恢复了信心和欢乐。他在日记中写着：“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说明过去的经历的甘美。悲伤的时候，多么的容易想起快乐！冬天，蜜蜂不能酿蜜，它就消耗已酿好的蜜。”这一段时间里，他是在养病，又养伤；在蛰居之中，为未来作准备，在蓄势，蓄水以待开闸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说：“我必须承认，若问我对于社会我有了什么作为，对于人类我已致送了什么佳音，我实在寒酸得很。无疑我的寒酸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无所建树也并非没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着把我的生命的财富献给人们，真正地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我要在贝壳中培养出珍珠来，为他们酿制生命之蜜。我要阳光转射到公共福利上来。我没有财富要隐藏。我没有私人的东西。我的特异功能就是要为公众服务。惟有这个功能是我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我含蕴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

恢复健康以后的梭罗又住到了爱默生家里。稍后，他到了纽约，住在市里的斯丹顿岛上，在爱默生弟弟的家里。他希望能开始建立起他的文学生涯来。恰恰因为他那种独特的风格，并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会所喜欢的，想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帮助他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这种尚能营利的营生。

于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爱默生在瓦尔登湖上买了一块地。当这年过去了之后，梭罗得到了这块土地的主人的允许，可以让他“居住在湖边”。终于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溶，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

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美国的国庆，他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湖边的木屋。在这木屋里，这湖滨的山林里，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并且梦想着，他独立地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时间。他记录了他的观察体会，他分析研究了他从自然界里得来的音讯、阅历和经验。决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作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并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这中间，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那发生于一个晚上，当他进城去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他之拒付此种税款已经有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去到鞋匠家里，等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几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的什么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桔丛中——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狱事件。

在1849年出版的《美学》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用的题目

是《对市政府的抵抗》。在 1866 年（他去世已四年）出版的《一个在加拿大的美国人，及其反对奴隶制和改革的论文集》收入这篇文章时，题目改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此文题目究竟应该用哪一个，读书界颇有争论，并有人专门研究这问题。我国一般地惯用了这个《消极反抗》的题名，今承其旧，不再改变。文中，梭罗并没有发出什么政治行动的号召，这毋宁说正是他一贯倡导的所谓“更高的原则”中之一项。他认为政府自然要做有利于人民的事，它不应该去干扰人民。但是所有的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这个保存了奴隶制度的美国政府了，因此他要抗议和抵抗这一个政府，不服从这一个政府。他认为，如果政府要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应当有消极抵抗的权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这篇《消极抵抗》的论文，首先是给了英国工党和费边主义者以影响，后来又对于以绝食方式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与“非暴力主义”有很大的作用，对于 1960 年马丁·路德·金，在非洲争取民权运动也有很大的作用，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影响，以及对罗曼·罗兰也有一些影响。

梭罗是一生都反对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帮助南方的黑奴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在 1845 年的消极反抗之后，他还写过《马省的奴隶制》（1854 年）一文，他和爱默生一起支持过约翰·布朗。1859 年 10 月，布朗企图袭击哈泼斯渡口失败而被捕，11 月刑庭判处布朗以绞刑，梭罗在市会堂里发表了《为约翰·布朗请愿》的演说。布朗死后，当地不允许给布朗开追悼会时，他到市会堂敲响大钟，召集群众举行了追悼会。梭罗关于布朗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动都是强烈的政治言行。

这期间，梭罗患上了肺结核症，健康明显地变坏。虽然去明尼苏达作了一次医疗性的旅行，但病情并无好转。他自知已不久人世了。在最后的两年里，他平静地整理日记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段落来写成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平静安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死于 1862 年 5 月 6 日，未满四十五岁。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1849 年自费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这书是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木屋里著写的，内容是哥儿俩在两条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议论文史哲和宗教等等。虽精雕细刻，却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行一千册，只售出一百多册，送掉七十五册，存下七百多册，在书店仓库里放到 1853 年，全部退给作者了。梭罗曾诙谐地说，我家里大约藏书九百册，自己著的书七百多册。

他的第二本书就是《瓦尔登湖》了，于 1854 年出版。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还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勃特·路易斯·斯蒂文生的讥讽和批评。但乔治·艾略特在 1856 年元月，却在《西敏寺周报》上给他以“深沉而敏感的抒情”和“超凡入圣”的好评。那些自以为是的，只知道要按照他们的规范，来规规矩矩地生活的人，往往受不了他们毫不理解的事物的价值，自然要把梭罗的那种有历史意义的行为，看作不切实际的幻梦虚妄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本书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业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一本独特的，卓越的名著。他一生所写的三十九卷手稿，是他的日记或日志，其中记录着他的观察、思维、理想和信念。他在世时的，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他去世后已收集、整理好，出版了的计有《旅行散记》（1863 年）、《缅甸森林》（1864 年）、《科德角》（1865 年）三种。他的全集出版有《梭罗文集》，有 1906 年的和 1971 年的两种版本。此外是他的日记，有《梭罗：

一个作家的日记》、《梭罗日记》两卷本、《梭罗日记之心》的精选本等。

以上只是梭罗生平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再说一点他的这本书。

对于《瓦尔登湖》，不须多说什么，只是还要重复一下，这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

自然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过，“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的寓言，爱默生的弟弟爱德华问过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却再也没有回答了。有的评论家说，梭罗失去过一个艾伦（斑鸠），一个约翰（猎犬），可能还失去了一个拉尔夫（栗色马）。谁个又能不失却什么呢？

本书内也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有启发性。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欢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的寂寞和恬静下来，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

应当指出，这本书是一本健康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作了极其动人的描写。读着它，自然会体会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断地将读者提升、提高。书已经摆在读者面前了，我不必多说什么了，因为说得再好，也比不上读者直接去读了。

人们常说，作家应当找一个僻静幽雅的去处，去进行创作；信然，然而未必尽然。我反而认为，读书确乎在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读《瓦尔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读者跑到一个山明水秀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的兴趣，就在那样的地方读它，就更是相宜了。

梭罗的这本书近年在西方世界更获得重视。严重污染使人们又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的澄净的清新空气。梭罗能从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这些生活之必需出发，以经济作为本书的开篇，他崇尚实践，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译者曾得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暨夫人鼓励；译出后曾编入《美国文学丛书》，1949年出了第一版。1982年再版时，参考了香港吴明实的版本。译文出版社在第二版的编审过程中，对译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工作。对所有这些给过我帮助的人们，就在这里，深致感谢。

大合唱《长江》序

1956年5月，我曾随诗人方纪，从长江中游城市武汉，溯江而上，经宜昌，入三峡，到重庆和成都，再会同了一批水利水工水电专家们一起踏看了都江堰和川西平原、岷江、大渡河和长江上一系列未来坝址。以后，我们两人又到云南，在石鼓和东川一带踏看了金沙江。我们初步了解了长江、金沙江、岷江和三峡的巨大的水利枢纽规划。我完全被我国的壮丽江山以及社会主义大建设的豪迈气派吸引住了。

1957年我在北京编《诗刊》。我们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主席的一封信和他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其中之一，是《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即大三峡的大坝，“高峡出平湖”，即三峡水库。因为头年已经有过一次长江的查勘，更加被这首词所激动。

1958年春天，毛主席和周总理分别视察了长江三峡。当周总理来到三斗坪的坝区时，他在检查过大坝基岩和岩芯以后，曾转过身来，向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林一山主任说：“过去有过一个《黄河大合唱》，现在应当有一部《长江大合唱》了。”林主任当即表示，一定组织人力，来写出并谱成这部大合唱。后来在湖北，成立了一个长江大合唱创作组。这便是这部大合唱《长江》的创作缘起。

1960年，三峡大坝的准备工作，加快步伐。那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会在京举行。会后，中国作协组织一批作家到各地区生活。经动员和批准，我离开了诗刊社，调到湖北省文联，进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担任工作，深入生活。到职后给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写大合唱《长江》的歌词，后因三年困难发生，伟大建设工程又推迟了，但长江大合唱创作组仍继续活动。

1961年，在省委的支持下，省文联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了一次长江上的旅行。参加者除诗人之外，还有作曲家多人。一行十余人中，有通过中国音协请来的作曲家，军委总政文工团的罗宗贤同志。我们先溯江而上，再又顺流而下，在全长江上下作了旅行采访，搜集了不少创作素材和音乐资料。

那年8月，我写出一个《长江组歌》的初稿，共分四部，分别写了长江的地理、历史、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的长江上的建设，企图通过这四个方面来反映长江。经过几次修改，第一部分于1962年元月初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二第三部虽已写出，但继续作了修改，至1963年元月初才在《人民日报》发表。第四部分虽也写出了，但建设生活还在一个漫长艰苦的历程之始，一直至今，仍在改写未曾完成。

那年第一部发表后，罗宗贤就着手作曲了。他用的歌词是报上发表的七首诗中的五首，略有修改。是年完成，就是本书印出的大合唱《长江》。1963年夏，总政文工团曾经排演，但未演出。同年10月，武汉市歌舞剧院建院音乐会上，将它公演，在武汉剧院，共演出了若干场，然而，在十年动乱中，这个作品是被当作大毒草批判的，不用说再未演唱过。而令人悲悼的是热情洋溢、多才多艺的作曲家罗宗贤同志，受尽了折磨，不幸病逝。

终于，在进入了80年代以后，长江大三峡水利枢纽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对它的原有规划设计，中央已经给予高度评价，并已肯定，坝轴线也基本选定，在最近几年里将作好施工前的准备。人民翘首盼望，长期等待着的最世界上最宏伟的大工程之一，到了上马的前夕。我从1960年底来到武汉，等

待至今已经二十三年，终于可以望见它的开工兴建之日，向它欢呼了。

这次，有佳音传来，人民音乐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个大合唱《长江》了。但是它的总谱没有了。经历了那场浩劫，虽多方寻找，罗宗贤同志当年的总谱还没有能找到。武汉歌舞剧院建院演出时的总谱也没有了，幸而分谱还在。但经了解，当年演出这部大合唱的乐队也没有能得到罗宗贤同志原来的总谱，而是另请作曲家冯仲华同志写出乐队用的总谱和分谱的。

鉴于大合唱《长江》，本来并非哪个文艺家的个人创作，它本来就是一个集合了多数人的力量而组织起来，然后写起、谱成的作品，因此和总政文化部的一位诗人协商，还请冯仲华同志根据当年演出的分谱，重写钢琴谱，并再作些加工改进。至 1983 年 5 月底，这样可供乐队用的钢琴谱完成了。因写此序，以纪历程。

这个曲子没有用《长江大合唱》名称。它只是称作大合唱《长江》。这样做是有意保留了《长江大合唱》的崇高的标题，留待以后，到大三峡水利枢纽，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建设全面施工之际，那时定可以产生出许多优秀的大合唱来。待这些作品发表，演出了之后，有了定评，得到公认，那最好的一部由领导机关批准，再来正式命名，方为郑重。

1983 年 5 月 27 日

《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散文集》题解

这本集子里收集了我的从 1978 年至 1985 年八年里的二十九篇散文。我把它们分为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两类。愉快的散文，写完了平安无事，心情舒畅，作者与读者顾而乐之。不愉快的散文中，有刺痛了个别人的，一帮人的；还有惹起了轩然大波的，批判它的文章字数，超过了拙作几十倍之多。还听说开了不少会，准备征讨砍伐，而刹那间烟消云散，雨过天晴了。有一篇不知怎的得罪了一位老将军，闹得不大不小，我至今也摸不着头脑。还有得罪了同行的，以及得罪了不知道是谁的，大都后来获得了谅解或宽赦。我本可学鲁迅，也把一些讲理的和不讲理的文章附在文后，印将出来，立此存照。不禁想起了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还是大家豁达一点算了吧。本书题名来之于英国笑匠肖伯纳。他有一部书，书名就叫《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戏》。

1985 年岁暮

我的“试验版”

为重版我的诗集《二十岁人》，作了两种改革。其一是当初编目未按年月，因此头绪是不清楚的。读者虽一般地不会有感觉，但是其中的线索确有点乱，现在改过来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东西，次序不太可能十分准确了，但自己比较安心，大体上有个顺序了。目录是连排的，节省点纸张。如果全国的诗集都能这样做，节省的纸张可不少，且也好看得多，一目了然，更便于检索。

其二是诗不分行，而连书了。这改革或者有点意思。我国古诗是从不分行的。《诗经》和《离骚》，李白或杜甫都不要分行，不要求把自己的诗放进较大的空间去，宁可肩挨肩地挤在一起，有很高的密度，反而光芒四射。这里不是说我的诗还行，我只是说这个古代传统很有点意思。诗分行是不是好看一些？不分行是不是不好看？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看诗不分行，无损于诗意与诗情。我这个选集要收入很多首、很多行诗，如果分行，篇幅太多，本子很厚，效果还不一定好，而且会显得有点浪费，亦于心不安。恢复传统有时固然是倒退，有时又是复兴。往昔之文艺复兴，就是有点革新的意思的。

因为新诗多半无格律，无音韵，是诗的散文化，是散文诗，故连书亦无可，并不影响读者对它们的欣赏。当然我并不反对诗的分行。西方诗无不分行的，是他们的传统。我将本来分行的诗连书，不过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小小试验罢了。这一来，我就可以多选一些诗，基本上找到了的全选入了，除个别例外，计亦良得。只有一首《橹》，要请它搬家，请它搬到另外的《散文选集》里面去了。其所以还称“选集”者，则因为还有不少作品并没有能够找到。

我并不一定主张诗要有格律。散文诗只因无格律，故而只是散文诗。卷首即有说明。这里不是讨论“格律”的地方，不多说它。在该说它的地方说吧。

本来我不打算说自己的诗的。但试验版编出来后，就有一些想法。我怎么看待我那些诗？《二十岁人》那样的作品，先前是自己欣赏过，自鸣得意过的；后来自己把它们“放逐”了，然后又给予否定了。到《最强音》，诗风来了个突变，变得非常“刚强”而且“健康”了，然而诗意随之减削，以至消失。而后十年间很少，或者竟是不想写诗，不大写诗了。开国后，甚至连散文也写不出，只是写了些向国外作宣传的新闻报导了。但后来又写了些分行的散文诗之类的所谓诗，还出版了一本《战争和平进步》的诗集，接着又被聘请为中国作协的《诗刊》副主编，不免重操旧业，又编了四年的诗刊。这中间免不了又写了一些诗，又出版了两本诗集。再以后又停了下来。“文革”以后，才发现自己是只能写散文的料子。我是不配写诗的人。然而回头看早年的旧作时，却感到相当满意，不再“悔其少作”了。我重新觉得《二十岁人》、《明丽之歌》，甚至《最强音》，虽很浅薄，虽很幼稚，都很可笑，都无羁束，没有套子，直抒胸臆，感情丰富，真挚可喜，文字清新，意象生动。那时很年轻，血气方刚，还很健康，谈不到颓废没落，真是如今再也不能做到，再也写不出来的了。

乃有得色，觉得我重编旧作，将一生作品编年整理，反倒可以隐约的看到时代的发展变化，历史的潮汐起落。虽非史诗，亦似诗史，是一部小小的

诗史，也算是半个世纪来的，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和他的情绪曲折的真实纪录。从这个《诗选》的工作，我才发现它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我有我的幻想，也有我的幻灭，以及我的再幻想，以及我的再幻灭。最后是一些悼诗，展示了一个时代的老去和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出来。我估计当其他的选集，全部十卷都完成后，这整个图景上，将会更加清楚地，如在云雾室里，显示出一些粒子径迹变化。现在先说这一点儿吧。

（这是《徐迟诗选（试验版）》里的《二十岁人》新序。略有删节）

《徐迟文集·散文卷》自序

年岁不饶人，我进入了八十岁。真有点胆战心惊，不知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我的第一本诗集叫《二十岁人》，单纯得很。当时以为人世最高贵的事物唯有诗歌。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要达到高贵的境界可是难上加难，根本是不可能的。后来就知难而退了。那时除了诗，也弄一点音乐，写点散文。是看不起散文的，写过就随手抛弃，不再看一眼。到知难而退的时候，自认不是诗的料子，才想起还是进入自己也看不起的散文的行列吧，才知道写散文也不容易呢。三十岁人以后，什么也不行，心还不死，就只想写散文。哪知四十岁时，又被一些人认为过去是写过诗的，似乎还有点诗的气质，就硬生生的推我到《诗刊》工作，就有机会登上了《诗刊》的编委宝座，居然编了四年《诗刊》。然而又不称职，终被辞退送进了专业作家中间去。这一下台就算死心塌地进入了散文行列。散文比诗是宽广得多了。诗是最窄的窄门。散文敞开了大门，什么都可以出入，就是诗也能容纳，名叫散文诗，请进请进！于是举着特写的招牌，我闯进了散文的大门，时而还在鲁班门前摆弄一下斧头，把诗的气质发挥出来，弹拨一下心弦，吹响一些号角，自由自在的活动在祖国的大地上。凭着深入生活的号召，50年代走向东北、中南、西南和河西，大写特写，到60年代，在十年空白之后又写起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来，都不知道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品种。我的诗集其实全是散文集，我的小说（不多），也是散文诗似的小说。我的散文，有的与报告文学分不清楚，我的游记更是杂乱无章的，多媒体的散文或散文诗。70年代写科学技术，只能归类于散文。看来我还是散文的料子。不过我并未和散文诗的诗告别。以诗为纬线，以散文为经线，我纺织了一辈子，就是这十卷文集，或可能有十二卷。这一卷就是第五卷：散文卷了。下面还有文论卷、音乐卷、杂文卷、自传卷，实则全部文选都是散文卷，只是其中又分为若干份不尽相同，但相差也不大的各别的散文卷罢了。写到这里，交待了这一点觉得大可结束了，好吧，就这样结束。

《徐迟文集·文论卷》自序

当知道我着手编我自己的文论卷后，一位老朋友，诗人曾卓关照我，一定要小心一点，慎重一点。文论不比其他的创作，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它往往会惹起一些是非来，甚至会酿成什么风波。我当然很感谢他给我的这些劝告。其实，什么文体都是应该用严谨的态度来对待的，哪怕就是抒情诗，也并不都是随心所欲地写出来的，而大多数是再三再四地推呵敲呵的，推推敲敲的才弄出来的。

到我着手工作起来时，我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文论文章，都要如此的谨慎小心的，只有某些带政治性的文章才要多注意一点，并且要把把关。然则全世界皆然也。而真正的美学评论却无需如此紧张的。刚开始时，我的大多数文论文字不过是一些抒情诗而已，是美的文学，那时，孜孜以求的是美。《圣达飞的旅程》就写得很美的，那篇《希腊女诗人》也写得很美的，这多少有点够得上资格，被称作美的文论文章的了。它们都是在追求真、善、美、爱、心、智、均匀、平衡和完整、和谐、幽雅，潇洒等等，等等的。

只是那篇《新土耳其诗人奈齐》就稍差了点儿了。两篇意象派的文章可能稍好，或者略差了点儿，但多少还有点美感。以后，就越发不行了。反正不如我一开头写那两篇文论，相当地精美、欢畅、流利。后来的那些文章，不用说感情已不够饱满，好像思维已渐见僵化了。如今反思起来，真觉得很有意思。看来就在我对评论的认识上，早就出了毛病了。看来是我竟会以为，诗才可用‘心’写，评论则是要用‘脑袋’写的，不知道评论也是要用‘心’来写的。

我把我一开头写的几篇介绍外国文学的，醉心于30年代现代派的文章，收进这个集子，是想露一点底子给当前的新潮派看看。那时的现代派都是多少下过一番功夫的。曾从邵洵美那里得到过一本《论现代主义诗歌》，还是徐志摩收藏的书，有他的亲笔签名的一本书，非常之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但那时，现代主义已吃不开，晦涩的诗是没有人读的。施蛰存对我说：你尽写些这样子读不懂的诗，叫我怎么给你发表呢？后来，我就搞不下去了。又写了些多少可读懂的作品，偶尔也给他难读的诗，如艾略特的那首《一枝雪茄和一本导游书》，则作了些注释，得到发表，是没有什么人读的了。

一进入40年代，我就弃邪归正了。这就是后来的那么几篇大作，浅浅涉猎了古希腊的史诗与诗剧的东西。有篇把莎士比亚论文，多少还有点雄心勃勃，想钻到学术界中去钻研点学问。然而太难了，此道我没有走通。然后就不再写诗，逐渐转向了散文。现在诗歌界已忘记了我，把我归于散文中的报告文学一类别了。文论也转过去了，是同时发生的事。

但因曾经写过诗，还没有被有些人，也没有被自己所忘记，还免不了在诗与散文中并驾前驱。50年代初还为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西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过世界名人纪念会，为大会主持人起草了开幕词和报告书。接着是《诗刊》创刊，被拉到编辑部坐镇，承担了三年十个月的编务，这段时间，大言不惭的为诗歌发言，回头再看，觉得还有少许是可以留下来作一个里程碑的标志的，这就是后来的那部分的一些谈诗的文字，那时正在逐渐地，再后来差不多全部地转向到了报告文学。

我的文论就是这么两部分：上编谈诗与下编谈报告文学，上编共四十篇，下编共三十篇。我在我的晚年里，写的少许报告文学作品，居然也曾风行一

时，实际并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内容。那时，到处来找我谈论报告文学，我说得很多，略有一些是重覆的话，但至少也是可以作为一个里程碑似的标志而保留下来的吧。

此外，下编中还夹杂着与报告文学不相干的评论文字，有综合的谈论了文学的，有分析研究作品的，如《红楼梦》艺术论，是“文革”时期留下来的雪泥鸿爪，也还可以作一个可悲的旅程碑的。

《徐迟文集·音乐卷》自序

我爱音乐。但我不是懂音乐的，自然不是什么音乐学家(Musicologist)，也不是不想当一个音乐学家，仅仅是当不上而已。这都已写在本书前面的三、四篇序言里的了。

在 1937—1939 的三年里，我是一个热烈的，时而还是狂热的音乐爱好者。那是多么遥远的往日！回想起来，还很醉人的。居然写了三本小书，还算全面的把西洋音乐家和作品介绍到国内来。

四十、五十年代里一直如此，交了很多音乐家的朋友。在作家中，爱好音乐的作家并不多，因此我是很被音乐界重视和重用的。我也忻然地替音乐家们服务，给他们写点文章，自己好像还很得意。幸而我虽狂热，而不狂妄，尽管有点自鸣得意，尚有自知之明。我能写出一篇篇音乐的美文、甚至评论一番，均能适可而止，没有说过了头，即使有说错的地方，还能得到谅解。现在把这一些旧作塞到这部《文选》中来，仍有点惶惑之感。所以，《歌剧素描》只选了一篇，其他一概藏拙。

1994年6月28日

《徐迟文集·杂文卷》自序

这第八卷真似乎有点摆杂货摊儿的样子了，此之谓《杂文集》。上、下编各五六十篇，共一百二十来篇。不过，再一想，还是有大批的30年代的杂文，发表在上海、香港，甚至在南洋的报刊上的，零零落落的杂文，目前却已无法找到它们的了。早先的那时期里，我所写作的，一般地比较专一、单纯，还有点孤僻，孤芳自赏。人刚在开始的时候都如此，渐渐发了点新的萌芽，长了点新的枝枝桠桠。生命逐步发展，友朋也多了起来。到后来就有了一些罗嗦、麻烦、争吵，乃至有了许多的麻烦了。越来越麻烦，越来越复杂，到后来不知不觉连破铜残铁也多起来了，好在没有当真去看重它们，收集它们，根本不想弄成什么书籍的。一去六十多年，到晚年却又拣起它们来了。此事还是特别经过徐鲁先生帮忙，从故纸堆中收集、整理，汇总、编辑而成的，竟然一卷编成，我这《文集》就算有了个样子了，于心亦大慰。似乎我这个人的精神生活就全都摊了开来，全盘托出，交给了公众。茶米油盐，酸甜苦辣，大都有了一些，再不缺什么了吧。

有一篇《读书人纪事》还值得一提：说到的是，人呵就那么奇怪，这里那里都有许多人，在各自干一些事，在尽一点心意。他们是但知耕耘，也不计什么功、过，什么得、失的。有个人读书曾作一些札记，寻找着毫不相干的一条条海上的新的航路。而当这些札记，在特定的时候放到了哥伦布的手上，才发生了发现一个新大陆那样的重大的作用。我是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件资料的呢？不知道了，但我却抄录了它，写进文章。后来根本不记得它了。可是马国亮先生记得，转回来告诉我说，这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他说得那么认真，则马先生给予我的印象，也许更深于他所得到的了。有些事就如同火种的可以传来传去的。一个火把可以点亮一百乃至一千个火把，有时却任何一个火把都没有被点亮过，然而重要的是让火把闪闪地亮着。火把是普罗米修斯这个智慧之神偷来的，是他送给人类的天火。天火就是智慧！现在正有人在研究，生命是怎样从太空之间产生出来的？是什么使人能够爆发出这样无限光彩的智慧来的？这智慧是会传遍整个宇宙的呵！最神奇莫过于宇宙产生智慧这事了，然后智慧将改造这个神奇的宇宙。我并不是在说大话，事实如此。杂文固小道，却也可点燃什么的。虽然因果是并不存在的，世上一切事皆偶然发生。现在有人用紊乱数学来寻找规律出来，人真是聪明得不得了。看来宇宙之谜最后是会全部被人一个一个地破译出来的。

1994年8月

《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后记

原来我并没有想出这样的一个集子。当我漫游在科技领域的广阔天地中，每有所感，就写成文章给报刊发表。有的剪报留存了，有的却甚至没有剪存的了。而上海书店的一位老友范泉兄却来提醒我，说我这些小文章已经足够出一个集子了。还未想好如何出版它们，老范却给我编辑成书，寄来了一个目录，并将它们辑入“文史探索书系”中。我这才感到这件事是可以做的，乃欣然应命。觉得出这样一本书，可无愧色，因为它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尽管写得还不够好，但也终于写出了它们了。现在肯写这些高科技命题的人很少。我很寂寞。我希望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些方面来。我希望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展，科技界和科技出版界能开创出一个新局面来。现在科学技术已不分彼此，溶成一体，这是高科技的一个特征。有时工程的迅速发展猛烈地推进了科学发展，有时科学要停下步子来，等待超大型工程技术的建设成功。科学再也不是离开技术而踽踽独行的了。中国和世界都处于势不可抑的大动乱和大变化之中。只有电子计算机可以救中国，只有高科技可以拯救人类，从各种各样的大灾难中脱颖而出。这就是我在这个《后记》中突然冒出来的最后一句话。

1993年3月12日

荷马史诗《依利阿德》译本序

一

1992年4月30日，我到希腊，还没有喘一口气，希腊国家作家协会秘书长姚兰妲女士（Mme Yolanda Peteraki）问我，对雅典有什么最初印象？

最初印象据说最重要。我也立刻作了回答：“我的最初印象有三：阳光、海水、大理石。”

这里的阳光是有名的，地中海的阳光向来都是很有名的，尤其是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的阳光更是特别地有名。我一来就感觉到了，希腊阳光是非常之明丽的，我来时正是立夏的前后。并不算希腊的最好时候，但气候还是好极了。阳光是那么亮，亮得像金子，那么柔和，柔和得温馨而且体贴人。这样的阳光正是产生荣耀万里的太阳神，宙斯（大自然）的儿子的，阿波罗的阳光了。

这里的海水也是很有名的，本来地中海和它的“蓝色海岸”早就蓝得遐迩闻名的，这次才知道它不仅蓝得多种多样，而且透明度惊人。我似乎没有看见过这样美丽而透明的海水呢，海水环绕着这么多的大小地闪光的，几百个海岛，这正是产生这位手执三叉戟的，威严的海神的，波塞顿的海水了。

至于这里的大理石，我还无法形容，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去看这雕刻家和建筑师用作原料的大理石呢。但我一看到希腊人的鼻子就好像已看到了许多有名的雕塑的大理石人体和那些圆形剧场的和圆柱形的大理石建筑物。虽然意大利的大理石也很有名，也是一样的雪白粉嫩的。而且米开朗琪罗，也确实不在菲地亚特和泼拉克锡泰勒等等之下，但无论罗马的、翡冷翠的或巴黎的大理石巨匠、高手，确乎又是怎么也都比不上希腊的这些大师的。更不要去细说那些气宇宏伟的大理石的建筑物了。哪里还能找到比此地典雅的，贞女之神雅典娜的贞女庙，和台尔菲的太阳神阿波罗的太阳神庙的，和索尼翁的，手执三叉戟的海神波塞顿的海神庙，那样地庄严、肃穆的，最高级的大理石建筑物了呢。

说来也真奇怪，后来我正好参观了这三个庙，在阳光下，在海滨，在大理石的前面，留下了我的更深刻的印象。呵，金色的太阳。蓝色的海，贞洁无瑕的大理石！

二

半个世纪前，1942年立夏前后，我在重庆歌乐山乡间，曾开始阅读荷马史诗，而后情不自禁的挥笔，用无韵素体诗翻译了《依利阿德选译》的十六个它的最有名的选段，当时真已觉得“诗人兴会更无前”了，又痴又狂，朗诵它们之时，手舞足蹈。两年后在美学出版社出了这本书，次年又在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了它一次。

此事在拙著《江南小镇》中有过描写，不再多说。但看来在小尺度的范围之内，因果关系还是存在的。五十年平安无事，过去了，没有想到1992年初夏，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忽然中国作协要我率领一个作家代表团去希

腊访问、观光，可以游览一番了。

我们4月30日转道柔立克到了雅典，住进奥林匹克皇宫饭店，在客厅里我回答了邀请我们的主人姚兰姐夫人的突然提出的问题，那时阳光已照耀在我身上，海水已在飞机上看到，大理石在当时还未曾看到，但过去看到过多少次了，如在巴黎的卢佛宫看到过的，维纳斯雕像、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雕像等等，乃信口就回答她，因为只要说到了希腊，自然谁都会的，谁都会想到这些雕塑，我肯定是会看到它们，并且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姚兰姐是一位女诗人，还有一位女诗人名叫玛洛（MaroStassinopoulou）的，是一位“淡装浓沫总相宜”的，典型的希腊美人。还有诗评家的玛丽迦蒂和她的丈夫，一位长髯诗人克里斯朵斯·喀西姜诺斯（Mariekaty&ChristosKatsigianos），还有魏梧的狄密特里（DimitriLazogiogos-Ellinikos），是诗人又是文物专家，明天他要给我们导游，去看雅典的卫城。另一位邀请我们的主人，大诗人维特萨克锡斯（VassilisVitsaxis），是一位大使，因公外出了，今天不能来，明天他要赶回来参加我国驻希腊的祝幼婉大使阁下，专门为我们的出访而举行的一个招待会。

然后我对主人说道，“我做过一个梦，一个很美很美的梦；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做了整整五十年了，今天我忽然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发现我就在你们大家的中间。”我请龚洁女士给我翻译，她说这就是一首诗了，于是她把它翻译了一遍。然后我拿出了我的那个五十年前的《依利阿德试译》的再版本来，并说明，明晚在我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我要将它赠送给我的邀请国的希腊雅典国家图书馆。

三

一夕无话，次日我们作卫城之游。在雅典，当然首先是拜访雅典娜的贞女庙（也有译作万神庙）的了。它就在卫城的花岗岩小山山顶。那天正好是五一节，国际劳动节。游人如织，群聚在露天的古代的议事广场的小山前头。狄密特里说给我们讲了奥瑞斯特斯的故事，以说明古希腊的民主精神。明知：能到议事广场小山前来的其实只是贵族，也只有贵族头头，说了话才算数的，甚至最后决定权，说到最后还在雅典娜的女神投下的那一票上。不过这一切也很了不起了，两千五百年前的所作所为，往往还比今天的许多事情和许多地方要好得多。

然后我们来到卫城的大门口，却和许多游客一样，大家都被挡了驾。原来今天是例假日，卫城不开放。这给我深刻印象，因为我们的规矩是每逢假日就要举行联欢，领导参加，和群众一起狂欢一天，而服务工作总得跟上去。游客和服务行业，大家都要忙得不得开交。希腊人却是不然，每逢节日，个人人都放假，一个不漏，大家都休息，于是我们不得其门而入。不过我非常赞成这个合理的好规矩，觉得很受启发，想用这奴隶社会的制度的民主精神，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贡献一个优良制度，聊进一言。

于是我们从卫城下山，到下面的小街，东弯西拐的找了一个咖啡座，喝着匹克洛斯，一种希腊人最喜欢的又黑又苦的咖啡，聊聊闲天，十分幽闲，十分舒服。这是很难得的暇闲，我们可是好久没有这样子的坐茶馆了。在那里我们为主人们介绍了中国的尚非信息社会的作家和作家协会的信息和情

况。

下午我们自由活动，我没有出去。晚上我们去了我国的驻希腊大使馆，见到了希腊国家作家协会的主席和夫人，两人都是诗人，及主要全是诗人的他们的用协会员。其中有我们的两位邀请人中的另一位，希腊的那位驻外大使阁下兼翻译家协会主席的，诗人维特萨克锡斯先生。他说他明天还不能陪我们去游索尼翁的海神庙，但后天将陪同我们同游台尔菲的太阳神庙，一共要有三天时间。明天则由诗人塔索斯和他的夫人艾斯特尔（Tassos & Esther Anagnostou）和女诗人玛洛，陪同前去。后天去台尔菲，除他和夫人以外，还有玛丽迦蒂和她丈夫，诗人克利斯朵斯陪同。

在海神庙，这头等的大理石建筑物，独立崖前，面对苍茫的大海碧波，巨风吹不倒，虽然已显得颓败了一些，却更显得苍老而又精神矍铄。在那里那天我没有会到威严的老神仙波塞顿海神，我会见他是在后来，在雅典的国家博物馆，在那里，他是一尊铸铜的雕像，庄严妙相，美不堪言，沉甸甸的铜雕，站立在一趾和一踵之上，张开两臂作投掷（并没有拿着的）标枪或三义戟之状，保持了那样的一种均衡。这是我一辈子所能看到的第一号铜雕了，比台尔菲的那尊《御者》还要高超，出神入化。

我们饱看了大海的明丽风光。那天我们巧遇到风神爱依俄勒斯出巡。风很大，归来在海边用餐，艾斯特尔在餐馆里问我：在室内还是在海滨用餐？我是不该说：“在海滨”的。我那天是穿上了夹大衣的。风神却吹得诗人塔索发了两天烧，因为那天他只穿了一件衬衫。

又次日是台尔菲之行了。有大使阁下和夫人，还有克里斯托斯和玛丽迦蒂这样的两对夫妇，四个人带着我们五人，驰车两个多小时前去。我们住在很漂亮的欧洲文化中心。头一天的下午，他们游泳去了，我独自在山上，望海作休息。次晨有了一个最佳妙最美丽的天气，我们终于见到最瑰丽的大理石的建筑物。再怎么想象力好，我也想不到它的规模会如此之宏伟！这又名‘台尔菲神谕’的胜地里面的大理石雕塑真是人世最美的事物了。但因为它们太多了，我没有按我的：凡到展览会，我只看三件的最佳展品的原则，以免看过以后记不住，好的坏的一概的都忘了，一切就无法细说了。但有青铜雕刻一件，过目难忘的。它，陈列在博物馆中的许多青铜的雕塑中，奕奕如生的一《御者》，从双目炯炯，从长袍的褶痕的毕挺上面显示出来的，安详神情，达到了古希腊的诗学、美学、哲学中所涉及到的所谓 Heiterkeit（不知应该如何译它，有人译作‘肃穆’）的最高境界，真个最为精采。从此它也永远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了，和我的朋友罗念生一起，我想起它来便要想起他，而想起他时也会想起它，再也忘记不了他们的了。

四

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我想到要再次翻译荷马史诗的了。反正就在希腊之时吧。在台尔菲我参观了一个诗人的住宅，现在也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了。他和一个美国女人结了婚，美国女人很有钱，两人决心用他们的资产，来创办一个台尔菲艺术节，这事后来办成功了。艺术节共举行过两次。这就把他们所有的钱都用光在这上头了。他们修整了圆形剧场，上演了希腊悲剧，一个是《普罗米修斯上绑》，还有一个好像是《在陶乐斯的衣菲格尼亚》。

那美国女人是美术家，她设计了演员们戴的面具，极好。她还在一架仿

古的织机上织制了演员们的服装，可了不起。描写他们要用很多的笔墨，我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做这件极有趣的事情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热爱古希腊的，巴不得为它做点什么。说是他们很快就把资金化光了，美国太太说要回去筹款，再来办艺术节。她走了，却没有回来。诗人后来也去世了，遗体安葬在近旁的一座公墓里，还能让人前去凭吊。现在留下来的一座房子，也能让人追思。这里的一切很感人了。人去楼空了，只有青山还在，我也是一个爱希腊者，巴不得能为它做一点什么事。也许就是在这时，我心里动了一动，是否我可以译一部《依利阿德》的诗体译本，因为我国已有两个中译本了，一个是傅东华译的，一个是杨宪益译的，但都是散文译本，至今还没有一个诗体的译本呢。

要补充一下，使我有重译希腊史诗的机遇，是很多很多的，上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次而已。五十年前我就做过这样的梦。东方古文明之中国，岂可以没有一本西方古文明之史诗呢。

五

我不能再停留在希腊的游记上了，那是可以写很多很多的，十分美丽的回忆。如果我有时间，我还能多写一些。在雅典，我还试译了一下维特萨克锡斯大使阁下的一首《帮助我歌唱人》的一百多行长诗，在告别他的那天晚上，他朗诵了希腊原文，我朗诵了我的中译文。这是他改写《奥德赛》的一段诗，是他自己的新创作。我译得很带劲，并且觉得不很吃力。我甚至有了一种美好的感觉，我在应用诗歌的形式上，可能已渐臻成熟之境，毕竟侍奉缪斯女神已经不下六十年了。

在雅典的时间不长，有一天下午我去了一趟书店，买了一批书，其中主要是荷马的原作和研究他的著作。我已经下了大决心，要译《依利阿德》了。五十年前就想过译它的，工程浩大，那时功力不济，没有敢动手。那时就是动了手，也未见得能完成它。现在条件好得多，主要是我已用上了电子计算机。说起来真是，要是没有电子计算机，我还真不敢尝试的呢。而有了电子计算机我也就有了这种雄心勃勃的壮志和诗意盎然的雅兴。

头一个问题是格律方面的。自从中国新诗运动发生以来，一开始就不讲究格律，甚至是提倡自由诗（Vers libres），反对格律化的，因为它是从反对旧诗中诞生的。但押韵，或者说，相对整齐，大体押韵，却被容许和接受了下来。有三种形式是较为流行的：民歌体；豆腐乾诗。楼梯诗，不必在这里细说了，广泛流行的是自由诗，无所谓形式，充分自由，因此在格律方面，从 1919 年新诗肇兴，一直到 90 年代还没有人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来。

但小诗不讲格律尚可，巨大的诗篇可不能不讲究它了。在五十年前，试译《依利阿德》时，我用的是无韵素体诗，即西方的所谓 Blank Verse，来做希腊史诗的中译文的格律。这是不押韵，专讲音步，或称音组，每一行多少个音步或音组。全诗就有了如同一片粼粼水波似的规范化了。

这无韵素体诗是英国诗人喜用的格律，我国的新月派诗人如闻一多，徐志摩，陈梦家等，均曾加以注意，并作过一些试验。曾经有一次，我专诚拜访过陆志韦先生，向他请教过，他也是这一派人物。卞之琳先生也是最讲究这个无韵素体诗的格律的人，他用它译了莎翁的几个诗剧，然而他自己写新诗却比较少用。诗人冯至写十四行诗时也比较讲究音步。

我国学者孙大雨对此曾有专著，讨论了这一诗歌的形式，音组这个名词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并亲自用它来译出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一剧。我对孙先生是十分钦佩的，多次在文章中，也在《试译》中推荐过它，但他一生甚为坎坷，他的努力也因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的新诗运动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但至今连一点儿格律也没有建设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个人对此感触最深，这一回就想借这一部巨著的翻译来探索一下。

在我译《依利阿德》的第一个歌的时候，先用五步一行的无韵素体诗开译了，结果发现原作六一一行诗，竟译为七百多行诗，超出太多了。立刻悟到原著用的是六步体长短短格（Dactylic Hexameter），如此则非得从五步改为六步不可，并立即决定，马上试一下长短短格，每一步三个字（长短短）或两个字（长长）互相调节着用。于是又将第一个歌，全部从五步体改为六步体，同时首次试验一下长短短格，结果七百多行诗，就改成了六百二十四行诗，比原作只多出了十三行诗，不免心中大为快乐。

方针既定，我就放手翻译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也逐渐地掌握了这种格律。现举几例说明之。

全诗开卷第一段：

|呵永恒|的女神，|这一回|的史诗|唱的是|光火，|
（长短短|长短短，|长短短|长短短|长短短|长长，）

这就是六步体长短短格。下面是：

|是阿基|勒斯的|光火，|这命中|注定|的灾难，
要给希	腊联军	一个比	一般的	损失	更大的
损失，	使多少	的勇士	成群地	坠入了	幽冥界，
留下来	的死者，	不免	填充了	鹰犬的	口福，
从而	给宙斯	达到了	目的，	这两人	光火了；
一个	阿格门	农王，	阿特丽	柔斯家	的儿郎；
一个	阿基勒	斯王，	从此他	们再也	不来往。

全书一律用这一种格律，从头到底。间或也有没有遵守的，但属极少数。我这里不详细解释它了，聪明的读者自然会一下子明白它的意思的。

六

现在先要介绍一下荷马的史诗。五十年前，我就写过下面的这么几段话，但当时的出处却没有说明，想来是根据穆莱（Gilbert Murray）的《史诗之兴起》（The Rise of Epic）一书的，这本书早已不知去向了，现在也不太记得它了，不敢肯定。那几段话写的是：

《依利阿德》释：

希腊史诗有所谓‘史诗圈’者，指这样一个时空的圈以内的史诗作品、传说以及古史等。荷马学者及文字学家将古希腊的史诗大别为二：“特洛亚圈”以及以忒拜城邦为中心的“忒拜圈”。《依利阿德》是属诸‘特洛亚圈’的。‘特洛亚圈’共有八部之多，第一名叫《赛泼利亚》，以金苹果的故事开始；在英雄帕琉斯的婚礼上，宾客盈门，但没有邀请‘不和’的女神。她不高兴，就掷出了一个金苹果，上书：献给最美丽的女神。

三个女神争夺这金苹果。因而她们不约而同的都向人间最潇洒的美男子，作为评判员的巴列斯，进行贿赂。天后赫拉许巴列斯以权势，智慧女神雅典娜许他以聪明才智，而许他以人间最美丽的女人的，爱神阿福洛狄特的

贿赂，打动了巴列斯的心，金苹果乃归之爱神。爱神作为报酬，便把斯巴达的皇后，倾国倾城的海伦一掳去，给了巴列斯。于是希腊大军云集，在阿谷斯国王阿格门农及海伦的丈夫，斯巴达国皇门纳劳斯的率领之下，出征特洛亚城又名依利昂城，去索还海伦。战争进行了十年之久，终于征服了特洛亚城。惟《依利阿德》所写的，只有第九年战争中的四十多天，它的内容是无比地丰富的，不可能，也不必地这里说了。

我的译文用了许多的英译本作为参考。我虽曾从缪灵珠教授，学习过希腊文，但没有学好。五十年过去，当年搜罗的藏书都已不知去向，再也没有用过它们，现已记不得什么了。但毕竟学过一点儿，总比没有学过好些。老年也很奇怪，反而记得许多往昔的记忆，时而还很有用处。在我把许多希腊文的英译本对照研究时，我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然而就在相互印证它们之时，我却得益良多，可以窥见了我以为是最好的和最真实的内容。

我曾说过，翻译就是创作。当时有人反对此说法，认为翻译只是在原文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我不知道创作与再创造之间有什么不同？我到生活中去进行了采访，根据采访，我进行创作，无须说什么在采访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或再创造之类的话的。我反对直译，至于‘硬译’更接受不了啦。我提倡文学作品应当用“雅、达、信”之说，以代替原来的“信、达、雅”之说。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个统一体，但前者首先想到了读者，也没有忽视了原作。后者首先想到原作了，很可能忘记了读者。然而翻译总是很难的一件事。唯其难也，难在雅而信、达，不在信、达而不雅。雅最难了，因为译的是文学作品。

香港的艺术节

“十二年前，香港没有艺术节。文化活动疏落，艺术节目寥寥无几。而香港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地方，艺术逐渐地在这个地方发芽开花，冲淡了一贯以经济、商业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这是写在香港艺术节协会出版的一本图文并茂、印刷得异常精美的厚厚的册子，《节目表》，《前言》里的第一段话。

它接下来说，“首届艺术节于1973年举行，那一年的著名艺人和艺团，有梅纽因（美国小提琴家）、舒华柯夫（西德女高音歌手）、曼歌·芳婷（英国舞蹈家）等以及伦敦爱乐管弦乐团，布里斯托‘奥域’（Old Vic）剧团等。此后一年一度，邀请艺术界翘楚来港演出。以后的几年内，史透恩（美国小提琴家）、托第拉雅（法国大提琴家和作曲家）、伐莎里（瑞士钢琴家）等以及伦敦交响乐团、英国室内乐团，哈莱管弦乐团、克里夫兰管弦乐团、剑桥剧团、茨塞斯特节日剧团等著名艺人和艺术团体参加了艺术节的演出。”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来，香港艺术节请到了这多具有盛誉的大艺术家和名艺术团，它的艺术水平确实很高。

这样的艺术节，每年在春节前后举行，给香港的市民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今年的节目”，《前言》里指出，“较着重于戏剧和视觉方面，企图打破香港这个多元化社会里所难免存在的语言隔膜。”从今年1月30日开始，到2月28日止，共三十天，每天分四个剧场（大会堂音乐厅、大会堂剧院、艺术中心寿臣剧院、利舞台），以国语、粤语、英语三种语言，加上音乐语言、舞蹈语言，进行各种演出，达一百多个场次。此外，还有选自上海博物馆的五十多件珍藏品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展览；再加上我们三人（理由同志、贺祥麟教授和我）专程前去参加的一个“中英文学交流研究讨论周”，这是有着不同的题目，由中外作家、学者分别主讲的六个场次。艺术节的节目可以说是很有点规模的了。

今年这所有一百多个场次的演出者，包括香港话剧团、中英剧团、英国国家剧团、香港中乐团、香港交响乐团、匈牙利管弦乐团、成都市歌舞剧团、澳洲舞蹈剧团、雪梨歌舞剧团、西班牙德克拉加假面剧团、乌克兰民族舞蹈团、苏格兰室内乐团、加拿大铜管五重奏、雪梨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二重奏以及钢琴独奏会、女高音独唱会、大提琴独奏会以及许多艺术家参加的歌咏雅集、苏州评弹、一副爵士乐队（在希尔顿酒店的舞厅演出），最后还有一个由澳大利亚歌唱家联合演出西马罗沙的歌剧《秘密的婚姻》，等等。

没有必要把这些艺团艺人要表演的节目单抄写下来了，尽管我是乐意于抄录一份流水帐似的节目表的，多么绚丽多彩，令人神往呵！今年的艺术节的音乐方面，主要是演奏勃拉姆斯的作品，以纪念这位伟大作曲家的一百五十周年诞辰。就举这个例说明一下，曲目中包括他的《学院节日序曲》，他的四部交响大乐、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他的海顿主题变奏曲和休曼主题变奏曲，他的C大调钢琴三重奏、F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和A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等。对于知音者，这也是至高的享受了。不用说，其他如莫扎特、贝多芬和肖邦等等的作品的演奏了，也可以说盛会空前了吧。

在我去香港之前，曾听说，香港人自称他们处于一个“文化的沙漠”上。看来这话有点说过了头。仅仅从艺术节来看，它那里还是十分重视文化娱乐的。虽说五百万人的城市，几人能享受到艺术节？千人之场一百场不过十万

人。但也不能说是沙漠。当然它更着重于商业、经济。它的文娱生活中，则娱乐又多于文化，然而娱乐中也还是有文化的。有些人开口闭口说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颓废没落，荒淫无耻。对于这样的一部分人说也是事实，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严谨生活的人还是多数，或者说，大多数。他们在生活的激流中挣扎着、求生存。这不正是勃拉姆斯的作品的內容，甚至是大部的內容？当然，什么话也不要说得太绝对了。

香港有精华又有糟粕。既不可一笔抹杀，也不能全盘肯定。

认真一点说，艺术节里似乎也还缺少一点什么。缺少什么呢？我想，是缺少一点时代精神吧。

本届艺术节新添的一个项目，“中英文学交流研讨周”可以给这缺少的一点什么补充上一点什么东西呢？

“研讨周”由香港比较文学研究会筹备和组织。所谓比较文学，主要说的是中外文学的比较与交流。从2月7日起，每晚举行，至12日止，一共六场。“研讨周”在《节目表》上说了，“采用了一个平凡的主题：趣味文学……邀请了中外著名的文学家与学者，透过示范讲座，将趣味文学的主题带出。”这里所谓“趣味文学”，我最初也不理解。后来从节目表上看到它的英语用词是 Literature is to be enjoyed（文学应当是被欣赏的）一语，大体上也明白了它的意思，就是节目表上说了的，要我们“将文学经验带给每一个参加研讨周的人，使他们能够从一个活泼的角度来欣赏中国及外国的文化。”可见，文学在香港是被认为一件比较严肃的事物，和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相比较，可能是稍为严肃了一点吧，因之需要通过一点儿趣味或从一个活泼的角度来让人欣赏到。

研讨周的六个场次是：2月7日，由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主讲，讲他如何将他的小说《游园惊梦》改编成为舞台剧，然后放映了这个舞台剧的录影片（这就生动活泼了）；2月8日，由《游园惊梦》舞台剧的女主角卢燕女士主讲，讲她如何塑造剧中人钱夫人这个角色（这就更能引人入胜）；2月9日，由余光中教授主持“中国抒情诗人之夜”，余教授主讲后，诗人们朗诵现代中国诗歌及英国诗歌，并有香港青年作家协会的集体朗诵节目；2月10日，那是我们的专场，题目是艺术节规定的，关于“三十年代发芽，蓬勃于七十年代末期的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特色”，由理由同志主讲，贺教授和我帮腔；2月11日，由两位美国作家主讲科幻小说的创作；2月12日，由一位美国女权主义作家，主讲当女作家之意义，并放映首次在香港公映的电影《说谜语》。以上节目，均在铜锣湾海港路的艺术中心大厦的演奏厅里举行。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们的研讨周也卖票。入场券每张港币十元（学生票五元）。讲话而有票房价值，在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出发前在北京，我还以为我们将辛苦地自始至终参加六天的研讨周呢。到港后才发现，我们毋需参加六场，只要一场就够了，即我们自己的专场。当时我们表示，很想听听白先勇先生的讲话，比较文学专家李达三教授自告奋勇，愿给我们去买票，并热诚地承担了开车子送我们去艺术中心演奏厅的义务。可见，如果我们想参加我们自己的专场以外的任何别的场次时，我们得自己掏腰包，买票进场，并自己解决交通问题。

则艺术节的其他节目，可别想艺术节协会给我们送票招待了。当然不能！如我们要听匈牙利交响乐团，要听成都歌舞剧团的藏戏与舞剧《花仙卓瓦桑姆》，要听陈淑贞弹奏捷克作曲家杨纳契克的《街头示威奏鸣曲》，我们都

得自己买票。头等票价是港币一百元或八十元，二等票价七十五元或六十元不等，而著名的罗斯卓波维奇的大提琴独奏会票价最高，头等为一百二十元，二等八十元，三等五十元，四等二十五元，一句话，离不开香港的“一贯以经济、商业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也许是我们这里，往往发出金字火红请柬，或分送招待券，或预留座位，敬祈首长来宾光临指导，甚至备有茶水香烟，这些看白戏的优越性实际是慷国家之慨，大约要进入改革之列了。

香港《大公报》在2月11日第二张第五版头条，大字标题发表了：“昨晚在香港艺术中心作家徐迟、理由、贺祥麟谈中国报告文学发展，三人是应邀来港参加艺术节交流周活动的”一条消息。其他如《文汇报》、《明报》等各报也都发了我们的消息。我们三人的讲话有分工，我作了一个导言，意在撒下一点报告文学的种子，理由讲了正文，他生动活泼地讲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飞来峰》；贺教授作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结束语。

要说时代精神的话，我们的讲话给艺术节就作了这么一点小小的补充。

对于中英文学交流研讨周，这一次虽然规模很小，它的意义还是重大的。香港就在我们大门，而现在我们去访问的人不多。大门口都很少去，别说远处了。足见我们足不出户，比较严重。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既不甚了解香港和世界的文学状况，更不要说它们的经济、政治和建设的真相了。我们出去一趟也不容易。香港只是咫尺之遥，出访要办理护照签证的手续，还要通过海关检查才能放行。出去以后，见到老友故旧，才发现连香港的老熟人老朋友也对我们相当隔膜和不了解，但他们的心是热呼呼的，对祖国的感情那样深。时值春节，我是亲眼看见，返回大陆探亲的港民达五十万，他们在九龙车站排了长队等着上火车，有达两昼夜者，不以为苦。然而我们的文学家可能是不太关心我们的香港同胞手足了。

而有过一个时候，我们的文艺家曾云集于香港。那是在抗战前期，上海广州沦陷后，那时在香港的，有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廖承志、乔冠华、许地山、柳亚子、邹韬奋、郭沫若、胡愈之、茅盾、夏衍、阳翰笙、金仲华、欧阳予倩、萨空了、黄药眠、戴望舒、戈宝权、萧乾、杨刚、萧红、端木蕻良、袁水拍、冯亦代、蔡楚生、沈西苓、金山、姚锦新、戴爱莲、叶浅予、黄新波、张光宇、张正宇、丁聪、黄苗子、郁风、刘火子、林林、周钢鸣、陈残云、林埃、黄文俞、华嘉、林焕平、刘思慕以及胡绳等等，那是多么辉煌的一张名单呵！我记得不全了，没写上的还多呢。怎么的，一到50年代，这多人全部撤走了，一个不剩。三四十年过去，还很少回来看看那旧游之地。于是这美丽的岛上，就这样大发扬了商业的精神和经济的活力。巨厦如蘑菇而起。虽然不是文化的沙漠，却少却了一支我们的人曾经擎举过的光华的火炬。怎么才能让这一支时代的精神的火炬，再在那发达的现代化的岛上熊熊地燃烧呢？

1984年

苏州书画

因为工作，来到苏州，甚至没有多少时间游览。但是不能不发现，苏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我对着一群青年同志这样说时，他们竟哗然大笑了。他们并不以这座古城为满意。他们期待的将是一座光亮、新颖、现代化的城市。

曾有个人儿对我说过：苏州古老、破旧，你这个颂歌现代化的作者去那儿干什么？我说：苏州是一座具有古老传统的城市；它不免于是一个渐进缓慢的城市；但它将是一个突变的城市，你会看到的。

苏州保留着古老的林荫道、长巷和房屋。白色粉墙的墙粉，有的已经不白，但还是有刷白了的粉墙。长巷之幽深，街道的清静；房屋门前，花木扶疏；隔小河望过去，美丽如画。它是一个画中城市。那一群青年是身在画中不知画吧。如果这城市有点古旧破损，送进苏州书画社去，重行裱装一下吧，它经过改造便可焕然一新。

苏州是一个有艺术传统的传统艺术城市。有些数目字听起来可是惊人。这个并不很大的城市有过一百七十座园林，还有不少数可以恢复起来。到处有花香鸟语，莺声啾啾。凡是四方形，都有四只角，一个田字，可以有十六只角。拙政园转弯抹角，共有七百八十只角。每一个角隅都作了精美的艺术处理，从每一个角度去看它的布局，都可以看到它的匠心，传统艺术的匠心使人赞叹不已。

动听的苏州评弹，曾经在城里拥有一百零一个书场。拨动了人们心弦的细长尖尖的手指，拈抹、按捺着琵琶和弦子的丝弦。一支支醉人的曲调，便是从幽深的耳道飞入大脑的穹窿里而使人迷醉的。富于表情的语言、颜容与身段、手势，诉述并模拟人类社会的诸色世相。平凡的故事都引人入胜，甚至庸俗笑料底下还深藏着文采、机智以及淋漓的眼泪与愤慨。

有人说，苏昆的特征是柔、秀、婉、转。据说，一部县志里说过吴语的特征是清、新、柔、慢。又据说，府志里总结了苏州刺绣的特征是精、细、雅、洁。还不妨用《红楼梦》里总结绫罗绸缎那种苏州丝绸的特征：软、厚、轻、密。总之，苏州这最古老的历史名城，是可爱美丽的风景城市，是丝织城市，刺绣城市，园林城市，工艺美术城市，语言艺术城市，又是书画城市。

是的，它尤其是一座书画城市。博物馆正展出珍贵的藏画，惊人的书画的卷轴，那些卓越的艺术家的书法和绘画都悬挂在眼前了。苏州的画家可以从曹弗兴开始。书法家就是张旭了。历代都有名家高手。特别是仿古这种特技，是苏州的专擅。元明清代，全国画家大多数在江浙两省，在苏州尤为集中。于是中国画史上一个重要的画派，就在苏州形成。这个画派，包括沈周、文征明、唐寅、仇十洲，所谓明四家，还包括他们同时代的画家，多得如同满天星斗；以及后来的清六家，所谓大四王、吴、恽；以及后来的小四王；直到裕园画社，现代的二吴一冯，等等。迄于今日，岂止千百人著名于世。而且还有，是高手而湮没无闻者，不可计数，更不说小画家和女画家们了。

这书画艺术，便是这城市里面的丝织、刺绣、园林艺术、工艺美术乃至语言艺术的最集中反映和最高的表现了。这书画艺术传统，具有深厚的力量，以至吴门画派数百年代代相传，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既然传统已经形成，便没有多少的变化，也还是那样地繁荣昌盛，始终不衰。现在经营着苏州书画的，便是苏州书画社了。

这次我大吃一惊，走进民间艺术厂的一个美术车间。巨大而光亮的画室里，有老少男女几十位优秀的画工在里面绘画；或山水、或花鸟、或人物。我一共访问了四个这样的大车间。后来进入一间由更加成熟的画家使用的画室，里面有十多个画家在进行这种吴门派的艺术创作。然后我进入了装裱车间。那些创作的以及仿古的美术品，在这里被装裱成为一幅幅光彩夺目的书画、卷轴。就是残破得不像样子的古画，经过这里装裱，竟然仿佛是幽灵再生了青春，腐朽也重显了光辉。这些书画将要悬挂在客室、厅堂、博物馆和艺术之宫，并远渡重洋走向全球，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赏。

从著名画家谢孝思和苏州书画社负责人张瑞林那儿，我了解到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地区这样多书画家和这样多的作品曾起过这样大的影响。吴门派的画风之兴盛，在画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四人帮”那样地荼毒和摧残苏州这个城市，这个城市还保持了它的多方面的传统，其中书画传统不久便将显出它的新的风格和新的色彩。

当前著名的画家是张辛稼、吴木、许十明；著名的书法家是费新我等。六十岁时，费的右手腕不幸得了骨结核症。对于一个书法家也是画家的人来说，不能使用右手是何等的痛苦呵！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换用左手捉笔，经一段时间的苦练，就恢复了、更发扬了他的书法艺术，由拙而巧，大巧若拙，越写越好。现在他题署落款，就用“新我左笔”字样。

大体上计算一下，苏州现有较优秀书画家四五十人，画工二百余人，美工三四百人，还有业余美术工作者和业余书画家五百人上下。这座书画之城拥有一支千人以上的书画队伍，就全国来说，也是少有的强大的队伍。

问题只在于传统限制了发展，传统反过来使这座城市渐进缓慢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还是没有怎么改变了这个城市的传统面貌。但传统可是发展的雄厚的根基。这样的日子已经逼上前来来了，这个城市将要发生突变。在朝阳织锦厂里，那种特别高雅的宋锦的艺术产品，正在被从意大利引进的相形之下有些粗俗的天鹅绒挂毯所替代。旅游事业家正在建筑一座水上莲花中的九重楼饭店。而美国的一座园林里，正在仿造苏州网师园里的一个大厅和它的周围山水。苏州刺绣研究所的老画家徐绍青所画的《万里长江》图卷，已开始刺绣，长江南津关口的葛洲坝水利枢纽成了这幅十五米长卷的刺绣精品的中心。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大举进军的日子，苏州再不能用传统的方式来缓慢前进了。渐进势必转化为突变！

但现在，苏州已经是一个被污染了的天堂。钢厂浓烟滚滚，吹向半座城市；另一半便由硫酸厂化工厂等厂担任。大概造纸厂认为寒山寺外的枫桥流水是应当由它负责来污染的了。三十六鸳鸯馆前的明镜似的湖水，天天有个厂子覆盖它的雾一样地降落的水泥粉末。一切工厂，如果不能自觉地迅速解决它们的三废问题，迟早要被国务院下令停止生产。抒情散文只不过是柔和的劝告而已。突变还没有到来，问题已经显出来了。问题当然可以解决，突变也是一定要到来的！

苏州应当是一个用每秒千万次的电子计算机来作为中心的全国丝织业和刺绣业的中心城市。当初是苏州织造和民间手工业工场的经济基础培育了这吴门派，而吴门派又是服务于丝织手工业工场而提高发展的意识形态的艺术，今天的苏州书画更应当依附于现代化的丝织、刺绣工业，促进它的产品的美学上的价值，使这些产品成为明日人类最喜爱的锦缎与刺绣艺术。那末，苏州书画，吴门派的传统和一切其他苏州的传统艺术，还是有灿烂的光辉的

前景的。

建筑的新装点

琵亚特丽斯·喀莎台苏斯，巴黎艺术学院师范系造型艺术教授，应文化部邀请，来我国讲学。她在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讲了课，介绍了法国现代雕塑的新流派，并打开了幻灯机，放映了一些雕塑作品。她首先介绍马赛尔·梵·蒂埃伦，一位动态雕塑家，放映了一些运动的雕塑，并对之赞扬备至。讲课完毕，湖艺学生给她看一本书，《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她惊讶地发现，这本书里，印刷着梵·蒂埃伦的两幅巨型运动雕塑，并有两幅运动的雕塑示意图。

1979年我到法国访问时，在巴黎见过梵·蒂埃伦先生，参观过他的工作室，看到过这些运动的雕塑。回来写书就写了它，并附上图片插页。现在，喀莎台苏斯教授了解到我也在武汉，便希望和我见面。

第二天她要和湖北省一些雕塑家座谈。我也被邀请去参加。我们见面交谈时，谈到我们共同的朋友拉兰·梵·蒂埃伦夫人和著名画家赵无极，大家很高兴。座谈开始以后，喀莎台苏斯教授在言谈中，一再地强调，说了许多道理，说一个艺术家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的独创性。而没有自己独特的创造的艺术竟不得称为艺术家，只不过是复制品的制作者而已。我很赞成她的话。我国把文学家称为作家，也就是这个意思。作家要创造，不能说已经说过的话。他的创作必须言人之所未言。艾略特称庞特为 Fabbro，即创作者，也就是这个意思。作家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创造出前所未有，前所未见的作品。这个工作是完全不同于大工业的成批地生产大量的同样产品的。

来访的教授谈到她自己，在受了正规的艺术教育之后，曾苦心孤诣地寻求她自己的艺术语言，步上她自己的创造性的艺术道路。她并认为艺术教育就应当时时刻刻地让学生意识到他不能模仿，他不搞复制，他必须创造，他必须创新。这位教授经过了不断的探求，逐渐趋向于建筑的外部 and 内部的艺术装饰。她已经创造出在建筑物的壁上的网点的分布来表现人物形象的手段。她在建筑物墙壁上，以无数的孔眼，描塑出人物来，也是壁画，但都是一种从未见到过的独创性的壁画。

她给我看了她的作品。她那些作品其大无比，当然不能随身携带了。她只是从皮包里拿出一些照片来。

其中一幅是拍摄了法国的达斯喀新村的，风中玫瑰剧院，外墙的大壁画的照片，题目叫《娜嘉的微笑》，1979年建成，确是很有特色的建筑物装点。

另一幅是在多哥这西非洲国家的首都洛美的西非发展银行的建筑物外墙大壁画的照片，题目叫《黑色的面具》，1980年建成，拍摄于落成典礼的庆祝会上，这幅照片和壁画都很精采，很有味。

另两幅照片拍摄了法国巴黎国防馆的四季厅周围壁上的《影星装点像》。这是她1981年的作品。装点着室内墙壁的，其中一幅有卓别麟的形象，那壁画是很容易认出来的，但他对面那一对情人就认不出来。还有一幅那位女明星我也没认出来是谁，因我多年没看外国电影了。

这幅《电影明星装点像》，原文的 Point de mire，意思是“打靶点”。怎么译法？想到了毛泽东的几句诗：“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觉得很有意思。也许这位教授读过这首诗吧，也很可能不曾读过。顺便说一句，（有女明星的一幅）图上的黑影女士就是这位教授自己，很有创造精神和风度。

她在北京也和美术界名流有接触。一位女画家告诉过我，教授送了她很多图片，大约比送给我的要多。我认为我们的女画家也会作文介绍她的。然而没有。故借我非常喜欢的建筑刊物的篇幅，刊此短文，主要是请读者看一看照片。艺术应当交流，相互诱导，彼此启发，方能繁荣。

唐小禾、程犁的壁画

30年代上半叶，油画家唐一禾从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学成回国。那时他已享有盛名，因此良友图书公司想给他出版一本画册。他辞谢说，现已回国，等新作多一些时，再考虑此事吧。然而那时候已国难当头，他所作的画是些抗日宣传的巨幅画了。等到武汉沦陷以后，哥哥唐义精和他将他们创办的武昌艺专，搬迁到了四川江津。1944年春天，哥儿俩去重庆开美术家的会。船到小南海附近，被泡漩水卷入江水狂澜中。一禾素擅游泳，本已出险；返身救兄，双双遇难。那年唐一禾仅有三十九岁。他有两个孩子，小的一个叫唐小禾，当时三岁。

小禾是出生在江津的。六岁时抗战胜利，他们回到武汉。本来也有一位美术家的母亲，逐渐放弃自己的艺术生涯，以尽力地抚养孩子们：长子学了理科，以后教书；小禾继承父志，学了美术，后来进入了湖北艺术学院。毕业后，在湖北美术院工作。家学渊源，画的都是巨幅的油画。

80年代初，与程犁合作长江葛洲坝水电工人群像，已见功力。因同时有武昌东湖宾馆宴会厅美饰任务，与程犁去到宜昌彩陶厂，创作了巨幅的陶版刻绘壁画，名《楚乐》，其高六点二米，其长十二点五米，其面积为六十五平方米。

它以随县出土，精美绝伦的，成套的铸铜编钟和玉石雕成的编磬，二十五弦的楚瑟和流苏羽葆飞扬的建鼓，以及丝、竹、匏、木俱全的大乐队，来作了中心主题。

而伴随着这些“楚乐”演奏者们的，则是这两位画家从战国的舞俑、玉雕和漆绘、画像石和画像砖中感受到的，幻想出的，隐隐约约显现出来的，飘动着长袖起舞的舞女们的五彩缤纷的舞蹈形象。当这些想象和图景显得越来越清晰时，表现它们的欲望就越来越强烈了。他们从1979年受命，历时三年，至1982年才完成。

这件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首次创作出来了在屈原《九歌》中描绘着的所谓“楚南郢之邑……其祀必使巫者作乐，歌舞以娱神”，特别是《礼魂》的“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夸女倡兮容与”的歌声交响，舞姿飞翔的场景。我古代文化生活和楚国音乐舞蹈的形象已被他们发掘出来，开拓出来。这立刻成了一块新的艺术创造园地。随之出来了一些舞、美、音乐的新作品，将来还必然会继续得到开发，发扬光大，成为一种独特的楚文化的艺术风格的。《楚乐》获得了内地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现陈列在武昌东湖宾馆宴会厅的主厅中。

程犁，女，油画家，也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是唐小禾的同班同学，他们结婚后的所有作品大都是两人合作的。他们功力相埒，虽气质并不完全相同。小禾偏重于理性，程犁更富于感情。有人说，小禾善于结构构思，程犁著力于色彩形象，但从他们作品上的表现与其效果来看，可以说他们是融洽一致，轩轻不分的；既合乎并协之原理，遂相得而益彰了。

《楚乐》完成以后，两人还曾以两湖民间舞蹈，长阳县之“跳丧”舞以及湘西“甩手”舞为题材，作相互对称之壁画两幅。本是某剧院订制的，但作而未果。两幅画的风格粗犷，力度强劲，几乎可以说“跳丧”就是《国殇》再现，“甩手”近乎“展诗兮会舞，灵之来兮蔽日”的群舞，都反映了我国南方山区的兄弟民族的初民精神，将憨厚而热烈地酣舞着的情趣，在画面上

表现得分外淋漓尽致，而气氛氤籍，有豪迈雄浑之感。

两幅画并未上墙，作为油画作品展出时，受到了内地文艺界的一致好评。

1986年，小禾、程犁去了江陵，在新建江陵博物馆大厅墙上，铺盖上去一幅大壁画：《火中的凤凰》。有一位卓越的散文家程明静，写有《荆州思古》一文，深得我心。她远居海外，归国旅游。在江陵博物馆她见到古尸如何“双目空洞地微阖，无言无声，在我一霎凝眉中，诉说了两千多年的兴亡、盛衰和荣辱。”使她想到了楚成王建渚宫于江边，如何财富奢华，有诗为证：“飞楼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越千娥眉。”又联想起《哀郢》的“民离散而相失兮”以及关羽所筑的荆州古城，悲凉地谈到一切将“绝灭于无形”。如果她能看到这幅壁画，我想也许她就会反悲为喜。因历史应是无限数的死亡与新生的往还与上升，就像这画里所表现的，极乐无量的情绪，深沉饱满的信心。

这《火中的凤凰》越两年而成，画的时间较长。有的评论家指出，很显然是因为他们正在探索一种新的表现，在尝试一个新的表现方法的缘故，而他们的试探是出色地成功了。

《火中的凤凰》长三十米，宽三点六米，面积九十平方米，自1986年五月开始构思，至次年年底创作完成，1988年初新馆落成展出。这大壁画放在门厅，使人一进入博物馆便产生了身在楚国古都氛围中的感觉。红、黑、青、银、金的主要色素画出凤凰的“自在、自为、自由”的三个阶段。自在的凤凰是一对乐园鸟，自为的凤凰是三只集香木以自焚的献身者，从火焰中飞出来的永生的凤凰，是自由的女神。它们占据了门厅的三面大墙。上面是星空，下面是红色的地毯。

自从郭沫若歌唱了《凤凰涅槃》以后，中国也就有了文艺复兴的运动。怀着全部的希望，我们终究将要创造出一个最新的文明社会来。它肯定是从烈火中再生的凤凰。我们是一个龙凤之国。黄河流域以威严的龙的图腾；而长江流域却以凤凰为神圣的象征。前者给人以沉重的压力，后者轻扬而远举。前者寥廓而苍凉，后者富饶而又华丽。前者使世人感到古老的郁闷与惶惑，后者给宇宙于清新与流畅的欢乐。

《火中的凤凰》壁画中的凤凰，昂扬地经受了苦难，而取得了胜利。这是一幅用传统磨漆工艺画成的壁画。画家们付出了他们的心血，制作成功了这一件灿烂的，辉煌的作品。

正在制作着“凤凰”之时，北京传来电召他们前去商谈一项援外任务的讯息。现在要说到50年代中叶，周恩来总理曾与埃及国家领导人纳赛尔谈到：由我国以无息贷款来援助他们建设在开罗的国际会议中心大厅的计划。事情虽在那时已经谈妥，不幸纳赛尔去世了。这事拖到了80年代末，才办成功。

会议大厅的设计由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承担。总建筑师是魏敦山先生。埃及方面组成了审核设计的委员会。经过双方的研究，埃方接受了我方提出的建筑方案。所设计的共有三个会议厅，一个二千五百人的厅，一个八百人的厅和一个六百人的厅，一共三个厅。施工单位也是由上海派遣去的。

这个设计中有两幅壁画。展览大厅走廊上方，要一套共十五幅的壁画，全长一百五十四米。二千五百人的会议厅前，再要有一套二十八米长的壁画。此外，还要有一件较大的雕塑作品。

这三件作品要由北京和武汉的美术家提出方案，由埃及组成评选委员会

作出选择决定，然后经过制作，最后陈列出来。但当时唐小禾还离不开江陵的壁画，只好由程犁去北京开会，了解情况，研究方案，查阅埃及资料，来完成展览大厅壁画的构思和作出初步设计图样。

1987年5月，中国艺术家带了他们各自的方案赴埃接头，这次是唐小禾带着与程犁合画的展览厅壁画方案去到开罗的，那时建筑工程业已开工。但程犁还得留在国内，坚持磨漆壁画的制作，直到它的完成，装上博物馆的墙。

中国艺术家在开罗，参观了尼罗河、金字塔和狮身人首怪兽，沿河访问了所谓百宫之国的王都底比斯，即现名卢克索的古城，看了卡那克神宫、曼侬巨雕、后妃谷、女王庙、死亡之城等等后，再回到开罗。

然后，唐小禾向埃及提出指定要他来提供的，展览大厅的长一百五十四米壁画的设想，主要是程犁执笔的，即用十五幅埃及风格的大理石镶嵌壁画，每一幅长十二点五米，宽六点二米，总面积为四百二十二平方米的美术方案。

埃及方面为大厦的这三件艺术品的审定工作组成了一个艺术委员会。这些埃及最著名的艺术家，在会议上，通过了唐小禾程犁设计的壁画的方案。但是，并非他们提出的那个二千五百人会议厅的壁画方案却没有被埃及的美术作品评审委员会所接受。他们要求中国的艺术家提供新的方案。

考虑到了埃及方面提出的设想，唐小禾构思了另一个巨型的二十八米长的，分为五个画面的《七千年埃及文明史》胶彩（阿克列克）油画，面积八十四平方米，并立即画出了草图，埃及方面欣然接受了这个新方案。

为了制作展览大厅的大理石镶嵌画，从1987年到1988年，他们在广东云浮，从挑选大理石的原材料，到画出图件，并进行一个一个的细部制作，到最后拼装、铆焊固定，然后装进集装箱，十五幅画一共装了三十二吨的集装箱。箱子起运，人再起程。这次程犁也去了。到了开罗工地，开箱、上墙，这整个过程都得由艺术家们自己一丝不苟，紧紧扣住，最后总算完好无损地安装完毕，大功告成了。

这巨大的大理石壁画，从右边的：一、起始；二、友谊；三、日；四、和平；五、河；六、对话；七、金字塔；八、交流；九、河；十、博爱；十一、河；十二、母子；十三、月；十四、艺术；十五、终止，于宴会厅左边的门口。都是以白色大理石作底，以红色大理石作图形，由广东云浮大理石工艺总厂，制作出一共九百零五块大理石板，再行拼装，而后完成的。

它的艺术风格是严谨的埃及民族传统的。它的思想境界是崇高的，情感是健康、真挚、热烈的。自然风光更是雄浑而优美。它的理想就是真善美。它是对于人类的事业充满了信心的。壁画和国际会议中心的精神是协调一致的，它是诚心诚意地服务于整个建筑物的目标的作品。

大理石的交道打完了，接着便是胶彩油画《七千年埃及文化史》，是由他俩和一助手来完成的。三位艺术家再次作了参观旅行，看了开罗的吉札、孟菲斯的埃及古王国，看了卢克索神庙，卡纳克阿蒙神庙，帝王谷、王后谷、女王陵，还到了阿斯旺大坝，尤其难得的是看了阿布·辛贝勒的拉美西斯二世大庙，尼弗里塔里小庙和从水中搬迁到水库中的岛上的菲勒神庙。这一切，实是为了完成这下一个任务所必不可少的营养品。

大会议厅的这一幅壁画是用丙烯（阿克列克）颜料和中国特有的沥粉原料来画出的。与大理石壁画自右至左相反，这历史画要从左往右看去。会议大厅的左门之左有一块墙，画了一个埃及少女，站在绿树之前，一水罐在她

赤足旁边，是为序曲。过了她是会议厅的左门，门楣上画了一个太阳，是埃及的古代传说中的太阳。

然后是古埃及的法老王时期：尼罗河在奔流着；金字塔高耸入云。法老王后端坐；侍女站在背后，似与序曲的少女隔门遥遥相对。王后的身段有一种透明度，她的线条显出她的人体的无比完美。她们站在一对巍峨的宫殿石柱前；两个女奴隶就在她们的后面；还有三头牛跟着这两个女奴隶。一对陶立克式的大理石柱隔开了纪元前约为 30 个世纪的法老王朝时期，进入了这个约起于纪元前 6 世纪的希腊罗马时期。

在这希腊的陶立克大柱子下，有一对希腊贵族的夫妇形象，以象征亚历山大帝东征，带到奔流的尼罗河的岸上来的希腊的文明。紧跟着是罗马基督教时期，画中出现圣母玛丽亚怀中抱着的耶稣，他义父蹲在旁，以开罗的保存至今的一座天主教堂作为他们的背景。

画面再右移，到公元 6 世纪开始的阿拉伯时期，尼罗河又奔流进入了伊斯兰教的历史和风景。骑在两匹白马上威严的王子和飘扬起蓝色头巾，美丽的王妃，成双地驰骋在大清真寺的高大穹窿下；另外是两个贫寒的妇女，一个头顶着水壶，一个头顶着一盘子的馕，一头老绵羊驯服地站在一旁。而源长流远的尼罗河依然这么奔流，过了 12 个世纪，才迎来高层建筑下的，新的工业发达的现时代。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手鼓响起来，一个婚礼正要举行。新郎穿着西式礼服，结着领带；新娘穿着雪白的衣裙，长纱曳地。烛火在燃烧，玫瑰正盛开。尼罗河上的月光照耀在右门的上方。那边又有一户人家，在会议厅右门的右侧，父母的他们和一个正在学步的小孩，蹒跚地向着我们走上来。

生生不息，生命永恒，七千年埃及文明史，可以作证！

何等的简洁而热情的表现手法！

这丙烯沥粉壁画所用的沥粉，是我国的特产，国外从未见过的。用一支牙膏似的管子挤出来的沥粉，土名就叫“老粉”，在画上留下一条条隆起着的线，但埃及艺术家看了，喜欢得不肯让画家们再敷上颜色去，然而敷上了颜色自然是更加的美了。

上海的建筑家们后来说，就是这两幅壁画，提高了他们的建筑物的档次。自然，这座建筑也为这两幅画提供了最好的美术环境。

唐小禾和程犁是在十年内战的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便是这开放、改革的十年也并没有给了多少良好的条件。然而他们却作出了一些幅探索性的壁画来，可贵的是他们所有的试探，都闯进到创造性的天地中去。玛耶可夫斯基唱过“向左！向左！”的诗句，我看不如唱“向上！向上！”的诗句更好些吧。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征服引力，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征服万有引力的。画家们早就能做到这一点了，他们是一直在引领我们向上升腾的！

观画小记

——初读《中国名画鉴赏辞典》

友人寄来图书一巨帙，有 1255 页的《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书名题签：刘海粟。编委会主编：伍蠡甫，副主编：邵洛羊，及委员 22 人。图文并茂，琳琅满目，荡魂驰目，美不胜收。粗粗翻过第一遍，花了好些天时间。连一幅画、一篇鉴赏文章还未能细阅、细读，总算从第一页翻到了 1255 页，已经把我累得气喘不置了。但整个情绪却非凡喜悦，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这样浩大的工程，发起、规划、设计、施工，直到建成，精装出书，这本身就使大家高兴。

主其事者，是伍蠡甫老先生。卷首，有他一篇《中国名画遗产再认识》（代序）。此文分六大段，一上来就说得明白，他愿这本书变成一座桥梁，给我们的欣赏者：一，能够进入到创作者的内心世界去；二，捉摸到中国绘画的“以形写神，形具神生”这一特征的所谓“神”；三，分别地体会到中国绘画的“人物、花卉、山水”三种艺术形式之“美”与“新”；四，感受到主体精神与形式创造在“文人画”中的统一……可惜伍蠡甫老先生未能看到这本巨帙出版，就去世了。

我平素喜欢写一些出格的文字，但这篇《观画小记》却不敢出格，想写得规矩一点，甚怕一出格不知会扯到哪里去。所以，按这部《鉴赏》的办法，中国绘画就从新石器时代说起。原始人的眼睛最初看到并画出图纹的，原来是蛙纹和鸟纹之类，那些艺术之萌芽。从蛙纹到人面蛙纹、鱼纹、猪纹、稻穗纹，再一飞跃，就进入到舞蹈图、祭牛图、狩猎图，终于我们看到了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画《龙凤人物图》。把这帛画当作一件有着现代象征派艺术形式的作品不是不可以，其中的寓意却不容易考据出来的。它本身就已经是一幅非常完整的杰作了。

再后来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就是什么人物、事件、实物都画上去，什么都刻（成浮雕）、呈现在砖上面，既有神话传说，又有历史场景，许多想不到的东西都有。再后来到了敦煌壁画，在那么多的洞窟中，人物、花鸟、山水俱全，只是从此以后，人物反而渐渐地少起来，而山水却在中古时代的卷轴画中逐渐成了主要绘画主题。到渐近于近代，文人画乃成为中国画的主要特征。

因为历史的原因，人民生活多灾多难，正直的艺术家纷纷退隐，来逃避灾难、祸患，寄情于山水之中，溪涧之间，隐匿在世外桃源。实是一个悲剧，但亦不失为绘画之一福音，出了那么多大画家，往往也是大诗人，可以王维为代表。这些画和诗，一直传到今天。荆浩的《匡庐图》，关仝的《山溪待渡图》，还有李成、范宽之作。而黄筌的《芳淑春禽图》，解释词说它“右岸绿茵茵的草地上，斜斜长出两枝柳树……惠风和畅，柳条摇曳，一片春天气象。一只黄鹂展平双翅，在空中飞翔，欢快地向着翠柳鸣叫……”画美，陈炳先生鉴赏的文字亦很美。这些不容易看到的画幅，可以在这本巨帙中一看到，细细品味了。

伍蠡甫也有专文说画，如对董源的《寒林重汀图》，指出它之被推为“无上神品”、“天下第一”、“感情之奔放，笔墨之洒脱”，“乃长期经验之积累。或许是晚年之作吧”，可以说推崇备至了。这正是因为图，使文章生色了，而文章把握到景色和作者的心灵深处，也使鉴赏者格外添了兴味。

元明以来，“文人画”的大兴而起当然是好事，但又很可悲哀。一部“二十四”史，直至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差不多都一样，他们心灵寂寞，迫使他们向第二境界，乃至第三境界转移。但又矛盾重重。我看了王齐翰的《勘书图》中的图中图，有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戏中戏，很是喜欢，文人所欲，不过如此而已。我多么希望在我自己的背后，也能有这么三合一的大屏幕，上面画着美好的风景。我也特别喜欢石恪的《二祖调心图》，那是作者从一种奇异的视觉角度看到的，几乎有一点现代派的神韵，而所表现的却是精神的升华，完全无我的境界，或者说，进入了虚拟的空虚之中了。刘森评说：“水墨淋漓，一气呵成。深的地方，浓有光彩；淡的地方，淡有韵味。有笔有墨，笔墨交融。所作不受对象的约束，到了传神的高度。”他又说，或者有人会说它“粗俗”，是吗？我要说，至粗俗者至深厚耳。

接引我进入中国古画的友人宗典先生，他与甫正先生一起解析了北宋大画家巨然的《秋山问道图》。他们在综述了全图佳妙之处后，引用青原惟信禅师的一段有名的话：“三十年前老僧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既参禅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歇体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两位评论家接着说，“换而言之，便是因象悟意，疏沦向心的因缘了”（谨按，疏沦者，疏导之意也）。大约这便是伍蠡甫老先生在代序中讲到的，第五点的性格论和第六点的“灵府”、“心源”论了，不过，这是最难谈的，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一种艺术哲学的境界，或就是哲学的境界。鉴赏到中国绘画中的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这本巨帙《辞典》是企图传达这一微妙的，这也是它的可贵之处。这要有时间，要深思。现在，我刚看了这本书的极少一点点。只是手痒，先写下点点滴滴的心得，信手写来，略示欢忻之情而已。

庆祝《诗刊》二十五周年

—

《诗刊》创刊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在庆祝《诗刊》二十五周年的时候，不由的使我想起了它和整个新诗运动的悠长历程。在老诗人中，郭沫若已经去世了，叶圣陶却还健在呢。创刊于1922年1月，由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我国第一个新诗的刊物——《诗》，就是叶圣陶和刘延陵主编的，至今正好六十周年。我们在庆祝《诗刊》寿辰的时候，也应该向诗界所有的元老们祝贺长寿啊！

自新诗的发生和发展以来，诗刊之多，难以统计。在《诗刊》总第二期上，吴视同志化名吴腾，发表过一篇《五四以来的诗刊掠影》，列举了多种诗刊的名字，共四十九个之多。这却还不是全貌呢。其中多数诗刊只出了一期两期三期；能出满一年的就很了不起。大约解放前的诗刊，要算桂林的《诗创作》出得最长，一共出了十九期。可是，请看我们的《诗刊》，出到这一期已是“总一百五十二期”；其次该是四川的《星星》，也出到“总七十五期”，多么令人高兴呵！

我们庆祝的这个《诗刊》，确实是六十年来所有的新诗刊物的传统的继承者和创新的集大成者。

我们的庆祝，也当应是所有诗刊和全体诗人的共同的庆祝。

庆新诗繁荣！祝《诗刊》长寿

二

1956年之秋，远游回京后，正写作时，诗人郭小川来通知我，中国作协已作出决定，出版《诗刊》，让我协助主编臧克家。先我有点不愿意编刊物，被方殷同志责备了一顿。后来就听命了，于是着手进行编辑工作。在这之前的《诗刊》创刊的酝酿过程我是不太知道的。我的追忆只能起于接手后的第一件事。

那第一件事就是开始考虑了，要想方设法了，如何能在新《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我们一位大诗人的作品——毛泽东诗词。那个时候，毛泽东诗词尚未正式发表，只是已流传甚广。我个人也曾竭力寻访抄录，只抄到八首而已。传抄总难免抄错，个别字句就难详其原意了。多么想把八首诗词发表出来，以光篇幅！这件事，主编克家和别的编委们都赞成，但说恐怕做不到，怎知主席肯不肯将他的诗词正式发表？我也知道争取他的同意不是那么容易，但至少我们可以试一试，写一封信征求他的同意。不过这封信一定要写得非常好，还得有点儿巧思。它可是不同于一般的书信啊！

先秦文学和《史记》、《汉书》一类史书中，都记载有一些大政治家、战略家、纵横家往往在面对重大疑难问题时，仅仅用一句话就干净利落，彻底解决了复杂的矛盾，令人击节赞赏。要把这个意思说明白些，得举一个例子。请容许我罗嗦一点。

例如齐桓公举兵伐鲁，鲁庄公不敢应战，请求谈判结盟，托称他是小国，会谈时不敢带剑。桓公同意了，说谈判时他也不带兵去。他的智囊管仲说不

可，因对方有个曹刿，此人是订立了盟约也约束不住他的。桓公不听，自去会盟。哪知一登会谈的高坛，庄公挥剑就威胁桓公。管仲上前保驾，曹刿拔剑将他拦住。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管仲只对桓公说了一句话：“君与地，以汶为竟。”就是说，“你给他点土地吧，以汶水为两国的边境好了。”桓公听到，即表同意，对方可就满意了。他们就平安无事了，会盟也就成功了。这件事，写在《管子·大匡篇》里。

只是这样一句话，七个字，合理地解决了对抗性矛盾。决斗流血转化为祝酒干杯，这一类的事情是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的。史书上记载着很多这一类的一句话的故事。那末，我们能不能也给我们当前这个已经设定的矛盾作一番研究，求出一句话来，一说出便可以说服毛主席，使他欣然同意，把他的诗词交给我们《诗刊》发表呢？

吕剑和我跟好些同志商量过，讨论过。我们日思夜忖，却想不出什么好的点子。

1956年底，预定于1957年1月25日创刊的《诗刊》第一期都已经发稿了，这“一句话”还没有想出来，信也没有写出来。我岁末驱车到北京大学燕南园去拜访诗人冯至，说着谈着，谈到了毛泽东诗词，如《沁园春·长沙》中，据我们从萧三同志的一本书里抄到的，有这样的诗句：“张寥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个“张寥阁”，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很可能是传抄有误，却无法给它改正错字。冯至说，“毛主席诗词早已广泛流传，连国外都有了多种文字的翻译。却有这样显然的传抄错误，真是遗憾！其实呢，与其听任错字流传，倒不如请毛主席发表一个定本，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他说到这里，我大声喝彩了。这一句话找到了。这一句话好极了。

那天我回到编辑部，便兴冲冲起草了一封信，就用冯至这句话，附加了截稿日期和出版日期，请毛主席尽早赐稿。信写成了，臧克家同志写得一笔好字，恭正地挥笔便写。正好那天编委们都在，全体签上了名。信就发出去了。

于是一天天的等候回音，望眼欲穿，却似乎很少希望。信一寄出，石沉大海似的，音讯杳无。等到截稿日期也已过去，没有望了。

1957年1月12日，中午，忽然间，从国务院一连打来了三个电话，要臧克家同志到诗刊社里等着，说是有一封信，要交给他本人。信来了，半个小时后，毛主席的信和诗稿真的寄来了。“漫卷诗书喜欲狂”，他一次就给了我们一十八首旧体诗词，比原来捎去的八首还多了十首。

在毛主席的书筒里，他写着：“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这一句话证明是灵了，他真照我们的意见办了！正是一句美妙的话“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十四个字，打动毛主席了。

而那个“张寥阁”，弄清楚了，并不是哪一个姓张的人，也不是哪一座亭台楼阁，原来是“怅寥廓”，错字终于得到了改正。

这件事立刻轰动了。刘白羽同志闻讯赶来，要看诗和信。他高度赞扬，说“诗人和诗人之间有共同语言。”他立刻和文化部一位部长助理打电话，因为出版局当时认为《诗刊》是不会有销路的，只批给了五千册印数的纸张。部长助理闻讯，也要看诗和信。出版局的控制数字就一下子提高了，

给了印数五万册的纸张，并答应如果还供应不上，那可以再版。大家高兴地说，从来没有刊物能像《诗刊》的幸福，也许它一出就轰动了世界！

果然我们过了几天的轰隆隆的日子。新华社发消息；《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都转载《诗刊》上的诗词；王府井大街上的杂志门市部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买一本刊物而排起了这样长的长队，编辑部收到的来信堆如山积，都是各地买不到刊物的读者写来的信和汇来的款。后来果然再版了一次，又加印了五千。

毛泽东诗词的影响巨大，诚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了。不久我们就收到国外寄来的许多报刊上的各种文字的翻译诗词。

在他的信里，毛主席明确地支持我们——新诗的事业，他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但是，自从毛主席诗词发表后，旧诗渐渐多起来了，并且也神气起来了。各地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旧诗，甚至有些新诗诗人也写起旧诗来，青年人也竞相仿效。对此，毛主席早有预见，还郑重地提出过警告。他担心的是“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什么叫“谬种流传”？《辞海》新版本解答：“谓荒谬错误的种子流传下去。”这至少是值得注意一下的。现在的旧诗也有好的，毕竟不多。毛主席说了，“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诗刊》真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之下成长的，“《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它果然成长了，发展了。《诗刊》二十五周年了。风华正茂，愿共勉之。

一些往事的回忆

“文通”朋友们：

向你们问好！说起来这已是四、五十年前的往事了。弹指一瞬之间，又将成为五、六十年前的事。五十年前，1937年春，望舒正和路易士和我一道，在上海办《新诗》月刊，到了夏天，七月芦沟桥，八月黄浦江，战争起来，《新诗》停刊。秋天，我们一口气撤出了几道防线，上海成了孤岛，南京失守，大片土地沦陷。三八年元旦，我从上海郊区，所谓“越界筑路”的中国地界，紧张万分地搬家，因为日军随时可能进驻。三月底我搬到亨利路（现东湖路）一栋房子里，叶灵凤住三楼，戴望舒住二楼，我住楼下。五月，望舒和我乘轮船到了香港，都住在西环太白台和桃李台。后来灵凤也去了那岛上。我在香港住了三年七个多月。其间四年二月曾去桂林一个月，十月去重庆，住了八个月，到四一年的五月才又回到香港，住到太平洋战争起来，香港沦陷。我在四二年元月离开它，作为难民，春节过后才到了肇庆，方始脱险。我经过桂林到了重庆，住到抗战胜利。最后又返回上海，是1946年3月的事。一个个的螺旋圈，于今也有四十年左右的盈虚之数了。

可以回忆的往事实在太多了。而被遗忘的事迹比之被记得的还更多得多。你们在编一本《历史的轨迹》的纪念书，进行了广泛的联谊，多次给我来了信，帮助我从尘土中挖出一点一滴的被埋葬着的形象、声音和感情。我奇怪，我怎么能忘记了这么多的事迹呢？当时我确实和你们的许多同志有过热情的往来，但经过了这几多年，大约因我已经进入了衰老的岁月，而身上的重荷却没有减少，更有增添。文债欠得太多了，我已经还不起，也还不清了，徒呼负负了。

是的，我曾在重庆的观音岩下，红球坝上，一座茅屋中住过。因为我住在那里了，我的隔壁，只隔薄薄一层上点泥的芦苇，便住进了一个专门监视我的特务，真糟糕！是的，在那茅屋里，我曾为“文通”的蔡郁林同志的墓碑题字，但关于他的事，只是因为你们提起了，我才想起这个来，其他事却都想不起来了。好不容易，我想起了两人，何忆华和徐歌，后来他们都改了名字的。时而忽然又想起了许多个名字，一忽儿却又忘了，并再也想不起来。“文革”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的，可以一个个人和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彭耀芬给了我一个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那时我从沦陷后的香港跑出来，跑到了澳门。彭耀芬也在那里，看到我那样的十分狼狈，尽管他自己也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有一天深夜，他挤在人群中，等到天亮，为我买到了两个热呼呼的澳门面包，那是很有名气的所谓 Macao Bum。然后跑到我的住处，把它们塞到我手上，我觉到了那面包还很热烫，味道真是鲜美。此外，很惭愧，我便没有别的记忆了。不过，我们之间曾有感情，是真有感情的。

冯亦代同志给我来信，要我赶紧写一些回忆寄到编者那里。你们给我的信和电报都收到了。我想写，但没有写出来。这次亦代信上说，“务请你拨冗一办，以慰‘文通’友人对你的感念之诚，至要！”我却只能写这么一封信了。如以为可，就把它收入你们已为我预留了版面的纪念文集中去。实在对不起你们的“感念之情”了。

我可能再掘挖得深一点，我就要将所得写成文章。亦代所要求于我的“拨冗一办”，现在我已做到。此刻我桌上正放着一个电报，要我明天“务必到京参加××会”。这虽然也是一个“务必”，我还不能够去呢。而冯亦代的

这个“务必”，总算照办了，虽然办得不太象样。

来个光明尾巴吧，我一定要把往事回忆，像马塞尔·普霍斯特的《索取失去的时间》那样地写出点来。我虽然忘记得很多，但除了我忘不了这个值得留念的集体，还有许多忘不掉的揪心的事体。那时我们在香港还是干得不赖的哪！

1987年3月8日

四十多年前的两篇小文章

一位真诚的老友，为我操了心，雨夜来访，给我看42年前的我自己的两篇署名文章，发表在1946年8月1日和8月8日上海《文汇报》上的复印件。一篇是很久以来就想寻找它而还没寻到的，却得来全不费功夫；另一篇却早已忘记了，读后更感慨系之。

8月1日的上海《文汇报》第七版，文艺半周刊“世纪风”里，发表有郭沫若的《南京印象》，茅盾译的《团的儿子》连载，袁水拍追悼陶行知先生的《他是一条辛勤的牛》和我的一篇散文，题名《谁先恐惧？》

我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3月底从重庆回到上海的。4月，我代表陈松，我的妻子，到吴江县城看我们的外祖母，因我妻子已怀孕八个月，不敢让她出门挤车子了。我坐火车到苏州，换乘公路车到吴江县城，看到那时已有七十五岁高龄的外祖母。抗战以来，和她分别快有九年了，不必说那见面时如何的喜欢了。到了那天夜晚，“早睡的县城已经睡下了。”我也上了床，读着司汤达的一本长篇名著《巴马修道院》。读它时，被它所描写的残酷宫廷的阴谋斗争，一页页地，引导到一个惶惑的境界中，以致思潮起伏了。我这样写着：

“我承认我有无名的恐惧。这完全是司汤达引起来的。据表弟说，最近县政府得到了情报，说是新四军有一团之众，秘密开来。这两天风声紧……”我觉得我探亲探得不是时候。文章中说到：

“我常常不知检点，说话写文章都太直率。就拿本文来说，为什么不叫《还乡散记》，偏要用什么《谁先恐惧》这种刺激性的题目呢？”

正在我有点神经紧张之时，忽闻有千军万马之声，“老朽的屋子为之震动”。原来是白天太热，夜间来了一场暴风雨，可把我吓了一跳。然后自己也不禁失笑了，我继续看我的书。可是就在这风雨之夜，传来了砰砰的敲大门声。表弟奔下楼去开门，拥进来一批荷枪实弹的军人，提着风雨灯，东照西照，高头照，低处照，害得我心惊之至。可是外祖母镇静地关照我：“勿关你的事，这里查户口。”而当大兵来到我床前时，外祖母又向一个彪形大汉说：“我们的亲戚。”等等。而他们竟然不屑一顾的看也不看我。这时，外婆全家大小孩子和同一屋顶下的几家人家男女老少全都来了，按照户口再被点了名。“一忽儿，所有的人又都消失不见，只地板上还留下许多野兽似的湿脚印。”

为此我说我苦苦地思索，而“认识了一个小真理”，如下述：

“这战后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统治者，是害怕人民，是有所恐惧的。”

“他们有所恐惧，你百般解释也不能使他们释然于怀。有所恐惧，乃有所对策。有所对策，人民就半夜里披衣起床，惶惑不安。人民越惶惑，统治者的对策就不能不更严密。人民就更惊骇，而雪球越滚越大了。”

接下我问：人民的恐惧和统治者的恐惧，两者相比，谁先恐惧？我的回答是：

“一律的，全世界人民的恐惧是产生于统治者的先恐惧的。”

文章没有点明这“统治者”说的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过，当时谁也明白说的是这一个只想挑起内战，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府。但虽然它穷凶极恶，其实是有所恐惧，并为恐惧的人民怕它，它更害怕人民。谁先恐惧？它先恐惧！过去了42年了，我又读到这篇文章，不禁为自己当时的大

胆捏了一把汗。然而却也很愉快了，因为在当年国统区内，我敢在宣铁吾的鼻子底下说这些，毕竟做到了无所畏惧，对残暴的敌人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文字斗争。

继8月1日这篇文章之后，到8月8日又在“世纪风”上发了一篇《必须给人民以希望》。它提出：

“我要求报纸必须给人民希望，我也同样要求文艺作品如此。”

我说到：甚至在对日作战处于不利状况之时，中国也还是很有光明的。大家要求把开始在降落的黑暗的暴露，摆在第一位。那意思，就是要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种种黑暗和重重的黑幕了。接下来说，而现在（指的还是1946年的下半年）情形已经不同，现在（1946年）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抗战时期全民的希望扑了一个空。”我说，“我们似乎跌下了万丈深渊。黑暗到连一粒星光也看不见了。能看到的只是几颗民主巨星的殒落（按：指李公朴、闻一多和陶行知先生等）。”

但我立即指出：“我们的人民不能每天读黑暗的新闻。本质上一定存在着中国光明面，问题是我们记者怎样深入采访光明，能够发出光明的音讯，希望的音讯。”

虽然我没有点明，但谁都知道我说的中国的光明已存在着了，说的是它存在于延安，于陕甘宁边区，于广大的二十来个解放区，从那里布发出来了光明的音讯、希望的音讯。它们也存在于国统区内的先进工人和农民，以及民主党派和广大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那里。

8月8日那篇文章的结论是：“大家有一颗心，一起来把中国的希望具体地写出来。文艺与报纸必须给人民以希望。人民才能在这种艰难险恶（的环境）中挺下去！干下去（在）赢得和平、赢得进步之前，我们必须赢得自信，赢得希望。”这是非常古老的老文章了。在《文汇报》庆祝它的诞辰50周年之际，回想当年它发表这样的文章，让我慷慨陈辞，我因此感到无比欣慰。祝《文汇报》健壮！祝《文汇报》老当益壮！祝《文汇报》长寿！祝《文汇报》同人安康！难忘四十年的交往1949年6月，我从江南小镇来到北京。不几日就看到了《人民日报》。这以后它成了我每天必读的报纸。一转眼，它一天一天地出版了四十个年头，达到了它的“不惑”之年了。多么可喜！可贺！

四十年间，我这支秃笔是已从不会写，到渐渐会写得流畅一些，总算为这报纸的副刊写了不少的诗文。因而颇有兴趣地查点了一下。这多年为党撰写了一些什么，写了多少？查点之下，共得四十九篇，其中诗十一题十四首，文三十八题，似乎还有遗漏，尚待查清。所写的主要内容是在全国许多基本建设工地上的采访见闻。有几篇在署名之前，还挂上了“本报特约作家”的称号。在查点之中，想起了许多往事，使我怀有对副刊的感激之情，它又激起了我的浓郁的感慨。

余兴未尽，索性又查点了一下自1942—1946年的重庆《新华日报》。一共查到三十一篇，内容较多而广，笔墨似更流畅。1946年的1月2日，刊出我一篇文章，作为八年抗战的文学总结性论文《在泥沼中》。文中说到我们的文学大体可分为“应该写”的和“愿意写”的两大类。两者能完美统一的，不多。而各写各的，不少，则各有利弊云云。我借用了两位大作家的作品评介，说出了我自己内心的徬徨。

1949年夏在北京，捧着第一次文代会赠送的全套五十本《中国人民文艺

丛书》，读得又惊又喜。自惭形秽，觉得我必须收起自己的一套，努力学习，到工农兵群众中，哪怕生硬地楔入生活也好，暂时不能动笔了，不写作了。1951年初是在朝鲜志愿军总部和开城。1952年半年在广西的柳城县三个乡中土改。1953年一开始就到了鞍钢的三大工程工地。这样，经过了兵、农、工三次生活体验，有所积累，也明确了自己的方向。至1953年4月18日，才在本报第三版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学报道，写鞍钢第八号高炉建成，点火投产的《难忘的夜晚》。到钢城来向我组稿的是文艺部的周志，最初给我带路的人我还没有忘记。

往事历历，尽在记忆中。接着写了《汉水桥头》和《真迹》、《长江桥头》、《归来》，与方纪合写的《欢乐的“火把节”》、《三门峡序曲》。党报发表它们，极大地鼓励了我。当年我有志于做中国工业化的记者，基建工地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接连五年奔走在全国的工地上，对未来的蓝图已看得十分真切，对全国建设的一盘棋了如指掌。可惜中国作协要我编了一年诗刊，又下放我到葡萄园中去劳动了一年，后来又编了两年诗刊，然后将我左迁到湖北武汉。然而来到了长江大三峡的工程上，我却挂了一个空，等了二十多年也未等着。一连几年做的都是我不愿做的事，但又都是应该做的事，故不能让我挎个挂包满天飞，以至我所梦寐以求的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和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歌唱的美梦，终未做成。

积十五年之沉默，蕴无限之忧思怨愤，1978年我才写出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报纸在转载它时所加“编者按语”云：“科学技术领域是层峦叠嶂的壮丽高原，是繁星灿烂的无垠长空，期待着更多的作者去探宝。”如今重读这语重心长的编者按，还不能不感到异常地激动。我们多么愿意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多么应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环顾当今的文学界，愿意写与应该写的矛盾在我国许多作家们身上是已经解决的了。我们愿意写的正是应该写的作品，而应该写的作品，我们的作家也愿意写出，完全有能力写出它们来。对立是能够统一的，但矛盾却仍然存在。我们确还读到了一些包括部分老一辈在内的作家的作品，只是为了应该写而写，大量的作品未免淡而无味。我们确也读到了一些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作家一个劲儿地写他们愿意写的作品，大量的篇幅简直是莫知所云。

如今我只写愿意写的文章，我愿意写的文章似也都是应该写的文章。好像我已不在泥沼之中。多数作家肯定都不在泥沼之中了。中国作家的这一进步非同小可。不过还未可完全乐观，现在还有一些人陷在泥沼中，应伸出手去把他们拉出来。

副刊的五、八版在这四十年里，真是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写稿的是受惠者，我是深受其惠者。十年动乱过后，文艺部一位负责人，曾在一个风雨冰雪之夜，同我在天安门城楼之下，来今雨轩之前的台阶上，深夜长谈，他重新燃烧了我死灰中的余烬。文艺部及报社许多编辑都关心过我；一批闪光的名记者在不同的生活点上帮助过我。包括全国各地的许多记者站，以及派驻国外的驻巴黎的记者和驻联合国的首席记者等。把文章寄给副刊，比较放心，这是一个可以信任的编辑部。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为共同事业而默契地工作着。我决不会忘却他们的，这是四十年的交往呵！怎么能忘记呢？

1989年7月

《收获》三十周年

闻说《收获》三十周年，心头很有一些欢乐感、喜庆感和幸福之感。

不消闭目，浮上眼帘来的，首先是靳以同志。《收获》创刊以后，虽然编辑部在上海，但他常来北京，因此见到许多次。他精力旺盛，熊腰虎背。他是作家群中显得特别健壮的一位作家。而偏偏最早离开我们，永不回来的人，不是别个倒是他。

50年代，阳谋以后，文学界就不繁荣了。要办一个大型刊物可不容易。

《收获》那时是唯一的一个。很可能他是为了《收获》，过度地操劳又操心，因而致病，才过早地去世了的。到了80年代，这样的大型刊物简直不算什么，全国有几十个了。现在的文学界是真正地繁荣起来了。到了这大的丰收的年代，硕果累累。可惜，靳以是想也没想到，看也看不到。

开国之初，我是真虚心，写不出像样的工农兵文学，自己惭愧。只好虔诚地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生活了。最早写了一篇朝鲜战地访问记，《走过被蹂躏的土地》，《人民文学》退稿，说写得太凄凉了。后来写出一篇“鞍钢八号高炉点火投产”的特写，登在《人民日报》，另一篇《聪明的架工》登上《人民文学》。那时在我心目中，《收获》比《人民文学》更要崇高，曾惴惴地答应靳以，把《一桥飞架南北》改好了，给他用。孰料这篇东西给方纪看上了，中途截住，把它拿走，发在《新港》上了。一天，在王府井大街作协大楼的一个楼梯角上碰见了靳以。我面露愧色，他好心肠安慰我：“不要紧不要紧，这是可以理解，谅解的。以后再有什么东西给我们好了。”从此我欠了靳以一笔文债。没有还清，他过早地离开了。

第二位浮上眼帘来的是满面红光的叶以群。他和我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同室共住，亲如手足。开国以后，分住两地，往来很少，见面不多。1962年，我写了《祁连山下》的知识分子题材受人注意，接着写了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一篇《火中的凤凰》。给《人民文学》了，又退回来。当时文学界条条框框封得严严实实。文学只能写工农兵，不能写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改造都不行，更别说歌颂知识分子了。但我写的《火中的凤凰》是写开国大典，通过郑振铎来展示中国古代文明和未来的文化发展的。这篇东西碰了几次壁。1964年我又将它寄给了《收获》。后来叶以群来信说，可以选用两章，当《收获》登出广告来了，我看到目录里是有《火中的凤凰》了。最后，还是因为它是写知识分子的，犯了禁忌，给抽了下来。只寄回一份清样给我，表示《收获》确曾发稿，打了清样的。但是，就是不能刊登。

在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层，没有立足之地。在中国，文学只是工农兵文学，文学的接受者是工农兵及其干部。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到“文革”就登峰造极了。斯文统统扫地！而叶以群不幸也离开了我们，过早地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但是“文革”以后，情况有改变，知识分子可以写，我也大写特写了一阵子，当然也写工农兵。现在五十圆的大钞票上，工人农民之外，还有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知识分子了。文学随之繁荣了，这是以群想也没法想到，看也没有看到的。

在我的心目中，《收获》仍是我国文学界的一个崇高的刊物。我们这一代人曾习惯于把靳以和巴金这两个名字联在一起。“巴金靳以”，似同一体。当初，《收获》虽以靳以为主编，实际上靳以也是巴金的代表。以群一直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文哨》的编辑。他是茅盾的代表，多年来都是

的。只是后来茅盾在北京，他在上海，巴金也在上海，以群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时期的巴金的代表，直到以群不幸地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现在的《收获》的主编就是巴金了。其实《收获》一直都是巴金的刊物。因此我认为理所当然，《收获》是我国文学界的一个崇高的刊物。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在《收获》发表过两次，也算还清了欠下的文债了。这是我的幸福，能在《收获》上发表作品。现在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极大的丰收的文学纪元。想当初巴金用“收获”两字命名他的刊物。他老人家是想到了，但也没想到，也没看到过中国文学界会有今天这样地盛大丰硕的收获。但巴金看到了靳以、以群想也没想到，看也没看到过的收获。他仍然在主编《收获》！“他在丛中笑！”

祝《收获》到五十周年时，一百周年时，取得还要更大的收获！

《黄山记》的创作

一

1962年秋，中国作协委托我去安徽，参加省作协主办的黄山诗会。

9月3日，飞抵合肥；四日乘火车到芜湖，住两宿；六日在一场过境台风的风雨中，驰车到达黄山，我住进了温泉宾馆。

那时，全国处于饥馑状态，起因于1958年刮起来的“共产风”，加上五九至六一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其实这并不仅是天灾、也有人祸，即极左路线的罪过，造成了全国性的粮食紧张。不但细粮短绌，而且粗粮也不够吃，饿死了许多人。更由于营养不良，到处是患上浮肿和乙型肝炎的病人，形势严重。如今事过境迁，大家都已忘记了。

那时农民自发地创造了一个分田到户的好办法，谋求生产自救。行之卓有成效，安徽省领导也是支持的，从而保证了人民群众度过这场大困难。但当时分田之事是不能公开的。硬是要在二十个年头过去了之后，到70年代之末，80年代之初，这个分田到户才终于显示了它的最大效益。但那个时候的中央是不同意的，甚至撤掉了省委书记的职。而现在已改变了概念，都改变了态度了，进而确立为生产责任制。

我还是在这个时候到的安徽。其时，形势已有转变，生产已有所恢复了。我认为：“台风已经过境。”用这个题目还写过一首诗。当然这首诗也没有能发表。在合肥，在芜湖，在黄山，我发现人们垂泪而道，道出了很多惨痛的经历。我想不通，堂堂社会主义大国，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一场灾难。因此，在温泉宾馆里，我情绪很坏，从来没有这么坏过。我内心发生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呵！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黄山诗会的安排，是先上山去游览，再下山来开会。因此一连四五天，我游览了黄山的各个有名的风景点。我想，山下的人间遭遇太痛苦了，让我忘掉了它。让我忘情于山水之间，让我和大自然溶合。就让我像李白的诗所说，“遗影入无穷”，让我暂时做一个出世之人吧。在50年代里，这一种思想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当年我也有过这样的豪言壮语：我要攀登的，是我们要开发的山；我要跋涉的，是我们要征服的水。我向来不愿游山玩水，我并不怎么爱好风景名胜。在50年代里，山水诗、风景诗都属于禁区之列的。但在黄山我却沉缅在风景隐逸之中了。

我因内心痛苦，而到风景中去寻求解脱。我果然得到了内心的平静和极大的欣喜，为祖国的山水所激动。我在这几天的游览中，得到了充足的美的享受。黄山实在是美极了，我真正感到祖国的可爱。我要歌颂这黄山的胜境，这样做就是歌颂祖国。于是我为写作《黄山记》而作了一些准备，收集资料，酝酿了情绪，踏破千峰打草稿。

二

我在黄山的游踪其实很一般。七日我在温泉宾馆附近走动，看了人字瀑、白龙桥、药臼，丹井、虎头岩、三叠泉、鸣弦泉；眺望云门峰、云际峰。八日登山，经立马亭，龙蟠坡，到半山寺；过天都峰脚，过蓬莱三岛；到了文

殊院，受到迎客松的欢迎。午后登天都峰，过鲫鱼背。那时比较年轻些，只四十八岁，上天都峰只花了三十七分钟。夜宿文殊院，正好看到正南前方的蝎子星座。9日早上看云海，登莲苑峰；下山过百尺云梯，复上山到鳌鱼洞；在平天岗我观看了凤凰松；又到天海，登上光明顶；下来住在北海宾馆。于是看到了散花坞、始信峰、仙女峰。最后看到了西海门。10日我奔上了狮子峰，在清凉台旁的飞光岫看日出，然后去始信峰，石笋矽，至此，黄山景色，大约已得其半。下午四时，到西海门，循小路上左数峰，又从那儿由小路到飞来峰，又名仙桃峰，从那儿经过为云雾遮掩或吞没了的小路，误入海外五峰；最后又登光明顶，则莲花峰、天都峰一目了然，五大云海尽在眼底。这一下午的游览后来成为《黄山记》一文的主要章节。十一日又把光明顶作了中心，日出观赏，特别喜欢西海门前的云雾飞舞。只见大风吹得云雾很长的舞袖，一直吹拂到我的眉睫上。那些大胆的舞蹈家忽然从深谷跳上排云亭来，拉着我们作胡旋舞。十二日下山，十三日开会，下午我讲话。开了四天会，又游了一次徽州，十八日会议结束，十九日上青阳九华山，二十日下山到芜湖。二十一日访问了裕溪口煤港，二十二日到合肥，便着手写《黄山记》。二十五日飞北京，到十月三日《黄山记》完成于昆明池边的云松巢中。

我写这篇散文时，参考资料用得很少，只有康熙五年僧弘眉主编的一部《黄山志》。其中我摘录了李白的一首诗《送温处士归黄山》以及宋代吴龙翰，元代的潘旦、汪瓘、谢肇淛和明代的吴伯兴所作黄山游记的片段，以及清代闵嗣麟编辑的《黄山志定本》，其中只摘录了《黄山领要录》几小段。这么一来资料也就够我用了，因为我只想写些尽量地短小的游记。

三

我写的《黄山记》，只写了四小段。第一段写黄山的造山运动，第二段写一些开发黄山的人，第三段写我游山的历程，这三段都不灵光。到第四段才是真真的写景，多少有一点儿游记的味道了。我曾经想过把前三段统统不要了，删去它们算啦。我想，如果只用第四段的一千五百字左右，纯粹地写风景，效果可能好得多，我自己曾认定了一种要短小的写法，存心要学古代散文家的样子，一心一意地，纯粹地描写风景，而其中展示出我对于生活的热爱来。

我的《黄山记》的运气不好，因为这纯粹写景，文不载道、诗不言志，在我们的文学界里行不通，就到处碰壁。该文写好，我就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它是一家大衙门，它的大编辑一看，通不过，都没有给主编看就退了稿。我又送到《安徽文学》编辑部，它是次一级的中衙门，也因同样的理由退了稿。碰了两个钉子，我就避免再碰第三个钉子了。我把文章养在金鱼缸里似的养起来。倒也像分田到户的好办法一样，硬是要在二十个年头过去了之后，到70年代之末，80年代之初，这种文体才能得到了承认。1979年我编《徐迟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并没有给我钉子碰，就这样注明此文是“按照手稿排印”，收入集中。到80年代末，时运已转，否极泰来，国家教科书都将它收入课本中了。这次在课本中，这四小段全都用上了。我看也好。这就使全文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比较清楚明白。但我希望教师授课之时，把重点放在第四段上。这第四段也许是真正的抒情散文。这种抒情是在探索着美。这种抒情是在歌唱祖国，这是我写作时的心情，也是我愿意将

它们散播到祖国青少年心田上去的美的种子。这种抒情我想是健康的，这种抒情之中没有任何庸俗的东西。我吸收了古典文学的一些部分，只是一些部分，我也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速度感，使第四段的场景迅速转换，变幻莫测，终止于摄身光这一最高的效应。

任何文章，发表以后，就不再是作者所独有。好坏只能由读者评述，本来不必由作者再说什么话了。出版社的编者来函一定要作者说些话，只能说些冷暖自知的话，是大可不必说的废话了。

1990年

文饭小品

30年代里，施蛰存先生办过一个刊物，名叫《文饭小品》，他公然提倡的这个，却并不是叫人要为吃饭而写作。而他只是要阐明，写作的人是要吃饭的。这并不是现在叫的什么超前经济意识。在那时的上海滩，那样的虚荣市场上，是毫不希奇的事体。人要吃饭，也是一句真理，经过实践考验的，到今天还是如此。连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大知识分子，也曾说过：人就是因为多长出了这么一个胃的缘故，必须吃饭，所以要为生活奔走。有何希奇，何足道哉。不过有的人就是讲面子，不肯丧失掉自己的“人”的尊严，好像金钱不洁，铜臭熏天，他却清清白白的，不愿意说出他的，非常之高雅就是了。

现在要说的就是稿费的事，作家也是长了一个胃的，必须吃饭，他又只会写文章，就靠出卖文章给他换稿费吃饭，养活自己。可是写作付出的劳动量大，换来稿费很少，是很不公平的。例如马克思说，他写部《资本论》得的稿费只能够他抽雪茄烟。幸亏他有个好友，是一家棉纺公司的老板恩格斯，经常慷慨解囊。给予救济。这事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重大问题，却也并未引起任何人的重视。稿费依旧，到处都是照样的低，与他这样认真的作者付出的劳动量太不相称。

再说得实在点，早在30年代，稿费一般是每一千字两元，最高的大约是庚子赔款付给西方文学名著翻译费，每千字十元，算是高标准了，罕见而少有。在通货膨胀时期的抗战陪都重庆，曾经发动过一个呼吁“斗米千字”的运动，足证当时稿费最低，到一千字连一斗米也买不到，也罕见而少有。解放后，千字二十元的稿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说得过去的。故相安无事。到了今天，又成问题。好不容易提高到了千字三十元的“高额”了，仍然是不能解决目前著作家的困境的。因为稿费实在是低，低到斗米千字上下，低得过份了。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再提高稿费，从五六十元到一百元千字，到二三百元一千字。有一天会真的达到一字千金，但就不得会有一字一千元文章了，它是付给最恶劣的劣作，有如误入歧途的《废都》之类的。通货膨胀一来，什么都做得出来了。杜甫说得极好：“写文章的人最恨的是命运好了文章就写不好；恶鬼看见活人从眼前走过，快活得不得了（文章憎命达，魍魉喜人过）。”一点儿也不错。作家没有骨气。能行吗？文以气为主！不过，“文饭小品”却是可以写得很潇洒，有灵气的，“命不达”，是可以闪耀出创作的灵光来的，“文饭小品”无伤大雅也。

蓬比杜文化中心和它的一个圆

十八年前，在 1979 年春天，在巴金老人的率领下，我曾和中国作家孔萝荪、李小林及翻译家高行健，一行五人，在五月节前后，访问了法国。当时，对巴黎新建的蓬皮杜文化中心，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由依萨蓓儿陪同，和李小林一起，上上下下的看了全部的展品，第二次是和几位代表团成员一起去看，那次我有时是独个儿的，有选择地看了一些名画的局部的细节。对这个极为新鲜的现代文化，我感到无比的欢欣和喜爱，当时法国人都还没有完全承认它的十分奇突的建筑结构，甚至还有人认为它丑不堪言的。但我却非常地赞扬它，后来在我写的《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1982 年 12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书中，第二十六节里，这样写道：

“当蓬皮杜文化中心是一座好像常减压，催裂化的石油化工总厂那样类型的建筑物时，怎么能把《摩娜·丽沙》和《圣母与圣子》奉为绘画的准则，放进它的展览厅呢？罗浮宫里的绘画，记录了已过往的那些时代变革的社会生活；文化中心绘画厅里的现代派艺术，记录了这一时代大变革的社会意识形态……对蓬皮杜中心而言，连铁塔都只是一件前世纪的雕塑了。但是像铁塔似的巨大雕像也将运动起来。现代科技和工业将会在外层空间，建设一座神话般地提供太阳能的空中城市。那时真正的空中楼阁，以及巴比伦式的空中花园，将与地球同步飞翔。”

我自己倒不记得了，因为巴金在参观，法国文化部派人陪同着我们，我当时还说了一些话，大概的意思是：“这里太好了，五光十色，美不胜收的，什么都有了，但我觉得还是缺少一点什么。缺少了什么呢？呵，缺少了一个圆。”

十多年后，武汉市的湖北美术学院院长唐小禾及夫人程犁，在他们完成开罗国际会议大厦里面的两幅他们的巨大壁画之后，来巴黎参观。到了蓬比杜中心，在这一建筑物外面的石块广场上，看到了天空中有一个，用了几乎看不见的钢丝，悬起的一个球形体，好像是从太空中看去的，我们的蔚兰色的地球。文化中心的解释员对他俩说：“有一年一位中国诗人来到了这里，非常欣赏这个现代化建筑的新奇，但感觉在形式上还缺少点什么，便同陪同的法国朋友说，如果在广场上空再有一个圆球形，整个建筑就有呼应了。说者是有所思，而听者又有心。法国人就采纳了这个想法，挂上了这个球。”唐小禾问。“这个中国诗人是谁？”解释员回答：“他名叫徐迟。”他们听了很高兴，就拍了几张照片，印在他自己的著作《重返埃及》中（此书是 1995 年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同时还洗印了一张，送给了徐迟，徐迟又将照片寄给了上海，给巴老收藏了。

日丹诺夫研究

1949年1月，正当中国人民胜利在望，一本文艺理论书籍叫做《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的，由时代书报出版社，出版于上海。

当时不少读者，怀着景仰之心，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一位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所作的几篇批判讲话，以及作为其附录的几篇决议，错以为这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的，故我们必须遵循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那时还不能将它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理论之间的某些原则差别区分出来，误把它作为法式而认真地学习，初初几年里并诚惶诚恐地接受而奉行不渝；但稍后却也渐渐的不再提到它，终于也把它忘了。

流光如矢，三十一年过去，回头又找出了这本书来，皱着眉头，好不容易又将它读了读，可读之处甚少。已经阅历过十年浩劫了，现在该目光如电，对它进行研究，重新评价此书了。日丹诺夫这个人，是多才多艺的，也有马克思主义的一定的理论修养。早先听到过这样的传说：他一边儿弹奏钢琴，一边儿发表他的文艺高见；现在也有人愠怒地对我说过：日丹诺夫不过是一个酒鬼！但我们还是应当对他作出公正评价。当年自有当年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相信，日丹诺夫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抱有热忱希望的。当然他是过于自负与自信了，但对于苏联的文学、艺术与哲学的发展是有良好愿望的。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承认他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然则对他还是要分析研究，不是光说好话，也不是随意抹杀，不可否定其一切。

但是不能不指出，对于意识形态、思想领域里的哲学论争以及特别细致的文学艺术诸问题，他这些讲话和决议采用了粗鲁态度：正是日丹诺夫，对苏联文艺进行了一系列的过火批评，他是开这种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里我们也有一些好同志接受了他传下来的衣钵，有的现在已经有认识了；有的好同志至今还不怎么认识。还有一些人则胡作非为，乱打棍子，借以荣升，以此为业，比日丹诺夫还狠；还有更坏的文痞白骨精，简直要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一股脑儿踏倒！纵然我们今天的青年读者已经不大知道甚至于完全不知道这个日丹诺夫是何等样人物了，但其所作为及其言论还值得清理一番，作为历史教训，洋为中用，以儆效尤。

其所作为，略叙数端，如下述：

早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日丹诺夫就代表联共（布）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出席致词。他是从30年代开始就在联共（布）中央抓意识形态文艺工作的，他那次讲话中就已经出口不逊了。他在1936年1月批评了苏联的一位杰出的作曲家肖斯塔柯维奇，说他所写的一部歌剧和一部舞剧为“混乱而非音乐”。作曲家被贴上了“人民敌人”的标签。肖在回忆录中说他看到报纸上报道：“今天演出人民敌人肖斯塔柯维奇的音乐会。”当莫斯科剧院去到巴黎，要演出根据普希金悲剧改编的，那部由穆索尔格斯基作曲的著名歌剧《波里斯·戈都诺夫》时，却遭到他们禁演。这几年里，好些个喜剧，喜歌剧和话剧的演出被撤销掉，莫斯科有十座和列宁格勒有十来座剧院被封。成百部电影被停拍、禁演。著名戏剧家梅耶霍尔德及其他一些作家突然失踪，他们的全部作品被禁、剧本禁演。他们再也没有露面，都被送到了那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服役了。这些事都是在60年代里才透露出来的，都和斯大林有关，而执行其事者少不了日丹诺夫。

后来是苏德战争。在战争胜利之后，正在苏联疗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

文化元气之时，日丹诺夫忽然再次出现，又来粗暴地对待文学艺术工作了。1946年8月，他出现在一个会议席上，严厉地批评了《星》和《列宁格勒》两种杂志，给予一个讽刺小说家和一位老一代的优秀女诗人以猛烈的鞭挞，然后用联共（布）中央的名义作出决议，进一步批评了一系列的作家和作品，并下令改组《星》杂志，并停止了《列宁格勒》杂志的出版。

日丹诺夫的讲话和决议使得苏联作家协会不能不召开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会上，吉洪诺夫、法捷耶夫、戈尔巴朵夫、苏尔科夫等等都发表了演说，谴责了更多的杂志，批评了更多的作家和作品，还作出了主席团的决议。这明明是规模巨大的一场围剿，当时叶尔米洛夫却不是讽刺而是真心诚意的说：“苏联文学——世界最民主的文学。”实际是社会主义民主和苏联文学网被摧残了。

与此同时，又有联共（布）中央的关于话剧剧目的决议，其中批评了二十多个戏，指名道姓地对它们的作者进行了鞭挞，然后提出了“改善”苏联戏剧状况的办法。几天之后，又有一道决议颁布，批评了一部电影《灿烂生活》及其导演、编剧、影片作者和歌曲的作词者作曲者，并批评了爱森斯坦，普多甫金等优秀电影艺术家的若干部影片，还指责了电影艺术部的领导者及其附设的艺术会议，宣布禁止《灿烂生活》的公开放映。

这样接二连三的轩然大波，到底有什么合理的内容呢？概括起来，无非是要求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的提高，但却不是一般地提高，而是想把思想工作提高到高度水准上去，要建立起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学，要求这种文学艺术，超过旧时代创作中的最好的模范。日丹诺夫的用意良善，自然是不可否定的。他所采取的粗暴的形式，实在罕见；实际效果是很坏很坏的。要求超过过去时代创作中的最好的模范的目标，看来是并没有达到的，也决不是他这样地对文艺横加干涉的方式方法所能够达到的。而且今天再来读日丹诺夫的讲话和那几个决议，且不说态度的粗暴，即其语言之干瘪，文字之拙劣，抛弃了俄罗斯文艺批评的深刻分析与优美文风，甚至是逻辑混乱，语法欠通，堪称有史以来八股文中最蹩脚的八股文章，不堪卒读。

第二年，1947年6月，日丹诺夫昂首阔步，走进了哲学的领域，批评了一本哲学史教本，即亚历山大洛夫主编的《西欧哲学史》。这混淆了哲学与科学的长篇大论的讲话，说什么“哲学的领域由于具有积极意义的各门科学的发展而不断缩小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从哲学保护之下取得解放”。而且说“我们哲学家应该分析综合现代自然科学的结果”，“从马克思起哲学初次成为科学而它的历史开始进入全新时期了”。我国哲学界现在已经有研究到日丹诺夫这个哲学讲话。这篇讲话的结果之一，是苏联的《西欧哲学史》教本，直到今天也没有写出来。他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界里制造的极大混乱，至今无法收拾。

又半年后，1948年1月，在联共（布）召开的苏联音乐家会议上，又是日丹诺夫登台，作了开幕词及总结性发言的两次讲话。2月，他又主持并写出了关于作曲家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一个决议，禁止了这个歌剧的演出。在讲话中，他再次提到1936年1月的“著名”论文《纷乱代替音乐》，再次讽刺、批评、打击肖斯塔柯维奇，还加上了普鲁柯菲耶夫、米亚斯柯夫斯基、哈却都梁、波波夫和卡巴列夫斯基等几乎所有杰出的和优秀的苏联作曲家，顺便还把造型艺术的绘画的“新倾向”痛斥一番。但日丹诺夫却用了美好的形容词赞美古典音乐和绘画，这当然是不错的，看来他很喜欢

它们也懂得一点，因此他很不喜欢也很不懂得他说的那些非古典的或者反古典的新音乐和新绘画的新倾向。在决议中，他谴责苏联音乐中的反人民的，导向取消音乐的倾向，要求肃清所谓本决议中指出的缺点，提出音乐创作的“高度”要求，并赞同为“改善”音乐事业而采取的组织方策！

半年之后，日丹诺夫忽然因病逝世。这一切也随着告一段落。现在人们再不记得他了。但是他那流毒实在是深远的。

这个日丹诺夫对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的言行很值得我们作点研究。他这个人已被遗忘，他的一套言行做法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不可用轻率的态度来对待它，应当给它作些分析。他的突出的言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他的“极左”的态度，粗暴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林彪、四人帮对意识形态的态度及其程度似乎是直接从日丹诺夫那儿继承过来，并给予了更大发展的。

日丹诺夫在苏联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有一段名言：“沉缅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宫画片——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衰颓和腐朽的特征。资产阶级文学，把自己的笔出卖给了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文学，它的‘著名人物’现在是盗贼、侦探、娼妓和流氓了。”这里的“著名的人物”，没有举出名字来。

后来在关于哲学史的讲话中，他又讲到了“堕落的资产阶级”、“出卖灵魂的黄色出版物和堕落的资产阶级艺术”、“匪徒、龟奴、间谍、刑事犯等等，都被收集进去。我随便举一个新鲜的例子。据最近《消息报》消息，存在主义者萨特所编的《现代》杂志称赞犯罪文学家强恩·哲纳的《偷儿日记》一书是一种新发现。”这里举了两个名字，一个是让—保尔·萨特，一个是强恩·哲纳。

对于资产阶级的衰颓、腐朽、堕落，是人云亦云，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过日丹诺夫未能预先见到本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一次好像一百年前的“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产阶级是要灭亡的，不过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中，它的全部生产力这些年尚在极大发挥之中。“这一切”，马克思那序言中说，还应当“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

至于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它的衰颓、腐朽与堕落，也是人言籍籍，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了。但是资产阶级文学家是不是把他们的笔“出卖”给资本家了？却还可以考察一番。有写了一些很好的作品而发了点财的，如辛克莱、杰克·伦敦等，还可以包括海明威等，总不能说他们的作品宣扬了神秘的宗教，不能说他们的笔写了色情文学，更不能说他们把灵魂“出卖”给资本家了。连托尔斯泰都有一半儿是宣扬宗教的狂热者呢，无损他的一半儿是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大师。就算D.H.劳伦斯在作品中有过若干色情的片段，便是高尔基的作品中也写过些片段，无损于他们的现实主义的创造精神。30年代一度出现过格调确也不高的保利·穆杭等人，总不能说他们就是盗贼、侦探、娼妓、流氓。描写蒙德卡洛赌场里的赌徒形象的作家不少，包括斯蒂芬·茨魏格这样的有名的人物，他本人并非赌徒，也不因为他写了赌场而成了什么赌棍。《偷儿日记》即便是一本坏书，也不能说写了偷儿的作者就此成了偷儿和盗贼。去年，存在主义者让—保尔·萨特逝世，举世哀悼，

法国文艺爱好者几万人给他送葬送过凯旋门。萨特也并不因写过《可尊敬的妓女》，便成了不可尊敬的娼妓。

说什么也不应该把这样一连串称号，盗贼、侦探、娼妓、流氓、匪徒、龟奴、间谍、刑事犯，加到资产阶级的文学家的有名人物身上去。就算资产阶级文学界里有这样的败类，也不能说资产阶级文学当中的有名人物就全是这一些败类。西方资产阶级出版过很坏的很恶劣的黄色的和别的畅销读物，但他们从来也没有被资产阶级文学界承认过。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文学艺术要有分析，冷嘲热骂也是可以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像日丹诺夫这样恶狠狠地侮辱他人，只能证明他自己相当狂妄，信口雌黄，有点失言了，贻笑大方。

俄罗斯的文学和文艺批评历来是有优秀传统的，但日丹诺夫的文艺理论，文风不正。辱没人辱没到入地，反过来夸耀自己简直上了天。他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会上，称苏联文学为“最有思想，最进步和最革命的文学”，这是说得非常正确的。苏联文学确实给过全世界进步人类以巨大的影响。中国的有思想的，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家艺术家毫无疑问受到过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等卓越的苏联作家艺术家的熏陶与教益。但是，已经用了这样三个最高级的形容词了，日丹诺夫还嫌不够，他还加添了这样一连串的话：

“除去苏联文学之外，没有并且从来未曾有过一种文学(怎样怎样)……没有并且从来未曾有过一种文学(怎样怎样)……在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找出这样(怎样怎样)……的文学，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没有并且也不能有这样文学，它能像苏联文学(怎样怎样)……”这种话，全是极正确的话，对于鼓舞士气，确实是很不错的；但日丹诺夫是只管自夸自赞，可谓到了顶了。正如他在破口大骂的时候，是穷凶极恶的，而在自我陶醉之时，他简直成了圣洁的天使。且不说《国际歌》，就不属于苏联文学，而且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应当想一想许多国家也曾产生过有思想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就是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也有过对于人类进步与革命斗争作出一定贡献的文艺传统和作出一定贡献的作家艺术家的作品的。谦虚总是美德，自豪要有分寸。

日丹诺夫这样咒骂资产阶级文学当中的有名的人物为强盗、娼妓、流氓等等，唯独他自己最正确最完善最美丽，他那个思想根源恐怕就是把其他的一切阶级都看作反动的阶级，或所谓只是“反动的一帮”。但这样的思想反而可以同专制主义者封建主义者结成反资产阶级的同盟，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说起过，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已屡见不鲜的了。

在苏联音乐家会议席上，日丹诺夫热烈推崇俄国古典音乐、古典歌剧、民间的旋律和歌谣，而斥责了苏联现代作曲家的音乐的形式主义倾向，诬之为根本是反人民的音乐理论，并作出“结论，应该完全恢复古典遗产的意义，应该恢复正常人性的音乐”等等。实际上现代作曲家并没有抛弃古典传统和民间音乐，他们对于古典传统及民间音乐有极其深刻的造诣。被日丹诺夫点了名的，像肖斯塔柯维奇等等作曲家的现代作品中，就能听出他们是“吃透”了古典遗产、民间音乐，是师承了古典和民间的音乐而又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创新倾向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些现代作曲家的作品，自从日丹诺夫讲话以来，一直至今还在演奏，现代创作也在成长并在发展。行政命令并没有发生作用，迫害打击也徒劳而无功。如果有人说日丹诺夫是复古的罪人，这样说是错误的讽刺。尽人皆知，古典音乐和古典文学、古典绘画等等受人尊

重，从来也没有消失过，并不需要谁去复古，去恢复它们。但是我们不是古人，要到死后才是古人，而活着的时候我们不是，活着的人若是有正常人性的人，不应该满脑子都是古典主义。活着的作家艺术家的职责就是继承传统而发展它并创新。动不动就要用“形式主义”、“反人民的音乐理论”的帽子压人，实际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当然，对于抛弃了遗产与人民的那些冒充的现代作曲家，我们也要进行批评，但也不能用帽子压人，也不能用棍子打人的，我们只能说理。

日丹诺夫的讲话中，强调文学艺术的思想性，应该说是他的合理的内容了，作为他的一种基调的“面向自己的人民”，也是无可非议的。这些正面的话，说出来很容易，但如果说得很空，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并没有多少帮助，因为空空洞洞地说这些话，像日丹诺夫的讲话和决议那种文字是并不能激发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放射出文学艺术的有感染力量的奇光异彩的。所以，日丹诺夫确已被遗忘，肖斯塔柯维奇不朽了。

1980年11月28

人兽之分

人兽区分是从哪里分的？屈原在《天问》里问过：“何鲁能言？”有些能言之禽，那仅是学舌的八哥儿，不能算数的。世无能言之兽。猩猩狒狒，金丝猴猢猻，也不能言。能言之兽就只有人。但能言之人已是人，不是兽。故人兽区分在所谓有音节的语言上。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与后来的阶级社会之人，又是怎样区别的呢？其区分在文字上。自从文字诞生，阶级也就诞生了。原始人与阶级社会中人的区分在甲骨文呵，楔形文字呵，埃及方碑上现在还认识不到的文字呵，等等，即其区分在于文字了。

阶级社会之人将怎样区分于今后消灭了阶级之后的人呢？我猜想是区分在电子计算机语言上。那前面的两者是已有定论的；后一种我姑妄言之。现在，恐怕得研究一下电子计算机语言与电脑人消灭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了，它们还在发展之中，它们的前程却看来是有限的。

但在我们这里，懂得电子计算机语言的人太少了，还是先提倡一下读书竞赛再说。我国至今还有为数不少的文盲，还有不少的人是听广播看电视，但不看报不读书的。不读书的人照样可以生活，而且还可以生活得很好，甚至比读书的人还要好得多。不过我看，人还得读书，而且要责成甚至处罚那些不读书的人，要他们读书。读书以后，他们也会爱上读书这种良好习性的。

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我曾经提倡过读书，提出要开展一个持续二十年的读书大竞赛。虽无甚反应，但随着全总提倡读书以来，我的建议也已经通过这个很好的形式而得到实现了。这使我满心欢喜，馨香祝祷。愿我国各民族，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群众都能读书，能读更多的书，得到更多的知识，能不断地更新知识，使我国以后秀出于世界之林。

正如文字之发明，并不取消了语言的作用，正如电脑的发展也不取消，并取消不了文字的作用一样，人只有能言才能学到文字而后能读书，人也只有在能言能语能读书能不断增长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掌握电子计算机与使唤电脑人，使之为我们服务，消灭劳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更开创新的宇宙空间。

近来好作怪想，多写怪文。书成以供《书刊导报》之用，这也许是创作自由给我增添了胆识吧。如谁有争议的话，有以教我，尤所欢迎。因为我深深感到我自己读书不够，只是读书劲头还不小而已。

读周立波遗稿有感

前不久听说，已故作家周立波同志有一份遗稿，是关于域外的许多著名作家和光辉作品的研究的。兹已征得立波同志的爱人林兰同志同意，将该遗稿的全文八万余字，交给本刊《外国文学研究》季刊，悉按原文，手稿原样，分为三期连载，从本期开始，于今年年内全部登完。这份遗稿是林兰同志收藏并亲手加以整理的。别的几位同志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本刊编辑部在发表时又对它作了一些查对、校订、补译以及注释的很不完备的工作。

我们感到，这份《立波遗稿》真正是我国近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文献，更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美学的瑰宝。能发表这份遗稿，本刊引以为荣。

这是立波同志 1941 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课的提纲。它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年代，历次运动，特别是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浩劫而仍得保留下来，它简直可以说是奇迹一样地保存了下来的。这劫余的残稿，又岂仅是一个提纲呢？它有非常严密的逻辑结构、内在的紧密联系、博引旁证、丰富多彩，并且非常完整，有很多闪光的警句。

当年立波同志就是根据这个提纲而讲了许多课的。那时一般的课程只是学员听，立波同志讲课却非学员也蜂拥而来听。当年的讲话，肯定有许多人作了记录的，但没有人整理过发表过。那时毕竟是戎马倥偬的年代。立波同志自己也是讲过课后就放过一边了。但这个遗稿并非当年讲稿的纪录或追记，而只是当时作者亲手写成的提纲与挈领之作。而我们今天读起来却感到很亲切，感觉到好像作家就在面前讲话的模样，它那么动人，有着珠玑似的精采的语言。读它们就是一种享受，一种艺术的享受。它讲出来就和一般理论家的口气不一样，和美学家的文风也大不相同。立波同志对那些大作家和名作的着眼点，也有他本人独具的特点。他深知创作的得失，尝味过笔耕的甘苦，他是有着一个小说家的实践经验的那种特点的。

读者正是从这样的醇厚的享受之中，得到好处，感到受益匪浅。《立波遗稿》将会是这样地收到它的美育的效果，读者可以从欣赏之中受益，为它所熏陶而得到好处，这样的文稿，这样的境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我们读了这份遗稿，才知道立波同志早期的创作生涯中，是曾经勤奋地钻研深究过这多作家与作品的。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位作家之能写出他的《暴风骤雨》与《山乡巨变》来，是有其源泉与渊流的两方面的根基的。他既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和革命工作的经验，又饱学了外国文学的名家巨著，并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两者缺一不可。缺了前者，作品就没有饱满的生活气息；缺了后者，生活实践再多也表现不出来。两者是相得益彰的。这个道理往往有人忽视。甚至今天还被某些人士所忽略，但知深入生活，不知道做学问的重要，或反是。

从这份遗稿也可以看出立波同志的外文底子很厚，他引用一些外文的警句，非外语程度贫乏的人所能用得上的。我们现在的文艺界懂外语的人相当的少，而通过翻译来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局限性很大。此外，我们又曾一揽子地漠然忽视西方资产阶级的作家与作品，后来又忽然漠视苏联作家与作品，直到最近这三四年，情况才逐渐改变过来。读了立波同志这份遗稿，真是深有感触，希望我们的青年作者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在外语及外国文学研究上，多下一点功夫。

我们现在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我们想，也可以从这份遗稿吸收到一些养份的。本期登载了立波同志对西欧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下期登载沙俄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再下期登载苏联的作家与作品的研究。

1982年2月

亨利·米修的一首诗

译者腊兰寄来法国亨利·米修的一首诗《慢吞吞，有人按着万物的脉》，附言说她周围的人看不懂，问我的意见。我把它发表出来，公诸于世。米修的诗包罗万象，凝炼得很。《慢吞吞》的诗也得慢吞吞地读。慢慢吞地领会，还是有味的。且很有点味，其味无穷。法国的读者喜欢他的诗和他的语言，翻译过来不容易，我请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校订了一遍，还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希望我们的读者不要掉头不顾，不屑一顾。请细细辨味。世界变化着，文学也免不了变化。我们不懂的事物还很多，不能感受的东西也不少。诗人企图表现真实的内在精神，给予感应的可能，诗里面有一些我们内心所掩饰和埋藏的思想和感情。我们看惯了人世的表面事物，也时而看到表面底下的深处的真实，或恍然大悟，或恍然若失。这首诗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事物，认识人和事物的关系，认识我们熟视无睹的内心世界。米修在去年去世了，终年八十五岁，享有盛誉。译者是为悼念他的逝世一周年而译出这首诗的。

谈谈灵魂和灵魂工程

凡人，都有灵魂，无论是高尚的、平庸的、卑劣的。但灵魂，少不得一个躯壳，不管是长寿短命的、健美病态的。恐怕没有一个灵魂，会没有一个躯壳的。也没有一个人的躯壳里，不装着一个灵魂的。一旦灵魂离开了躯壳，即使一时还存在，它也没有生命力了，最后还是消灭，终于无影无踪。

但是灵魂还可以离开了人的躯壳，而寄存在金石、竹木简、纸张和印刷品里的。即使躯壳已经消灭，而灵魂，甚至于还可以得到永生。留传下来的灵魂，构成历史人物的灵魂。例如屈原，虽人生无常，而文学千秋。屈原的《九章·抽思》里，这样歌咏过：

“看夏至的哪一天，夜是最短的啊，为什么我等着天亮，好像等了一年。到江陵的纪南城去，路程虽远，我的灵魂一夜天里就去了九次。我是要去告诉楚怀王呵，道路的是非可曲折得很呢，你从南天的月亮和星斗本可以辨别方向的。我要去对你直言不讳呵，我的灵魂可已经把道路问题认识得清清楚楚的了！我的灵魂是何等的忠、信、耿直呵，只是你的心不和我心相同，看起来是我理屈了，又找不到媒介来替我缀合呵，可你不知道，我才从容不迫呢。”

在这一段诗里，屈原在当时楚国走什么道路的重大问题上，宣泄了他深处的灵魂。他不知道他为后世建设了一项灵魂的工程。他的灵魂的呼声，直到今天，还在嘹亮地号召、呼唤，震荡人民的灵魂，和他共鸣着。他的躯壳早已化为逝水，这灵魂工程却永垂不朽，而且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呢。

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此。灵魂工程的价值就在于此。屈原的诗篇不仅感染了当代，而且感染了后代，以至世代代。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再现它的时代，社会变革，山川地貌，历史风云，而且可以塑造出金刚不坏的躯壳，更重要的是它还能迸发出人的灵魂的颤音和吼声，响彻云霄，让后世对之发出回声，震荡不已，延绵不绝。

我们盖厂房，起高楼，这叫建筑工程。修万里长城，叫国防工程。制造各种机械，叫机械工程。筑大坝灌溉、发电，叫水利电力工程。开发海洋，叫海洋工程。改造并创造生物形态，叫遗传工程。飞船登上月球，都利用一种综合工程，叫做系统工程。这又叫宇宙工程。此外还有一种跟物质建设工程并驾齐驱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其中有一种叫做灵魂工程，其重要性决不下于物质工程。而我们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文学理论家、编辑家所从事的就是灵魂工程。

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诗学》中，说到希腊悲剧对人的心灵起到了一种净化作用。罗马一文艺评论家注意到文学的崇高性，作文《论崇高》。从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来，迄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文豪从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到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打破了封建主义的黑暗、愚昧的专制权力，摧毁了封建割据的思潮，开创了民主自由的潮流，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最美的崇高观念，触动了人类灵魂深处，发扬了人的个性发展的精神，把一打一打的皇冠打落在地。然而在东方，我国却从秦汉唐宋以来，顽固地维护着封建君主的统治，而儒家释门佛教的奴才哲学一直禁锢着人民的心灵，直到20世纪，余风未泯。自古代、中古至于近代，虽然我国的文学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遗产，装点统治者旧制度的门面，却很少能触动帝国的毫发。只有起义农民能够撞击森严的紫禁宫殿，文人学士却

谈不到改弦更张，起不到旋转乾坤的作用。

无产阶级的导师，提出过“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对人民文学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终于斯大林提出了灵魂工程的命题，但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而日丹诺夫挺身而出，压制文学进步发展，阻挡灵魂工程建设，使苏联文学倒退回去。他挥舞棍棒，用行政力量打击了一部分文艺家，杀鸡给猴子看。把偷来天火送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绑上高加索的悬岩，取消了创作自由，生气蓬勃的灵魂工程遭受了极大损失。“四人帮”这一套继承了日丹诺夫的衣钵，把我国的文学事业一时摧残殆尽。

灵魂工程的命题，给予文学一个崇高的使命。它指出了今后文学发展的方向。不仅典型环境，不仅典型人物，文学还要致力于人类灵魂，并把它提高到人类灵魂工程的高度。我们今天，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决不可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亦即我国人民灵魂工程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也是我们党赋予我们文学家们的最光荣也最艰苦的任务。西方资产阶级尽管建设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他们还没有做到，甚至没有怎么意识到高度精神文明的建设。但西方的现代作家艺术家，在物质文明的直接影响下，或多或少地已经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一味排斥他们是不对的。但他们只写灵魂，不取躯壳，也非尽善。

新时代的浪潮正向我们挑战。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在相应地变化。文学不但要紧跟着，而且最好要走到前去，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现代文化教育和现代化文学艺术的建设，使之并驾齐驱，甚至走到前面去。千万不能倒退回去，古色古香，不是方向。我们总要从未来汲取我们的诗情。

我们要承担这个任务，自觉地做一个人民灵魂的工程师，或人类灵魂工程师。党中央已经把这个光荣称号给予我们。我们当然要做到无愧于这个称号才是。巴金老人提出，我们的文学要走到世界前列去。我们要努力，大家要发奋，从事我们这神圣的工作。

我们从自身做起，净化了自己的灵魂，然后才能净化人们的灵魂。我们自己要做到自身就是一个忠、信、耿直的灵魂，从南天的月亮和星斗辨识好方向，把前进的道路，是非曲折，认识得清清楚楚。直言不讳，集思广益，从从容容的，深入生活。体验感受，收集材料，分析研究，博览群书，潜心思考，学好外语，订好规划，画好蓝图，编好程序。然后绞脑汁，付出心和血，登攀文学的高峰，走向崇高的境界，投入灵魂工程的伟大建设。我们本在做着，今后更自觉地，做这个工作，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进入人民的灵魂人类的灵魂深处，以净化卑劣的灵魂，刷新平庸的灵魂。做人类灵魂工程师，我们要将人类灵魂推上崇高境界，使人类永生不息！

（这是在中国作协湖北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的开幕词）

1985年5月

网思想的小鱼（一）

解 题

一位老友记起我二十岁时，有一本小册子，以《网思想的小鱼》为题。我早忘了，他还记得。但在我的许多小册子上，都可以发现，有很多思想的小鱼，落网在它们里面了。好奇怪，已过去了许多时光了，这些小鱼都还鲜美如初，乱蹦乱跳的。随手抓几条，给你看看吧。

幻 想

诗人应有幻想，但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可以检证的科学幻想，社会科学的幻想和自然科学的幻想。然则，没有现实就没有幻想，没有幻想也就没有现实。

比倒霉还糟糕

什么时候你违反了辩证法，你就要倒霉。什么时候你的辩证法，虽然注意到了统一的对立，却忽略了对立的统一，你将要比倒霉还糟糕。

成熟

当青春和美貌离开你的时候，留下来的便是一个成熟的坚强的钢琴演奏家。在她的成熟的，坚强的，优秀的触键中，便闪出了青春和美貌的最光辉的形象。

人 生

在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立刻向了结束而走去。可那还是很远着呢，没想到人生会得这样地漫长。没想到人的一生又会得这样的短促，立刻就走到了我结束的时候。那最奇妙的一瞬之间，便走完了这么漫长的一生。

彼岸

彼岸有什么可怕的呢？有我最亲爱的人在渡口等着我呢，我急急忙忙地向她扑去。

网思想的小鱼（二）

河里流着轻柔的水波，有一个钓鱼的人在河边垂钓。小心呵鱼儿，你们别上了钩。但愿他是一个不灵光的钓者，一条鱼也钓不着。看！浮子在抖动。看！钓者甩起了钓竿。一瞬间，他钓上来一条美丽的小鱈鱼。可怜的小鱈鱼，上钩了。

舒伯特为它写过一首歌。舒伯特歌里的小鱈鱼是被钓竿儿叼走的。但是钓竿儿算得了什么呢？我是用网的，网的是思想的小鱼，也网过较大的鱼。二十岁时就老这样下网了，大约可以下到八十岁。这一张张的稿纸就是有格子的网。有时一网可以打起好几十条鱼来。有时可也打不着一条鱼，而打上了一网子垃圾。有时网破了，得修补。网收上来还得晾干。

我在这生活的河流中一次次下网。我在大地之上来来往往采访。我最怕人家招待，所谓招待，我看就是把我安置在遥远距离之处的某种艺术。所谓招待不周，就是没能把我放在最最遥远地方的意思。有一回沾光，受到了最高级的招待。坐飞机出发就被当作一个VIP（最重要旅客！）到了航空站，有大队人马来接送。送到市区很远的最偏僻的一个山庄里。那里只有树木和鲜花。那里只有无比的幽静和空空荡荡的大厅和套间。那里是连当地老人都还不知道的别墅。两道哨岗不让人随便进来。在出去访问时，又有车队随同作陪。警车呼啸着开道前进，所有车辆停下来等队伍通过了再走。一路上大开绿灯，红灯根本管不了它。为了一次宴会，让整个餐厅停业。吃的是山珍海味，直到主客都病了。我尽情地享受了一段时间的清福。拉起网来却一条鱼也没有，连一根水草也没得。

在一个极寒冷的夜晚，不得不把自己点燃起来。我的心于是熊熊燃烧，散发出火红的灼热的光芒，不这样就要冻僵了。我只能眼看着我自己被燃光。把这寒冷烧热了再说吧，管它明晨有没有我迎接太阳。

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并没有失魂落魄。我甚至是非常之理智的，出奇地冷静的。天呵，我还必须履行我们这一伙人的神圣职责。

但我是有了毛病了。不知我是出了什么毛病，反正我已有了毛病，我掉了东西了？我失掉了我的一半？失了一半就失去一切？以前我富埒王侯，现在穷得像约伯。赏赐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现在我成了冒烟的湿柴，冰冻了的湖水，漏底的船舶，断线的风筝，这些是多么糟糕的事，我现在比这些还要糟糕得多。

女儿只是说：这多的衣服都已穿不得了。现在出门没有合时的衣服穿。而箱子里、柜子里、包包里不能穿的衣服倒不少。不知怎么来收拾它们，处理它们？

她是这样说的，我听见的却是：多少思想现在可有点儿用不上了。没有衣服穿自然不行的，裸体可不能出门。没有思想则没有关系，照样满嘴胡言，走遍天涯海角。书架上，书柜里，本本儿里，用不上的思想也真不少。也没人来清理，我可不知该如何清理它们呢。

早先我曾经爱过她。她曾经如此纯洁而美丽。我从九个女神中选一个为我的妻。后来她也衰老了，只有背影还婀娜，腰还是细细的。我还是爱她，可是她不声不响，不打一个招呼就走了，并且我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生死的界线真是太分明了。去了的再也不能回来。往日我想念出去的人，总能把她（或他）想回来的。如今未去的人怎么样苦苦地想着她（或他），

也未能、永不能把她（或他）想回来。

失去了一半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明显地老了。写字、看书早已带上了五百度的老花眼镜。我谛听全靠助听器，而且左耳右耳用了两个助听器，还不太管用。满口的假牙，要知道，是不能吃芝麻的。喉咙里不断歌唱着支气管炎的呼噜呼噜的合唱交响乐。大脑倒是还行，啊，只是为了让我感到痛苦。

孙子似乎不大理睬我。孙女儿也许在暗中嘲讽我。这没有什么，代沟寻常事。我还可以活下去的，可是我真的嫌恶我自己了。我这一辈子走了回头路。我一生绕了一个大圈子。怎么回到了我的出发点？善哉，出发点现已建成了堂皇的终点站。正是在终点站，我看清楚了出发点是这么回事儿！于是我嫌弃了我自己。我已无法再走第二圈，没有这个力气了，也没有这个道理的。

我以为我有丰富的辞汇，敏锐的感觉，出奇制胜的想象力，满腔的爱和恨，以及自以为是相当不错的表现能力，但我缺少的是与人共感的本领。没有搭出一副共感的跳板，就无法让读者接受我的心意。这个缺陷，不少人也有。

我想，反不如质朴的辞汇，木讷的感觉，儿童们的天真而单纯的想象力，浅薄的溪流似的活泼泼的爱和恨，以及不怕怎么笨拙的表现力，可以还未开口人家早已晓得了，并未走上前去人家先迎过来了。

那总要到来的尽头怎么还未到来？生之不易，还没有困死之难。

“死在生活的末尾是件美事。大大小小的龃龉和纠缠不清的怨尤和口角再不会发生了。留下了宽容和谅解，一种令人怀念的告别。”

这也是网来的死之讴歌。

网思想的小鱼（三）

呵呵，中国大酒店！今晚的华筵设在中国大酒店。多么好的名字：中国大酒店！今晚的菜单有大虾、鱼翅和海螺、瑶柱等等，吃过就忘记吃了什么。因为山珍海味，名堂很多，向未见过，而它们又各有一个令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优雅菜名。一席共吃了八道菜，平均每人一百元。三大桌坐了三十多人，共计四千余元。

饭后，主要宾客们都要在中国大酒店的册页上题词留名。题词的词儿秘书们已为首长们准备好，只要执笔缮写就行了。我有幸列席于华筵，心里也暗自准备好一个题词。万一他们也要我题点什么，我不至于手忙脚乱。但他们并没有来邀请我题词，我颇因为他们不邀请我、看不起我而微有愠怫。可惜了我准备好的这个题词：

“中国，现已成为一座大酒店。”

网思想的小鱼（四）

净土=人间

[注解]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即文艺复兴新时期的最初一个诗人的但丁曾著《神曲》，分三卷：地狱、净土、天堂。（净土也有译成炼狱的。）这就是所谓三界：在天为幸福的天堂，是神仙住着享福的；在地下为恐怖的地狱，是罪恶的鬼魂在那里受刑的。净土或炼狱，也很恐怖，是已经沾污污染了的灵魂可以得到净化的地方，是“锻炼锻炼”的天堂下、地狱上之炼狱。锻炼改造好了的灵魂就上天堂，改造得不好的就沦落而下地狱。这是个什么地方呢？这无非就是这个人间了。这个人间则既无天堂，也无地狱，只有炼狱，美其名曰净土。

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意识流

[注解]时人都以为意识流的文学是最新的文学，或曰，现代派文学。目前很时新，很时髦，人竞趋之。其实，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就是意识流的文学。人有之，则文学亦有之。

朽而不退，未若退而不朽

[注解]当“文革”中提出“老朽滚蛋”口号，当时所谓应该“滚蛋”的“老朽”，都还未到老朽之时。现在又过去好多年了，不少人已到了老朽之年。但还有老而不朽的，还是不该“滚蛋”，不该退休的。但朽而该退休而不退不休的，最后恐怕倒是要“滚蛋”的。朽而不退的，这种人可谓不识相。朽得已经发臭了，还是不退；怨声载道了，还是不退，反更嚣张，且更神气。呵，那就有好戏可看了！有相当多的人，令誉是非常之美好的，非常之崇高的。及其朽也，而犹不退，崇高的令誉就要剥蚀，坠落。对于他们，就应该赠言，以“朽而不退，未若退而不朽”了。已有非常崇高的令誉者，自知己朽，就此退休，退反而可以不朽，保持他一生的令誉了。很多人已这样做了，他们是珍惜自己的一生令誉的。这些人应受到尊敬，岂止尊敬而已，他们一生的作为，将载入史册，永垂不朽。

远望楼评诗记

近虽病躯初愈，还去京开了几天新诗诗集评奖会。这次评奖会有一个很宝贵的团结的气氛。评委们的态度认真，老诗人冯至、公木都认真严肃地对待这次评奖，研读、交换看法，深思熟虑。

十六种得奖的集子里，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成名的诗人的集子占六种；在五六十年代里成名的诗人集子占五种；而在七八十年代里崭露头角的新秀诗人的集子也占了五种。这次获奖作品的名单“可以说是大体公允的”。

评奖并不是一桩轻松的工作。在远望楼上放眼，这1983—1984年的两年中间，出版的新诗集有四百多种，好比一片一望无际的浩渺烟波。就书目而言，恐怕还不是很完全的。特别是对年轻的一代诗人的集子，可能有所疏漏。

这回得奖集子的诗人年龄大都已过了四十岁，只有个别不到。令人遗憾的是二十上下、三十左右的青年诗人的集子入选太少。因许多青年诗人的诗创作大都还未成集。可是我们都知道，诗总是以青年诗人写的来得好些。这次没选上他们的作品，有待于下届诗集的评选，来纠正和补救这一缺点了。此外，女诗人的得奖集子这回只有一种，其比例远远低于实际情况，恐怕也是一个缺点。

诗的评选，跟诗的翻译一样，须由一些诗人自己来承担比较好，比较可靠。这一个特点有别于其他的文学形式。但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评委要评选自己的诗集的尴尬局面。我们考虑了这一点，并且有几位评委要求过退出评委会。但大家认为回避固然可以，但评奖主要以作品质量为准则，也不必因人而废，倒是今后应及早注意到。对评奖工作我还有一点建议，我以为已享有全国声誉的诗人、作家不一定要在省级评奖中拿大奖了，已享有国际声誉的大诗人、大作家也不一定要去拿全国金奖了。这样做会使他们赢得更大的声誉。希望各个文艺协会的领导人能在各种形式的评奖中明智地掌握这一点，要让更多的青年人，以他们的优秀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

这次评选，总的来看，似乎得奖集子的水平比之上届未见突破。这两年里国内外的风云际会，本当激荡出嘹亮的歌声来。诗坛却平稳发展，未见异军突起。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内在的原委。为什么诗篇虽多，能激起共感、共鸣的规模略小，回音、回声幅度不大？回顾时，不能不想到一个时期里出现的所谓新诗危机论。事后证明没有这么回事。诗在发展，在前进，但传诵一时的名篇佳作却不多见。或者这段时间正是“万木无声待雨来”似的，诗也期待着狂飚和豪雨。一般来说，要等到雨过天青，才有新人新作像雨后春笋，一节节地拔地而起。

得奖诗集中，老诗人的诗艺成熟，语言洗练，遣辞恰当，思想完美，是比较明显地胜过了新秀的。然新秀却以感情的清新、热情的荡漾、奇特的构思、新颖的意境为特点，有些是老诗人所不及的。至于中年的诗人，则感情与功力较为平衡，他们是我们当代的大诗人了。

然而大家感到，诗作还免不了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有时落了套。套话是诗之大忌，它是奴隶的烙印。甚至我们卓越的诗人偶尔也难免，用了世俗的习惯方式来观察和感受，而发为吟咏时，竟未注意到自己被某些框框所框住，未能用创造性的真知灼见，写出人所未见、发人深省的新诗来。青年诗人则框子较少。

这次诗集评奖，仿佛从远望楼上望见，新诗是一种大有希望的文学形式。

我们的诗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仿佛是波澜壮阔的海洋一样，从中传来了这时代的浪声潮音，以及水下的声纳。

1986年3月

我们的文艺与我们的时代

时代

时代感或时代精神，对于文学与艺术而言，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因素。没有一件文学作品或艺术创作，可以脱离它的时代，而创作出来，并流传开来，更不用说什么流传下去了。

然则还有一个空间，空间万物，生生不息的人民生活，也是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又一决定性因素。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不能遗世而独立的。一切文艺都不可能不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文艺家心灵的反映。其所反映，或是这一个那一个的侧面，或这一个那一个时代的这一个那一个角落。可能是积极的反映，它也可能是消极的反映。然而积极的反映也许达到了消极的效果，或一时的效果——不举例了；消极的反映也许反而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乃至长远的效果——有如《离骚》等。

文艺家心灵之反映，必然地起作用于一定时代的人民生活，或多或少地要推动生活前进。并且，也还有可能，拉住了生活的后腿，死命地拉着它落到后面，倒退回去。既然如此，文艺与时空关系总应予严肃的思考。

这个道理，文艺家们大体上都是已经知道了的。他们听也听过多少遍了。知道并不意味着做到。有出息的文艺家是在这样的努力做着的。但有的是听到而不爱听的人。有的是听过就忘掉的人。有的是听到却照样昏头昏脑的人，还有继续说胡话的呢。这也是常见的现象，已不奇怪。很多文艺创作，只是自顾自地拼命地创作或表现；也有很多读者、听众和观众跟着盲目地自顾自地甚至疯头疯脑地喜欢着欣赏着它们的。历来如此，干涉不了，也可以不加干涉，听其自然。它们最后是会自然而然地淘汰的。况且其中可能还有一点儿较好的东西，能传诵甚至流传，因为它们毕竟还是离不开时代的。他们中仍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依附于时代而合上了时代的节拍和使命的。

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变化，变化的剧烈比之以往那些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以及机器的时代更甚更大。科学技术之日新月异，物质生活的突飞猛进，价值观念之兔起鹘落，人类心灵之动荡不安，自有人类以来的两百万年中以这五千年或这三千年的变动为大，而在这五千年三千年中，又以 20 世纪下半叶的变易为最迅疾，最出人意外的，确乎是空前的了。我们的时代已失去了它向来的稳定性。全球差不多都是这个情景。我国也处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动中，我们正在开放，正在改革。显然迫于时势不得不然，否则就不能侧身于列国之林了。

世上的有心人都在追求着，竭力争取着实现一个合理的社会和崇高的理想。本世纪的第一次欧战中，出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了东欧诸国和一个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追求着，竭力争取着逐步体现并最终实现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更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第二次大战在引爆了两颗原子弹之后宣告了结束。这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结合成果，爱因斯坦的能量公式导致了原子裂变，以及原子反应论和原子能电站的运行。到 50 年代，人类开始进入太空了。六十、七十年代各一次，人类真正登上了月球。而这 80 年代之末，有人大声叫嚷，并认真准备激光武器和星球大战；也有人不太大声地作好反星球大战的研制。19 世纪末的人类尚无能力给自己作末日

审判；20 世纪末却已能几十几百次地毁灭自己了。

但与此同时，电子计算机问世了。并已从巨大到只有国防部才能够拥有的大机器，微缩到可以放在家里听候使唤的、更完美更有用的个人微型机、微电脑。完全清醒，彻底符合逻辑思维原理的计算机还在迅猛地向第五代的人工智能与第六代的更新与全新的发展。濒于毁灭的世界的救世主将以它的全能的导航能力把世界从大风暴中平安无恙地降落到安全跑道上。

再没有比我们这个更多麻烦的时代了。但人脑加电脑，解决最麻烦的问题，最难的难题。我们已生活在一个每秒三十万公里光速的时代里。人脑就是要用电脑的灵敏工具，以接近光速及光速的速度来计算，来回答，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麻烦和最大的难题。理所当然，我们的时代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大变化。如所周知，我们的认识远远地跟不上去。

缀在美妙的夜空，屏幕上的星星，并不代表一个共同的时间。我们所见各个星光的时代这样错落不齐。从几个光年前，到亿万个光年前发射过来的星光；有的星光来自早已在亿万年前烧毁并坠落了星球。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思想感情也并不代表一个共同的“同时”。

在这 20 世纪 80 年代的任何一天里，在中国报刊的版面上，在展览馆墙上，电视屏幕，银幕和歌舞舞台上，那些著作家和表演艺术家们的思想感情，也都来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代。既还有氏族社会与奴隶主社会的时代里的思想感情，也还有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各阶级各阶层，各别时代里的各种思想感情。还有被殖民主义社会，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各个阶段的不同时代塑造成的思想感情，可能我们现在还比较地更多。所有这些，跟那些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各时代的思想理想，感受感情以及各种各样欧美亚非拉澳和南极北极的马克思主义的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新”思想并不同时，不是今天“同时”并存，它们不太一样或太不一样，纷然杂呈，各说各的道理，就如那夏夜的澄清的满天星斗一样。

就像前不久曾经有过一位高贵的游侠骑士，名叫堂吉诃德。这位堂吉诃德读了许许多多的集封建皇朝的文学之大全，读得太多太多，以至着迷入魔。于是他挺起长矛，要向风车作战。他先虔诚地向一位多情的情人一厢情愿地祷告了一番，求她保佑他自己，然后把盾牌遮隐身体，横托着长枪飞马向第一架风车冲杀上去。他一枪刺中了风车的翅膀。翅膀在风里转得正猛，把长枪进作几段，一股劲把堂吉诃德连人带马直扫出去。堂吉诃德滚翻在地，狼狈不堪。

可怜堂吉诃德就是时代错乱，吃足苦头。其他例子就不说了。我们的时代真是变化多端，我们的时代极为复杂。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巨大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听取信息，务求能认识这个剧变前大时代，跟它上前。

各种思想感情，各种文艺作品，各种艺术表演，有的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有的挖空心思地加以阻挡，甚焉者力图拉住中国历史往回倒退。前进——倒退；倒退——前进；都不过是局部现象。从总体上说，中国在前进，时代在前进，总体上已接近光速，局部地甚至以光速高速前进，也有以负速倒退的。

然则，让我将一切犹豫推开，把任何埋怨收起来，尽量地把一切自满，骄矜打掉，连同那些猥琐的、庸俗的、落后的、卑劣的、毒辣的、衰颓的、

老耄的、僵死的事物给予化学处理，使之转化，来奔驰向着一个更好的世界，并展开翅膀，向一个个高级阶段的社会形态飞升。

我们的文艺要有出息，为我们的时代而服务，奉献鲜丽的花朵，甘美的果实，茂郁的森林，纯洁的灵魂。

1987年10月15日

充满生命力的新文学

自从 1919 年，“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以来，到今天，已有七十个年了。七十年来，中国的民主浪潮震天响，民主已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去，已深入人心了。相形之下，科学的温度较低，声音微弱些，不太吃香，相当寂寞。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默默无闻地在坚持工作，就是有点名气名气也不大，他们工作、思索、实践、创造、发明，成绩并不小，但也不太大，没有一个曾获得诺贝尔奖的。他们默默地生，又默默地死。但他们总在干，干了一生一世。

所谓民主，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译名，简称德先生，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领域。据说，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不知这个说法有没有一点问题。世界上有的是用民主的手段，达到了民主的目的，建立了民主政体的民主国家，即使说它们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你能不承认它们？不是外交上也承认了它们了。

所谓科学，是赛恩斯（Science）的译名，简称赛先生。从大禹治水，发表《禹贡》算起，就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乃是生产力的代号，是日新月异，不断地，极大地发展着的生产力的总称。最近我在一篇《鄂州市西山记》的散文中，说了：“请看明日之域中，竟是赛先生之天下。”虽然在今日之域中，是的，德先生还很起点儿作用；但明日之域中，德先生的位置该让给赛先生了。你不信吗？信不信由你，到 21 世纪便知分晓。

我国科技落后，并不是由来已久，而是由来不久。自古以来，我国因有四大发明，世称中国是最先进最发达国家。骄傲自满，停步不前，从 1840 年起的一百四十八年以来，我国是很明显的落后于西方了。五年前，我在《外国文学研究》季刊上，撰文一篇，叫《也要研究外国的科学文学》，文中指出我国至今还没有一套自然科学的世界名著丛书。这些科技名著大多数没有译过来，大多数没有出版，很不像话。大家读过《居里夫人传》，但居里夫人的科学论著中国还没有翻译出版过，你要读它，得读原文。有些科技名著，在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前已经有了译本，开国以后却没有再版，如大名鼎鼎的牛顿的《原理》，全名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你要读它，得找开国前的版本，不容易找到了。局面就是这样，岂有此理！而五年之前，有人告诉我，已有计划了，要由十几个出版社联合起来，出一套《自然科学世界名著丛书》。选题有一百九十种之多，已分别约人翻译云云。我听了很高兴，就写文章为它摇旗呐喊。不料五年过去了，怎么样啦？这个基本建设的规划还并没有能得到实现。

今天我们科技写作研究会宣告成立！以后要拿出具体成绩来。让科学家们，工程技术专家们带头写作，让业余作者、专业作家、新闻记者们来学一学，也学着写，以促进科技写作，以发展科技写作，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繁荣昌盛。

事实上，科学家们都善于写作，并富有文采。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伽利略的《对话》和牛顿的《原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我国古代乌龟壳上的天文记录，王充的《论衡》、酈道元的《水经注》，沈括的《梦溪笔谈》都是科学写作，有的就是哲学名著，文字精美、准确、严谨。科学家们都是能写文章的。他们要解放思想，要泼辣地把笔锋挥动，向人世宣告他们的探索进展，发布他们的奇异信息，呈献他们的智慧之果实。如果说过

去这方面做得少了一些。凡做了的都有很好的效应，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科技正在发展，它当然是要发展，一定要发展的。反映这科技发展的科技写作因而必然也要蓬勃发展的，即使没有这个写作研究会。而现在又有了这个研究会，就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写作，可以做许多具体工作，实际工作了。

我们中国的真正希望，还在于“五四”时候提出的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合作，在于民主和科学的并协。现在民主的浪潮犹在激荡。科学的微波也在辐射。可别小看了微波，微波也能惊天动地。微波技术可以用于测量、雷达、遥控、电视、射电天文学，微波波谱学，微波接力通信等等，并可以用于粒子加速器，来生产出百万量级和兆量级的强大的电子伏，以催使高能物理的碰撞。将来一定会有将微波、激光、超导等等技术应用于一次次的“宇宙的创生”的模拟试验，来获得认识我们的宇宙和改造它的更高量级的科技新成就。

现在是民主的时代，今后是赛先生的天下。1920年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有名公式。这个公式鼓了干劲，但共产主义至今还没有实现。就它说到的具体细节而言，不很确切；就它所说的精神而言，它完全正确。现在我们也知道苏维埃政权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开放改革。即使做到了全国电气化的科技水平，尚不够促进共产主义的到来。

而在列宁说出他们公式之前的一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的先驱者们却早就给出了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著名公式：民主加科学可以建设新中国。七十年来，民主的浪涛时起时伏。有时震天响，有时很平静，该平静时就平静，该震天响就响震天。而这期间，科技的频率也忽高忽低，总的来说，频率偏低，甚至很低，但是微波也并不微弱啊，连微波都是非常之强大的呢。民主加科学是一定能建成新中国的。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庆贺我省科技写作研究会的成立。今天，是的，它不过是巨浪之中的一个微波。但它将大有助于我国科技的发展。科技写作是具有进攻性的充满生命力的新文学，它将来要替代我们现在的所谓新潮派的旧文学。在科技和民主的并协性中，在它们同心合力的大发展中，那个代替相对贫困、相对愚昧、相对阴暗的旧中国的，将是更加富强，更加智慧，更加光明的新中国。一个崭新的新中国一定会到来，世界大同或者说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在科技写作研究会湖北分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报告文学要走进生活

关于报告文学，有几句话想说。一、这是报告文学的时代；二、我们要写我们的时代的报告文学；三、我们的报告文学要赶上时代；四、报告文学要走进生活。现在简单说明一下。

一、这是报告文学的时代。从来还没有一个时代是这样地日新月异，波澜壮阔。一个人，一个县，一个省，以至全中国全世界都有不断的变化，甚至从宏观的宇宙到微观的粒子，Quazks（夸克），都有最新的震撼人心的消息要发布。光辉的事迹到处都有，等着报告文学为它们广为传布。这真是报告文学时代来临了。

二、所以说，要写我们时代的报告文学，只有这种文学形式能最快地反映我们时代。它是今天最好的文学形式。但是我们的时代发展得这样迅猛，速度非常，已接近于光速，变化之大，目不暇接，出奇不意。几乎无所不能，因此要写我们时代的报告文学是并不容易的。

三、我们要赶上我们的时代，不赶上不行。我觉得我们有点赶不上。报告文学应当具有灵敏的消息，不能容许把最新的事物、最新的发展遗漏了，遗漏了就是失职。然而并不是赶不上，赶上去了也还是可能的。

四、为了赶上我们的时代，报告文学必须走向生活并且走进生活，但就是走向生活也不容易，许多事牵绊着你我，使你我不能出来，许多条件限制着你我出去了也困难重重。人又都有惰性，喜欢安于现状。报告文学作者必须克服惰性，尽量地出去，走向生活，并走进生活，一进去就四通八达了！

走向生活，走进生活，是我一生奉行的格言。我的志愿是要写两本书，一本叫《建设一个新中国》，一本叫《建设一个新世界》。没想到我衰老得这么快，一眨眼都七十六岁了。但我仍然要履行我的走进生活的格言。去年我在一次腹部手术痊愈以后，我去了那个全国最穷的省贵州省，考察它的磷矿资源和开发的情况，以及考察了乌江，赤北河的通向海洋的内河航运。终于我发现它是一个富贵省。不幸受了风寒，病了四个月。今年痊愈以后，静养了四个月，我又跑进来了。到了山西的一个世界第一流的露天煤矿去，进行了采访，看到那里的煤层的储量之大，几个世纪也采不完。巨大的运输车载重一百七十吨，轮子高三米，我一人一手还摸不到橡皮轮胎的上面。我知道，我还在走向生活，走进生活去，因此我还可以写点报告文学，聊尽我的职责。我诚恳希望比我年轻的同志，你们比我幸福得多，你们还能跑，还能大跑，大写，写我们时代的报告文学。关键，在于走向生活，走进生活！干什么工作都要这样，报告文学尤需如此。

这四句话说过了，又觉得还要说两句。那是：五、报告文学是文学；六，天下没有不可写的报告文学，就看你如何写。

五、报告文学既是报告，又是文学。归根结底，它是文学。只有发挥文学的优势，才能有更大影响，更能感人，更起作用。在这文学的一点上，要精心构思，精心结构，精心写作，精心修改。丰富的联想，优美的辞藻，语言的音韵，对仗的工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六、有些报告文学很不好写，我却一直认为，天下没有不好写的报告文学，就看你如何写。文章有种种写法，这样写那样写；正面写，侧面写；顺序写，倒叙写；哪样写最好？要思考，研究，作出决定，再动手写。若写光明面，千万不要认为光写光明面就行了，光明只有和阴暗对比了，才能显现，

但光明应当是主要的。反过来，你写阴暗面，它也只有和光明对比过了，才显现出它的阴暗来。但每夜都阴暗，而每天都明亮。光明仍然是主要的！写《猜想》时，我其实就在写一篇伤痕文学。但它不仅仅是伤痕文学，我写了伤痕锻炼了人，伤痕又如何被克服。被超越，被升华。后来有些伤痕文学却忘记了每天都有一个太阳升起来，光照万物的，结果它们这些作品往往是徒然使英雄气短。而后就是儿女情长了，终于发展到不忍卒读的性文学去了。

文章是最美妙的事物，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世世代代的文学精品很多，都可以给我们借鉴。文章的奥妙，千变万化，正如世界上的人和事的千变万化一模一样。究竟怎么写，是很大的学问。努力钻研，自然会尝到甜头，其乐无穷。

让我们的报告文学乘胜前进！

1990年

试谈散文诗格律化

诗是要有格律的。没有格律的诗，便是散文诗。

诗，必须讲究格律。散文诗可以例外，不要求它讲究格律。

诗是浓缩的思想感情的产物。散文诗也是浓缩的思想感情的产物。在这里，两者是一致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格律。自古以来，中国诗词有严格的格律。散文诗则并无格律的要求，因此它自由自在，奔腾流泻，没有拘束。

然散文诗人，一时兴趣来了，也手痒了，在他们的作品里用上了一些应用格律，押上了韵，安排了音组，使之有了节奏，像水一样，或轻柔地流动，或澎湃汹涌，激起了滔天白浪。

中国古代散文中，有一些名篇佳作是格律化了的。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篇幅极小，三、四千字，太辉煌了，姑且举这么四篇供我们参考吧。

确实，中国古代散文，称作赋的，就是散文诗。相当格律化的，但与诗的格律并不相同。我们今天的散文诗应当写出和这些名篇佳作相当和并列的作品来！

在我们挥洒自如，飘逸地、轻快地抒写不受格律约束的散文诗作时，不妨也用一些格律化的手法。许多散文诗人已经不知不觉地这样做了。有时也可以有意识地这样做，当然绝不受格律的束缚。我们只管放手写下来，心灵务必自在，行文尤须自然，才能写好我们时代的散文。

试验一下格律化的散文诗，也许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质量，同时也会使诗的格律逐渐地发展起来，说不定对于新诗也能作出一点点贡献，因为新诗的格律八十年来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尚待诗人们共同努力。散文诗是方兴未艾，前途特别远大，格律化之说法，是否妥当，请在座同行批评。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散文诗学会 1990 年朔州年会上的发言）

我的不解之缘

不知为什么，我和报告文学是有一段不解之缘的。我本来是写诗的，后来写了一些散文，结果却落入了半诗半散文的报告文学的怀抱中。我想，这不是我自己做得了主的。我想，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这是报告文学的时代。报告文学就是要我报告我们时代的使命。

1977年秋至1978年春，我一口气写了几篇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写地质学家李四光，《歌德巴赫猜想》写数学家陈景润，《在湍流的涡旋中》写物学家周培源，《生命之树常绿》写植物学家蔡希陶。那时我一般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稿，一个星期送中国科学院请专家审稿，在专业上把关，再一个星期就完稿发排。那时我说过：“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这似乎是对的，我的作品也受读者的欢迎。后来我却改口了，我说：“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科学家，所以写了几篇科学家和科学。现在，为了更好地写科学家，我想还是最好要懂得一点科学。”这个公式一变成为“要懂得一些科学”。在我接着写《结晶》这个胰岛素的科技项目时，我就写科学家又多写了一点儿科学。在我接着又写《刑天舞干戚》的葛洲坝水利工地的水电工作者时，我硬是写了两大段的大坝基岩和河势的科学内容，结果读者就有点纳闷了。效果就不怎么好。

近年我把很大的力气放在“要懂得一点科学”上，常在深夜读科技书，也写了更多一点儿科技内容。关于电子计算机，我已写了好几篇，《大海之中一滴水》写华中电网局如何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小型机管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个省的电力和这四个省的供电，效果并不好。去年我写了一篇《神机妙算小型机》，也是写到了比之一般微机更有作用的小型机的，效果稍为好些。最近又写了一篇《攻主战场者谓主力军》，还是写小型机如何用集散型控制系统改进抚顺石化公司和吉林化肥厂这些大型企业的。发表以后，一片沉默。我感到奇怪，是否后来的那个公式出了毛病了。

也许我应该回到我原来的公式上，不要再写科学了，但可以写科学家其人及其事。我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这样做，我会感到气沮的。我们国家在电子科技发展上，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我们不能不在这上面努力奋进。现在文学艺术界很少注意这些事，“搞活大企业”这件火烧眉毛的急事，很少得到报道，报道了它又如空谷之音。究竟我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希望高明人士有教以我。要不然，我的不解之缘也许就可以解除了。

从“现代化”到“高科技”

有一个城市打算创办一份《快报》，约我写点感想。顾名思义，《快报》应当以最快速度，传达当时当地所发生的变化给读者。这速度，在深圳，已经应当，并可以是接近于电子或光子的速度了。如果用电脑电视的多媒介的计算机来接受信息、发播信息，利用光纤、激光来通讯、电传，也就可以说做到了高科技带来的高速度。

现在的问题，正是多数人还感觉不到时代步伐的迅速。一般说来，“文革”之后我们提倡的“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不能不是我们的物质基础。但世界上的科技发展之迅速，实在超过了我们的意想。“现代化”的口号已经有点儿不够“现代化”了。高科技乃将取而代之，不，它早已挤掉了“现代化”。现代，“现代化”只能用作基础，但决不能是目标，更不能作为理想——现在的理想也不成其为理想，“高科技”的理想也在日益翻新，变化多端，“超越意识之外，凌驾意识之上”。

举一例以明之，如光导纤维。一根铜质电线，最高只能用以通过一千多对电话。一根光导纤维，却可以同时通过两亿对电话。价钱还非常非常之便宜，又无从窃听以致泄密。正在铺设的北京至深圳的光纤电话线，将可同时通过 7680 对电话，三两年后可达到同时通过两三万对电话。光纤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高锟先生发明的，他曾任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总工程师。武汉邮电研究所总工程师赵梓森是国内开发出光纤通讯来的主要人物之一。

“现代化”和“高科技”的差别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前不久还看到一些文章提倡高技术，而不提什么“高科技”，说明他的观念不旧，是很新的，但新得还不够。现在高科技是统一了科学与技术的，凡科学有要求于技术的，技术一定能做到，高科技到达的地方，两者都是同时到达，同时并进。世界上正以疯狂一般的速度向“高科技”突进。在这高科技的竞技中，日本、德国和美国正在领先，拼搏得十分激烈，好比是一场争夺激烈的拳击赛。迟早我们会突然从黄粱梦中觉醒：这世界乃是“高科技”的世界，而我们许多人的观念，犹是“现代化”之天下也。我说过不止一次了：应当有此危机感。

这就是当我了解到不久将要出版一份《快报》之后，所引起的一点思想。

释美文，致贾平凹书

平凹：

上午来了一个电话，说是你的刊物，定名《美文》，向我约稿。

我没有给他肯定的答复。只说我已衰老了，不给什么刊物写东西了。他说，他们的刊物不一样，是独特的。我说，天下的刊物都一样，看了这本就等于看了那本，都差不多。你说你有某些特点，那我能同意，你说它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我不相信。他的声音就不一样了，他说你不写就不写吧。他本来想来看我的，也就不来了。我看他很失望，就赶快说，回去向贾平凹问好！我若写出什么合适的“美文”来，就寄给他咯。这个“他”就是你。现在就写这封信。

美文，是个外来字，是法文 *belle-lettres* 的译名。字典上说是“有关于具有美学价值，不一定具有教义或宣传内容的文学 (Literature regarded for its aesthetic value rather than for its didactic or informative contents)”。我查了字典得到这个解释，颇受启发，故写此信，以此言奉上。

1943年，我在重庆当过一个美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年我给我自己的许多散文编写了一本名叫《美文集》的书。当时以为，只要文章写得漂亮就可以叫做“美文”了。我的《美文集》里的文章，却多数是具有教义或宣传的内容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具有美学价值，不一定具有教义或宣传的内容的”散文。按严格的要求，《美文集》不合乎美文的要求，但天下哪有这种绝对的事呢？字典上说的是“不一定”嘛，就是说有一点也不要紧嘛，所以我是在出版《美文集》四十九年之后才大体弄清楚了什么是“美文”的呢。即此一点，就很值得告诉你，故写此信给你。以后如能写出“不一定具有教义或宣传内容的文学”来时，当寄给你审阅，不过这可能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在电话里说了，我已衰老了，既衰老不堪，就不一定能给什么刊物写东西了。

祝美文文学从贵刊上散发出巨大光华来，兴我华夏文学。

徐迟

1992年6月21日书

帮助后来者

范泉兄：

久违久违！

你受了一些兀遇，而犹强烈地生活着，工作着，至钦至佩。

《文化老人话人生》的文章，写起来很吃力，好比两手要端一座山。呵，老年，多么沉重的老年！

就写信给你，以信代文吧。不写老年了，只写对老年的一点看法。

老年已侵袭了我的心，我想饱以老拳，打它出去。不可能，它偷偷地坐在我的心田里。我无法推它出去，打发它到远处去，到远方去。我赶它不走，它变化我的心。

老年像化石。一切形象尚在，但已冻凝在大山的积石堆中。老年老年，我对它一无办法。我不要见它，它却来了。

现在我还未冻凝得不能动，也还能思考，还多少有点意识，再以后就凝固了，终至于冥顽不灵了。我切记着，要在灵魂出窍之前，找好一块地方，绝对避免堵在一个大门口，或一条大路中间，务使自己不至于变成一块路障，一块挡路石，一条拦路虎，一个阻塞生活奔放的害人之物。

阻塞者的老人最可悲、无耻！滚你的蛋！若还是岿然不动，就炸了它。

不准老年阻塞自己，更不准老人阻塞青年的前进道路，否则就砸碎它，碎不了就爆炸它！

如果你是一个明智的老人，能提示、提醒一点什么，告知后来之人，也应当赞美你，感激你。我并不一般地反对老年人，老年人是能帮助后来者的。老年人唯有虚心帮助人的好处而已。

到了老年，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有点识相的，有点聪明的，有点有利于生活的发展的人。

近来我在考虑，登一个记，受一些技术训练，许能通过考试，及格了，登上一架航天飞机，作太空的遨游，飞到极远处，然后不再回来，免得成为人间的发臭的垃圾障碍物。

徐 迟

1991年6月25日

谈比喻

没有必要解释比喻。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拉到一起，（它是一种自然现象，三尺儿童都善用比喻。我的小女儿三岁时，就对我说过：“爸爸的胡子，像一片草地。”）这就是比喻。

同时，比喻大如宇宙，宇宙本身有时候并不是通过别的，而是通过比喻来把自己显示给芸芸众生的。

一位备受尊敬的长者却说过，比喻总归是跛了一条腿的。这话自身也是一个比喻，因此可以证实比喻是跛了一条腿的。但必需指出这一点来：只有不好的比喻，不恰当的比喻，才会如此的。而恰如其份的，好的比喻，就是连现实自身都赖以显示其存在的主要方式，譬如月球，地球，星球，足球，篮球，网球，排球，乒乓球，绣球花，狮子滚绣球，环球旅行，球鞋，都是从一个谁也不知道是最先从哪儿找来的‘球儿’作为比喻用，而命了名的。然则，球是并没有腿儿的，因此它倒是跛不了的。

据说，银河系是扁园形的，像一个铁饼；又据说，太阳系也是的。如果人间没有这个田径运动里的铁饼，不知该怎么样来描绘宇宙中的这一种天文现象了，连宇宙自身据说也是一块巨大无比的旋转着的铁饼，或薄饼、或飞碟等等的涡旋体的形状。但谁也不能跳出宇宙去眺望这块铁饼，以证实此说。

还有，扫帚星，要没有比喻，就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办了。要没有比喻，就没有那个‘相对’性，没有了互相‘比较’的办法了。宏观世界固然是无比喻就无法很好地加以描述的，微观世界似乎还更加困难，现在不得不乞灵于比喻了，如“秋毫之末”、“芥末之微”，想“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但这一个方面竟连比喻也感到非常困难，想借用日常生活中可以理解的东西，作为比喻来描绘它们，好让我们理解它呵！硬是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比喻与跛脚的辞汇。

文学方面的应用比喻，是真个令人钦佩，令人倾倒，令人欢欣，令人狂喜不置的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国诗歌的第一句就是一句名句，比喻诗的名句，用鸟类的求偶来比喻爱情。

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仅用了这十个字，能画出这样美妙的景物来，简直神奇得很。这是所谓‘意象派’的诗了，堆砌六个意象，都不像比喻，甚至于只能说是平铺直叙的。然而这《使至塞上》的整首诗，说到的大漠与长河，也就好比是边塞的比喻一样，是塞上的风光的，一对绝妙的比喻了。中国文字是所谓象形字，象形和比喻是相当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当然它们也有所不同。

李白的《远别离》是最了不起的诗篇：诗人面对他当时的形势，唱出“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这是中国历史的一篇最大的翻案文献。那龙、鱼、鼠、虎是极其令人震慑的比喻了，这是一个“大比喻”。大诗人用上了这么几个惊心动魄的语言，写明白了权力斗争中，连尧舜也没得一个好下场的大比喻，其目的在于晓喻君主，进谏给皇上，要唐玄宗切不可把大权交给李林甫、杨国忠，把边防委托给安禄山、哥舒翰。这正是一首政治性很强的抒情诗，然则政治抒情诗是从来都少不得用许多比喻的，盖中外皆然也。屈原的《离骚》，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等等，均属于是。

小比喻俯拾皆是，如所周知。不想多说了，“大”比喻却很值得一谈。

一部《圣经·旧约》的第一句，开宗明义，曰：“太初有道。”希伯莱文我不懂，英文本译作“*In the beginning is the word*，”本意应是“太初有言”，指上帝创造世界的首次发言。无论此字译作‘言’，或译作‘道’，可都是极大的概括，是特大的比喻。‘言’是代表着神的意志。‘道’在日常语言中是一条条的道路，用来比喻道理的，比喻真理的，是来代表‘知’的。后来，大诗人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一卷，开头的“太初有行，”（*Im anfang war die Tat*），这‘行’字的英译作 *Deed*，‘行’确是代表‘实践’的比喻式的用语。然而就文学来说，大比喻最好不要用在这种哲理性的大题目上，也仍然不容易说清楚。毋宁用在某一些比较大幅的特别复杂的生活场景上，作大规模的形象描绘之用，便可显得分外有声有色。本文的目的，本来也不过是要想说说这些个的“大比喻”而已。

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第一章里，写一个客厅中的晚会，当宾客群集的时候，作为主妇的一位贵夫人，就变成了一个纺织女工那样的奔走在她的棉纺厂的精纺车间的‘弄堂’里，哪里的细纱有断头，她就打它一个结，接上了它，操作就能继续进行，美妙地运转了。小说里这一小段是规模不小的大比喻，用来描写这位精幹的贵夫人组织这个晚会的进行，哪里的谈话要有点停滞了，她就上去说几句话，把这一个断头接上，然后又到另一处去调整一下那里的气氛，使所有纱锭都能正常运转。这段小说用了这个大比喻，变得很生动。不过不知道棉纺厂的读者可能读不大懂。

我曾学过托翁的这一手法，用爬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艰苦卓绝，来描写一个数学家如何跋涉在有如崎岖高山的一道数学难题的解答上。我专门借来了一本攀登珠峰的报告文学著作，从中抄一点，改写一点，写出整个登山的过程，将它压缩成将近一千字的大块文章，借以比喻一般人无法理解的，那种解答数学难题的艰辛的奋斗。看来，发表后效果还是不错的。不用这样的大比喻，真无法表现高等数学的运算之难呵。

另一次是在写一口石油钻井的井喷的场景时，也是比较难于描写出来的景物，就又用了一回大比喻的手法。这次是用了猛虎出柙，游龙入海的两个大比喻，就让一龙一虎，在钻井的井台上大闹特闹。效果也很不错。我得出一个经验，凡是难写的场景，均可用这大比喻的方式、方法，来试它一试。

雨果（*Victor Hugo*）有两首诗，我特别喜欢。一首写开隐杀人。死者是他的手足兄弟，阴魂到处追逐着它的杀手。一首写拿破仑从斯莫楞斯克败退，兵败如山倒。两首诗都是在咏史，本不是作比喻诗写的，但是我总觉得作者是写成比喻诗了。我有一个朋友被人谋害了，不知杀人凶手是谁。后来那人因为杀了一个兄弟般的人而发了疯，自己吐露真情出来。这使我想起了前一首诗。希特勒进攻苏联时，我们多数人总是要想起后一首诗来，结果真的是如此。两首诗都是绝妙的大比喻的诗歌。

1945年抗战胜利，嘉陵江发大水，我看到洪水冲下了一栋房子。一整个屋顶漂在水面，无数的耗子惊惶失措地在这屋顶上的瓦楞之间狂奔乱窜。我当时就觉这里面存在着什么内涵很深的东西。这一景象，好像是什么皇朝的末日，或某一上层建筑正在面临着崩溃的象征似的，后来果然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时，人民解放大军渡过了长江以后，国民党败兵的狼狈逃窜形象中，又全部重新看到了它一次。我最近把它写进了我的长篇回忆录《江南小镇》里去。

大比喻的作用很好，我特别喜欢它们。可以举出许多名篇佳作来。

然而比喻并不是文章中最有特色的因素，无须说得太多。本来我也不想多说它了。但高级的比喻艺术实在太多，不表示一下我的欣赏，有点遗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如此之深情，岂能不提？鲁迅翁的“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中夜沉醉起，何处觅孤莆？”这却又是另一种的深情，说不出是什么样的灵魂的微茫，却不是李商隐的那种脉脉柔情了，鲁迅心中牵挂着的并不是小我有衷心的诚挚的爱情，而是伟大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悲怆怅望。看来大比喻是能创出更好的艺术的一种灵感归宿。

“人生不相见，动似参与商”，是杜甫的大比喻。参，指‘猎户’星座；商，指‘蝎子’星座。这两个星座很美，秋冬是‘猎户’在中天；春夏是‘蝎子’在中天，从来碰不到一块儿的，用于人生中亲友不易相见，竟如此之难得见面，用得极好。使我奇怪的是杜甫的诗，很少用比喻。他惯于直抒胸怀，文字明亮透澈，笔墨丰富多彩，感情深沉浓郁，竟然少用比喻，少到找也找不到的。可见不怎么用比喻，也是能出大诗人的。

郭沫若的《屈原，雷电颂》则是政治性的大比喻，“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是的，剑劈比铁还坚固的黑暗，是当时的时代的了不起的声音！

艾青的《礁石》却是革命者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的比喻。戴望舒的“蝶褪了粉，蜂褪了黄”的比喻，写在一首很美的诗中，懂的人不多。美丽的比喻还是很多的，比喻并不是什么跛脚的残疾呵！

1992年

不十分考究也非不考究

湖北经济报要了解我的消费帐目。我从来不记帐，我从来不研究所谓家政学，无法作出计算。但这个题目出得很好，很新鲜。我就很喜欢从这些方面去思考一下新鲜的问题，并且也喜欢考察一些自己的事，来了解自己。

我的月收入，是中间偏上的干部工资。就今天来说是少得可怜的；好在还略有少许不固定的稿费收入。我支出在伙食上，大约是工资的五分之二，房钱水电费，约其五分之一，日常支出的，零花的，约其五分之二。没有更多的消费了，但是零花的五分之二是远远的不够花的，这就要靠少量的稿费来调济、贴补。贴补多少，就说不上来，但差不多是似乎够用了。我很少给人送礼，不上馆子，不请客。不喝酒，也不抽烟，也从来不赌博。我的消费观点大致是在“勤俭治家”信条的指导下的，几十年如一日，全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这些个观点到近年来，才稍有改变。

我译过美国作家梭罗写的一本书《瓦尔登湖》的散文集子，其中第一篇叫《经济篇》，对衣、食、住、行，发表了他的一些观点，我可能受了他的一点影响。他比较古怪。我没有他那么古怪，比他好些。但也有点与众不同。

我很勤奋，也很朴素。按理这就可以、也就很应该能致成巨富了，但却一点也没有，还是平平常常的，手里收入的，嘴巴吃掉，过得很清淡的日子。我的衣食住行，这生活的四大元素的我的情况，大致如下：

衣，非常朴素。供给制时代穿的是毛式衣服，是公家发的。有些毛料服装是公家配给，自己出一点点钱，找裁缝做的。这些衣服现在完全不穿了。50年代做过一套西服是专供接待外宾之用的。后来四次出国，做了三套西装，是因为公家发了三次治装费才做的，衬衣内裤也都是在治装费内开销的。近两年我才添置了自己花钱的一套西装，还买了一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学了点时新式样，想到自己不要脱离群众了，这两天，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才想了一想，以后我应该每年添置一套两套西装了。好像听说，日本人每年平均做十七套西装，我想我如果还能活十年到八十八岁的话，如已能添置十套之多，死去时就很够我穿的了。

食，也很简单，不是十分考究，但也非不考究。早餐：西式的牛奶咖啡，鸡蛋，面包，因其很省事；中、晚餐：少量的鸡、鸭、牛肉、猪肉轮换着吃，占数量的三分之一，因噎而废鱼。现在要求自己大量的吃蔬菜，每餐占总数量的三分之二，至少也是一半以上，非常舒服。

住，则不很满意。因住房面积太少，用此装人虽尚有余，用来装书则实在不足，已没地方再来放下我的一些书了。书架书柜把墙都占了，只能装几千册书，而按需要的话，少说也得是万卷楼。家有两架钢琴，一大一小；有四张书桌，都还不大够我用。已有一台电脑了，正在换代。购第二台电脑，购来不知往哪儿放呢？其实我的房子不密封，是不能安放电脑的，现将就着用电脑，也只是将就着住。夏天因装了空调，仍能正常工作。冬天无暖气，不得不年年作南飞雁，往深圳过冬。向领导提出过要求装暖气，并为了藏书，要大一些的房子。知识分子即读书人是不能不读书的，以便及时装入新知识，也包括装入浩瀚的旧知识。够我装书的住房一时难得解决。不过我比沈从文先生已经好得多了。房钱确是很便宜的，最近涨了一倍。这是合理的，是符合经济学的起码原理的，涨了就好。

行，我虽老矣，还能行路。虽说是不下楼，不出门，不上街，不出城，

也不出省，不出国；不上山，不下乡，都做不到。还能出差，偶尔出国。还能下乡，也能上山。市内有小轿车可坐，打个电话给机关，小车就来；几百公里的远路，也有车送。出门去，有车送飞机场，我从来就喜欢坐飞机。但除了出差，可以报销，否则即便是出去进行采访，或去深圳避寒，也只能是自费飞行的。离休前是自己要求离休，但离休后不但照样工作，而且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不比离休前差，甚至可以说比离休前强些。已经不能报销了，还能够自力更生，快八十岁了，似乎我反而进入了一个创作上的飞跃式的黄金时期。不知怎么的，以前讲究节约，很省钱，不怎么写得出东西来，现在稍讲大手大脚，讲究豪华一点了，有时还作穿梭式的飞行采访，倒写得更顺手，更写得出。现在收入也多了点。我想也可能我的工作方式方法更豪华，更现代化时，会写得更多更好，收入亦然，随着跟上来。这话怎么讲，恐怕得稍加解释。

我在武汉居住，但很少写武汉，我不敢在武汉多活动，怕人家说闲话。写《哥德巴赫猜想》时，气派很大。因为写《地质之光》时，曾去了一次华北油田，感觉那里热气腾腾，回来下笔，就有这么一股热气。为写好陈景润，在我到科学院见过此人之后；我们的卓越的编辑周明，还约了我和张瑞芳、赵丹、黄宗英几人一起去华北油田大玩了一次，后来又和冰心老师，严辰夫妇，李若冰诗人等去了华北油田和大港油田这两大油田去访问了一次，而后带了油田最蓬勃的激情和最热烈的气氛回来，再去数学研究所采访一星期，然后动笔写起来，情绪不一样，思路也不一样，写出来的东西就比较不一样。在武汉我就是不敢这么干的，我得小心谨慎，温文尔雅，尤其要规规矩矩，不敢大手大脚，最好缩手缩脚，免得招摇，当然是写不好的。我也写了一点武钢、长办和电网，因为他们气派比较大些，热情洋溢，接待也很开放，我很受感染。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泼辣、奔放劲儿，即使不搞豪华版，也不能夹着尾巴来过日子的。不来点豪华，不来点变化，许多事就干不出色。

所以武汉三十多年，基本上没有给它写过什么东西，大型企业不在内，长江大桥我写得真不少，但也没有真正地放开手呢。还没有阔起来，就怕人说你作风不艰苦，不按《讲话》准则，不够深入生活了。

这不是离题了吗？不是谈消费，又是谈写作了。我是只能谈谈写作，哪里能谈什么消费呢？要我谈消费，我也是谈创作的消费。

但是，岂独写文章是如此的呢？

我现在感觉到：勤俭治家只能治出一个勤俭之家，勤俭治国也只能治出一个勤俭之国。小康还达不到，遑论乎大富之家、巨富之国呢。但现在世界正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误了时机，就不再来，来不及了，真正以神奇的速度在发展着的是什么？是知识！不重视知识分子就是不重视知识的具体表现。不重视知识分子表现在不重视知识分子的消费上。知识分子的消费问题很值得研究。目前的情况就是臭老九的时代还没有彻底地过去呢！

希望知识分子变成香饽饽的时代早日到来。要是有点远见的话，就会相信，以后全中国将会人人都是，全世界将会人人都是知识分子呢，这样的辉煌的日子最终是要到来的，而且为期实在已经不会太远了。要知道，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知识是人类共同的最宝贵的产业，而不是别的。

1992年9月

自然、地球、人类

自然第一章

我们将从哪里出发呢？

我们从自然出发。它（自然）一无所有。而又万有；无所不包，亦无所容。

我们知道自然吗？我们自然是知道一些的。天文、地理，我们知道的并不算少了，但和它，自然本身相比较起来，我们就知道得太少了，少得简直可以说，几乎什么都还不知道呢。但是，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的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的。

我们，请问，算是什么呢？原先，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什么也没有，也没有我们。后来。有了我们，也有了这些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又后来，我们又有了“自己”，就有了我们的感官，能感觉到东西了，也能感觉到自然界了。我们感觉到自然界里存在着的万有了。从这些感觉中，产生了知识，知道了许多的东西。感觉，知识，万象，抽象，汇集在一起，分散到四面八方，又汇集，又分散，而知道了很多本来不能感受和明白的东西。我们的感觉越来越灵敏了。知识就这样越来越丰富起来了。丰富得简直不得了啦！事情也复杂起来了，遂越来越复杂了。

那么，我们究竟知道了多少？从这宏观的大自然，直至最大尺度的大自然界，到微观的小自然的基本粒子，直至最小尺度的无质量的光子那样的小自然界，以及那恰好处在两者之间的我们人类，既是主体同时也是客体的，所谓人类世界的人的本身，我们究竟知道了多少呢？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之无知亦无识的。对于人自己，我们也知道得可怜得很，只有很少，很少的一点点儿。再大不过了不过地球这么一个行星上所能知道的一点点，外面还有个大的不得了太空呢。不过也不能妄自菲薄。毕竟我们已有兆兆亿亿万万年的“时空”历程作为我们的从非人类到前人类到人类的祖先的很长的经历了。然后，从近一百万年来到这个最近一万年的时空历程中，开始了这么一百个世纪的新历程。这样过了九十九个世纪，到了这个20世纪的，本世纪末的今日，人类的感觉、智能又跃上了一个高潮。这又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一个划时代的从一无所知到颇有所知的飞跃般的变化，已经进入了新的开始的开始！

不妨大言不惭一下，我们将来是要知道一切的一切的！

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对于自然的探索和研究的成果中，有了很重要的发现，如一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古典物理学的权威著作，至今仍有大大的用处，可是，现在它却有点不够用了，许多问题它已解决不了。好在，两卷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也是一项辉煌的业绩，一百多年来它经受住了多次的考验，历久而不衰，至今还很有用处，它确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古希腊已知道电和磁了，中国的黄帝，更早就已造出了指南车来。但是，人们都把电与磁当成互不相关的两种东西。直到19世纪，人们才知道了，电的周围有着磁场，磁力在某种情况下能够感应出电流来。它们可以看做一种力的两种形态。而差不多所有的物质的：摩擦力，原子结合分子的化

学力，物质的较大微粒接合起来的黏着力，物体维持其原形的弹力，都是由电磁来的。原子全是带电的磁体，地球也是一个大磁体。太阳也是一个更大的大磁体。这个电磁理论是我们的旧世界的最后一个巨大贡献。如果说，19世纪还是旧世界，那么这个世纪之后，很快的，人类就要逐渐地，深入到另一个新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密度中去了。

此外的力：重力，又称地心吸力，万有引力的，它是否也是和电磁力属于同一种力呢？电磁场和引力场，是否可以统一起来，叫作统一场？爱因斯坦研究过这一问题，达几十年之久，还没有成功。

19世纪是古典物理学得到最高成就的一年，以电磁学作为代表。划时代的变化这时已经接近起来。一到了19世纪的最后一年，就是1900年。年底，12月的14日，一件献给20世纪的圣诞礼物，即是普朗克的量子学。这里所说的一个新时代、新世纪，应该说，就是从量子论的兴起，而开始的。

这位德国物理学家名叫麦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揭露了一条自然规律：

$E=h\nu$ ，这一个 ν ，名叫“普朗克常数”，是个可以通到极小的微观世界里去的，通到最小的自然界里去的最基本的一个常数。

万物虽然复杂，归根到底都是由小到不能再小的“量子”来组成的。譬如我们冬天烤火，火是一星星一星星地，极微小微小地，好像一极小包一极小包地，一极小捆一极小捆地，轻轻地，振动着，颤抖着，靠拢来，密集地，紧紧地组成热气腾腾的热能，去温暖烤火者的。这些小到眼睛看不见的，不停颤动着的粒子，名之曰“量子”，一切事物皆由“量子”组成，因此它具有一个决定性的特点，它是绝不能再有变动的，普遍适用于一切事物的。它是适用于一切的颤动的数，故称“普适常数”。这个数被普朗克他们计算出来了，非常非常精确。它最初是中国物理学家叶企荪（普朗克的助手）参加了计算小组而计算出来的。自从有了这个普朗克普适常数，就有了可以计算那些很小很小，小到根本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论多么微小的粒子的质量与它们的能量的基本单位。从此，人类可以用它来认识小自然，并用它来精确地计算那些看也看不到，摸也摸不到的，组成自然界的物质的结构的极微小的任何种粒子了。

这倒很像我国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有点差不多的相似，然而老子并没有拿出开门钥匙来。现在钥匙已经握在当代科学家的手上，完全可以用来开启了一扇又一扇的“众妙之门”，找到了无一例外的所有发现了的微小的粒子。事实就是如此了。这是很了不得的！

我们的第一个要求，也许可以说：凡是20世纪21世纪的人们，最好尽可能地，都对量子学说有一点概念，多少能有所理解，哪怕有点印象也好，否则我们就将无法，或多或少地来理解一点当代的这个高科技的特大革命。

任何历史上的其他革命绝不可能与之相比，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由它引起的当今的，以及近期的、未来的，世界上的一切巨大的变化，包括这个“多事之秋”的，本世纪末的各种大事、小事，甚至包括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专题，自然、地球、人类、文字、哲学、诗学和其他的，国际的、国内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等等的变化，一切都在其内。

20世纪对于自然界，或者说，对大自然的探索和研究，贡献已经很大，大到现已面临新世纪的前夜的现在，还不可以作出估量来。这是因为20世纪还没有过完，而其成就大到了暂时地，还无法精确地，估量到它们的地步。

想当年,20世纪刚开始不久的1905年,5月,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首先借助于普朗克的量子的概念,他发现了光子(光子的命名是后来定的),在人类史上领先迈出一个大步。这是他献给人类的新纪元的两大堆贺年礼物里的第一件(后来这让他得了个诺贝尔奖金)。他同时揭露了一条自然的基本规律:光速是宇宙中的速度的最高极限。光速(代号C)这一个C,也是一个再不会变动的常数,不过这个常数,乘以平方以后,就变得非常非常之大,它是天文数字。它是可以应用于宏观世界的。还有,他给出了一个所谓“质量是能的量度”的有名公式,也是那时提出来的,而麻菰云的升起,就是这个公式的最好的说明,以后还要给予一些说明的。

1917年,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那是讲空间,时间和整个广漠的宇宙的结构。人管起宇宙的事来了。不久之前,人真能去到月球上了,月球现在已属于地球的一部分。以后,火星也一样要成为地球的近邻。还有很多怪奇事,后面再说。

狭义、广义相对论都是很不好理解的,但是有一些初步的概念,多少能有点理解,真是必要的。对于肯钻研的人,它们也并不是永远地不可能理解的东西。现代物理学引出的波澜壮阔的新纪元,和一切引人注目的高科技,都是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两个泉源出发的。

自1925年到1927、1929年,光(粒)子开始受到了光(波)理论的挑战和冲击。这个问题在物理学界,是长期以来论争不休的。至1939年,光之既是粒子,又是光波的,所谓“波粒二重性”的理论终于成立。原来所谓光子,是一个个的单个的粒子,但光子若出现,就是一窝蜂的,蜂涌而出,出来就成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亿大的群体。一只25瓦电灯泡每秒发射的光就是六千亿万个光子的能量子数,它们自然就不可能不显示为起伏不已的波澜似的光波来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电波呵,无线电波呵,什么波长呵,波段呵,听收音机要选长波呵,选短波呵,我们依靠科技的智识,已经懂得很多东西了。同时我们开始知道,人的感觉,人的感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阳光通过三棱镜可以看到折射出来的七色光谱,肉眼所见的光辐也只有这么一点点。这只是很狭小一段辐射带。人的能见度,原来小得很可怜:红光的波长是比较长的,这是人可以看见的,比红色的光波更长一点儿的红外线的光波,猫眼睛能看见,人眼睛反而看不见了;紫色光线的波长是较短的,人眼也可以看见的,比紫外线更短一点儿的波长,人眼就看不见。“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人眼能看的光也就只有这么小小的一个波段而已。人能依靠的感觉的有多少呢?人只能依靠思维来意识到红外线和紫外线,和比它们更长更短的波,人只能靠思维来意识到感觉的东西。感觉的错误太多,全靠思维来纠正感觉的错误,引上正确的道路。当然感觉也还是很有用的,但不能过份的夸大它的作用。当初不知道宇宙间有许多我们的感觉器官根本不能感觉的东西。话虽如此,我们没有道理来任意贬低感官与感觉的作用。

进入20世纪以后,爱因斯坦在理论物理学的领域里,既继承,又更新到了在无数新的情况,新的领域里面,取代了牛顿理论的位置,逐步逐步地《相对论》既保留了,又发展和取代了牛顿的《原理》。而物理学的发展,甚至也已开始在批评《相对论》了。他们说,在它的好像北京的天坛似的如此完美的宏大的建筑物上,已经出现了三条裂痕了。此是后话,暂时可以不提。提起它来,只是为了说明自20世纪以来,人类的认识发展是这样的猛烈、迅

速、深刻而且丰富、无比的精彩，但是，这一点却很可惜，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曾感觉到呢。相形之下，不少人根本还没有感觉到有了什么变化。他们的自我感觉倒是非常之良好呢。这样的无知呵！真是令人恼火的。

现在自然正在被认识，正在大改变，地球也是如此，多数人就是不知道。地球上的一切，很糟糕，大战倒是不打了，都害怕了，小的局部战争到处在发生。生态环境在改变，森林迅速消失，沙漠却在扩大，臭氧层出现了空洞。日子难过，大难当头。世人连一点危机感也没有。他们模模糊糊，自鸣得意，一点不知道高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大世界在建设，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智能高速公路，人类要上天。先上月球住下，作为转运站，再从那里登上火星，和其他人类可以居住的卫星和行星，目前建设不了太阳系，正在探测太阳系，以至银河系，河外系……

自然的秘密正在一个个的被识破，地球的奥秘也正在一个一个的被破译出来。新奇的事物层出不穷，向着老的人生观、老的世界观、老的宇宙观挑战呢。如果人们现在能感觉到或意识到这个，那就是一个新的转变的起点了。

地球第二章

地球只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太阳系。也算一个星系，好似一家子，但是很小的一个家族，兄弟姐妹共九位，通称做行星。其中三个行星：火星、金星、木星，是我们这个名叫地球的行星上的人类，用肉眼都可以望见的。其他的五个行星，水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却是肉眼不但可能望见的，而且又全都是不可及的，一个也没有上去过的。总算我们已登上了我们自己的卫星、月球了。现在，在本世纪末，用机器人去访问火星这行星，此事已登上宇航日程，已见了报。据说一九九八年又要有一次，已是第九十多次，甚至上百次了。

过去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什么 ONEWORLD（《一个世界》）。但是这“一个世界”也有大小之分；大世界遥指满天的星斗；小世界专指咱们地球一个而言。先说一说大世界，即宇宙，其大无法比拟。我们地球所属的太阳系，又是属于银河系之列，银河是可以看到的。夜晚里，中国人看它像一条银河；外国人则说它像一条泼满了奶水的牛奶路。在它的界外有银河之外的所谓河外系，肉眼休想看到它们。用了高倍数的望远镜向着更远处望去的话，现可以看到已接近于宇宙的边境区域的许多的许多的类星系。它们类似星系，而实非星系，故如此命名。

小世界中，暂不忙说地球，应该先说一说微观世界。它们遍全球，以及全宇宙，到处都有，比蚂蚁还小，也比蚂蚁还多。这些最小世界，又叫粒子世界，是最小小的了，小到不可思议，现已有量子学家和高能物理学者在考察它们了。他们在最大的大机器，叫做回旋加速的大机器中作它们的试验，从中可以看到它们的来来去去的轨迹，还可以摄下它们的照片来，它们有的小到无踪无迹，连照片也拍摄不清楚，但也已可以计算出来，并描写它们的状况如行踪、质量、能量、体积及其作用。而现在哈勃天文望远镜上了天，情况大变了，不清楚的已清清楚楚的拍摄出来了。

但地球这个小世界却与众不同，它暂时只有一个。它是独一无二的，地球上面是有人的。据说，经常还有飞碟来访，是外星人派出来寻找我们的，而我们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外星人的踪迹。已有了计划，将给哈勃天文望远

镜加一个镜头，好让它寻找第二个月球，不过还是计划，还未找到，因而我们地球至今还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真有了外星人呢，会不会像有些可笑的儿童读物和无聊的政治家的疯狂谰言似的，说什么外星人就是想要侵入地球，地上的人就有了对外星人的敌对的情绪，想跟它们打什么星球大战了呢？

地球只有一个。世上却老在演出三国戏。这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一种说法：说这个小世界有着多少国家呵，目前已分为三个层次。美苏两霸为第一世界，现在只剩一霸了，成了美国独霸。它算是最大的赢家了；第二世界为发达国家，为数倒也不少，非常文明，不过日子也并不好过；第三世界则为不发达国家之群，数目很多的，出的事情也多。中国谦逊地自居于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有点隐然以第三世界的头儿自居。自从小小圆球，一分为三个世界以来，纵横捭阖，事情不曾弄好。第三世界中，有不少国家在打游击战争，想实行社会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国家，人为地挑起许多灾难，造成了天灾、人祸，战争不断发生，民不聊生，灾馑遍地，赤地千里，我们从电视机上看到许多非洲儿童，饿得成了皮包骨，嗷嗷待哺，苍蝇在他们的脸上爬来爬去，他们竟然莫知莫觉的，令人泪下。

地球只有一个，可是已经打过了两次惨痛的世界大战，扔下了两枚核弹。现又发明了氢弹，更加厉害，还在孜孜不倦地寻求更大，更大的杀伤力。这多少要怪爱因斯坦老人了。他总归是这些新玩意儿的物理学的理论基础。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打起核战争来，大家都要遭难，只有死路一条。地球上已生产了的核弹、氢弹，很够毁灭自己数十百次之多。奇怪的是核试验仍在进行，海底、地下，没完没了的试验着，最近更进步了，改为用电脑的模拟试验了。这样下去，简直是科技越发达，地球的景况越发危险。而爱因斯坦的场统一论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获得结果的。

好在，现在又还出来了一个高科技，它的神通更广大了。从前是科学高出于技术之上，技术跟不上去，现在技术高上去了，科学到的地方，技术都能给予实践得完美无缺。因此，高科技是有可能来拯救地球，脱离出全球覆灭的危险境地的。这高科技，可是更使地球变得更加小、越发小了。20世纪初，从中国到美国去，要坐二三十天的海轮，现在十几个小时就从空中飞来飞去的，一飞就到了。以后民航也用上了航天飞机，从洛杉矶到东京只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可以绕世界半周，那不就和许多大城市的市内交通堵塞相比，差不多一样的快慢了？地球成为一个城市了，好方便！

地球上的国家如今组织了一个全世界的组织，名叫联合国，联合国里还有一个安全理事会。不过安全理事会是并不能给这个十万火急的，危险的，地球的危险地区或地带，以多少多少的安全感的。为了科威特遭到侵略，安理会批准美国，用联合国名义，组织了以美国为首的一支联军（联合国军），打了一场代号为“沙漠风暴”的最新方式的战争，大举轰炸了伊拉克，逼得萨达姆投降，乃解放了科威特。从此之后，这联合国已忙得不得开交了：哪里失火，都要向它报警。它就得多次从事于人道主义援助，用人道主义的美丽的名称，当起警察兵来了。这个联合国已是国家之国，是 UN，最大之国，干涉了许多地方的战事，派兵到这里那里去，却毫无用处。地球上还有几十个地方，跟什么索马里、卢旺达是一模一样的，随时都能发生各种样的危机。派兵到柬埔寨去，一时好起来了，一下子又不行了。不久前，海地闹得也凶，南斯拉夫闹得最凶，真是不得安宁，看来联合国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不大顶用了，它也真正为难着呢。

这地球，到底怎么办？我们还没有说到大气层的危机，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呢。我们说的只是人祸，还没有说天灾呢。

有人说，这就是世纪末，末日审判日已经来临了。是吗？

有人说，地球小得很。没有什么了不起。本来就是四大皆空……

但是，地球上有人，人可以起重大的作用！人，是可以决定一切的，不光是自己的命运，而且假以时日，是一定可以控制宇宙的机制的。

人类第三章

人类是可以认识宇宙的，也只有人才可以认识宇宙。人之认识宇宙还是很不够很不够的，但现在人已经认识到了的，却也已经很不少，很不少，很不少了。

假定说，人之认识宇宙已经有一百万年了，九十九万年是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之中，什么也没有弄清楚。这算是第一个的阶段。

那时间，人只知道有个法力无边的神，向他膜拜，向他磕头，受他控制，顺天应命，这第一个阶段是神权阶段，是一个非常野蛮的过程，时间如此之漫长。

后来，人的认识逐渐进步了，人类很缓慢地进入了文明的过程中。人利用了自然来制造了一些、和好些的人工的事物与其制度了。王权乃逐渐地取代了神权。但神权却还是至高无上的。王者自称天子，成了神之子。从神之子代表着已经统治了九十九万年神权之后的王权起，事情才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这时，人对大自然的认识，经过点点滴滴的累积，总结成为丰富的智识，毕竟已增大了不少的积累了，人渐渐可以和大自然对等起来了，或者说，甚至可以对抗起来了，甚至对于自然可以有所加工，并有所改造了。是的，人已有了一些大自然没有的，人自己发明、创造的人工元素、特别是人工智能等等。这样就开始和发展了这么一个已一万年的有点儿文明的人间世。

蒙昧的，野蛮的九十九万年过去了，是人类的第一过程。接着又一万年也过去了。这是有点文化的，有点文明的一万年，现在也过去了。这是人类的第二过程。

现在，我们是否可以再朝前展望一个一千年了呢？现在快要过完我们的这个 20 世纪了，我们感到我们正在逐渐地进入到又一个新的过程中，即第三个过程中去了。这个过程要短得多，一千年也说得太多了吧。总之是用不到那么多年头的。现在是进入第三个过程的所有必备条件，差不多已经完全具备了。

古埃及、古希伯莱、古希腊、古印度和我们古老的中国，等等，都已走过了这样子一个九千多年的，或七千多年的，或五千多年的，或有了历史文献记录的三千多年的历程，这是人类的第二过程的全过程。

这过程，在西方：从希腊，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到今天，这一条线索是非常清楚的，古希腊可以说是从荷马时代，从克里特岛，或赛泼洛斯岛那儿萌芽，传到雅典这个城邦的中心，再传到罗马城邦，经过文艺复兴，到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一切都是清楚的，若以人为代表，大体上就是从亚历斯多德，到牛顿，到爱因斯坦三个历历可数的大思想家。第三个过程是从普朗克的量子说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确立，寻引着我们进入的。

在东方，在中国，也在差不多时候，有过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虽然是

人才辈出，可是社会生活方面却比较停滞不前，在智慧海中虽有过很多很大的贡献，明、清以后，发展就不太大了。到近年，才出了杨、李、丁、范四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不久将来，中华民族肯定也是会有可反映未可限量的辉煌前景的大思想家。相对而言，四位崇高的中国人对人类的知识的向前发展，也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了。

我估计这第三过程将一个极大的速度飞跃前进。从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算起，只差几年就是一百年了。这一百年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第二次大战的最后，扔出了两颗核弹；谁想得到，四五年刚结束了战争，四六年却立即出现了第一代的电子计算机；而四七年便是第二代电子计算机。现在第五代的电子计算机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更新的神经网络的计算机也有了消息。正在发展的信息高速公路就成为信息社会的信息时代的一个顶峰，而正好服务于空间时代空间社会了。

紧跟着是 50 年代，放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各种火箭和各种航天器升上了天空。人第一次进入太空；然后，60 年代是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人的足印登上，踏上了月球的尘土。所谓“空间时代”便这样演出了响彻云霄的交响乐的前奏曲。又过了不过十年，机器人将考察火星的机器降落在火星的表面。

同时，回旋加速器终于将物质的结构基本上弄清楚了；从夸克与胶子的发现，物理学暂时告了一个结束。同时天体物理学也将宇宙的诞生与归宿、宇宙的年龄与时空连续区的大小规模等基本概念，一个一个的掌握了起来。看来，只要再有几十年，人类将生活在月球上、火星上，以及其他的天体之上。今天还不敢想像的许多变化，正在如潮水般涌来。

一千万年来的人类发展就是如此这般！

现在我们就是站在这大变化的门槛上！

不！已经跨过门槛，进入了空间时代！

现在我们的地球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我们人类自己已濒于彻底毁灭之境。

1992 年，我在《攻主战场者谓主力军》一文中，已说，“电子计算机差不多就是高科技，高科技差不多就是计算机。”这话我说了不止一次，现在要再更改一下，改为：

“计算机就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是计算机。”等到神经网络计算机成功，计算机这个名字甚至就可取代高科技这个名字了。

光粒和光波原来是分了家，对立的，现在已统一起来，称为“波粒二重性”。

光子电子原来是分了家，对立的，现已统一起来，而被称为“光电效应”。

科学和技术原来是分了家，对立的。将来统一起来，一并称为“科学电脑”。

论老年

非老年，决不知道老年是什么。老年自身也是有很多个层次，不到了那个层次，就不会知道那个层次里的种种情况。老年就是衰退，是减法，甚至是除法，是雕刻刀的切削、琢磨，使大理石、花岗岩碎成粉末、屑粒，飘落而下，是一天一天的失去，直到一个最后的终了时刻。那时，所有他得到过的一切全将一点儿也不留下了。他一点儿也不带走。老年就是在永远的安息前的，一点儿微弱的颤动，至于波平浪静为止。但老年人自己却是不甚知道这一切的，他的最后只有一次回光反照了，再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死得像石头一样的沉。

高能粒子的研究，得到了电子毫无规律可寻的结果，电子的一切，都是偶然的。因之世界也是偶然的，亦无规律可寻。你找规律，找到很多，你寻求知识，也得到很多，没有用处。你不能知道电子是什么，你抓不到它什么，它在你的眼鼻子之下，在加速器里，一溜过去了，你拿它没办法。老人之所以为老人，也是没有规律可寻：为什么这人那么年纪轻轻的去世了，然而他呢，为什么硬是老而不死的呢？为什么忽然现在又果真死去了呢？不知道，老年之谜，谁能回答？世界之谜，永无回答。

在自然界里，已经回答了的问题，而还不能解决问题的，很多。牛顿谦逊地说：他只是在海滩上拾到了几只贝壳。真还差不多如此！他在小尺度里，都对，一进大尺度里就都不对了，于是，就靠爱因斯坦来解答牛顿解答不了的。而爱因斯坦也说了，他时常觉得，他自己没有弄懂了什么。人们喜欢问老年人的长寿经验。没有什么长寿经验可以回答，可以奉告的。何况我们不能说一个老人就是一个老人，不一定。这个老人，他可能还很年轻呢。反而一个少年却可能不是一个少年，而是一个衰老的，或颓丧的，病人或思想负担很重的人，抑郁不乐，比老人还不如。或者已是一个少年老成的人。而有的老人，鹤发童颜，看去是个老天真，乐天知命，实际思想陈旧。这样的人也很多。人是五花八门的。总之，没有规律可寻，你总归弄不懂的。主要是看他们的思想。老少不以年龄分。要从思想来辨别他们的长幼。要知思想上年轻，跟小孩子似的活泼泼的老人，是很多的，只此原因是使他们的生命十分长寿的最有效的钥匙。然这也算不上规律，世上已无规律，这是言明在前的了。

论科学

科学是比较接近于获得了真理，即相对真理的，因为它现在是讲“相对论”的了，而且它向来是欢喜进行认真的研究、试验、论证，后来又特别讲究定量，从来一丝不苟。那么，它和梦幻大约有很大的距离了吧。不然！它们的距离竟是意想不到的，科学是那么样地靠拢梦幻，和梦幻相贴近的呢。哪里是个远近的问题呵！可能你没有想到吧，科学和梦幻竟是、或差不多是，一回事儿的呢。

科学家说：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

嘿！这说的是没有幻想呵，而你说的却是梦幻。然则梦幻与幻想，岂不是一回事？甚至于与狂想曲也是一样的呢，科学时常有像萧邦的《即兴狂想曲》似的激动人心的优美的音乐风格，当然它也有它极严肃的一面。它是非非常地严谨的。

一部《封神榜》里面，包含着多少的幻想的故事，有着非常之梦想的风格的呵！它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它敢于想人之所不敢想，言人之所不敢言。这书不算是写得那么好的，然而它里面的神话，今天差不多都实现了。

还有什么“精卫填海”，也是当作神话来讲的，可是对于高科技来说，现在若要填海，真是算不了什么。到处都是填海。就是“女娲补天”，也是神话，现在却也正在研究，怎样把臭氧层的空洞，补起来呢。什么千里眼，是望远镜，岂止远望千里而已，哈勃望远镜已望到数以亿万光年计的遥远之处了。所谓顺风耳，不过是打电话而已。现在已可以既打电话，又看得见对方的形象，声音笑貌。近来更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N)计划，就更了不起。坐在家里，不但不出门，就能知天下事，还能用它来参加国际会议，如置身在大会场的现场上一样。人在家中坐，便可看医生，作检查，接受治疗。医生可以根据任何地方传来的清晰度高、X光片或扫描图像，进行会诊，手术时还可以与远距离之外的，经验丰富的专家保持声音和视觉的联系。长期患者可以在家中接受定期检查，得到即时治疗。

过去所谓“乱说《西游记》”，孙行者可以“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现在火箭升空，比孙行者还要厉害。“探险号”卫星已经飞到了太阳系之外的银河星系去了。或早或晚，人类是要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去的。

人所幻想到的什么，科学是都可以给人去做到的。人类的梦幻，就是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或更美好的世界吧，这肯定可以通过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精心设计，组织施工，群策群力，创造出来的。信息高速公路是最近国际上的热点，美国一发起，德国、法国、日本，以及新加坡，印度，台湾都在策划、设计、投资、着手进行了。深圳也在按照国际技术标准进行信息塔的设计，以建成一座可使光缆网与微波网组成天上地下、立体交叉的全封闭的信息高速公路，很不错的了。

不要怕幻想。能做美丽的幻想，是好事，并不是坏事。能把高科学和高技术，来和梦幻、幻想结合起来，是大家的希望，人民的希望。我们最怕的是落后。我们最不喜欢的是没有幻想，没有梦幻的人，这种人可能是没有出息的庸人。

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这话真不错，这是真理，相对真理，相对于败类来说的就是如此。不幸世界上还有一些毒虫、恶狗、还有一些行尸、走肉，

人民的幻想和梦想是改造好他们，不接受改造就只好消灭他们。

论真理

读了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著：《人生论》的译本（湖南版），第一篇的《论真理》不大满意，就萌一念，自己来试试，回答一下“什么是真理”？培根对此一问，说了什么呢。他反对了一些怀疑者，把真理视作枷锁，他们不愿听，而宁愿听信些谎言。他说了一顿谎言的不是。转而歌颂，真理是最高品德，是知觉之光，他赞美道，如果“永远绕着真理的枢轴而转动，虽在人间，也如同生活在天堂里了”。这些话稍稍有点不着边际，他后来谈到实践真理重要，又骂了一通虚伪、背义和欺诈，就此完了。我觉得，他没有道出多少道道来。

最近我感到：真理，不是别的；真理，就是梦幻。当一个人在梦幻，他是在梦幻中寻找着什么的。他寻找的就是真理！你们也许听到了会感到意外。难道梦幻能和真理加起来的吗？是的，连得起来的，因为他所梦幻的，就是真理！他读书，思考，争辩，他认为他寻找、追求、探索的，乃是真理？但是，如若他依靠的只仅是理智，未必就能找到真理。这里是不能忽略了感情的。认为感情无边无际，靠不住；不如理智的条理分明，有根有据，靠得住。可是哲学家那么多，科学家也那么多，可是他们曾给了我们什么？答案并没说清楚。真理是什么？他们走路、过桥、乘坐过轿子、汽车、飞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都不能把我们送到真理面前。梦幻却飘飘荡荡，把我们送到真理面前，拿到真理，或把我们送进真理核心里面去。

梦幻是人人有的。夜夜都可以做梦，时时可以幻想的，虽不是每一梦幻都能送我们到真理面前。然而梦幻之多，多得惊人。梦幻很随便，梦幻极有兴味，决非哲学家的冥思与辩才，科学家的推理与计算，所能媲美的。梦幻，我们可以看看，给过我们什么？世上的人都做过多少的梦幻，梦幻又出过什么真理？

给了给了。请想：轩辕黄帝做了什么梦？大禹王又做了什么梦？秦始皇做了好多梦？孔夫子做了多少梦？唐宗、宋祖多少梦？成吉思汗，朱元璋，康熙与乾隆，还有孙文、蒋介石，毛泽东做了多少梦？这是一组大人物的名单。依此类推，也可以把西方的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印度人、以色列人、马雅人、爱斯基摩人，所有的人、所有的梦，他们梦幻所得的真理，都列举出来。他们的梦幻多数是拿到真理的。现在，我们可以下一个评论了；所有的梦幻都达到了相对的真理，如：

哥伦布的梦幻，果真发现一个新大陆。是否真理？至少是相对真理吧。

肯尼迪的梦幻，把人送上月球又请回来。是真理吗？也是相对真理吧。

克林顿和戈尔的信息高速公路的梦幻，怎么样，是真理否？等着瞧吧。

爱因斯坦的梦幻，发现了狭义相对论的光电子和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波，是真理不是？恐怕是非常接近于相对真理的，或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相对真理了。

逍遥游

冬天来了。武汉是摄氏零度或零下一度二度到十度左右。年老无法适应，只好往南方跑。来到深圳避寒，六年来都如此。不然的话，可能早已进鬼门关，见到阎罗老了。一到深圳，气候可是相当的暖和了，大致是在十五摄氏度到二十来度左右。阳光灿烂，花开如锦。除了偶然也有点寒潮在十度上下，只不过有几天的光景罢了，也能挺得过去。到深圳我住在中国作协的创作之家。这是一处好地方，在麒麟山下，天鹅湖畔，而且是在深圳疗养院内。我因而又能拾得了若干余年。我曾给它题过这样的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此枝可依。”并加注曰：“‘此枝’者，创作之家也。”

此地风景佳丽，有紫荆，花开如紫霞，杜鹃红似一片火。正是万紫千红！我起先是喜欢红杜鹃的，后来却更喜欢观察紫荆树的，一朵花五个花瓣，摆成个半圆形状，吐出花蕊五茎。一枝可着花数十朵，一树上可茁枝数十百条，一树十树便成花球、花庭、花园。它约略可分三色：新紫、深紫、淡紫。等到花开放到淡紫颜色之时，花瓣便落下了地，铺成地毯。它的花期长达半年之久，我感到这至少也是南方的一种最佳丽的树种了。花期是否还更长一些，则非我所知的了。因为我只在秋冬才来，不能知道它春夏的景况。

我常坐在创作之家的走廊上曝冬日，并默默思考：为什么一株，两三枝紫荆花树，安放在一个庭院里，就能叫人欢乐无涯？为什么几栋楼房放在山下湖畔，绿叶荫间，可以令人得到宁静、快乐和创造的兴趣，体会到不亦乐乎的味道？而且，为什么天地之间，有了山和水，平原、大海和海岛，城市和乡村，还会有飞禽、走兽、虫鱼和七窍玲珑的人类往返其中？为什么在天地之外，还有更神奇的太空，有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乃至类星系，叫人飘飘而欲仙，想作太空之人？真不知哪位总设计师，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这多的美妙事物，形成一个宇宙？也许，这是永远也不会有任何答案的。

（不过，对我来说，我可是早已给出了一个答案的：既然说，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上帝，这位总设计师本人，却又是人给创造的。是人自己，在创造着、发现着、鉴定着、并猜想着的所有的一切，所以人就是万有的创者。人就是自己的上帝。人们叫唤了千百遍“上帝”，上帝也不见面，就因为不知道他老人家就在人的自个儿的心里。）

在闲居中，突然收到一位朋友寄来的一本书，书名《逍遥游》，李士非著，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内有序文一篇，代自序诗一首，及《逍遥游》上下篇，两大组组诗。展读之下，一口气就读完了，兴味盎然。这是一本奇特的作品，我从未听说过，会有人有此等奇异的经历。原来诗人李士非于1991年的春节后，突然心机梗塞，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抢救，醒来后却发现他自己的大脑皮层出奇地活跃。据序文中的一位金先生介绍这老李当时：“灵感连爆；诗思汹涌。”就这样，病人伸手要起纸来了，医院也竟然能同意给他以纸，并准许他左手打吊针的同时，右手使用来进行创作。序文中说，“就是在这样的姿势里，从2月19日到3月2日，接连十三天，作者在危重病号监护室的病床上，一气呵成，写出了这首约1300行的长诗”来。

真是罕见的诗篇呵！

“1991年/真够朋友/它把彩色斑斓的印象/塞进我的大脑/让我慢慢思考/思想的自由/谁也禁止不了/洁白的病床/正好做思想起飞的跑道”（《病

床是思想起飞的跑道》)

所以我们是在起飞的跑道上了。原来他在病中最先想到的是前一年的旅行。他最先的一个心愿是去探视一颗忠贞的心灵。心灵可是不容易捉摸的，但说出一件事来，也就能解决这等的问题了。

它不是朦胧诗，但又有朦胧诗味道。他心中急于说出来的这人物的特点，就是他的忠贞之心。可怜他早逝了。我们不一定要知道此人是谁。知道这颗心灵就够了。

然后，我们随着他到了闽粤赣边区的大山里，探望一个《不肯出山的作家》及其全部的家庭悲喜剧。然后诗人去到漳州和梅州，度过了一个壮丽的水仙节，由水仙所组成的一条巨龙，在烈火中翻腾，让诗人写成了《水仙花节与龙的涅槃》。

接着是黄山和九华山的奇妙遐想，两首诗：一名《与无瑕大师对话》，又一名《天地间的奇迹》。到这里，诗人确有“上下而求索”的一种极其自由自在的逍遥游的感觉了。以上几首诗组成了这部长诗的上篇；再往下便实际上是这本书的主体的下半部，吐露了诗人心中最关怀的若干个人物的生世和遭遇了。

这是一个甚为壮阔的题材。这 1991 年诗人为这题材奔走在北京、上海好些地方，见到了好些人物，让许多不容易开口说话的人说了话。一共十个标题，七个都可以摄制成为影视片的，可作为当代历史的见证。这里不必叙述它们了，好留给读者他们自己尽情地来作一个完整的观赏和美的享受。

此外，又有一些逍遥游式的乘兴飞翔，乃至《看一下我的彼岸》，很有意思。（但是，要读者们自己去看他的那个彼岸了。）全书的最后，感谢护士、医生，并作结语。

但当诗人在这番逍遥游已尽兴之时，我心里却有了一种感觉，似乎作者和读者的心头也逐渐地变得愈加沉重起来。虽然他现在已经放下了心事，在危急的当时只怕来不及说完了，该说的话都已说出来了。他完全可以大大的逍遥一番，他却又回到现实的人间来了。他临危时能如此逍遥，如此解脱，如此潇洒，如此无畏，而病一好转，似乎原来的束缚感又回来了。难得的《逍遥游》业已完成，下次还能再作这样的“逍遥游”了吗？那可是不能轻易去尝试的了。看来“逍遥游”，总归是难得有的，也不容易再有一次的。那样地难得的经验，我们老李能有这么一次已是了不得的福气，是他一向的豁达与刚强的性格赐与他的了。

回到前面的紫荆花下的沉思上来，觉得“逍遥游”真是世人所向往的，但它也不可能是真正地完全地逍遥的。庄子的《逍遥游》可也不怎么逍遥呢。其名为《逍遥游》者，实际上都是想大有作为的人，都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不管他们说得多痛快或含蓄。那么还是老实不客气的奋力地作出点什么来吧！在紫荆花下的狂言：“上帝就是我们人”，或者“人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实则是最平淡无奇的一句话罢了。

珍贵的精神遗产

——读《闻一多全集》

欣逢《闻一多全集》十二卷出版，心潮澎湃，感慨万端。四十多年前夏天的一段往事，犹历历在目。我那时不在昆明在上海。李公朴先生先倒下去，跟着是闻一多先生倒下了。他们都是被法西斯特务用无声手枪杀死的。然后，传说在黑名单上居第一名的有陶行知先生，而陶先生突然因脑溢血在上海去世了。

那一段日子，是中国的最黑暗的时候……已经变成历史了。

有时候觉得，那样悲恸的历史好像被人们忘记了。但《闻一多全集》的出版发行足以证明，它并没有被忘记，它是不会被人遗忘的。

新出版的这部《闻一多全集》，意义非常重大。一，是它的政治意义；二，是它的学术价值。闻一多先生是举国闻名的诗人、学者、革命家。作为诗人，他不是个一般的平凡的诗人，而是一个极不平凡的诗人；作为一个学者来说，他也不是个一般的平凡的，而是极不平凡的学者；作为一个革命家来说，他也不是个平凡的，而是一个极不平凡的革命家。

他二十四岁时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一出手即不平凡。他问：“为何更须烧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他后来就答复了这一问题。

二十九岁时出版的第二本诗集《死水》：他呐喊着：“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他又在《发现》一诗中说，“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他说出了他对于旧中国的绝望的语言，以及愤怒的语言。

他学的本是美术。但他首先却是诗人。一个追求真实的诗人。他一生都是忠贞的诗人，是忠于自己的信念和美的理想的诗人。他早就明言，他将以其生命殉身于诗的崇高职责。请看看他在1931年初的《诗刊》创刊号里发表的一首诗，就可以感悟到，他那时已是在静候着一个“奇迹”的来临：

“总不能没有那一天，/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
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吹不熄/灵魂的灯，情愿蜕壳化成灰烬，/不碍事：
因为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听见阖闾的户枢轰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的——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集外集》·《奇迹》）

他自己知道，并早已经描写了，有朝一日，他会被“雷劈”、“火山来烧”、被恶鬼“起来扑我”，（终于被手枪所击中，）而似“烧蜡成灰”、“蜕壳化成灰烬”，他将在最后，面对着这样的“一刹那”，而死去，为国牺牲了。（千万不可误以为这是一首爱情诗呵。）一扇“金扉”将接引他进入这“一刹那的永恒。”

他不仅是诗人，又是学者。他从研究远古的神话，到研究《诗经》，研究诸子百家，包括老子、庄子等，并研究了屈原《楚辞》，汉乐府诗，到唐诗，一直到当代的新诗。他是学者型的诗人，又是充满了诗人气质的学者。他钻研古籍，我看到过他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杀死蠹虫，给古籍以一种清新的气息。从远古的神话中，他考察了原始人的传奇和图腾。他分析了儒、释、道三家的哲理和各自的宗教。他是求索着中国人民的灵魂深处的隐秘意境。他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地。他踽踽独行在许多人迹罕至的学术领域中，只有很少人能够跟踪得上他。在这个领域中，我是没有能力来

作任何评论的。遗憾的是，他还没有能够完成他的探索，而在他正待收获的季节里，却被狠毒的无声手枪杀害了。反民主的独夫民贼，为什么会害怕到要杀害一个像他这样的诗人、学者呢？因为他是一个正义的学者，一个真理的诗人，又是一个自觉的革命家。

作为一个革命家，他具有最光辉的形象。很少有这样子勇敢的、无私的战士能赶上他的了！他为了声讨暗杀李公朴先生的法西斯分子，而公开地在云南大学的大礼堂上，作了他的《最后的一次演讲》，他大声疾呼道：“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踏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这样说了，考验也随着来到。他为真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预言过的《奇迹》出现了，《死水》流动起来，人民解放战争打响了！

现在，新版本的《闻一多全集》出版发行了，是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用了多年的时间编选而成，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校勘、出版、发行的。这一回真是出版了举世少有的一部好书了！

当我拿到了这部书之后，我好像走进一座巨大富藏似的宝库之中。它是这样丰富，这样的光彩夺目！我被他的第一卷诗集吸引住了；接着被他的第二卷的文论和杂文吸引住；被他的第三、四卷的神话和《诗经》上、下编吸引住了。第五卷是最动人的《楚辞》编和乐府诗编；第六、七、八卷尤为美不胜收的唐诗的上、中、下编；第九卷的庄子立时紧紧的吸引住了我，他把庄子的哲学和文学，尤其是文学，说得那么样精美和深刻；第十卷是文学史编、周易编、管子编、璞堂杂业编，语言文字编，真是太丰富了；而第十一卷的美术编，竟以他的素描、绘画、书刊装帧、书法和名振天下的他的金石艺术，图章的印谱给了我们无比的欣赏喜悦。最后，第十二卷的书简和日记编，一直把我引导到他的生命的最光辉的高潮去。这是多么好的一部书呵！出书，本是人间一项重要事情。其中，出好书，更是更重要的一项事业，它关系到人类精神文明的保存、传播、弘扬，以至于永恒。这部《闻一多全集》是我们现在的价值连城的好书，当代最可珍贵的精神遗产。

出好一部部的好书，和建设好一项项的工程是同样的重要和同样的困难的。在我看来，前者似乎还更重要更困难一点。三峡大坝、核工程、航天事业等，科技建设有一个依据定量、定性的数学程式和数理程序，比较具体。而精神文明建设则似乎还没有多少具体的尺度可以遵循。我们现在出了很多很多本的书，其数量真是很惊人的。但我们的书是很少再版的，出了就出了，究竟有哪些书是可以保留的，和永久保留下去的，就很难说。只是闻先生的这部书，原先曾是《选集》，硬是已经多次地多处地再版过的了。它在1948年出版时，只有四卷，逐渐扩大，现已扩大为《文集》十二卷了。它肯定将要一次再次，多次地增加和再版的。作为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永远保存下去。

关于诗的几句话 ——赠《华夏诗报》

《华夏诗报》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成功地团结了越来越多的华文诗人。它不分国界和地区，不管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等人为的（但也是自然而然的）划分的“国界”和地区，团结了华裔诗人。它是一份华裔的诗报。它将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五大洲华裔诗人的共同的诗报；将来还可以成为团结更多种文字的诗报；将来还可以为火星华人以及太空华人，以及为那里的诗报的作者和读者服务。前景无可限量。

有人问我最崇拜什么人？我回答：荷马，希腊诗人。我正在翻译荷马的史诗《依利阿德》（也有人译作“伊利亚特”的。）这是一首一万六千多行的长诗，是无量数、无姓名的游唱诗人，朗诵、说唱、合作、创造的巨著。荷马是第一个署名的诗人。我们都是他的后裔了。

但我也崇拜短诗的诗人。一行诗，即便墓志铭，用一句诗来概括人之一生，实在精美绝伦。二行诗可也了不得，许多有名的诗，最后只剩下两句，长久地或永久地流传。谁要能留下二行诗，也就得到永生的幸福了。三行诗有但丁的《神曲》为例。四行诗相当的多，我国称为“绝句”，真是绝了！五行诗并不少，六行诗较多，七行的较少，八行的，中国古代称“律诗”，数量很大，格律鲜明，佳作尤多。

我一贯佩服中国诗词格律严密，然而新诗却以自由诗为主，不讲究，或不太讲究格律。我把我们所有的自由诗，包括一些押了韵的自由诗，一律称为“散文诗”。肯定很多人不同意的，我请求他们谅解我。艾青写过一篇有名的大作《诗的散文美》，影响极大，但也产生一些反作用，格律被冷落了。他晚年编诗论集时，竟没有收进这篇好文章。大概是他现在认识到这篇文章有无形之中反对格律的毛病吧。

我译荷马是用诗体，用荷马史诗的原韵，叫作 Dactylic Hexameter，又叫“六步体长短格”，“长短格”固然不同于平仄，但也颇有一些“平仄”的味道。我很希望诗人们在创作时，稍稍注意于格律、音韵和平仄（新概念的平仄包括在内）。

自从有自由诗以来，八十多年中有三位诗人已可以有定评：他们是徐志摩、戴望舒、艾青，桂冠应敬给他们，纪弦也很不错是否可以加上他，不妨议论议论，听台湾诗友的意见。

女诗人呢？我心中已经判断有一位女诗人了，但不打算公开，以免引起徒然的论争纷扰。反正将来自然会有定评的。

我希望《华夏诗报》能长久地或永久地办下去，不要停刊，也不要膨胀，祝愿它办得更有生气，更精采，有名作出现，有盛名的大作问世！

最后要感谢主编，功勋卓著！想起他们的辛苦，难免还要受累，受点气，受点委屈，更要慰问、慰劳他们。此外的编者、校对者、发行者等，请接受我们的感激之情。

1993年4月4日

实现了一个美梦

1989年2月14日，我走进了武昌区一家天问电脑公司。经省委批准拨款，让我购置一台电子计算机。我选购了一台 Super PC/XT，是很一般的机子。因为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学会这玩意儿，也不敢贸然买一台好一点的机子。机子选定，格式化了。我当时就在机子上，输入了一句话：P（这）J（是）Q（我）G（一）TG（生）R（的）YB（高）IFJE（潮）。这样表示了我自己的希望。打完这一句，就起货装车。运回家里，安装在我书桌上，开始练习，用王永明的五笔字型 and Word Star 的编辑方法，让彩色的光在显示器的屏幕上从事写作和编辑。先头很慢，逐渐快起来。未一个月，就写出文章了。三年之后，比较熟练，已经完成了一部六十万字的长篇创作，并编辑了自己的《文选》一百多万字，还写了不少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电子计算机的作用确实不小。我的确进入了一个高潮。于是觉得老机子不太顶用了，要求更新设备。1992年，经省委再次批准拨款，买下了一台 386，这是比较高级的电子计算机，用上了香港金山公司的 WPS 的编辑方法，仍用五笔字的输入法，用得还好，但它缺字太多，一般办公够用了，文学作品却觉得不够用。它也是十年一贯制，改进不多，进步不大。譬如说，其实把《辞海》里所有的字，大部或全部输入电脑，也慢慢的到了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我的一个美丽的梦，只不过是那五彩的光，在显示器的屏幕前写作。然后，将写出来的东西储存起来，以便随时可以将它调出来修改。直到定稿，就拷贝到软盘上。然后，我可以用软盘将稿交给杂志社或出版社，让他们用激光排版系统，经过、或不经过校对，发表在杂志上，或印刷成书，出版问世。

这个梦想，在本世纪末，早该不成问题的了，因为国内已有许多出版社和印刷所都已置备了电脑排版系统。用电脑写作的作家虽不算多，却也不少。然而大多数出版物似乎还没有想到这样做，所以就在最近的几年内，我的梦想尚未能很容易实现。

我买了电脑后，开始写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写了六十万字，曾分三次发表于上海《收获》双月刊。第一次给《收获》的稿子是一份打印稿，第二次就寄去了一张软盘。心知此事在我国还是有史以来第一遭，我特地另带了一张软盘，亲自到上海去盯住这事。结果，编辑部说，我的软盘他们调不出来。我就去上海图书馆，找那里的计算机室，看看“上图”调得调不出来，自然调出来了。告诉了编辑部，有人笑我，“依徐迟格本事屠（大）来些”。本事再大也没有用，事实上他们和印刷所是订了合同的，刊物是排字工人用手排字的。一本刊物还有其他文章全是手排的，不能唯独一篇，却用电脑排版。我觉得颇有道理，就收回软盘，直至第三次交稿，都是交了电脑打印件。

《江南小镇》出书时，《收获》介绍给一省级出版社出书，他们请了一位专门人才当责任编辑，我很高兴。我寄去了全部打印稿供审稿，和一张小小的三寸半软盘，六十万字悉在其中，供电脑排版之用。我以为用电脑出书，这回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哪知他们来信说，由于电脑排版的费用太贵了，他们仍拟用手工操作云云。一闻此说，我不禁大失所望，甚至于七窍生烟，冒出火来了。我想已到 20 世纪的世纪末了，排字工人也干了一个世纪了。对我国出版界的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我简直不能容忍了。我回信直言，一定

要求用电脑印这本书，否则我就另找出版社了。那时我们还没有签订合同。然而他们那时还没有能准备好这样做。

在这之前，一国家级出版社曾向我约稿。我回信问道，如果我寄去一张软盘，他们能否读出来？当时我还另附去了一份电脑排印的程序图表。回信说，他们能读出来，并且能用电脑排印出书。这时我就找他们联系。他们表示可以按我的意图出我的书。这样不久后，我就和他们签订了合同。这事使我得罪了一些人，自然是没有办法可想的事，我也认罪。我向原先的出版社赔礼道歉，出版社则让我看了那位责任编辑在我先前寄去的打印稿上，确实是作了非常认真的和极为细致的编辑工作，更使我感到对不起他们。使我聊以自慰的是，我在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中，我没有让步，苦心坚持下来了。

1992年11月，我将去深圳避寒。之前，一家文艺出版社听说我已编好我的《文选》四卷，想给我出书。我的《文选》共十卷，卷一是诗，卷二是小说，卷三是报告文学，卷四是游记，共九十九万字。我本来还不想出它。因为全书尚未编定，还在编辑过程中。后来耳朵软，心也软，还是答应了，给了他们软盘，要求电脑排版。然后我就出门了，一出去就是半年。

过了年，到了今年，不觉已是三月，忽听说书快要出来。不大相信，如今书不可能出得那么快的。但是电脑排印，到四月就知道它果真快出来了。我购了飞机票，想赶回去看一看清样。不料同时接到两个邀请，一个要去惠州参加一个国际诗会，只好退了机票前去。会完后，又到蛇口进行另一个采访，等到回武汉，已是五月初。书已印好，正在精装，还要开个类似首发式的座谈会。这部《文集》就这样出版了，是最考究的精装本。我一辈子出书五十种，这部书出得最豪华了。而且，这是我一向希望的，作家用电脑写作，出版社用电脑编辑，印刷所用激光排版，一条龙，电脑一直干到底，又快又好。我的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一次，终于实现了！

但是，这部书不仅我没有看过清样，甚至可以说，不知怎的，是没有经过编辑校对的。这美丽的梦想确有这样的希望，电脑是完全可以一条龙把这件事做到底的。电脑甚至可以代替校对员给文稿进行校对，对讹别字进行修改和文字处理，作出许多神奇不过的事。可惜我们现有技术还达不到这个高水平。

我的美丽的梦想是实现了，但美中不足。因为这部《文集》里，误值是稍多的。我原来也想到过，它会不会在什么地方，出点什么毛病，可惜事先不知道会出在哪里，只有书出来了才能知道。现在书出来了，毛病也晓得了。就出在编辑未曾校对，而作者输入时，我的技术不佳，付印之前，没有看一次清样。

那国家级出版社对我的自传体长篇，竟看了四次校样。“一般我们只看三次校样，但老先生的这本书，我们给他看四次，”他们是这样说的。就这样，这本书五十七万字，也还有几个没有校对出来的讹别字。而《文集》，我一点儿也不怪出版社和它的编辑部。我交给他们的是软盘，虽交代过怎样编辑，但没有交代清楚，而且自己也没有提出来要看清样的事。看校样，看清样，本来是不费什么事，都习惯了的。现在补救的方法就费事了，至少是必须再来编它一个勘误表了。如能再版，就可以改正。最近我就在做这件事。过去从未做过电子的事业，都没有经验。“吃一堑，长一智”，大约不会再犯这种错了。

最近看《参考》，特别敏感的，看到它上面刊载了国内的许多新的排版

系统的广告，就感觉到了当前市场上竞争的激烈性。已感觉到，我国未来的出版事业，肯定会很快的全部电脑化的了。这是一条光明的尾巴，实实在在也是历史的必然：从勒石、刀笔刻竹简、毛笔写木简，从毛笔，自来水笔，圆珠笔，从木刻雕版，到毕昇的活字版印刷术，从石印、铜版、珂罗版、铅字排版，到电脑键盘和光笔写作，和五花八门的电子出版系统，这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了。

光明就在眼前，不仅出版业，而且在各行各业，都将这样。有朝一日，中国有一亿台的个人计算机了。我老是说这话的：“电子计算机救中国。”到那时，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也就是一个发达国家了。

1994年

王婆要卖瓜

——为《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自吹自夸

我写了一本书，去年出版了，在上海书店的《文史探索系列》中，是柯灵和范泉主编的。但是在这系列的已出版的十七种书中，它却像是踽踽独行的，单身一个。形单影只，孤苦零仃的。因为是光棍一条，它的心理是特别地，冷落地，寂寞的。

其实他来自十分热闹的地方，譬如，武汉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中的，气势磅礴，轰轰响着的平炉车间。在一千多度的高温下，炼钢工在炉前不能不用蓝色玻璃眼镜去观看，看火焰的飞舞，好看得很。不过没有到过炼钢炉前的人，对它自然是一般地漠不关心的。真让他们去看时，说不定还会汗毛凛凛的害怕得很，所以已看见过的人肯定是不多的。那里是多么光彩而精彩的重工业的前沿阵地呵！我们国家，经半世纪的努力，现在也能年产九千万吨钢了。多么叫人喜欢和兴奋呵！当我们能看到这样强壮的钢铁巨人之时。那年我写它，它像是一个还只有三十岁的刚成年的人呢，可是那时的一个车间，都已经年产二百万吨钢了。

书里还写了一个中华自行车公司：自行车的新概念。我国是世界自行车的最大的王国。但我们的自行车的概念，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是永久牌，是旧式的，虽然从数量上来说，十分庞大。而深圳这家公司所生产的自行车，却有成百上千种式样，我们的老概念就跟不上去了。自行车不光是一种运载器具，而且是体育的用品，不仅用之于平原，而且适宜于山地。至于赛车的车速之快，也已惊人之极。

关于华中电网，书中有两篇文章。第一篇写一个有如雷电之神那样的人物，说的是郑代雨，竟可以让二十二万伏高压电流通过他的身上而他绝不会触电，后来他又作了一次三十三万伏电流通过他的试验，第三次他竟然让高达六十万伏高压电流通过了他的身上，他仍然安然无事。当时，我就在现场上，他在高空中，强电流正通过他身上。我都不敢想这种情况，不觉低下头来。却给他看到了我在替他担心。何等心胸的人物！也还是他，把一条一千多米长的高压输电线，挂到两头都是一百三十五米高的跨越过长江的铁塔之上，我也上过这两座铁塔中的一座，那高处也吓得我胆战心惊。另外，也是他，把一百万千瓦的直流电流从葛洲坝一直送到上海。这相当于送了五百万匹骏马，长年不停奔驰的骏马送给上海市，让它们专为上海市效劳。

第二篇写的是计算机管理这华中电网的事儿。包含这篇在内，我一连三篇文章都是写的歌颂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的。请看，这里的两台小型机（只有冰箱大小，而且是输流使用的）竟可以管理多少多少座电厂呵，你也许无法设想，怎么冰箱大小就能织成一只蜘蛛网似的，把四省的发电和供电的电厂，结合成为一个超过了一千六百万千瓦的电力的网络，一手管理起来，能够让它们都听命于它，真是功勋莫大于它了。其实这又算什么，这不算什么。最神奇的是这《神机妙算的小型机》了，作为DEC公司的代理人的原某计算机公司的查树衡总经理真是很快地掌握了国际上的先进技术，能自己生产Vax3的产品了。到我写第三篇《攻主战场者谓主力军》时，他们的产品竟能管国营的巨大的自动化的化工厂了。我本想再写它一篇的，不幸咱们国家最擅长的内摩擦又一次发生了，只好使我们搁起浅来，暂时休息一下，欲知后事如何，只好且听下回分解了。

本书的另外三篇，一是《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原来发表于《人民文学》时的题目是《来自高能粒子与广漠宇宙的信息》，讲了许多作者自己也并未能完全理解的量子力学、狭义相对论和高能物理、天体物理学、广义相对论和统一场论，一大堆的真正难懂的理论物理学。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太重要了，呵哟！非同小可呵！作者本人是硬着头皮，啃了多少个深夜的这些生涩的天书，才粗浅地学到了一点点皮毛，在少许大专家和学者们帮助和指点下写了它出来的。在专家们看来，它们不值一笑，对于一般读者，又很有点难懂，我对不起读者了。要大家跟着我瞎闯，到细小到无法想象的，可又是美丽绝伦的一些微观世界里，而从中钻出来后，又要到大得莫老老的宇宙天体中间去，看星空里的恒星是怎么形成和（最近就有一颗）是怎样地死去的。很难懂！好在是，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我想总是不愁没有读者的。

那天，是1995年元旦，忽然来了一个加拿大“三一大学介子工厂”的加速器专家。我一见她，就兴奋无比，就请教她指点指点。承她不弃，讲了许多我真想知道的疑难问题呵，她答应要给我一些最新的粒子、介子、元素分析的材料。我等于接受了一次考试一样的，又问又答又问又答，总算通过了，不过判的分儿极差了。多少可以证明，我说的这些话并没有全是瞎说。我送了她这本小书，请她检查里面有错没有。承她不弃，回去马上送我一些补充材料。

此外，本书还有一篇写教育家顾乾麟先生的，据说他的事迹是很感动了许多知情者的。他设立的奖学金的成功率，是所有各式各样的奖学金中最高的。他造就了多少贫寒学子呵。当初写作那时还有不太好说的事，而现在我想是可以说的了，我国当代国际上最著名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幼年也曾得到过顾先生的帮助，而继续学习、成长，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人物，“固一世之雄也”。

最后一篇是，悼周霖教授的《哀诔祭》。这是一位建筑结构的力学专家的小传，有插图三幅，主要说明了一座建筑物，名叫“真武阁”的，它有一十二条柱子，其中四条名为“金柱”的柱子，是悬空，而不着地的。真是神了！这座建筑物由梁思成先生发现，他写有专文分析。而因为他不是研究结构力学的，所以他未能把它说清楚。周霖教授对之作了研究，用真武阁的实际上是用了老子的哲学理论，来理解了这一不落地的“金柱”的谜。这正是中国的智慧的又一个证明。这篇文章里面，我还对他深深地表示了无比沉痛的悲伤和哀悼，因为以他的智慧，应当做出多少的贡献来，但是他仅只要求完成的三件大事，却只能完成了一件半。他修复了一座永济桥。研究了一真武阁（可惜不能把它修建一下），而且他虽然已经设计了一座国家公园（而未能将它建起来）。让我再次引用我为他写的一篇碑文，来悼念他吧：

“临桂周霖，受业北京，水木清华，雕龙文心，洪钟虚受，执教南宁，幽谷无私，内涵深蕴，于公众事业，具献身精神，两件国宝，乃庆重生，复戴月披星，深入山林，意欲创建，国家园林，痼病在身，沥血呕心，忽兮身殉，魂焉飘零，壮志未泯，归于幽冥，山乡侗民，雨泣悲鸣，墓穴长眠，令誉长青。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以上介绍了这本小书的大体内容。自己觉得很得意的是这九篇东西所包含的份量并不是轻的。当然对于21世纪来说，它们确实算不了甚么。但对于我们当前的这个20世纪来说，它们多少还是能代表一点这一个世纪的中国的逐步的进步情景了吧。

我并不要说平炉炼钢很先进。它不先进，我的观念是落后了，我是不应该自鸣得意的。自行车，不用说，是只能作小范围来看的了。就这一代的电子计算机来说，它们也未免过于幼稚了些吧。在世纪末的 1995 年讲什么小型机，什么 Vax3，这些都已经是很过时的了。早在 1984 年里，美国未来学家奈许毕特就对我说过，将来的计算机要比现在的好得多多，现在的计算机还是原始的很呵。所以，这个王婆还要卖啥瓜呵！谁还要听你的 30 年代的量子力学呢？再过五年就要纪念它的一百周年诞辰了，再过十年就要纪念狭义相对论的一百周年诞辰了。确实今年是 X 光的一百周年诞辰，要开会，但不是要开会来纪念 X 光的发明而是要给 X 光照相送终的会。因为激光照相将要取代它来工作了。激光照相将比 X 光照相照得更清晰，用处更大，并且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但是，我也不能妄自菲薄的。悲哀的就在于我们的起点是这样的低。悲哀的就在于我们是这样的自满自足，实际就是不知我们的落后状态，只管自高自大。

在我的心中，为何充满了危机感。我害怕，我们的落后于现状可能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有人觉得日子很不好过。有人好像没有法子活下去了。21 世纪转眼就要到来，可是我们还在过着 19 世纪的精神生活，甚至还有在 18 世纪里生活的人。这怎么行呢？请问 1900 年，在中国，不是出过一个大乱子，连皇上和皇太后都从故宫逃难出去了，是逃亡到了西安去的，难道这还能忘记了？那时不是大家都相信了，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的吗？而过一百年，有些神话又出来了。这回出来当然进步得多了，连物理学的大主教不能研究出来的“场论”，现在我们已经有人在摆开场子来，要想作实验了。有人写了文章说人肉做的肚皮可以在长矛的尖尖儿上旋转，还拍了电视呢。可见功夫之深，不过这只是说说吧。然而，这也使人感到可悲就是了。看来王婆是卖不出瓜去的了。

八十述怀

一位朋友寄来了英国作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在他的晚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七十述怀》，到文末处还附着一大段《七五述怀》的短文，寄来的是中译文的复印件。朋友还写有一信，说到我这人有某些古怪的言行，好像和毛姆的性情很有些相似之处，可以供我参考：一读之后发现，果然有些相似，多多少少，可谓文人通病大致是差不离的。当时就想到，关于这七十和七十五岁的《述怀》，毛姆都已写出来了，但他没有写八十，因他没有活到这个年龄。而我正好临近了、到达了、又过去了八十大寿的大关，在卡子上，好像要查看我有没有边境出入证似的。乃写一个出来过过关。我很喜欢毛姆，他的作品很吸引我，但并不是好得不得了，似乎还没有达到文学大师们的高品位。然比我，当然要好得多了。我现在写了一首小诗，毛姆如若能看见的话，说不定也会赞赏一下的：

八十述怀

我已超越目前全世界，
人平均年龄的至高点，
感谢穹窿即我的大脑！
此外已不应该有别的意念，
多年来我好奇地瞧着，
这年月这天飞来到眼前，
欣然我接受这一奖赏，
死亡一瞬已在不远处闪现。

这是那祝寿的一天到来之前一天，自吟的一首小诗，自满之情，溢于言表。过了两天，这所谓诞辰的一天便来临了。我向来不做生日，七十那年正好客居在华盛顿，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里，只要我说一声，章大使和夫人一定会赏赐我一番庆祝的，我却没有吭一声，只顾独自过得安静。

我还记得，五十寿辰的那一天，我在马鞍山钢铁厂采访，没有吭声。其前一天，我国发射了第一颗氢弹，其后一天，赫鲁晓夫被罢免，下了台。我的生日前后有这样的两件大事，我那件好事正好插在中间。还是相应不理好。六十寿辰呢？那年我在沙洋农场的省干校的牛棚里，和一个大提琴家一起放牛，当然我那时，是不会不识相到自己来要求吃寿面的，让它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今年我八十了，省作协建议给我开一个创作讨论会，我婉谢了。临到此日，我已经外出，正好可以逃避开人群，我跟谁也没有来往，自个静静地躲在一个边境城市，某个“高处亦胜寒”的一座第八层高楼上，终日孤独，惟与书本与电脑为伍，怡然自得地过了这一天。

这些日子里，我读了不少本的奥妙书，除古典作品之外，还翻阅了如同上海版的国学丛书《陈寅恪评传》。他那么有学问，却受了那么多苦，打掉了那么多的胎儿，都是要写的书。台湾的高阳的《胡雪岩传》（因为书里他写了点我家乡的辑里丝销售到国外去的故事），也还比较好。也是台湾的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给鲁迅的“吃人”理论，作了细致入微的详尽注释，足证作者有卓越的见识，是中国第一本历史著作。西蒙妮·波伏娃的一本《第二性：女人》的译本，从心理学、生理学、女性学和人类学角度剖析了女人这“半边天”的永恒主题，虽然她并没有通体透明地能使人彻底的见到底，亦已是一本罕见的发挥到了目前少有的深度的专著。看了等等著作，都是觉

得很有意思的，能发人深省的。还有一本很神秘的、古怪的、深奥的书，叫作 BEYONDDEATH，副题叫 thegatesofConsciousness（超越死亡，意识的门洞），中译本却用《死亡探秘：人死后的另一种情况》作题目，也还有看头。世上既有这多的佳作妙品的书，真能多读一些，也值得快活一世。

偶读《蒲桥集》

连续七年都到南方新城深圳过冬。说是为了市场经济这新鲜玩意儿而去，实在却成了为过冬天到暖和些而后归。今年决定不做南飞燕，留下来在武汉过年过冬。不觉过了冬至，到了小寒。还不算太冷，靠空调送暖风度日。家居无事，就看书，便看了《蒲桥集》。

我并不喜藏书，有书十余架。屋小显得书多，受来访者赞美。其实没什么书，好看的书都被人弄走，剩下的都是不好看的书，人家不要的不看的。许多书，失败在书名不吸引人，这《蒲桥集》可为一例。偶从架上抽下的这本书，是作者之名还有点吸引力。在手边放了几天没有打开来读，没有料到书极有味。十来天了，只读了一半，还有半本未读，是舍不得读。怕一下子读完了便没得书读。读上二三十页赶快停止，以辨别滋味，细细咀嚼，有所享受。这样的书现在很不容易见到了。其实这本书再杂碎也没有的了。但就是因其太杂碎，不少有味的内容，不想为了快我朵颐，不必一口气都把它吞掉。我很佩服这位作者汪曾祺是吉祥、安详的人，能摆弄出这样一本平淡无奇而又天然成趣的书来。我少见多怪，却又怡然自得。这些年找我写序、写评论的事好像成了我的专业，但能推掉的就决不写，而这一次却自己手痒起来了，想写一点什么。

汪君我是认识的，但不熟。我在编《诗刊》时，发过他的几首诗，只记得一首两行的小诗，原文也记不得了，只是那个意思：旗帜就是缚在杆子上的波浪，或者是：波浪就不是缚在杆子上的旗帜。我当时很欣赏，现在也很欣赏。此外就一概都无记忆。对我来说，有一个人就因这一个记忆而永生了！当然他是现实主义者，这样的波浪，或者说，这样的旗帜，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太多太多了。而我们的生活中确也有多少是缚在杆子上的旗帜呵！

汪君也是认识我的，有一次在我们和汉学家一起举行的会上，他突然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说了点什么话。但那时我只记得他的那两句话，而不认得他这个人了，就未热情对话。他也就没有再来找我，把我看成一个过了时令的人。这些都和现在我读《蒲桥集》无关的。不过这一来却让我看见了这个人，个子不高，中年偏上，矮墩墩地，并无风流倜傥的神气，朴素实在，有书卷气，妙语惊人。

这次，偶然的，翻了一翻书皮，见金岳霖三个字，就找出一读，想到的却是林徽因。果然读到，但只是很少的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却极不平凡，令人震抖。因为林徽因是著名的才女，与梁思成、金岳霖组成了一个三角。梁因林而受了伤，林乃嫁给了梁。金终生不娶，是旧时代流传下来的佳话。《蒲桥集》第79页，有三行文字记录着：“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这里，汪先生只56个字，标点在内，记录了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谁也想不到逻辑学家、大教授有着这样深挚的恋心！可谓美谈。

《蒲桥集》有61个小标题，都很有趣。可以对它不屑一视吧，或者不屑一顾的吧。其实不然，细心一读都还有不少的内容呢。而且文风也好，很有讲究。内容丰富得不得了，随便翻开一页来读，都可以让读者不费力气地读到从前没读到过的东西。作者自述，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过他作文课，曾出过一个题目，叫“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还有一

次出了个“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从这两题目着想，可写的内容就有不少。《蒲桥集》写沈从文的有三篇，都写小事情，如在家乡听傩戏，弋阳腔，打鼓的是一个七十多的老人，沈先生听了说，“这是楚声！”听得他泪流满面。现在楚声真是听不到了。我曾写一封信问过沈先生关于楚舞，问他长阳县跳殇是否“国殇”？回信建议我录音录相，另外谈他自己的事。

又有“沈先生家里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的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他《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撷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这一段73个字，标点在内，细腻动人。

还有一篇《严子陵钓台》，只两千字，谈严子陵肯定其人，以范仲淹之说作证明。说范仲淹一生只留下两篇散文，一篇《岳阳楼记》，写得极好。一篇《严先生祠堂记》，最后四句歌尤为千载传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汪曾祺认为：范仲淹是政治家，功业甚著，他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很入世的，为什么又称颂严子陵这样出世的隐士呢？想了一下，觉得这是称颂范仲淹的两种读书人的尺度，也是中国读书人的两面，这样的两面常常存在于一个读书人之上：成功与隐逸。或者各偏于一面，也无不可。范仲淹认为严子陵的风格可以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我想即到今天，这对人的精神还是有作用的。汪曾祺的这一段话，很有道理。可惜我到钓台走过两次，却一次也没有进那里的祠堂去读那篇文章，没有强烈肯定严子陵风格的勇气，但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最后还是认识到了严先生的伟大的。

总之，《蒲桥集》是一本好看的，好玩的好书，我喜欢看，并推荐它。如果一定要找出它的一点儿什么缺点来，那就是，它实在也是太琐碎了一点儿。

西方古典之于我

我生在父母亲所办的贫儿教养院的家庭中，有钢琴、小提琴和整套的一副铜管乐队，似乎可以解释为何我稍大就喜欢了西洋音乐。小时最喜欢在铜管乐队的中间听排练，虽然没有什么名曲，但除了双簧管没有，其他乐器一应俱全。稍长，我自己也学过吹小洋号，学过亨德尔的 Largo，但没有学下去。

高中时，参加过郁郁星先生指导和指挥的口琴队，吹过《双鹰旗下进行曲》及一些歌剧选曲。还有一年喜欢了好莱坞的电影插曲。20岁进大学后，就对西方古典音乐入了迷。听唱片，竟然在22岁时就听起贝多芬的《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号来了。这一套唱片五张，听得如痴似醉。但后来再未听过。那时的唱片中，男高音的卡鲁素的曲子很多，钢琴曲听不大懂，小提琴喜欢艾尔曼的和克莱斯勒等的小曲。指挥是托斯卡尼尼和斯托可夫斯基等等。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把丰子恺和王光祈的音乐的有趣故事和难懂的理论书都读过了，并开始读洋书中音乐学的评介作品，还记得有一本是Olin Downes（奥林·唐斯）的《音乐的诱惑》The Lure of Music。我曾经开过一张书名单子，说明我所藏音乐书本十分浅陋。Downes的书引起了我要写一本《歌剧素描》的兴趣，这是我编译的第一本音乐书，寄到商务印书馆就被接受，拿到一百只大洋的稿费。

那时我交了一个音乐家的朋友陈歌辛，不断的往来，交流音乐思想。我很受他的影响。很后悔我当年没有跟他学一点乐理及和声学，连一点儿音乐的基本知识也没有好好地向他讨教。可见当时我的水平甚低。但很奇怪的是我的音乐热情却很强烈，是不一般地强烈。音乐迷住了我。我发现别的诗人和作家都没有像我这样的热爱着音乐的。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到兰心大剧院去听上海工部局乐队演奏的那场星期音乐会。那时也并没有怎么听懂那些名曲，但总是听得似醉如痴的。当那个乐队有一次演出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时，我正在一百公里外的家乡教中学。当天早晨乘轮船转火车到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去听了一场，连夜赶回去。但觉我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动，一点也不知道这个“贝九”有多么深邃的内容，那时也没有席勒的《欢乐颂》的译文。似乎对那宏伟的音乐结构已经略有所悟。听完还正尔正经地写了一篇音评，在刊物上发表。

继《歌剧素描》之后，我写了《世界之名音乐家》和《乐曲及音乐家的故事》。这一共三本书，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自1936至1938年，一年出一本，最后一本由萧友梅先生推荐为音乐必读书之一。三本书把西方古典音乐自派莱斯特里那以来，到德彪西所有著名作曲家几乎都介绍了。那时隐然有当一个音乐学家的念头。

抗战时期在香港，我与小提琴家赵石炜交上了朋友，经常往来。从德国回来的女钢琴家姚锦新专为我演奏了她要在香港演奏的音乐会曲目。我为她写了关于她的音乐技术和她要演奏的乐曲的介绍，我很有点像当时香港音乐界的音评家的派头，有一股大言不惭的样子。有人对当时对姚演奏的音乐评为《贵族的音乐和音乐的贵族》引起一场争辩。我坚决反驳，举出贝多芬这样民主主义思想的音乐家为例，说过“怎么样也不能把他说成是一个‘贵族’”之类的话。

接着到了重庆，我不仅成了盛家伦、斯义桂、叶怀德、戴粹伦、林声翕、王义平他们的热情的朋友，而且后来成了中华乐团和马思聪、王人艺、黎国荃的朋友，每有他们的演奏会我就写文章捧场，叫好；还写过《音乐会怎么能抽‘娱乐税’》这样的文章。我之和马思聪结成至交，有着极为珍贵友谊是我最快活的一件事。我开始想过，将来要给他写一部传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马和丁善德、李德伦等成立了上海音乐界协会，我参加了宣传组的工作，也算音协的会员了。当然我是不合格的会员，因为酷爱音乐的业余爱好者可以成立他们自己的 Philharmonic 协会，但作为音协的会员我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这种爱好到开国以后一直保持着，1958 年以后买了大量的三十三转的音乐唱片，和后来出现的立体声唱片。在我家中，一天到晚开着唱片；我写作时都听着唱片，随着乐势而写作。有一次，小说家安危来湖北作协看我。我指着唱机对着他说：“这是我的灵感的源泉。”他每次开会，有机会就用这话来批评我：“他把音乐作为他的创作的源泉！音乐能作为创作的源泉吗？不能，只有生活才是源泉。”他说他的，我笑而不答，跟他没有道理可讲。

到了音乐匣子时代我又大买其录音匣子的音乐，听得高兴极了。逐渐到后来，不买小匣子了，我要买成套的多幕歌集、奏鸣曲全集、协奏曲全集等等的大匣子了，总之许多年来总要听音乐，还买了格罗夫的《音乐与音乐家》百科全书二十卷，如此等等。总之这一生从音乐中得到了不少安慰与快乐。但是忽然现在不大听音乐了，我听激光唱片时，就不很高兴，激光那种澄清的音色缺少了些感人的东西，再则演奏的速度太快，技巧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听着听着就没有味道了，最近听贝多芬晚年的五个弦乐四重奏和一个《大赋格曲》的成套激光唱片时，竟没有如 30 年代那时那样的激情和狂喜了，虽然也有点润湿了眼泪水，那是因为惹起了青年时期的回忆了。

为什么会如此变化？我自己也回答不了。听了六十多年的音乐，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原因很复杂，一时说不清楚。看以后能否用文字来表达我的这一剧变？

